主编　阎纯德　吴志良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列国汉学史书系

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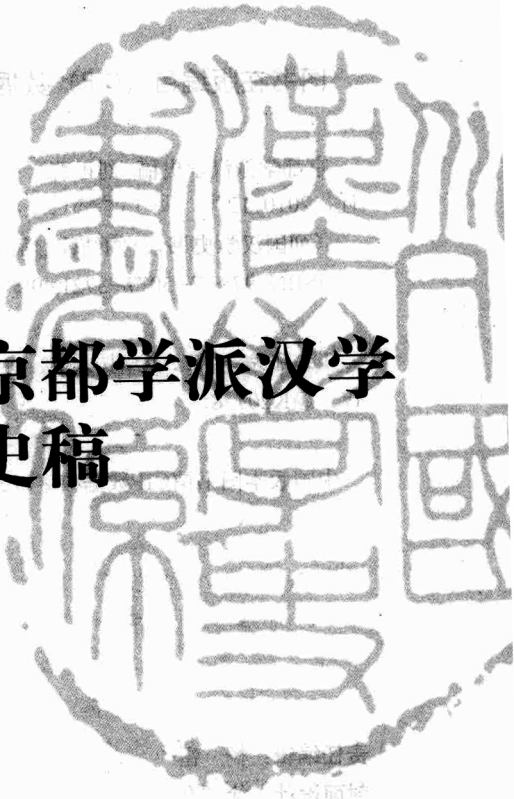
刘　正　著

學苑出版社

北京语言大学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刘正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刘正著．-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2
（列国汉学史书系/阎纯德，吴志良主编）
ISBN 978-7-5077-3721-9

Ⅰ．①京… Ⅱ．①刘… Ⅲ．①汉学-研究-日本 Ⅳ．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8659号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　67678944　67601101（邮购）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河北金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　　张：22.75
印　　数：1500册
版　　次：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5.00元

本书系之出版获澳门霍英东基金会与澳门基金会资助

北京语言大学列国汉学史书系
编辑委员会

顾　问：季羡林　李学勤　汤一介　王路江
主　任：崔希亮
副主任：韩经太
主　编：阎纯德　吴志良
编　委：王晓平　乐黛云　安平秋　许光华　刘顺利
吴志良　张国刚　严绍璗　李明滨　李海绩
陈开科　周发祥　侯且岸　柴剑虹　钱林森
耿　昇　阎纯德　阎国栋　熊文华

序　一

经过近30年多位学者的辛劳努力，现在我们可以说，国际汉学研究确实已经成长为一门具有特色的学科了。

“汉学”一词本义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的研究，而在国内习惯上专指外国人的这种研究，所以特称“国际汉学”，也有时作“世界汉学”、“国际中国学”，以区别于中国人自己的研究。至于“国际汉学研究”，则是对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外都有学者从事国际汉学研究，但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中国学术界的国际汉学研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汉学研究改变了禁区的地位，逐渐开拓和发展。其进程我想不妨划分为三个阶段：一开始仅限于对国际汉学界状况的了解和介绍，中心工作是编纂有关的工具书，这是第一个阶段。到了20世纪90年代，出现国际汉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大量翻译和评述汉学论著，应作为第二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里，学者们为深入研究国际汉学打好了基础，准备了条件。新世纪到来之后，进入全面系统地研究国际汉学的可能性应该说业已具备。

今后国际汉学研究应当如何发展，有待大家磋商讨论。以我个人的浅见，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考察应当并重。国际汉学研究不是和现实脱离的，认识国际汉学的现状，与外国汉学家交流沟通，对于我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以至于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曾经提议，编写一部中等规模的《当代国际汉学手册》，使我们的学者便于使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要组织出版《国际汉学年鉴》。这样，大家在接触外国汉学界时，不会感到隔膜，阅读外国汉学作品，也就更容易体味了。必须指出的是，国际汉学有着长久的历史，因此现实和历史是分不开的，不了解各国汉学的历史传统，终究无法认识汉学的现状。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汉学史的著作及论文。实际上，公推为中国最

早的汉学史专书，是1949年出版的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尽管是通史体裁，也包含了分国的篇章。这本书最近已有经过校勘的新版，大家容易看到，尽管只是概述性的，却使读者能够看到各国汉学互相间的关系。由此可见，有组织、有系统地考察各国汉学的演进和成果，将之放在国际汉学整体的背景中来考察，实在是更为理想的。

这正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推荐阎纯德教授、吴志良博士主编的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的原因。

阎纯德教授在北京语言大学主持汉学研究所工作多年，是我在这方面的同行和老友，曾给我以许多帮助。他为推进国际汉学研究，可谓不遗余力，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学术界周知的。在他的引导之下，《中国文化研究》季刊成为这一学科的园地，随之又主编了《汉学研究》，列为《中国文化研究汉学书系》，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其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直敬服无地。特别要说的是，阎纯德教授这几年为了编著这套“列国汉学史书系”所投入的心血精力，可称出人意想。

在《汉学研究》第八集的《卷前絮语》中，阎纯德教授慨叹：“《汉学研究》很像同人刊物，究其原因是因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学者太少，尤其是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每一集多是读者相熟的面孔。”现在看“列国汉学史书系”，作者已形成不小的专业队伍，这是学科进步的表现，更不必说这套书涉及的范围比以前大为扩充了。希望“列国汉学史书系”的问世成为国际汉学研究这个学科在新世纪蓬勃发展的一个界标，让我们在此对阎纯德教授、这套书的各位作者，还有出版社各位所做出的劳绩表示感谢。

李学勤

2007年4月8日

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

序　二

汉学历史和学术形态

历史是既抽象又具体的存在，是浩瀚无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会让我们兴奋，也会使我们悲哀，有时会令人觉得它又仿佛是一个梦。但是，当我们梦醒而理智的时候，便会发现——自然史、时间史、太阳史、地球史、人类社会史，一切的一切，不管是曾经存在过的恐龙，还是至今还在生生不息的蚂蚁社群，天上的，地下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切都有自己的历史。一切都有过发生，一切都还在发展，一切都还会灭亡。

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有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孕育过程，“汉学”(Sinology)也是这样，其孕育和成长，就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相互交媾浸淫的历史。这个历史，始于公元1世纪前后汉代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接下来是7—8世纪的大唐帝国、14—15世纪的明代、清末的鸦片战争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之潮时起时伏直到今天。这是历史，是汉学的昨天和今天，孕育、发生和成长的过程显现出的文化精神。但是，昨天有远有近，我们可以循蛛丝马迹探讨，找回其真；而今天，只是一个过渡，一俟走过，便成为昨天的陈迹。写作汉学史是一件艰难的劳作，尤其对象是遥远的昨天，尤其是“遗失”在异国他乡的昨天，更非一件易事。时至今日，朦胧面纱下的汉学还不为一些学人所认识，因此有必要取下面纱，让人们看个究竟。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尤其90年代以降，“汉学”(Sinology)便逐渐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术名词。中国大陆重提“汉学”(Sinology)至今，汉学就像隐藏在深山里的小溪，经过30年的艰辛跋涉之后，才终于形成一条奔腾的水流，并成为中国文化水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个变化是时代和历史变迁带来的结果，也是文化自己发展的规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汉学(Sinology)呢?首先,这里的汉学非指汉代研究经学注重名物、训诂——后世称"研究经、史、名物、训诂考据之学"的"汉学",而是指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语言、哲学、文学、艺术、宗教、考古及社会、经济、法律、科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那种学问,这起码已是200多年来世界上的习惯学术称谓。李学勤教授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汉学',英语是Sinology,意思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学术界,'汉学'一词主要是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等的研究。有的学者主张把它改译为'中国学',不过'汉学'沿用已久,在国外普遍流行,谈外国人这方面的研究,用'汉学'比较方便。"① Sinology一词来自外国,它不是汉代的"汉",也不是汉族的"汉",不指一代一族,其词根sino源于秦朝的"秦"(Sin),所指是中国。

在历史长河里,汉学由胚胎逐渐发育成长。虽然在1814年12月11日,法国法兰西学院才有第一个被称为西方汉学起点的汉学讲座;但指代汉学的"Sinologie"(英文"Sinology")一词则出现在18世纪末,早于由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emusat)主持第一个汉学讲座的时间,更不会晚于1838年。从此之后,"Sinology"便成为主导汉学世界的图腾,约定俗成的学术"域名"。在世界文化史和汉学史上,外国人把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研究中国学问的造诣深厚的学者称为"汉学家"。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必要标新立异,根据西方大部分汉学家的习惯看法,"Sinology"发展到如今,这一历史已久的学术概念有着最广阔的内涵,绝不是什么"汉族文化之学",更不是什么汉代独有的"汉学",它涵盖中国的一切学问,既有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也包含"敦煌学"、"满学"、"西夏学"、"突厥学"以及"藏学"和"蒙古学"等领域。但是一直以来人们对汉学的理解和解释相左,因此便有了"中国学"、"海外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汉学"、"国际汉学"、"世界汉学"等不同的叫法;如果咬文嚼字,推演下来,一定还会有"国内汉学"、"国内中国学",甚至"北京汉学"、"河南汉学"等。由于汉学的发展、演进,以法国为首的"传统汉学"和以美国为首的"现代汉学",到了20世纪中叶之后,研究内容、理念和方法,已经出现相互兼容并包状态,就是说Sinology可以准确地包含Chinese Studies的内容和理念;

① 李学勤《国际汉学漫步·序》,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从历史上看，尽管 Sinology 和 Chinese Studies 所负载的传统和内容有所不同，但现在却可以互为表达同一个学术概念了。话再说回来，对于这样一个负载着深刻而丰富的历史内涵的学术“域名”，我以为还是 Sinology 最好，因为，Sinology 不仅承继了汉学的传统，而且也容纳了 Chinese Studies 较为广阔的内容。另外，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应该称为国学，而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那种学问则称为汉学。这样，汉学既符合中国文化的学术规范，又符合世界上的历史认同与学术发展实际。

汉学的历史是中国文化与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是外国学者阅读、认识、理解、研究、诠释中国文明的结晶。汉学作为外国人认识中国及其文化的桥梁，是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撞击后派生出来的学问，实际上也是中国文化另一种形式的自然延伸。但是，汉学不是纯粹的中国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既是中外文化的“混血儿”，又是可以照见“中国文化”的镜子，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Sinology’是一门在国际文化中涉及双边或多边文化关系的近代边缘性的学术，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在‘跨文化’的层面上各自表述其研究的结果，它具有‘泛比较文化研究’的性质。”① 以上两种表述虽有不同，但学理一致，基本可以厘清我们对于 Sinology（汉学）的基本学术定位。

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说过：“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也说：“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审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② 他在《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提出：“我们选择出发，也就是选择离开，以创造远景思维的空间。人们这样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为了获得一个“外在的视点”，他才从遥远的视点出发，并借此视点去“解放”自己。这便是一个未曾断流、在世界上仅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之一的中国文明的意义。中国文明是一道奔流不息的活水，活水流出

① 严绍璗《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和思考》，2006 年《世界汉学》第四期。

② ［法］弗朗索瓦·于连（François Jullien）《迂回与进入》，中国香港三联书店，1998 年。

去,以自己生命的光辉影响世界;流出的“活水”吸纳异国文化的智慧之后,形成既有中国文化的因子,又有外国文化思维的一种文化,这就是“汉学”。也就是说,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另一种文化精神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汉学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抑或说是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有着独立个性的文化。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具有跨文化性质的学科,是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借鉴的结果。汉学对外国人来说是他们的“中学”,对中国人来说又是西学,它的思想和理论体系仍属“西学”。

汉学研究是指对外国汉学家及其对中国文化研究成果的再研究,是中国学者对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反馈,也是对外国文化借鉴的一个方面。凡是对历史或异质文化进行研究,都有一个价值判断和公正褒贬的问题。因此,对于外国汉学家对于我们中国文化的研究,必得有我们自己的判断,然后做出公正的褒贬。我们说汉学是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但是这句箴言并非只是适用于中国人,对外国人也是一样。汉学也像外国的本体文化一样,对我们来说有借鉴作用,对西方来说有启迪作用——西方学者以汉学为媒介来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完善自己的文明。人类由于文化背景差异和文化语境的不同,思维方向和方式也会不同,因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讲出不同的道理。“西方学者接受近现代科学方法的训练,又由于他们置身局外,在庐山以外看庐山,有些问题国内学者司空见惯,习而不察,外国学者往往探骊得珠。如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诸多领域,时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①] 汉学的学术价值往往不被国人重视,并利用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一些误读贬低汉学的价值。其实,这并不公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其独到的见解,能发中国人未发之音。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enri Maspero,1883—1945)对中国上古文化和上古宗教的研究就有独到的贡献,被称对中国宗教研究有“先河”之功。他研究中国宗教的宗教社会学的方法,促进和推动了中国学者采用宗教社会学来研究中国宗教,被称为“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真正创始人”。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终生的最高成就是根据研究古代韵书、韵图和现代汉语方言、日朝越诸语言中汉语借词

① 季羡林《汉学研究·序》第七集,中华书局,2003年。

译音构拟汉语中古音和根据中古音和《诗经》用韵、谐声字构拟古音，写出了著名的学术专著《中国音韵学研究》、《汉语中古音与古音概要》、《古汉语字典重订本》、《中日汉字形声论》、《论汉语》、《诗经注释》、《尚书注释》和《汉朝以前文献中的假借字》等，他对汉语音韵训诂的研究是不少中国学者所不及的，并深刻影响了对于中国音韵训诂的研究。20 世纪著名的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甚丰，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人事本位文化”，其核心是“帝王文化”，其他认识上尽管有偏颇，但也有其独异性和深刻之处。这就是“他山之石”的意义和价值。当然，不可否认，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读或歪曲也是常见的，诸如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John Gunnar Andersson)于 1921 年 10 月对河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之后，便说中国彩陶制作技术源于西方，并在他的《甘肃考古记》和《黄土儿女》著作中反复强调他的这一错误观点。这一观点亦为“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提供了说辞。日本学者石田幹之助也推波助澜，闭门造车地推测出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甚至连我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刘师培也被“忽悠”得认可了“中国文化西来说”。[①] 美国现代汉学(中国学)的奠基人费正清对中国历史尤其近代史的研究独具风采，为美国人民认识中国搭建了一座桥梁；但他在研究上的所谓“冲击—回应”模式，却近乎荒谬，认为是西方给中国带来了文明，是西方的侵略拯救了中国。综上所述，对于汉学成果的研究，只有冷静、公正、客观、全面，才能在沙中淘得真金，拥抱“他山之石”。

在中国，汉学的接受与命运，诚实地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是无视它的学术价值，更没人把它看做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此外，由于民族心理上的历史“障碍”，我们还曾视汉学为洪水猛兽，甚至觉得它是仇视中国、侮辱中国的一个境外的文化“孽种”。这种“观点”，虽嫌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自 19 世纪“鸦片战争”前后，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偌大的中国曾经惨遭蹂躏，整个历史写满了炮火压迫和宗教怀柔，其间也不乏为列强殖民政策服务的传教士、“旅行家”和“学者”深入中国腹地，以旅行、探险、考古之名而实行搜集社会情报、盗窃和骗取中国大批文物。

---

① 《章太炎全集·〈訄书·序〉·〈种姓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思念祖国〉·〈华夏篇〉·〈国土原始论〉》。

人类思想的飞翔，是受社会和历史禁锢的，山高水远的阻隔也使得人类互相寻找的岁月特别漫长。交流是人类文化选择的自然形态，汉学就发生在这种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之中。

公元前后，中国人被称为赛里斯（Seres），中国叫赛里加（Serice），这是陆路交往关于中国最初的叫法，时间较早；另一种叫法，把中国人称为秦尼（Sinai），中国叫秦（Sin），这是海路交往关于中国的叫法，时间较晚。由商人输往西方的中国丝绸绢绘是当时帝王贵族倾慕的奢侈珍品，Seres 和 Serice 两字系由阿尔泰语所转化，是希腊罗马称谓中国绢绘的 Serikon、Sericum 两字简化而来。西方人当时称中国为“秦”（Sin），称中国人为“秦尼”（Sinai），则是源于秦朝。①

人类在互相寻找的初级阶段，中国和西方试探性的商业交往还很原始，那时的人类，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族群处于相对落后和封闭的状态，人类各个角落的不同文化还处于相对不自觉或是相对蒙昧的历史时期。在人类最早的沟通中，中国人走在最前边。公元前 139 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越过葱岭，亲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等地，直达地中海东岸，先后两次出使中亚各国，历时 10 多年，开创了古代和中世纪贯通欧亚非的陆路“丝绸之路”，为人类交往开创了先河，也为汉学的萌发洒下最初的雨露。

在文化史上，以孔孟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先影响朝鲜半岛，然后才是日本和越南等周边国家。这些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复杂，甚至被说成同种同文，因此可以说它们的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公元 522 年，中国佛教渡海东传日本，从那时开始，中国典籍便大量传入日本，但这只是一种“输入”，只是日本创建自己文化的借鉴，并没有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层研究。及至唐代，由于文化上承接了汉朝的开放潮流，那时与异质文化的交流相对更加频繁，商贸往来和文化沟通有了发展，西方和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域的人士通过陆路和水路进入中国腹地，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城市，都是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汇的重要都会，尤其是前者，更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商业文化之都；而后者，由于东南沿海经济崛起、人口增多、手工业发达、农田水利的改善，为海外贸易发展创造了

① 莫东寅《汉学发达史》，北平文化出版社，中华民国 38 年，第 3 页。

条件，再由于唐代中期“安史之乱”切断了陆路“丝绸之路”的缘故，曾称为“鲤城”、“温陵”、“刺桐城”的泉州，便成为联结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第一大港”，是那时以丝绸、金银、铜器、铁器、瓷器为主的国际贸易之都。通过频繁的往来和交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汉学也便在这种交流中不知不觉慢慢衍生。

但是，源远流长的汉学，人们习惯地认为其洪流和网络在西方，西方是汉学的形象代表。这一看法一是源自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和中国人的崇洋心理；二是西方汉学的某些特征也确实有别于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汉学。其实，如果我们从世界汉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学要早于西方的汉学，比如日本在十四五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了汉学，而那时西方的传教士还没有进入中国。因此，对于汉学的研究，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我们都不能顾此失彼，要以同样的关注和努力探讨其历史。当然，汉学的历史藏在文献里，而隐性源头却在文献之外。

文化往往伴随经济流动，其交流也会在不自觉或无意识状态下发生。到了明代初年，郑和率舰队出使西洋，前后 7 次，历经 28 年，到过 30 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红海口，真正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

在公元八九世纪至十六七八世纪期间，关于中国，多见于西方商人、外交使节、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文化人所写的游记、日记、札记、通信、报告之中，这些文字包含着重要的汉学资源，因此有人把这些文献称为“旅游汉学”。这些人的东来源于文艺复兴，因为思潮的开放影响了欧洲人的思想和生活，他们或通商，或传教，或猎奇，但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却是一致的，于是汉学便在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荷兰、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主要的西方国家逐步发展起来。

这类游记和著作较早的有约在公元 851 年成书的描述大唐帝国繁荣富强的阿拉伯佚名作者的《中国与印度游记》，吕布吕基斯的《远东游记》（1254），意大利的雅各·德安克纳的《光明城》，贝尔西奥的《中华王国的风俗与法律》（1554），《利玛窦中国札记》，亚历山大·德·罗德的《在中国的数次旅行》（1666），南怀仁的《中国皇帝出游西鞑靼行记》（1684），费尔南·门德斯·托平的《游记》，李明的《关于中国现状的新回忆录》（1696）和《中华帝国全志》（《中国通志》）等，以及罗明坚、金尼阁、汤若望、卫匡国

等名士的著作,还有大量名不见经传的传教士、商人、旅行家、探险家的各种记述,都成为日后汉学兴旺发达的必然因素。这类著作主要涉及中国的物质文明,较多描述、介绍中国的山川、城池、气候,以及生活起居、饮食、服饰、音乐、舞蹈,也涉及一些中国的观念文化。这些"旅游汉学"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马可·波罗纪行》(《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5年随父亲和叔父来中国,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1295年回国后出版了这本书,它以美丽的语言和无穷的魅力翔实地记述了中国元朝的财富、人口、政治、物产、文化、社会与生活,第一次向西方细腻地展示了"唯一的文明国家"——"神秘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些包罗万象的文献,不仅记录了不同时代的中国,还以自己的文化视角开始了中西文化最初的碰撞。作为文献,这些游记、日记、札记、通信和报告,有赞美,有误读,也有批评,但因为其中包含大量中国物质文化及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宗教、科举等多方面的文化记载,而成为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术史上有重要价值。

汉学的发生、发展与经济、政治、交通以及资讯分不开。有学者把汉学的历史分为"萌芽"、"初创"、"成熟"、"发展"、"繁荣"几个时期,也有的分为"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三个阶段。但汉学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末兴起的"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的互动之中。

从16世纪到十八九世纪,在数以千计的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中,有不少人成为名载史册的汉学先驱,他们为汉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1540年罗耀拉(S. Ignatins de Loyola)、圣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Xavier)等人来华,开始了以意大利、西班牙传教士为主的第一时期的耶稣会的传教活动。接着,意大利的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罗明坚(Michel Ruggieri)等著名传教士来华。1583年,即明朝万历十一年,罗明坚将利玛窦神甫(Matteo Ricci)带到中国,从此,耶稣会士在中国的宗教活动无论是对于西方或是东方,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西班牙的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的《中华大帝国史》于1588年问世,这部世界汉学史上的第一部汉学著作,名副其实地对中国的政治、历史、地理、文字、教育、科学、军事、矿产、物产、衣食住行、风俗习惯等做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以七种文字印行,风靡欧洲。以利玛窦为核心的耶稣会士的历史意义在于他们开始了对中国文化

的全面“开垦”，不仅著书立说，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文化经典译成西文，不仅开西学东渐之先河，也推动了中学西传，使中国文化对西方科学与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这位思想家当仁不让地被视为西方汉学的鼻祖。与其先后到达中国的著名的传教士都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对推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做出了贡献。在世界汉学史上，除了以上提及的，还有许多汉学家的名字十分响亮，诸如曾德照、柏应理、卫匡国、殷铎泽、南怀仁、汤若望、龙华民、金尼阁、罗如望、熊三拔、李明、张诚、白晋、马若瑟、宋君荣、钱德明、翟理斯、安特生、雷慕沙、儒莲、德理文、安东尼·巴赞、蒙田、冯秉正、尼·雅·比丘林、巴拉第·卡法罗夫、瓦西里耶夫、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斯文赫定、马礼逊、斯坦因、理雅各、翟里斯、李约瑟、韦利、霍克斯、卫礼贤、福兰阁、孔拉迪、高本汉、卫三畏、费正清、戴密微、石泰安、谢和耐、欧文等。他们和东方日本、朝鲜半岛的富有建树的汉学家以及当今散布在各国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铸造成汉学史上的思想学术之碑，开垦了汉学成长的沃土。

“西方的汉学是由法国人创立的。”但是，在欧洲全面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上，“法国的先驱是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①] 戴密微把以上三个国家誉为汉学的先锋，“他们于16世纪末叶，为法国的汉学家开辟了道路，而法国的汉学家稍后又在汉学中取代了他们”，真正建立起作为学术的汉学传统。就传统汉学而言，法国是汉学家最多的国家之一，有许多汉学界的学术巨擘，不断为汉学的崇高而添砖加瓦。

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果不仅意味着中国文化“外化”的传播，也意味着异质文化对中国文化“内化”的接受。汉学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使者，在异质文化的交流中，也是人类和谐与进步的推动者。

汉学诞生在与异质文化碰撞、交流和相互浸淫之中。这个结果无异于一枚果子的成熟，只有“风调雨顺”才生长得好。和谐、宽容、理解与尊重，是异质文化彼此借鉴的保证。作为文化形态的汉学，其成长和生存离不开良好的国际语境。就中国而言，历史上凡是开放的时代，文化交流多，汉学就发展；反之，汉学就停滞，这似乎成为一种规律。

作为学术公器的汉学，文化上有其自己的成长过程。汉学是发展的，

---

① 戴密微《法国汉学研究史》，耿昇译《法国当代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这一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生存于异国他乡的文化,同样深受不同时代语境的极大影响。这里所说的语境,既包括中国的历史演变,也包括异国和世界的历史变化。也就是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汉学的发展方向和内容;换句话说,汉学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中国历史的更迭,也受制于他者社会的变化。这就是以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汉学发展的基本轨迹。

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总体上可以分为"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而现代汉学兴显于美国,20 世纪中期以来,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很繁荣。随着中国与世界政治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拓展,现代汉学有了显著的发展。

虽然 20 世纪的后 50 多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接触开始多了起来,但就整体而言,1949 年后约有 30 多年是一个相对"闭关锁国"的时期。公正地讲,这道意识形态的"长城"也并非就是中国的政策,是那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对我国全面封锁的结果。这个时期的"汉学"涂满了政治色彩,以法国为代表的汉学较多地保持着传统汉学的学术精神,而美国的"中国学"却成了充满政治意识的现代汉学的代表。美国的"中国学"所关心的不是中国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问题。这种政治特征,是那个时期美国汉学的基础,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他国家汉学的研究方向和内容。

由于中国与世界的隔离,由于西方与中国少有交流,因此汉学家不了解中国最新的文化进展(比如新的考古发现),致使汉学处于断炊或"无米之炊"的状态,没有中国文化的支持,西方汉学要想取得研究上的突破也很困难。陌生感和神秘感困扰着汉学家,这不仅是文化的尴尬,也是汉学家的难堪。

人类文化包含了物质文化和观念文化等。物质文化表现在衣食住行生活方面,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又极易变化的"具象"文化,例如饮食、服饰、住房、音乐、舞蹈等;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核心,表现在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家庭观、宗教观等诸多方面,以及关于自由、平等、民主的理解,观念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思维经过高度抽象后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它通

过文化灵魂——哲学、文学、语言、宗教、历史等来表达。[1] 观念文化，一俟进入外国汉学家的研究视野，他们的研究也就进入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深层研究。

汉学家从对中国物质文化到观念文化的研究，其领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现在，汉学不仅包括对中国的哲学、文学、宗教、历史领域的研究，还包括社会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Sinology（汉学）和 Chinese Studies（中国学），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异名共体"的地步。

时至今日，传统汉学和现代汉学这两种汉学形态不仅同时存在着、共荣着，而且还互相浸透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美国汉学悄然嬗变为中国学，并以自己独有的个性特点和极强的生命力出现在世人面前。美国汉学始自 1830 年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的建立，这个学会虽然代表了欧洲那种对东方学文学的兴趣，但这个学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为美国对东方的扩张政策服务"。[2] 这个特点也与"美国海外传教工作理事会"向中国派出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相一致。可见，美国汉学一开始就和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对华政策联系在一起。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48 年出版的百科全书式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观》就带有较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点，与欧洲具有人文科学特征的汉学颇有差异，但它依然属于 Sinology 的范畴。

美国从南北战争后的统一中走向强大，加入强国之列。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行径，是列强联合的第一次尝试。从那时起，承担着相当"政治"角色的传教士进入中国。真正美国式的"汉学"——中国学，就从那时开始，而奠基人和开拓者是之后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作为美国首席中国问题专家的费正清，他的中国学研究不仅影响了美国，也对其他国家的汉学研究或中国学研究有强烈的影响。

在西方，费正清的魅力在于，没有谁能像他那样以更清晰、更富于洞察力的笔触来表述中国。"在使美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纷扰

---

① 任继愈《汉学发展前景无限》，《中华读书报》2001 年 9 月 19 日。

② 侯且岸《费正清与中国学》，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

不安的近代史,以及中国神秘莫测的现状等方面,谁的贡献也没有像他那样大。"费正清等一批知名的美国中国学家都参与过战时情报工作,在战后作为美国政府的智囊而直接为制定对华政策服务。费正清的研究虽然充满了实用和功利色彩,立场和观点也有偏见,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历史上作为一个贡献巨大的汉学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的光辉。美国学者从事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使命感"、"学术个性"和"反唯理智论倾向","蔑视学问,更为强调实用性知识","更为明显同自己以外的社会,即政治家、实业家及其实践家始终保持紧密的联系"。① 这就是美国中国学家的基本心态,他们讲究功利和实用,不理会学术上的理智倾向,这与法国汉学家的学术心态、学术个性与学术传统几乎大相径庭。

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 Studies)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它们包括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而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汉学(中国学)则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其兴趣根本不在那些负载着古典文化资源的"古典文献",而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但是,汉学发展到21世纪,其研究内容和方式已经出现了融通这两种形态的特点。这种状况既出现在欧洲的汉学世界,也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之中,可以说世界各国汉学家的研究中,都兼有以上两种汉学形态。

汉学(Sinology)对中国研究者来说,被尘封得太久,所以它的空白很多,浩如烟海的资源还有待于深入开掘。这种开掘,不仅可以收获汉学,还可以无意中发现被历史"放逐"和"遗失"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文化。编撰"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目的和宗旨,不仅是为了梳理已有的汉学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追踪中国文化的外传历史状况、经验及影响,同时探究汉学的产生、成长、发展与繁荣,还要尽可能厘清这块"他山之石"对于中国文化的作用。当然,"列国汉学史书系"还期望对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有所裨益。

"列国汉学史书系"作为一个文化工程,其撰写的难度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比拟。严绍璗教授谈到Sinology的研究者的学识素养时提出四个"必须":①必须具有本国的文化素养(尤其是相关的历史、哲学素养);

① [美]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1992年。

②必须具有特定对象国的文化素养(同样包括历史、哲学素养);③必须具有关于文化史学的基本学理素养(特别是关于“文化本体”理论的修养);④必须具有两种以上语文的素养(很好的中文素养和对象国的语文素养)。这几点确实都是汉学研究者必须具备的文化和语文素养,否则很难进入汉学研究的学术境界。

写作“列国汉学史”艰难,而出版可谓难上加难。1995 年曾经“落实”的出版经费,因故而一风吹。人间的事好像天上的云地上的风,飘忽不定没有根,铁板钉钉是没有的,因为钉子可以用“权力”拔出来,一切承诺和协议,都可以化为乌有。虽然“列国汉学史书系”的生长不断受到寒风的袭击,但它终没有自毙于摇篮之中,冬天之后是春天,接着便是收获的季节。这套富有创意和价值的书系,将对中外文化交流和汉学的发展及其比较研究产生深远影响。说到这里,“书系”编辑委员会同仁和作者,要感谢学苑出版社所给予的支持,尤其要感谢社长兼总编孟白先生和不久前病逝的总编辑助理郭强副编审,由于他们慧眼识金才使这一书系得以面世。

有人认为“汉学史中国人写不了”,当然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立论”。日本人石田幹之助写了《欧人的中国研究》(1932)、莫东寅写了《汉学发达史》(1949),接下来又有严绍璗的《日本中国学史》(1991),张国刚的《德国的汉学研究》(1994),张静河的《瑞典汉学史》(1995),何寅、许光华主编的《国外汉学史》(2002),刘正的《图说汉学史》(2005)和李庆的《日本汉学史》(2005)相继面世。在人类的文化长廊里,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各种史书琳琅满目,这其中有外国人写中国的各类历史,也有中国人写外国的各类历史。历史,是往事,是记录,是选择,并有相对独立的评论和褒贬。但是,事实上任何一部历史都不是最后的历史,历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演进,修史很难一步到位,它需要一代代学者“积跬步”才能“至千里”,只有“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方能“风雨兴”、“蛟龙生”。学问之事非一夕之功,非得有前赴后继者敢于赴汤蹈火“流血牺牲”,才会达至光明顶峰。

开拓者也许会在某个时候将自己的真诚劳作化为欢乐,因为在以后的岁月里,定会有人踏着自己的肩膀或是踩着自己的鼻子和头顶攀上高峰,以鸟瞰美丽风光。21 世纪是经济的大空间,对汉学来说也是一个“大空间”。但是,要探索这个“大空间”,需要有个和谐的“太空站”,需要大家联袂共建;当然世界上需要多元文化和谐相处的历史语境,共同创造彼此接

近、认识、理解、尊重、沟通、借鉴与融合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汉学研究发展的机会。

时间在行走，历史在行走。人类创造过历史，书写过历史，但是没有最后的历史。汉学有历史，而且还正在创造新的历史，汉学及其研究将以自己的品格和个性在人类文化的世界里放出异彩。

阎纯德

2006年12月5日于北京半亩春

目　录

上篇　释义与综述

第一章　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 2
第二章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诞生的前前后后 …… 17

中篇　创始与发展

第一章　狩野直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 36
第二章　桑原骘藏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 50
第三章　内藤湖南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 66
第四章　矢野仁一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 89
第五章　小川琢治和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 …… 99
第六章　滨田耕作和考古学京都学派 …… 116
第七章　羽田亨和敦煌学京都学派 …… 128
第八章　铃木虎雄和支那文学京都学派 …… 146
第九章　高濑武次郎和支那哲学京都学派 …… 155

下篇　鼎盛与辉煌

第一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 162
第二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 205
第三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 233
第四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 288
第五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 296
第六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佛学研究 …… 306
第七章　京都学派的敦煌学研究 …… 312
第八章　京都学派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 321
第九章　京都学派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 329

上篇

释义与综述

第一章
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京都学派”的几种定义

实际上,“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有京都学派、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京都支那学派和新京都学派等几种不同意义上的指代范围和相关概念。

在中国学术界,我们历来固有的习惯是把“京都学派”看成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简称。这一理解已经具有了十分明显的中国特色。而且,这一特色的理解经过近百年来中日学术界之间的理解、互动和交流,至今也已经极大地影响到了日本学术界。相应地,中日两国学术界正在逐渐地走向共识。但是,严格地讲,所谓“京都学派”,它有哲学意义和东洋史学意义这两大不同学术层面的理解。

万丈高楼平地起。很显然,“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诞生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为母体的,因此,离开了这一母体,所谓“京都学派”是无从谈起的。

从上述两大不同学术层面概念的产生之先后顺序来说,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

所谓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教授西田几多郎博士和田边元博士为代表的,包括以他们二人的思想为基础的,和他们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的研究日本传统思想及其在现代的转化和发展的一个日本哲学学派。这一学派的主要成员有西田几多郎博士、田边元博士、朝永三十郎博士①、西谷启治博士、波多野精一博士、和迁哲郎博士、久松真一博士、武内义范博士、上田闲照博士等人。这一学派的经典著作有西田几多郎博士的《善の研究》、《自觉における直观と反省意识の问题》、《无の自觉

① 朝永三十郎博士之子朝永振一郎博士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的设定》,田边元博士的《忏悔道とての哲学》、《种の论理の辩证法》、《数理哲学研究》,西谷启治博士的《宗教とは何か》、《根源的主体性の哲学》、《神と绝对无》等专著。

所谓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指的是:以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内藤湖南博士和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骘藏博士三人为主要代表的,包括以他们三人的学术观点为基础的,和他们有着直接的师承关系的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学的一个日本汉学学派。这一学派创始时代的主要成员有内藤湖南博士、狩野直喜博士、桑原骘藏博士、小川琢治博士、新城新藏博士、矢野仁一博士、铃木虎雄博士、滨田耕作博士、羽田亨博士等人。这一学派的最初名称应该是"京都支那学派"。这一学派的历史我们将在以后各章中进行仔细的介绍和评述。

二、西田哲学、田边哲学和京都学派

既然从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上,作为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在先,那么,我们还是先对这一学派的来龙去脉做一介绍。这一学派的两位创始人是京都帝国大学哲学讲座教授西田几多郎博士和他的追随者、继任者田边元博士。

西田几多郎生于1870年,卒于1945年,石川县人。1883年考入金泽师范学校,后转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科选修科学习。毕业后任学习院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西田几多郎任哲学哲学史第一讲座副教授、教授,以后他获得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他的《善の研究》一书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销售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本哲学著作。至今也是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名著。

田边元生于1885年2月3日,卒于1962年4月29日。东京人。1901年,他考入东京第一高中学习。1904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始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和西田几多郎建立学术联系和个人友谊。后来他特别为此而转系到了哲学科学习。1913年开始,他任东北帝国大学理学部讲师。1919年,在西田几多郎的特别推荐下,他正式调到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任哲学哲学史第一讲座副教授。1922年开始,他留学德国,开始接受德国著名哲学家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思想。回日本后,1927年,他正式接替退休的西田几多郎的讲座教授职位,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哲学史第一讲座教授。1957年,德国弗莱堡大学授予田边元为荣誉哲学博士。

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以京都帝国大学为基地,先后培育出一批知名的哲学家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在日本近代哲学史上形成一个所谓“京都学派”。而这一概念正式出现,一般认为是在1932年的《经济往来》杂志上,西田几多郎的弟子户坂润发表了一篇题为《京都学派の哲学》的文章,开始把西田及其追随者们而成的哲学团体命名为“京都学派”。

田边元留学德国的最初兴趣集中在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但是他很快就沉迷在青年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中。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田边元及其弟子西谷启治博士,还有九鬼周造博士等人在学术界就经常和德国哲学界尤其是与青年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本人进行东西思想对话,以此来实现传统的日本禅学与净土佛学和西方哲学的沟通,力求日本思想在现代的最新诠释。

这一学派以田边元为首,三木清博士、九鬼周造博士、西谷启治博士、久松真一博士等人都曾经直接与海德格尔讨论过哲学。其中,上田闲照博士、川村永子博士、大桥良介博士等人都是在德国的大学取得的哲学博士学位,因此,他们对于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诠释学有着更为具体和深入的理解。其中,上田闲照后来出版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マイスター・クハルト研究》一书,大桥良介出版了《ヘーゲル论理学と时间性》一书。在阐释德国哲学之外,大桥良介还出版了《京都学派の思想:种々のと像思想のポテンシャル》和《京都学派と日本海军》这两部很有影响力的著作,对于宣传西田哲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一学派的思想也颇不统一。比如,西田几多郎的学生三木清和户坂润等人,开始接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出版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形成了京都学派中的左派。其中,户坂润以其个人之力,主编并发行了66期的《唯物论研究》学术刊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京都帝国大学的发展和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①

到过日本的学者全知道,过去的京都帝国大学和现在的京都大学一直是日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地,这一现象和“京都学派”中左派的出现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西田几多郎建立的哲学体系是以大乘佛教思想为主体、利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和体系,对日本传统禅宗思想进行改造,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具有现

① 研究户坂润的思想,一直是国内日本哲学史学界的热点课题之一。如《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上刊发的《户坂润哲学思想初探》一文,《社会科学辑刊》1985年第2期上刊发的《户坂润和东条英机》一文,等等。

代思辨哲学意义和特点的大乘佛教思想。在这一新兴的哲学体系中,他特别看重"纯粹经验"的价值属性。他认为,"纯粹经验"才是唯一的"实在"。"实在"则有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并且统一在一起。而社会性的"善"就是实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之后所形成的意识状态,紧接着,西田几多郎把"纯粹经验"表述为先验的自觉,而在主观与客观、自我与非我、意识与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两者的"场所",这个"场所"就是大成佛教哲学中所说的"无"。西田哲学把"场所"分为"有"、"相对无"、"绝对无"三个阶段,进而表明只有"场所"中的"绝对无"这一场所才是"真无的场所"。

相对于西田哲学对"绝对无"的肯定,田边元则提出了"种の论理"这一逻辑学问题。在田边哲学中,他以"个"和"类"代表个别和普遍,而以"种"代表联系两者的必要条件。他虽然对西田哲学中的"绝对无"的概念有所批判,但是他的"种"的概念及其价值属性,在本质上还是和西田哲学的"场所"概念保持了一致。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田边元及其弟子高山岩男、高坂正显、西谷启治、铃木成高等人站在日本右翼立场上,公开提倡所谓"世界史の哲学"。[①] 西田几多郎在《学问の方法》一书中公开地肯定了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是创造新的世界文化的基础,他还把日本精神理解为永远保持以皇室为中心的自我同一,使日本精神成为新的世界性原理,由此开启了日本的文化法西斯思想。田边元在《政治哲学の急务》一书中,更将"无"上挂日本天皇,论证天皇的不可侵犯性来自"无の优越性",表明了要维护天皇制度的思想。虽然他们对极端右翼的皇道哲学也持批判态度,但是他们从理论上肯定了日本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思想及其体制,进而又成为日本的极端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支柱,成为支持日本的整个侵略战争的理论武器。于是,以西田哲学为核心的"京都学派"的哲学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二三十年间,迅速红遍整个日本,对日本的思想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1941 年的 10 月,日本京都。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几近疯狂的时候,京都学派的几位青年哲学家们坐在一起,谈论起了中日战争的性质问题。其中,哲学博士高坂正显公开地鼓吹:

> 中日战争涉及许多事情而且极为复杂。但是,决定胜败的最后因素应该是谁的道德更优越,日本的还是中国的?当然,政治和文化上的策略是很重要的。然而,我们对中国人的道德态度更为重要。我们应该考虑使用如此一类的手段:为了使那边的人相信,我们应该派遣很多道德上优秀的自己人到那边去,展示我们的道德力量。中日战争也是

① 见高山岩男《世界史の哲学》,こぶし书房,2001 年。

一个道德的战争。①

天哪！

听杀人狂魔的御用学者出来大谈什么道德问题，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更无耻、更变态的事情吗?！这些主张只有他们自己才具有“学者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的文化流氓们美妙而动听的言辞，丝毫掩饰不了其背后烧杀抢掠、涂炭生灵、造谣诽谤的反人类、反道德的无耻行径！在人类正义和邪恶的交锋中，邪恶势力总是喜欢主张他们自己才最具有“学者的良知”、只有他们自己的言论哪怕是诽谤、是谎言，在他们自己看来也全是真理，他们在道貌岸然地斥责别人“深文周纳”和“不诚实”之时，没有忘记要教育大家“认识这个骗子，远离这个无赖”。这就是那个青年流氓哲学博士的混蛋逻辑！怎么这个青年哲学博士的流氓言论和他们背后的老师全是一路货色呢！我想：他们也只有这样说才可以安慰一下他们自己作恶时那野兽般的邪毒而丑陋的灵魂吧。

战后，随着“京都学派”哲学的分裂，以东洋史学界为主导的日本京都大学的汉学研究被迫接受了中外学术界赠与他们的这一名称。

三、新京都学派

所谓“新京都学派”，则主要指的是以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日本思想、文化和历史的现任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们，他们为了适应现代日本政府想成为国际大国的心态，从日本传统文化角度论证日本思想和文化的特殊性及其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启迪和价值，并且肯定了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对亚洲各国摆脱欧美殖民势力统治的所谓“积极意义”。这一学派以梅原猛、桑原武夫、上山春平、梅棹忠夫四博士为核心代表。其他成员如河野健一博士，本来也是研究法国历史的专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却也继承了桑原武夫的政治主张，积极地投身于日本国家主义的理论建设中。其中，核心人物桑原武夫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三大创始人之一桑原骘藏的儿子。而梅原猛又属于是京都大学教授桑原武夫的弟子辈的人物。②

上述四人可以说是这一学派的核心人物。

---

① 译文引见《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② 梅原猛《学问のすすめ》：“我在京都结识了很多优秀的学者，桑原武夫先生就是恩师之一。”张琳译，三联书店，1989年。

梅原猛生于1925年,宫城县人,日本著名哲学家。梅原猛是"二战"期间免试进入京都帝国大学的。当时,因为他对西田几多郎的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专门报名哲学系。进入大学后,开始接受系统的西田哲学的学习。在临近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的4月,他还应征参加了日军炮兵。在他从军期间,他居然是这样理解西田哲学的:

"战争期间,我用西田哲学武装了自己的头脑后奔赴战场。根据西田学派的观点,'战争是世界史的必然'。'我们应当由无而生'。"①

日本战败后,梅原猛又重新回到京都大学,继续完成学业。1948年,梅原猛毕业于京都大学哲学系,先后任龙谷大学文学院讲师,立命馆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授。京都市立艺术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第一代所长。现任ものつくり大学第一代校长。还是日本文化功劳称号和文化勋章获得者。对日本佛教、美学和哲学有精湛研究。著书弘富,个人专著多达几十种,有20卷本的《梅原猛著作集》刊行。他的父亲是日本著名的丰田汽车公司的常务董事兼丰田汽车中央研究所所长。② 他的儿子是滋贺县立大学教授,儿媳是日本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福井谦一的女儿。

桑原武夫生于1904年5月10日,福井县人。著名的法国文学和历史研究学家。他的父亲就是京都帝国大学创始时期的东洋史教授桑原骘藏。1928年,他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语系。1943年,他转任东北帝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48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59年,他当选为该所所长。1968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88年4月10日因病逝世。他不仅是位著名学者,还是战后日本思想和文化重建的重要决策人。

主要著作有:《现代日本文化の反省》、《日本文化の考え方》、《フランス文学论》、《现代フランス文学の诸相》等,现已出版10卷本的《桑原武夫著作集》。

上山春平是日本著名哲学家。和歌山县人。194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科。先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所长和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京都市立艺术大学校长。

---

① 梅原猛《学问のすすめ》,张琳译,三联书店,1989年。

②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中主张."梅原末治 …… 子,梅原猛",见该书396页。此说可能不对。因为根据梅原猛《学问のすすめ》一书中的记载,梅原猛的"父亲是梅原半二,母亲是石川千代"。可见他们之间没有父子关系。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主要著作有:《大东亚战争の遗产》、《大东亚战争の意味》等,现已出版10卷本的《上山春平著作集》。

梅棹忠夫生于1920年6月13日,京都市人。著名民族学者。194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先后任大阪市立大学副教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教授和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文化勋章获得者。晚年因为受双眼几乎失明的困扰,无法继续著书。

主要著作有:《文明の生态史观序说》和《日本人の知恵》等多种。

很显然,"新京都学派"是典型的以文化服务于政治的一个宣扬日本国家主义的政治学派。相关研究,可以参阅孙政博士的《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一书①,该书第四章第四节《中曾根与新京都学派》就此展开了详细的研究,分析了此派学者们宣扬日本国家主义、服务于政治的本质特征。而且,他们明明知道今天"京都学派"在学术界指的是什么,何况他们的父辈就是著名的汉学家。但是,他们却故意选取了"京都学派"这一概念,还命名为"新京都学派",而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又与专心研究日本思想和西方哲学的融汇及发展的老"京都学派"虽然有些联系,但是并没有必然的学理关系,却故意打出"新京都学派"的称号,真可以说是来者不善。

四、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在现代日本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汉学家们相信:最初,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者群的人就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比如,内藤湖南的晚年弟子三田村泰助在《内藤湖南》②一书中就持有此说。具体由来是:当时亡命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在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之时,利用唯物史观以甲骨文字论证中国古代社会的原始形态,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一名著。由此引起了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对此书的否定。与此同时,此书却得到了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的肯定。于是,郭沫若先生在日本开始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来称呼这两所大学的东洋史学者们。

但是,至今为止,郭沫若先生最早是在何时、在致谁的书信中或者和谁的谈话中,或者在学术论文中首先使用的这一概念,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换句话说,在郭沫若和户坂润之间,究竟是谁最先使用的"京都学派"这

① 孙政《战后日本新国家主义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② 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央公论社,1982年。

一概念，可能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考证。本书作者所谓的“一般认为最先出现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然后才是东洋史学意义上的‘京都学派’”之说，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从时间段上说，自 1930 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日本正式出版，到 1932 年户坂润在《经济往来》杂志上发表《京都学派の哲学》一文，在这两年之间，有关郭沫若先生和日本学者之间的学术交往和往来书信等问题，还是我们研究的盲点。特别是当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否定而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专家们肯定他的这一名作时，他的以“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来称呼这两所大学的东洋史学者们的说法是否曾经见于当时报刊，是否他和田中庆太郎等人的书信和谈话中已经这么使用过这两个术语，是否户坂润在报刊上也曾看到过有关对郭老此书的争议……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和调查，急于下结论显然是不可取的。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京都学派”这一概念指的就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为核心所创建的一支哲学学派。除了在中国学者郭沫若先生的语言范围之外，它和汉学研究乃至和东洋史研究是完全不搭界的。以我对日本学术界和京都大学学风和传统的了解，在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及其弟子们创建的“京都学派”蒸蒸日上之时，根本不可能出现同为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们也放心大胆地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这一奇怪现象。

换句话说，如果户坂润是最先使用“京都学派”这一概念的人，那么，以“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其实已经有点文化侵权和盗用它人名义的不光彩行为了。因为，对于整个昭和时代（1925～1989）的日本学术界来说，在日本国内“京都学派”这一术语的第一指代还是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的西田几多郎和田边元为核心所创建的一支哲学学派。内藤湖南晚年的弟子三田村泰助甚至主张：“不存在京都学派，只有内藤学派。”[①]这一极端观点完全抹杀了京都学派早期创始人们的学术贡献与历史价值，就是内藤湖南本人也不敢如此接受，自然也不是我们能认可的。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不能失去工具理性，而三田村泰助恰恰忘记了这一点。

——正因为如此，直到最近，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讲座教授池田秀三先生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一再声称：

---

① 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史学の风光》，《日本と日本人》，1988 年 7 月 1 日第 1591 号。

好像在从事中国学的研究者之间,“京都学派”这一学派的存在几乎已作为自明之事实而为人所接受。不仅限于研究者,于媒体之类,常将京都大学的中国学指称为“京都学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同样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读书人中亦落实了吧。然而,“京都学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体吗?我对此甚怀疑问。因为,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都学派”之一员,而我自身却完全没有这种自觉与归属意识。再者,在我的周围,不用说“京都学派”,就连具有明确的学派意识与组织形态的学派集团的影子几乎也看不到。因此,现在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承认存在着作为严密意义上的学派的“京都学派”。如此而言,我想一定会有人提出如下意见吧:何必那样严密地对学派进行定义呢?京都大学的学问一般都称为京都学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样广宽的姿态,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也确实存在着一种犹如传统的东西,所以将其称之为“京都学派”就是了,没有必要采取那样严厉的态度。说实话,我平常也并不是那么严密地考虑。本来,“京都学派”的存在与否,于我自身而言,无关紧要。只不过,作为学术史来论述“京都学派”的话,那样恐怕不行。再者,原本我对轻易地滥用“京都学派”这一称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没有认真地读过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顾研究者各自所处的种种情况、环境,无视各自的个性,不分青红皂白,就想贴上‘某某学派’的标签,我厌恶这种轻易之举。……我的本意并非在于否认“京都学派”。再者,这只是我经验范围内的事情。总之,自隶属于京都大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室至今日为止的三十年间,我几乎没有感受到所谓“京都学派”的实际存在。这只是我没有切身感觉到而已,或许在我没有察觉到的地方,“京都学派”一直存在着。只是不管怎样,抬出那种缺少实质感且沾满手垢的招牌,用以概括京都大学的中国学为能事毕矣,此又有何意义呢?与此相比,我们是否更应该去仔细体会每一个多样性存在之内情呢?我的本意尽于此矣。①

我想,大家看明白了我所说的“以‘京都学派’这一术语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其实已经有点文化侵权和盗用它人名义的不光彩行为了”这句话——更加之日本学术界以梅原猛为首的一部分京都大学的教授们目前正大力鼓吹所谓的“新京都学派”,一心一意想为日本政府充当文化顾问和决策人——自然也就不难理解池田秀三先生此文的用心了。这也成

① 池田秀三《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石立善译,《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

为以“京都学派”来等同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称谓习惯，被现代日本京都大学进行东洋史研究的专业学者们所婉言谢绝接受的直接原因。这也难怪池田秀三先生对“京都学派”这一术语使用了“缺少实质感且沾满手垢的招牌”这样一段话语来形容了。所以，他一再表示了被认同为“京都学派之一员”的现实“抱有不快之感”的情绪。

因为，池田秀三想恢复的是所谓的“支那学派”或者“京都支那学派”这一称号。

事实上，最初用来指代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学者群及其学术思想的术语正是“京都支那学”。它包括了支那哲学、支那史学和支那文学三者。假如可以算作一个学派的话，那么它的准确称号应该是“京都支那学派”，而不是“京都学派”。而且，当时以京都帝国大学为核心，成立了“支那学会”，发行了《支那学》杂志。以“京都支那学派”来指代当时京都帝国大学的汉学家群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日本学术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然而，因为在这个术语中出现了“支那”二字，这也是“京都支那学”或“京都支那学派”这一称号不为中国学术界认可和接受的直接原因。但是，具有蔑视含义的“支那”概念最早出自1888年出版的日军宣传手册《宇内混同秘策》一书中，那里使用“支那”来指称中国。[①] 而日本政府在外交文书中正式使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开始于1913年7月，而终止于1946年6月。起因是1946年6月中华民国政府以战胜国身份派外交代表团到东京，正式照会日本外务省：从此以后不许再使用“支那”这个称呼来指称“中国”。该照会文件全名为《支那の呼称を避けることに关する件》。1946年7月3日，日本文部省正式下达命令给全国的大学和报刊，禁止使用“支那”一词来称呼中国。

这三十几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侵华和辱华的大陆政策到了极点的三十几年，无论是民国时代的学者还是新中国时代的学者们，大家一致拒绝接受并声讨这一有强烈侮辱色彩的称呼，既然“支那”和“支那学”不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相应地，“京都支那学派”这一概念也就彻底失去了死灰复燃

---

① 清末民初，中国学者梁启超使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宋教仁在东京使用《二十世纪支那》（1905年1月）作为杂志名称显然并不具有蔑视含义，只是沿袭当时国外学术界、政治界称呼中国的一个习惯术语而已。因此，宋教仁曾热情讴歌．“夫支那为世界文明最古之邦，处世界最大之洲，为亚洲最大之国，有数千年引续之历史可爱，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笈可爱，有四万万之同胞可爱，有二十行省之版图可爱，有五岳四渎之明媚山川可爱，有全国共用之语言文字可爱。支那乎！支那乎！吾将崇拜而歌舞之，吾将顶祝而抃贺之，以大声疾呼于我国民之前曰·支那万岁。”

的可能。

但是,严格地考察“支那”这一概念的起源,我们可以发现:

对于近、现代中国人来说,特殊的历史记忆和历史事实使我们非常反感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二字。实际上,“支那”这一概念,从语源学上讲,来自梵语佛教典籍中的“Ch'in”一词。其本意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①]它是古代印度用来指代中国古代秦王朝的专门术语。在古代印度的史诗《摩诃波罗多》(Mahabharata)一书中已有“支那”一词出现。古代中国学者在把梵文佛经译为汉文时,按照音译把“Ch'in”就翻译成“支那”。梵语对中国的发音早期还写成至那、脂那、震旦、真旦、振旦等。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时代《旧约全书》中称中国为 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 China,和法文中的 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在日文中,“支那”的日语字母是しな,日文罗马拼音字母为:shina。在古代日本称中国隋朝为“隋”,称中国唐朝为“唐”。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末期,当时在日本政府的外交文书等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随着日本的对外开放和兰学的兴起,使用外来语的日文发音作为特定词汇成为一时的风尚。于是出现了不再称中国为“汉土”,而是按照外文音译把中国称为“支那”,一时间新闻媒体和著作中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现象风行天下。最早用支那一词称中国是在空海诗集《性灵集》中,里面有“支那台狱曼殊庐”一句,以后在《今昔物语》中有“支那国”的记载。这就是今天英语世界中“China”一词的直接来源。在古代语言世界里,“支那”一词又有“Sin”、“Sinai”、“Sinae”、“Thin”、“Thinai”等读法。

青木富太郎博士在《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②]一书中以为:

> “支那”的语源分为两支,一支是由陆路传来,读音为 Seres 或 Serike。一支是由海路传来,读音为 Sin、Sinai、Thin、Thinai。

岩村忍博士在《13 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③]一书中也曾考证说:

> 但是,有关 Sin、Sinai 等语源的通说,都把秦作为其起源。此说是根据秦的北京音 ts'ɪn(通俗的 chin)而来。这一音中的 ch 的发音是由不发 ch 音的阿拉伯人传向欧洲成了 Shin、Thin 的发音,更进而形成了 Sinae、Thinae 的发音。

晚清时代的中国学者中,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见薛福成《出使

---

① 罗马传教士卫匡国在 1655 年最早提出 China 是秦国的“秦”的译音。

② 青木富太郎博士《东洋学の成立とその发展》,萤雪书院,1940 年。

③ 岩村忍《13 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三省堂,1939 年。

日记》的记载：

> 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纳，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腊丁之名则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字之音译。

在日本著名的三省堂出版的《大辞林》中对此解释说：

> しな【支那】
>
> 外国人が中国を呼んだ称。"秦しん"の転という。中国で仏典を漢訳する際、インドでの呼称を音訳したもの。日本では江戸中期以後、第二次世界大戦末まで称した。①

虽然关于这一学派的名称问题在中日两国学术界之间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是，有一点那是谁也无法否定的，即："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及其相应地简称"京都学派"这一称号，早已经属于一个世界性范围的学术名称了。

而且，1997 年，日本的雄山阁出版社还出版了由滨田耕作的弟子、日本著名考古学家角田文卫撰写的《考古学京都学派》（增订本）②这样一本书。

角田文卫，1913 年 4 月 9 日生于福岛县伊达郡桑折町。2008 年 5 月 14 日因病逝世。他是日本研究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特别是紫氏学的权威学者。1937 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师从日本考古学京都学派祖师滨田耕作博士。

主要著作有：《古代学序说》、《古代北方文化の研究》、《紫氏部とその时代》、《平安时代史の研究》、《转换期の考古学》、《古代学の展开》、《考古学京都学派》等 30 余部，有全 7 卷本的《角田文卫著作集》出版。

显然，"京都学派"这一称号已经被理解为"东洋史学"、"支那哲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支那考古学"和"现代日本哲学"等几大学科所共同享有。在日本受到广泛流传的网络辞典《ウィベディアフリ－百科事典》中，关于"京都学派"，他们列出了以下几项：

京都学派（哲学）

京都学派（京大人文研）

东洋史学

京都学派（宪法学）

其中，第二和第三项显然是可以合并为一起。而宪法学京都学派只是

---

① 松村明主编《大辞林》，三省堂，1988 年。

② 角田文卫《考古学京都学派》，雄山阁，1997 年。

日本习惯上的东大京大对比的用法,类似的还有地理学京都学派、考古学京都学派等概念存在。因此,上述列举和本书作者的划分并无太大差别。

从宫崎市定开始,他对京都学派早期的几位学者把他们划分为东洋史学者和支那史学者两大派。在《京都のシナ学と内藤湖南博士》一文中,他正式提出此说:

> 京都大学在1906年设立文学部的初期,在那里研究中国史的学者们中,表现出两个相异的倾向。一种是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待的态度,另一种是把中国史作为支那学的组成部分来看待的态度。前者以为,世界史首先划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而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中心。因此之故把从这一角度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称为东洋史学者。其代表人物有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后者主张中国史学和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共同组成了支那学,这三者从来都不可分离的,只是从不同侧面对中国文化进行的具体研究,因此上不可能出现脱离中国文学、中国哲学研究而独立出现中国史研究。这一派观点被称为支那学。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内藤湖南、富冈谦藏、冈崎文夫等人。①

我将宫崎此说称之为研究早期京都学派汉学史上出现的"宫崎划分说"。而一个让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就是:实际上,"宫崎划分说"在日本学术界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相反,却成了某些中国学者研究京都学派早期历史的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比如说,在韩升、何培齐等先生的论文中就表现出对"宫崎划分说"积极的支持态度,他们也开始使用"宫崎划分说"来研究桑原史学、内藤史学。②

本书作者特别表明自己的立场:我不认为在早期京都大学汉学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宫崎划分说"所陈述的那种状况。理由如下:

第一,桑原骘藏虽然一直主张要科学的研究历史。他首先将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博士视之为学术珍宝的包括乾嘉考证学派在内的中国历史和学者们的观点及其考证方法一概视为是不可信,他的名言就是"中国人の学者は头が悪い"、"自分のやっいることは东洋史であって,シノ学とは违うものだ"等等。尽管如此,他还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始人之一,虽然他研究的专业主要是中西交通史、中西民俗比较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东洋史。仔细体会桑原所谓"自分のやっいることは东洋史であって,シ

---

① 宫崎市定《京都のシナ学と内藤湖南博士》,《中国に学ぶ》,中公文库,1986年,第269~270页。

② 韩升论文请见《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何培齐论文请见《史学集刊》,2008年第7期。

ノ学とは违うものだ"(即,"我自己从事的是东洋史研究,和支那学没有任何关系")此话的含义:他无非是把支那学理解为传统的儒学而已。而他所谓的东洋史,他才认为属于新兴的一门学科。

第二,笔者不认为桑原史学属于东京帝国大学系统的所谓"东京学派"!持"东京学派"说的有韩升、何培齐等人。他们沿袭宫崎市定的划分,也用"东洋史"和"支那史"的区别来划分桑原史学和内藤史学的区别。他们大概忘记了"东洋史"是以"支那史"为核心的这一范畴规定,也完全无视桑原本人对东京学派的批判。可以说,他和东京学派的领袖白鸟库吉之间没有任何学脉的、师承的、学术风格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研究方法也完全不同。他甚至对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更多的也是揶揄和嘲讽,一如他对内藤湖南和罗振玉、王国维!

第三,在本书作者通过对内藤史学和桑原史学的研究,我曾经做过如下比喻来说明他们的异同,即:我把东洋史研究比作一个造纸作坊,内藤、狩野二人看重的是制作工艺流程在造纸技术上的重要性,只要这一点把握精准了,造出的纸张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所造纸张的化学成分。而桑原看重的却是所造纸张的化学成分,只要这一点符合规定数据了,造出的纸张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制作工艺流程。我的这一比喻合适不合适,也只有那个造纸作坊老板桑原久兵卫才能作出评判了。从学理上说,尽管桑原骘藏生前一直否认自己是一名支那学家,他一贯主张他自己研究的是东洋史,而不是支那学或者汉学、中国学。但是,那只是他个人研究方向和内藤湖南的研究方向表现出的差异。即,虽然"双方都是实证的学风",而在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上,桑原考证学和内藤、狩野考证学的异同之间表现出操作方法上的差异。

第四,我认为尤其不能从他们各自的出身校的不同来划分。比如说同属毕业于东京大学的小川琢治,他就和桑原骘藏的史学操作方法完全不同。宫崎市定大概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对小川琢治属于他所谓的"支那学"还是"东洋史学"进行划分。小川琢治把《山海经》看成是历史地理学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里面的古代神话记载得到了印证,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作为历史地理学文献的可行性。而桑原骘藏把《山海经》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对那里记载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极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精通世界史而同时擅长支那学的小川史学的存在,让"宫崎划分说"破产。

第五,矢野仁一是和美国费正清进行同样的创建中国研究这一新兴学科的日本历史学家。笔者主张,在20世纪,中国研究这门学科是美国的费正

清和日本的矢野仁一共同创建的。矢野史学也根本不是什么“把中国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看待的态度”，而且他和内藤史学、羽田史学在操作方法上也表现出很大的区别，生硬地把他们划归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第六，富冈谦藏本人英年早逝，他的操作方法也不能完全划归在“支那学”领域。可见“宫崎划分说”因为缺乏统一的标准，自己首先就不能安排好各个早期学者的身份归属。

关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是如何诞生的这一问题，请见下章。

第二章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诞生的前前后后

现在，在日本学术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有着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

狭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就是指京都大学研究汉学的学者们所构成的一个学术群体。

广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有时也常常被“关西学派”所代替。那是因为在地理位置上东京一带属于日本的关东地区，而京都一带则属于关西地区。

关西地区主要是指京阪神地区，即从京都府、大阪府到神户市之间的地区。

在这一地区著名的国立大学有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神户大学，著名的公立大学有大阪市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著名的私立大学有关西大学、关西学院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①] 其中，在汉学研究上堪称重镇的著名大学就是京都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和关西大学。

广义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群则不单单是指对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专业学者们，它还包括了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法制史和中国古代科技史等相关学科进行专业性研究的学者们。

一、“东洋史”概念的形成

根据筑波大学、爱知学院大学东洋史教授田中正美在《那珂通世》一文中的考证：

“东洋史”这一概念是日本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894年召开

① 所谓的“关关同立”说的就是上述四所著名的私立大学。

"高等中学校(即国内的高中)教授会"上,由那珂通世博士首先提出的。①

那珂通世,生于1851年2月6日,他是日本盛冈藩(今岩手县盛岗市)藩士藤村盛德的第三个儿子。最初的名字叫藤村庄次郎。为了接受良好的教育,在他14岁的时候,他成了当时盛冈藩学校的教授那珂梧楼先生的养子②,从此以后正式改名叫那珂通世。中学毕业后,他顺利地考入了东京地区当时著名的庆应义塾,专修英文。毕业后,他先后当过小学和中学的老师,以及千叶师范学校和东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后来,他成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1896年开始,他又成为东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的兼职讲师。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很多考证日本、朝鲜、中国历史的专题学术论文,一时间名声大振。1901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支那通史》是中日两国学术界产生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他根据文廷式收藏的手抄本《元朝秘史》翻译和注解而成的《成吉思汗实录》一书,出版后立刻成了国际学术界研究蒙古史的重要经典,也因为这两部专著的出版,给他带来了重大的学术影响和知名度,至今这两部专著已经成了日本学术界的不朽的名著之一。1908年3月2日因病逝世。

当时,那珂通世建议日本高中的外国历史教育应该分成西洋史和东洋史二科。这一建议得到了包括当时著名的教育家、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先生的赞成并获得通过。然而,在日本的大学中普遍采用这一概念则是直到1910年才开始的:这一年,著名的东京帝国大学把以前的"支那史学科"正式改名为"东洋史学科"。当然,支持这一改动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和那珂通世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即:在白鸟库吉的中学时代,他所在的千叶中学的校长和任课老师正是那珂通世。

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他的父亲内藤十

---

① 田中正美《那珂通世》,见《东洋学の系谱》,大修馆书店,1992年。最早,正是田中先生以文化活动的资格和身份,约请我来日本进行学术研究的。又是他以一人之力,说服教授会所有成员,破格晋升我为爱知学院大学校史上第一位聘请一个中国人成为该大学文学部的佛教学宗教学客座研究员。没有他老人家对我的大力栽培,今天的我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他是日本汉学界研究晚清史特别是鸦片战争的专家,三四十年代曾经留学美国哈佛大学,本来他可以成为费正清或赖肖尔的早期弟子,可是因为当时他强烈的反美民族情绪,使他一怒之下痛打了多次侮辱他的一个美国同学,结果他被大学除名并立刻解递出境,终止了留学和取得博士学位的生涯。正是因为他这一特殊的经历,他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学者给予了特别的照顾和关爱,多次解决了我在日本遇到的种种生活上和学习上的困难。

② 按照日本的习惯,一般多是以"婿养子"身份入赘。但是,藤村庄次郎是否是"婿养子",笔者不知。

湾又曾经是那珂通世的养父那珂梧楼的学生。因此之故，那珂通世和内藤湖南有着良好的学术交往和个人友情。

因为东洋史学两大学派的创始人都和那珂通世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渊源关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日本汉学界公认：那珂通世博士是东洋史学初期统一时代的真正创始人，而白鸟库吉博士和内藤湖南博士则分别是东洋史学东京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

"东洋史"概念的出现之初就已经规定了东洋史的研究范围是以支那史为核心、以朝鲜史为辅助、以整个远东和东亚地区的历史为其学科基本组成这样的一个定义域。在此之前，日本汉学界一直保持着以"支那史"、"支那哲学"、"支那文学"和"汉文学"来指代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当然，1945 年以后日本政府曾公开禁止过在文章中再以"支那"指代"中国"的不当言行。

二、从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到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

1877 年，以东京开成学校（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yo）为核心，联合东京医学校合并组建成新的东京大学。在新的东京大学中有四个学部：法学部、理学部、文学部和医学部。文学部又有两大学科：史学、哲学、政治学科为第一学科，和汉文学科为第二学科。因为第一学科的史学科，两年后史学科被撤消，而代之以理财学科。撤销的理由是：

> "在史学科必须讲述日本、中国、印度和东洋各国的历史，必须熟悉日本及西方社会的古今沿革、变化和兴废，而且还要熟悉哲学。这样的人才太难求了"。①

因为没有合适人选，所以只好撤销学科编制。1881 年，东京大学文学部两大学科改组成三个学科：第一学科是哲学科。第二学科是政治学和理财学科。第三学科是和汉文学科。1882 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又增设了以讲授中国和日本传统学术为中心的第四学科古典讲习科。1885 年，东京大学文学部（相当于文学院）又形成新的三个学科的划分：第一学科是哲学科。第二学科是和文学科。第三学科是汉文学科。同时，把政治学和理财学科划归到法学部（相当于法学院）。

第二年，根据当时日本文部大臣森有礼的指示，东京大学文学部更名为

① 《东京大学百年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 年。

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①]

当时在哲学科中没有中国哲学讲座，在史学科中也没有中国史讲座。那时，有关中国的学术全设在第三学科的和汉文学科。当时任教的教授先后有中村正直、岛田重礼、南摩纲纪、重野安绎四人，由他们四人共同负责汉文学的教学。其中，岛田重礼还负责支那哲学的教学。岛田重礼本人和晚清学术界交往过密。俞曲园70大寿，他亦有祝文写来。文中声称：

> "每读先生书，未尝不发望洋之叹也。若天假良缘，过姑苏而登春在之堂，捧觞以祝介寿，并举平日所疑滞而就正焉。此余所切望而今则未能也"。[②]

中村正直生于1832年6月24日，号敬宇，曾用名中村训太郎。日本明治时代六大教育家之一。他自幼开始向佐藤一斋学习儒家经典。曾留学英国。他因为出版了日译本《西国立志篇：自助论》而一举成名。1873年，他开创同人社和明六社，普及西方启蒙主义思想。1877年开始，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1891年6月7日因病逝世。

岛田重礼生于1838年，字敬甫，号篁村。1841年开始，向海保渔村、安积艮斋学习儒家经典。1864年，他来到昌平黉塾学习。1877年开始，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日本帝国学士院院士、他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始祖。1898年因病逝世。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开启了实证主义的考证学研究传统。

南摩纲纪生于1822年，字士张，号羽峰，曾用名南摩三郎。自幼开始学习儒家经典。1877年开始，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擅长书法和诗歌。文学博士。曾任日本皇宫御讲。1909年因病逝世。

重野安绎生于1827年11月24日[③]，字士德，号成斋。1840年开始，他在造士馆塾开始学习儒家经典。1843年，他毕业后被留在塾中协助老师教学。1849年，他来到当时的东京，在昌平黉塾向安井息轩等人学习。而后因为遭人嫉妒而被诬陷获罪并被流放数年。1869年，他在大阪开设成达书院。1871年，他再次来到东京，开设书院。1875年，他成为日本皇宫太政官修史局的副局长。主持编著了《大日本编年史》等书。1876年，他成为日本帝国

---

① 根据《近代日本と东洋史学》一书的观点，森有礼是第一个把东京开成学校（Imperial University of Tokio）英文的"Imperial"译成"帝国"的人。这和他曾经出任日本驻英国公使、模仿英国教育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② 见《篁村遗稿·俞曲园七十寿序》。

③ 町田三郎在《重野安绎の人と学问》一文中主张是"文政十年十月六日"，此即当时日本农历，西历当为1827年11月24日。《明治の汉学者たち》，研文出版，1998年，第83页。

学士院院士。1883 年开始，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1887 年，他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在东京帝国大学期间，他主持创建了日本的国史学科、史学会和史学杂志。1910 年 12 月 6 日因病逝世。

重野安绎对日本史学、日本汉学研究方法上的以考证学为主的研究模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是日本整个历史学界和东洋史学学科的真正创建者。因为他注重考证而抹杀一切虚妄的史料记载，被人称为“抹杀博士”。他的学生白鸟库吉后来提出了著名的“尧舜禹抹杀论”的观点，白鸟此说和他的学术启迪有直接的学术渊源关系。正是因为早在重野安绎主持东京帝国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了考证学的实证主义史学研究模式，在这一点上，他和岛田重礼不谋而合，他们二人才是日本近代汉学出现实证主义考证思潮的早期先行者。因此本书作者对国内学术界某些学者所竭力鼓吹的什么罗振玉、王国维二人 1911 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证之风等观点，一直斥之为虚妄不经之谈、主观想象之说！

要知道：岛田重礼和重野安绎二人联合一起从 1883 年开始在东京帝国大学推广实证主义的考证学研究模式时，罗振玉刚年满 17 岁、王国维则刚满 7 岁！当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大师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公开传授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理论时，罗振玉年满 21 岁，王国维年满 11 岁！因此，不论从东洋史学东京大学的历史还是从东洋史学京都大学的历史来考察，根本不可能得出“罗振玉、王国维二人 1911 年东渡日本才使日本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出现考证之风”的结论。

在明治维新之前的享保年间，即 1716 ~ 1736 年，日本所谓的西学最初主要是指兰学，日语中所谓的“オランダ语によって西洋の学术、文化を研究した学问”。即来自荷兰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青木昆阳、野吕元丈等人是日本兰学思潮的先行者。那时，日本在学术上和德国的历史学和哲学界还是没有什么具体联系的。不过，就算是有点通商和外交联系也谈不到汉学研究的层面上。更何况那个时代德国的汉学研究是以实用语言方面的传授为主，若想作真正的汉学研究就得先去法国，儒莲（Stanislas Julien）是那个时代西方汉学研究的真正领袖。

到了明治维新时代，日、德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改善。正处于大力发展新式教育事业的日本，在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历史教授人选的情况下，就想到了向历史学大国的德国寻求帮助。通过德国驻日使馆的特别推荐，1887 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文学部高薪聘请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

派的史学大师兰克教授(Leopold von Ranke)的著名弟子瑞斯博士(Ludwig Riess)出任新设立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即历史系)主任教授,把德国当时历史学界飞速发展的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学术理论和西方史学传统带到了日本。此事的具体经办人就是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教授重野安绎博士。

后来成为日本汉学界顶尖人物的东洋史学祖师爷白鸟库吉博士等人,成了瑞斯的第一批日本弟子。从此,德国汉学开始凭借着德国历史学在日本的传入而日益流传开来。近代日本汉学界特别是东洋史学界的开山祖师就是德国历史语言考据学派的弟子。其中,白鸟库吉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曾追随瑞斯,亲自到德国留学数年。

瑞斯当年开设的课程先后有①:"历史研究法"、"地理学"、"东西交涉史"、"西洋史"、"德国近代史"、"英国史"、"法国史"。

三、从东京帝国大学到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学讲座

1890年,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始模仿欧美学制,设立讲座制度。其中给和中国学术有关的汉学和支那语学设立了三个讲座:汉学和支那语学第一讲座,汉学和支那语学第二讲座,汉学和支那语学第三讲座。②

1905年,东京帝国大学根据讲座的实际内容,临时性质地把汉学和支那语学三个讲座分别改组标明为:支那哲学讲座,支那史学讲座,支那文学讲座。

1910年,东京帝国大学通过决议把哲学科支那哲学讲座、史学科支那史学讲座、文学科支那文学讲座的划分正式固定化。名称虽然有些变化,但是依然保持着创始时期的汉学和支那语学三个讲座制度的性质。这三个讲座的人选先后如下:第一讲座第一任教授是岛田重礼博士。他的继任者先后有重野安绎、星野恒、宇野哲人、盐谷温、服部宇之吉、小柳司气太、高田真治等人。第二讲座第一任教授是竹添进一郎博士。他的中学时代老师的第四个儿子就是日后的京都帝国大学首任校长木下广次博士。

他的继任者先后有根本通明、市村瓒次郎、服部宇之吉(岛田重礼的女婿)、盐谷温、岗田正之、仓石武四郎等人。第三讲座第一任教师是张滋昉

---

① 见《东京帝国大学学术大观》,东京帝国大学出版会,1942年。

② 特别说明,为了维持历史文献的真实性质,本书出现的书名和学科名中的"支那"一律使用原始术语,没有翻译为"中国"。

(华裔,讲师身份)。他的继任者先后有宫岛大八、三岛毅、那珂通世、金国璞、张廷彦(华裔)、白鸟库吉、服部宇之吉(兼)、宇野哲人(兼)等人。

其中,白鸟库吉博士和市村瓒次郎博士被公认为东洋史学东京学派的两大创始人。

白鸟库吉生于1865年3月1日,原名白鸟仓吉。1879年,他考入千叶中学后,受到当时校长那珂通世的影响,决定今后以历史学为学习和研究目标。1887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师从重野安绎和瑞斯二人。1890年,他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1903年归国。1904年,他成为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教授。1905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19年,他当选为帝国学士院院士。1925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休。1947年4月1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倭女王卑弥呼考》、《东胡民族考》、《西域史研究》、《塞外民族史研究》、《アジア史论》等,有10卷本的《白鸟库吉全集》出版。

市村瓒次郎生于1864年8月9日,字圭卿,号器堂。1884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1887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学习院大学讲师。1890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892年,他晋升为教授。1898年,他转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副教授。1905年,他晋升为教授。1907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休。转任国学院大学教授。1933年,他当选为国学院大学学长。1939年,他当选为帝国学士院院士。1947年2月23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支那史要》、《中国古代传说之批评》、《支那史》等。

出自他们二人门下的著名东洋史家,有箭内互、松井等、今西龙、池内宏、加藤繁、羽田亨、桥本增吉、原田淑人、鸟山喜一、重松俊章、和田清、清水泰次、石田干之助、岩井大宪、植村清二、三岛一、津田左右吉等人。

1891年,长谷川泰议员向众议院提议[①]:

> "为了适应正日渐强大的日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实际需要,应当在日本的关东地区已经有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基础上,在日本的关西地区,即西京都(今京都)再设立一所帝国大学。"

这一提案得到了当时文部大臣大木乔的支持。

因此,在西京都的关西地区设立帝国大学也就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拟定的名称是"关西帝国大学",准备在该大学下设法科大学、理科

① 见《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京都大学出版会,1956年。

大学、医科大学和文科大学(相当于法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和文学院)四个编制机构。后来在当时文部省少辅(大致相当教育部高教局局长)九鬼隆一[①]起草设立新的帝国大学条例时才正式使用"京都帝国大学"这一名称,并大致确定了以刚从大阪搬到京都的第三高等学校[②](即第三高中)为基础,升格而成新的京都帝国大学的设立方案。

1896年,文部省事务次官(大致相当教育部常务副部长)牧野伸显向当时的文部大臣蜂须贺茂韶提出建议:"使用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的部分对日赔款,作为京都帝国大学的建设基金。"于是,这一建议获得日本文部省和当时的松方正义内阁的一致通过。[③]

可见,京都帝国大学从她诞生之初就和中国、和对华政治有了特殊的纽带关系。[④]

1897年6月18日,根据明治天皇第209号令,在日本的西京都正式成立了京都帝国大学,由木下广次出任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但是,它的文学院,即所谓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则迟至1906年才正式成立。

木下广次,生于1851年1月25日,熊本县人。中学时代在当地著名的时习馆学习,他的父亲木下犀潭就是当时学校的训导主任。横井小楠、竹添进一郎、元田永孚等汉学家皆出自木下犀潭门下。1872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的前身——日本司法省明法寮,专修法语。1876年开始,他前往法国留学。1879年,他取得法国巴黎大学法学专业学士学位。回国后从1882年开始,他先后任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相当于法学院)讲师、教授、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相当于高教局局长)。1889年6月7日,他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891年,当选为日本贵族院议员。1897年,木下广次被文部省任命为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1907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晚年时,他曾专心研究人体特异功能而再次闻名全

---

① 九鬼隆一的儿子就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教授、"京都学派"著名哲学家九鬼周造博士。

② 日文中出现的"高等学校"即中文的高中。和汉语中的高等学校、高等学府不是一个概念。有些研究日本学的学者由于不知道这一点,经常出现把某学者高中毕业考入大学的经历,理解为"从某高等学校转学到某大学"的错误阐述。

③ 这也就是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该条约要求清政府"向日本赔款白银2万万两"。则建立京都帝国大学的全部费用也只是这"白银2万万两"中的部分而已。全部赔偿相当于当年日本国库收入的四倍多。换句话说,起码使用了相当于日本一年的国库收入用来建设京都帝国大学。正是在此意义和事实上,我多次主张是晚清政府"被迫出资"建设了日本的京都帝国大学。

④ 牧野伸显的女婿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吉田茂的外孙就是现今日本政界的要人麻生太郎。

日本。1910年8月22日因病逝世。

在他上任之初，木下广次就很明确地表明[①]：

> "京都帝国大学不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分校，而是一所独立的大学。为了学校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具有独立的办学特点。"

可以说，从建校之初，建立一所独立的有别于东京帝国大学特点和学风的大学就成了京都大学历任校长的办校宗旨。

1906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相当于文学院）正式成立，直到1919年才更名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一任文科大学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著名汉学家狩野直喜博士。

狩野直喜生于1868年2月11日，卒于1947年12月13日。熊本县人。字子温，号君山，又号半农人。他被认为是"京都支那学"的开山祖师，也是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即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的第一代所长。

在创始时期的京都帝国大学，当时和中国有关的学术只有支那语学、支那文学一个讲座，教授就是狩野直喜。但是，狩野直喜当时在这里讲授的却是支那哲学史[②]，直到1909年，铃木虎雄以副教授到任为止。从1909年开始，狩野直喜正式开始讲授支那文学史。自狩野直喜以后继承第一讲座的教授先后有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人担任讲座教授。

到了1919年，又增加了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二讲座。担当第二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的是第一讲座的副教授铃木虎雄。自铃木虎雄以后继承第二讲座的教授先后有仓石武四郎、小川环树等人担任这一讲座的教授。

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史学科的出现则又是在1907年5月才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设立史学科，也设立了东洋史学第一讲座，内藤湖南以讲师身份出任此讲座第一任教师。

本来，狩野直喜最初是想以教授职称直接聘请内藤湖南的。在当时的日本教育界注重东京帝国大学的学历和崇尚留学欧美的大环境下，那时的内藤湖南只是位著名新闻记者和政治评论家而已，这使有着留法经历和东京帝国大学博士学位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以学历问题否决了内藤湖南直接担任东洋史学第一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的建议。

两年后，1909年9月，内藤湖南就晋升为正教授。

---

① 见《京都大学文学部五十年史》，京都大学出版会，1956年。

② 一直有学者主张狩野直喜是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讲座第一任教授。笔者认为，此说并不合适。

1908年5月，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二讲座。1909年4月，桑原骘藏担当东洋史学第二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桑原骘藏成为教授半年后，内藤湖南才晋升为教授。继承这两个讲座的教授先后有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佐藤长、荻原淳平等人。

到了1909年5月，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又增加了东洋史学第三讲座。但是，却一直因为没有合适的人选而空缺着①。直到1920年，矢野仁一担任东洋史学第三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

同时，在哲学研究科，增加了支那哲学史讲座，并且一直由狩野直喜担任支那哲学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因此，有些学者主张把狩野直喜作为这一讲座的第一任教授。但是，因为狩野直喜一直是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教授，因此他来担任支那哲学史讲座教授是兼职性质的。实际上，作为独立的支那哲学史讲座，它的第一任讲座教授却是1911年才到任的副教授高濑武次郎。而狩野直喜则是第一个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支那哲学史课程的教授，这么讲就很周严了。其中，支那哲学史讲座从高濑武次郎以后，先后有小岛祐马、重泽俊郎②、汤浅幸孙、日原利国、内山俊彦、池田秀三③担任讲座教授。

进入大正年代以后，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文、史、哲各自独立的倾向日趋浓厚，有关汉学的文、史、哲三个研究科，每科各设立三个讲座教授职位成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定制。

1919年，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更名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

1926年3月，内藤湖南退休。1930年3月，狩野直喜退休。1932年3月，桑原骘藏退休。到此为止，创始时代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三巨头全部退出了京都帝国大学。④

然后，在羽田亨的主持下，那波利贞、田村实造、宫崎市定、佐伯富等人先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讲座教授。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止，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二代的鼎盛时期。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止，东洋史

---

① 据说这一职位本来是留给王国维的，但是他婉言谢绝了。

② 重泽俊郎是我在硕士生时代指导教授坂出祥伸博士的导师。

③ 池田秀三教授是我在博士后时代的指导教授。

④ 据说白鸟库吉的弟子和田清博士曾经很自豪地说："我们日本的东洋史研究是世界第一。"可是此说是肯定东京学派还是赞美京都学派，却没有具体说明。我们只能善意理解是对东西两个帝国大学的赞美和肯定。

学京都学派进入了第三代的鼎盛时期。目前则是第四代学者的鼎盛和第五代学者的兴起时期。

最近，由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京都学派第三代东洋史家砺波护博士等人主编出版的《京都大学东洋学一百年》[①]一书中，对以下七位汉学家的汉学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肯定，即：

> 狩野直喜博士的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内藤湖南博士的东洋史学研究、滨田耕作博士的东亚考古和中国考古学研究、羽田亨博士的东洋史学和西域史研究、小岛祐马博士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宫崎市定博士的东洋史学和宋史研究、吉川幸次郎博士的汉语和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

上述七位汉学家中有四位是专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国际权威学者，另外三位则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专业学者，也是以“史”为核心的，足可以证明对中国古代史的专题研究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核心和基础。但是，这一总结明显地学术谱系混乱，因为他们七人不是同一辈分的，不能全部归结为创始期。尽管我和砺波护教授之间对于京都学派创始期的人员划分有些差异，各自研究方向也完全不同，但是并不影响我对他在东洋史研究上取得巨大学术成就的尊重。虽然我只和他在欢迎方克立教授访日的时候见过一次面、吃过一次饭、相互之间又只是寒暄了几句而已。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各汉学讲座创始人名单

讲座名称	讲座内容	主持人姓名	主持职称	开始时间
物理学讲座	东洋天文学史	新城新藏	副教授	1900 年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	狩野直喜	教授	1906 年
东洋史学第一讲座	东洋史学	内藤湖南	讲师	1907 年
物理学讲座	东洋天文学史	新城新藏	教授	1907 年
地理学讲座	支那史学地理学	小川琢治	教授	1908 年
东洋史学第一讲座	东洋史学	内藤湖南	教授	1909 年
东洋史学第二讲座	东洋史学	桑原骘藏	教授	1909 年
支那哲学史讲座	支那哲学史	狩野直喜	教授	1909 年

① 砺波护主编《京都大学东洋学一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 年。

续表

讲座名称	讲座内容	主持人姓名	主持职称	开始时间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	铃木虎雄	副教授	1909 年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	徐泰东	讲师	1909 年
东洋史学第一讲座	东洋史学	富冈谦藏	讲师	1909 年
东洋史学第二讲座	东洋史学	羽田亨	讲师	1909 年
美术史学讲座	支那美术史	滨田耕作	讲师	1909 年
支那哲学史讲座	支那哲学史	高濑武次郎	副教授	1911 年
东洋史学第一讲座	东洋史学	矢野仁一	副教授	1912 年
东洋史学第二讲座	东洋史学	羽田亨	副教授	1913 年
支那哲学史讲座	支那哲学史	高濑武次郎	教授	1915 年
东洋考古学讲座	东洋考古学	滨田耕作	教授	1916 年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二讲座	支那语学、支那文学	铃木虎雄	教授	1919 年
东洋史学第三讲座	东洋史学	矢野仁一	教授	1920 年
东洋史学第三讲座	东洋史学	羽田亨	教授	1924 年
地理学讲座	支那史学地理学	矢野仁一	教授	1924 年

尽管上述中间有的第一任讲座教授之间还有师生关系(如,羽田亨是京都帝国大学 1907 ~ 1909 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毫无疑问他和当时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二人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师生关系。)应该说,他们都有资格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第一代学者。

四、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

提起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就必须从它的三大创始人开始说起。可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少学者通常只知道一个内藤湖南。实际上,为日本汉学界公认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是三个:狩野直喜、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①]

① 中国学术界却经常只公认内藤湖南博士一人的现象出现,甚至还经常有学术谱系混乱的现象,如也曾有过把竹内好或竹内实先生当成京都学派现代中国学创始人来介绍的文章。这些说法皆为错误。

而且，根据京都帝国大学成立之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当时他们三人的地位：狩野直喜的职称是教授，而内藤湖南的职称则是讲师。1909 年，内藤湖南和新来的桑原骘藏二人同时成为教授。但是后者都比前者早半年成为教授。并且，对狩野直喜的教授任命是早在他来中国留学之前的 1899 年就已经内定了。因为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一代校长木下广次和他是同乡，至今木下家族的墓地和狩野家族的墓地，也是并排地出现在京都的光明寺中的。

狩野直喜是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第一讲座教授岛田重礼的学生。他中学时代和小川琢治是同学，大学时代和藤田丰八是同学，来华留学时代又和市村瓒次郎是同学。而桑原骘藏则是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第三讲座那珂通世（兼职讲师）的学生。

然而，由于桑原骘藏在论著和日常生活中对中国人种和文化一直抱着极端仇视和鄙夷的态度——笔者一直称他是现代日本汉学界右翼学者之祖，至少可以肯定他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右翼学者之祖。他甚至也经常当面对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进行讽刺和揶揄，以至于连罗振玉、王国维和董康（当时京都帝国大学不在编的汉语讲师）三人为了避免尴尬而非常害怕和他交往。当然，桑原骘藏也有个和他比较友好的中国学者文廷式。也许正是他那太极端的仇视和鄙夷中国的态度影响了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的介绍和交往吧。

负责支那文学和支那哲学教学的狩野直喜，出自其门下的最著名的直系弟子哲学是武内义雄博士、小岛祐马博士、本田成之博士；文学是青木正儿博士、仓石武四郎博士、吉川幸次郎博士等人。

而负责东洋史学教学的内藤湖南和桑原骘藏，出自他们二人门下的最著名的直系弟子是宫崎市定博士、神田喜一郎博士、贝塚茂树博士、那波利贞博士、佐伯富博士、冈崎文夫博士、宇都宫清吉博士、奥羽正义博士、宫川尚志博士、三田村泰助博士等人。而第二代弟子中的领军人物就是他们的直系弟子宫崎市定，一个曾经参加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疯狂掠夺中国古代文物和古籍的国际汉学界研究宋史的最为著名的头号学者、战后京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这位继承了桑原史学中的反华传统的国际汉学大师，以 94 岁的高寿走完了他那精彩的宋史研究和曾经有过的反华和从军生涯。

负责考古学和西域史教学的是滨田耕作和羽田亨。在他们门下的著名弟子如梅原末治博士、水野清一博士、田村实造博士、角田文卫博士等人。

在第一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巨头中，一般学术界把内藤湖南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创始时代的领军人物，这大概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第二代的领军人物当首推宫崎市定。

可以说，正是在这两个人的手上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今天的京都大学成了在日本全国仅次于东京大学的学科齐全、规模宏大的国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在世界上也享有盛名。日语中所谓“学の京大”也正是由此而来。特别是它的文学部和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古研究中心等教学和科研机构。日本国内一直习惯对东大和京大进行对比。如“官僚の东大”和“学术の京大”，“东大の白鸟”和“京大の内藤”，“东大の山崎”和“京大の小川”……

《述学斋日记》1930年5月6日中也记载了这一对比：

> 赴俞斋。访中江君，畅谈至深夜。云先师剑西先生在日，曾来北京，泊扶桑馆。君访之，谈及东西大学优劣，先师曰：“东不如西也。然今仓石生者，虽年少，现在京都留学，渠归东之后，东必有生色。”①

今天，京都大学全校多达六十几个图书馆，几乎在每一个学部和研究所内均有独立的属于自己学科范围的图书馆。全校总藏书量超过了600万册，而人文科学研究所内珍藏的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献就超过了40万册，这些文献即使是在中国也是十分罕见的，有很多珍贵的古代文献则是中国早已经失传多年而至今完整地保存在日本的。

京都大学的传统与办学目标，和东京大学截然不同。

京都大学位于日本历代的古都，有着悠久的日本传统历史和文化；远离日本首都的政治中心和繁华的大城市，优美的校园自然环境为学者准备了潜心治学的理想场所，这使京都大学一直以培养科学家和专业化学者见长。特别值得京大人自豪的是，到2007年为止，在日本的诺贝尔奖得主中，京都大学的毕业生就占了五名。而获日本文化勋章和日本学士院奖以及其他方面奖励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成就的取得同它的优秀传统是分不开的。京都大学从创校以来就十分执著于各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注重于学术上的高标准。至今，西田的哲学、汤川和江崎的物理学、福井和野依的化学、朝永的力学、利根川的生理学名扬天下，而以内藤史学为核心的东洋史学团队，更是20世纪国际汉学界的中坚力量。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著名的

① 见《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

史学大师陈垣先生就曾和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胡适先生一起探讨当时世界汉学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京都还是在巴黎这样一个问题。①

五、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对于近、现代中国学者来说，京都帝国大学及其以后京都大学时代的人文科学研究所一直是个让人神往和肃然起敬的象牙之塔。作为京都帝国大学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肯定要对它的来龙去脉进行介绍。

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正式成立是1939年。成立的目的是以对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综合研究为其宗旨的，它显然是想平衡一下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在人文科学上所形成的极端专业化和高精尖的研究模式。第一任所长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家小岛祐马博士。我们把1939年到1948年之间的人文所简称为“旧人文所”。

其实，早在十年前的1929年就已经成立了和此很类似的科研机构：东方文化学院。这是隶属于日本外务省下的一家官办科研和情报机构。东方文化学院的理事长是服部宇之吉博士。在东方文化学院之下，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所长是服部宇之吉博士。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是狩野直喜博士。在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下设评论员制度，负责学术研究。当时日本的评论员很似我国所谓的学科带头人和学科评议组成员二者的统一。很显然是由某领域权威学者来担当的。

第一届评论员如下：

支那文学专业：狩野直喜博士、铃木虎雄博士

支那言语学专业：新村出博士

东洋史专业：内藤湖南博士、桑原骘藏博士、矢野仁一博士、羽田亨博士

支那考古学专业：滨田耕作博士

支那地理学专业：小川琢治博士、石桥五郎博士

支那科技史专业：新城新藏博士

支那哲学专业：高濑武次郎博士、小岛祐马博士

支那佛学专业：松本文三郎博士

---

① 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到了1938年,因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和京都研究所之间因为研究学风和研究课题的矛盾冲突日益加剧,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侧重于近现代中国,直接为日本外务省和陆军部服务,而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则侧重于研究中国古典学术,这一矛盾冲突直接导致了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①] 东方文化学院宣告解散后,它的京都研究所则意外地保存了下来。1939年,正式独立后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改名为东方文化研究所,隶属于京都帝国大学,由松本文三郎博士和羽田亨博士先后担任所长。

这期间它最有意义的一项工作是自1934年开始编纂出版每年一册的《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一书。此书在编纂体例上是学自德国。[②] 当时德国汉学界编纂并出版了每年一册的《东方学文献解题》(Orientalische Bibliographie)一书。此书成为西方东方学界(特别是汉学界)必备的工具书。直到1914年才停刊。20年后,日本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开始模仿此书编纂了《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1963年开始,把《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改名为《东洋学文献类目》出版至今。《东洋学文献类目》和《东方学报》成了刊发汉学研究论文和收集汉学研究文献的重要载体。

残存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一直以独立后的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名义苦撑到了1948年,它和西洋文化研究所一起被新的京都大学收编组成为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我们把1948年以后的人文所简称为"新人文所"。现在,因为旧人文所已经成了过去,所以一般就直接以"京大人文所"来指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自小岛祐马博士以后,先后担任所长的有高坂正显博士、落和太郎博士(代所长)、安部健夫博士、贝塚茂树博士[③]等人。安部健夫博士是战后重新改组的新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一代所长。改组后的新人文所下设日本研究部、东方研究部和西方研究部三个机构。当时,由贝塚茂树博士和桑原武夫博士[④]分别出任东、西方研究部主任。

2000年4月,人文科学研究所又一次重组,目前的机构编制如下:

---

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京都帝国大学研究中国古典学术的学风已经形成,它开始和东京帝国大学抗衡。而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的汉学家们却更看重中国近现代的经济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二者截然不同。

② 此说又是由我首先发起,敬请精通德日学术交流史的学者们给我提供更直接的证据。

③ 贝塚茂树博士是著名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博士之子,著名冶金学家小川芳树博士之弟,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博士之兄,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小川环树博士之兄。

④ 桑原武夫是桑原骘藏之子。

人文学研究部

文化研究创成部门

文化生成部门

文化关联部门

东方学研究部

文化表象部门

文化构成部门

汉字情报研究中心

中篇

创始与发展

第一章
狩野直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狩野直喜生于1868年2月11日,熊本县人。字子温,号君山,又号半农人、葵圆。曾祖父狩野直清,祖父狩野直温,父亲狩野直恒。狩野直清以前谱系记载,间有残缺,不能连贯。狩野直喜是狩野直恒的第三子。

1879年,11岁的他开始在当地新建的同心学舍上小学。

1882年,他开始到济济黉塾学习传统的儒家经典。该学校后来接受明治天皇的特别赏赐,变成了一所公立学校。它的校训一直是当时日本教育界的一面旗帜:

> "伦理を正し大义を明らかにす,廉耻を重んじ元气を振わす,知识を磨き文明を进む"。(正伦理,明大义,重廉耻,振元气,磨知识,进文明。)

1884年,他考入东京地区的神田共立学校(相当于中学),主修外语。

两年后,又考入大学预科(相当于高中)。这时开始,他和日后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博士、中国文学史家古城贞吉博士等人是同窗好友。

1892年,他正式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在著名汉学家岛田重礼博士、根本通明博士、竹添进一郎博士等人指导下学习。当时他的同学中,就有日后著名的汉学家藤田丰八博士。正是在岛田重礼的直接指导之下,他开始接触到了清朝乾嘉考证学派。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正则中学、东京外国语学校等地任教。

1900年开始,狩野直喜作为日本文部省公派留学生,第一次到北京留学。当时,日本人一般多喜欢到欧美留学,所以到当时的"清国"留学者人数

是极其稀少的。哪怕是研究汉学的学生和学者。日后名满天下的服部宇之吉，当时作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副教授，比他早到了将近一年。[①]

留学期间，狩野直喜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搜求古籍和拜访当时在世的晚清学者这两件事上。比如，他亲自去拜访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俞樾，而且还亲自写下了《俞曲园の哲学》一文发表，得到了俞曲园老先生的赞许。[②] 俞樾老先生曾经应日本学者岸田国华之邀，编注过40卷的《东瀛诗选》，或者可以看成是他对日本汉学一个肯定。

当北京爆发义和团运动时，欧美洋教士和日本使馆中的日籍人员井上陈政[③]等人的被杀，直接导致了在京外国使馆人员和义和团的正面武装冲突。留学生的狩野直喜此时却是拿起了枪，成了日本使馆卫队队长柴五郎手下的一名卫兵。学生时代的狩野直喜的这次短暂的自动从军经历，为日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部分学者和学生直接参加侵华战争，成为所谓“笔部队”和“战利品部队”的一员，开创了先例。根据狩野直喜的孙子狩野直祯的陈述，当时一同被困在北京外国使馆中的还有日后饮誉世界的著名汉学大师伯希和。显然，这段回忆肯定是来自狩野直喜留学欧洲期间亲自拜访伯希和时才得知的。

作为八国联军之一日军的一名成员，在八国联军撤出北京后，狩野直喜回到了日本，向文部省汇报了在京留学的情况，然后就任京都帝国大学的法学讲师。

短暂教学和休息几个月后，1901年9月他再次来到中国，继续留学。这次他选择的地点却是当时南方的商业都市上海。在那里，有他在东京帝国大学时代的同学藤田丰八。在藤田丰八的介绍下，他第一次认识了晚清国学大师罗振玉。更有意义的是，根据狩野直祯的陈述，狩野直喜那时经常到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部的图书馆去读书和查找中西交通史和传教史方面的资料。该图书馆成立于1869年，藏书上万种，其中收有汉籍2000余册，其余皆为西文著作和杂志。在内容上几乎全是和中国有关的西方各种文字的著作。这使懂英文和法文的狩野直喜得到了了解西方汉学研究状况的难得的机会。正是在图书馆中，他结识了一些当时在上海的同样来图书馆读书和查找资料的欧洲汉学家。而且，当时那里还定期举行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学术讲座，在他留学上海期间就先后有佛尔克、李摩提太、福开

---

① 李庆《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同时前往的还有服部宇之吉。”此说可能不准。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井上陈政是两卷本《禹域通纂》一书作者、日本驻华公使馆二等书记官。

森等人在那里举行中国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的公开的学术演讲。

特别重要的是:根据我的考证和调查,狩野直喜在1902年还正式加入了在上海的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分会,是普通会员,会员资格一直到1920年。[①] 正是在这里,他经常出席这里举行的各种讲座活动,开始接触到了欧洲的汉学研究传统和学术经典。

通过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忆う》[②]一文的记载,我们得知,在上海时代,他一直没有机会和当时年青的王国维见面。只是他的同学、王国维的日文老师藤田丰八告诉他,王国维"头脑极明晰。善读日文,英文亦巧,且对西洋哲学研究深感兴趣,其前途大可属望"。

1903年归国后,他和加藤繁一起编纂《清国行政法》一书,后在京都法政专门学校短期任教。

京都帝国大学成立后,他成为那里的教授和文科大学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一直负责支那哲学史、支那语学和支那文学等讲座的课程教学。根据狩野直祯的《狩野直喜》[③]一文中的介绍,对狩野直喜的教授任命是早在他来中国留学之前的1899年就已经内定了。因为京都帝国大学的第一代校长木下广次和他是同乡,至今木下家族的墓地和狩野家族的墓地,也是并排地出现在京都的光明寺中的。

1907年,狩野直喜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1910年,狩野直喜带领着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内藤湖南和小川琢治以及讲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四人,再次来到北京,调查刚发现并运到北京的敦煌文书。辛亥革命期间,他在罗振玉和王国维的直接影响之下,对敦煌文物和宋元戏剧保持着长久不衰的兴趣,也开始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狩野直喜本人的相关记载可参见本页注解。)[④]

---

① 李庆《日本汉学史》一书中主张他"在上海,进入欧洲人开的学校,接触到了欧洲汉学的研究方法"之说,以我对相关资料的考察来看,尚未发现"进入欧洲人开的学校"学习之证据,李氏此说可能需要重新审查。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② 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忆う》,《艺文》1927年第8期。译文引《王国维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3页。

③ 狩野直祯《狩野直喜》,见江上波夫主编《东洋学の系谱》,大修馆书店,1992年。

④ 狩野直喜《支那学论丛》:"大约明治43年前后,敦煌发现的遗书被送往前清朝廷的学部,法国的伯希和氏和英国的斯坦因氏劫后残余的遗书妥为安置保管。闻之,我与京都大学的内藤、小川、滨田、富冈诸君共同奉命出差北京调查有关遗书。当时,罗叔韫君任京都大学堂农科大学校长,前述的藤田博士在其手下任教,故为遗书调查提供了极大方便。当时身为农科大学教员的王静安君亦为我等一行提供了诸多方便。……当时大阪《朝日新闻》报社因计划南极探险而正为世间注目,故与小川博士晤面之支那人皆言必及南极北极;而我与王君探讨支那戏曲问题而论及南曲北曲,所以滞留北京的我等周围的支那人将南北极与南北曲相比,成为一大笑谈。"みすず书房,1973年。

直到1910年时，狩野直喜在北京才和王国维先生初次见面，并一起探讨学术。狩野直喜在《王静安君を忆う》一文中回忆说：

> 我利用出差北京的机会面会王君，听了他关于元杂剧研究的谈话，觉得非常有意义。当时《大阪朝日新闻》计划南极探险，整个社会都很关注。小川博士每一次见到中国人的时候就讨论南极北极的问题，我则跟王君一直谈中国戏曲的南曲北曲。所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些中国朋友对比南北极与南北曲两个话题，他们似乎把这事看成一个笑话。①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国维先生和狩野直喜之间多次见面，相互往来书信甚多，他们之间探讨的问题从敦煌学、戏曲到唐宋文学。

1912年开始，他前往欧洲留学，目的之一就是亲自调查被当时掠夺并保存在英、法、俄等国的敦煌文物，这使他的研究兴趣迅速集中在经学和俗文学方面。当狩野直喜远赴欧洲留学前，王国维先生还写诗相赠。该诗《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全文如下：

> 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平生未拟媚邹鲁，胪蛮每与沂泗通。自言都市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此道齐衡嵩。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节回心胸。颇忆长安惜相见，当时朝野同欢宴。百僚师师学奔走，大官诺诺兢圆转。庙堂已见纲纪弛，城阙还看士风变。食肉偏云马肝美，取鱼坐觉熊蹯贱。观书韩起宁无感，闻乐延陵应所叹。巾车相送南城隅，岁琯甫更市朝换。嬴蹶俄然似土崩，梁王自古称鱼烂。干戈满眼西风凉，终雏得意樗且狂。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怜杜口心烦伤。四方蹙蹙终安骋，幡然鼓棹来扶桑。扶桑风物由来美，旧雨相逢各欢喜。卜居爱住春明坊，择邻且近鹿门子。商量旧学加邃密，倾倒新知无穷已。幸免仲叔累猪肝，颇觉幼安惭龙尾。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而今文谢安在哉。履霜坚冰所由渐，麋鹿早上故姑台。兴亡原非一姓事，可怜弃弃京与垓。此邦曈曈如晓日，国体宇内称第一。微闻近时尚功利，复云小吏乏风节。疲民往往困鲁税，学子稍稍出燕说。良医挖是九折肱，忧时君为三太息。半年会合平安城，只君又作西欧行。石室绀书自能事，缟带论交亦故情。离朱要能搜赤水，楚图岂但

① 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忆う》，《艺文》1927年第8期。译文引《追忆王国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

夸白珩。坐待归来振疲俗，毋令后世羞儒生。勿携此诗西渡海，此中恐有蛟龙惊。

而狩野直喜也深知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价值所在，认为大凡中国的老一代大儒才能做的事他都做了，并且他研究过外国学问并把它利用来研究中国的学问。

从欧洲回到日本后，他先后举行了“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和“关于敦煌的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会，并且发表了以研究唐代变文为核心的《支那俗文学史研究的材料》这篇重要的敦煌学论文。

1925年，狩野直喜最后一次和王国维先生见面。狩野直喜此次北京之行回国后，他给王国维先生来信一封，其内容谈到了当时时事，该信如下：

静安先生有道：睽违多年，驰神孔亟，重逢渴想。幸甚，幸甚！此次文化会议，议论纷纷，果如弟所料，不甚高兴。但至津见雪翁，至京见先生，所足以自偿耳。近闻北方战祸亦起，为之忧念。张颠冯厥，于弟风马牛而已。即为世道人心谋，张胜尤可，冯胜断不可。前车之覆似宜敬戒，何如，何如？

又见《王德毅年谱》[①]中的记载狩野直喜的回忆：

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在北京开会，我赴中国，在北京郊外西山的清华学校会见他。受到他的热情招待。我很希望王静安君参加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屡向我当局提及此事，也对中国委员说过：东方文化事业，如果要研究学问，首先非要请王君参加不可。双方都表示了赞成之意。今日中国，因为政治上意见相异和思想混乱，所以不一定大家都会与王君在思想上有共鸣。然对于王君的学问，因其学识超越时代……只要对中国学问有了解的人，没有一个不推崇他的。

和王国维先生的学术交流，使他们双方全得到了好处。王国维先生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所使用的资料，就有狩野直喜直接从欧洲抄录回来提供给他的。这一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狩野直喜提供的是他个人的手抄本，其中有些字当时他无法判断是何字，就大致画出，后

① 引见《王德毅年谱》文中。

来回国后却怎么也不明是什么字了。[1] 这些字到了王国维先生那里都成了可以辨识之字。王国维使狩野直喜的手抄资料变成了可以利用的信史，这是对双方大有裨益的事情。

而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一书，也使日本汉学界一时间兴起了竞相研究中国古代戏曲文学的风尚，至今，对元杂剧的研究仍然是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看家学问之一。王国维先生通过狩野直喜的论文中引用的"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两句古诗，根据《北梦琐言》中的引文，立刻判定出这是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并且由此而来写下了《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唐写本残小说跋》、《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等论文。荣新江先生在《狩野直喜与王国维》[2]一文中曾经评价说：

> 王国维对日本学术，特别是京都的中国学发展给予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在王国维自杀后，京都学人的纪念活动和纪念文章中感到这种影响。即使是狩野直喜的学生辈，仍然感受到这种影响力的存在。仓石武四郎氏曾说："我去了京都以后，却能强烈地感受到王国维先生和罗振玉先生的影响。还有敦煌的出土文物，这在东京虽然也有一些，但还没有达到一定影响的程度。"日本学术界曾大力收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比如他研究词曲的抄校本二十多种，即经罗振玉家和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手，归东京东洋文库收藏。

王国维先生自杀后，狩野直喜首先在日本京都袋中庵发起了悼念活动：[3]

> 追悼会小启
>
> 敬启者：清朝遗臣王静安徵君国维于本月二日午前十时在北京郊外万寿山昆明湖殉节。公为支那现代之完人，学界之耆宿，竟完大节，无任恸惜。同人等协商，因请法隆寺贯首佐伯定胤师在下列地点唪经追悼。届时光临参拜为荷，特此通知，敬请台安。
>
> 场所：京都东山线五条坂袋中庵。
>
> 日期：六月二十五日午后一时。

---

① 狩野直喜原话是："我往年在英法两京底博物馆及图书馆，研究敦煌遗书的时候，偶然看见了这个，喜不自禁，于是抄了一部分藏诸箧底，载了回来。遗憾的是每当钞写的时候，没有参考的书籍，也没有精读原文的时间，碰到文字不分明的，便模仿那形体写了下来，所以现在拿出来一看，全然想不起应当读作什么的，很不在少数。"《先秦经籍考》，江侠庵译，商务印书馆，1929 年。

② 荣新江《狩野直喜与王国维》，《敦煌学辑刊》2003 年第 2 期。

③ 见《王忠慤公哀挽录》，贻安堂，1927 年。

昭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铃木虎雄、神田喜一郎。

“乃择于本日设位京都东山之袋中庵哭之,又延法隆寺贯主胤公虔修忏法以祈冥福。”[①]他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是:“支那现代之完人,学界之耆宿”、“学问渊博,践履笃实”。

而狩野直喜和罗振玉也一直保持着长久的友谊。他曾经从罗振玉的藏书中借来《古今杂剧三十种》影印出版,丰富了日本汉学界的研究资料。

1928 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后,第二年成为新组建的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在狩野直喜就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期间,他多次指示要重点购入以清朝考证学为中心的各类中国古今学术著作,奠定了今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书的基础。

狩野直喜 1947 年 12 月 13 日因病逝世。

狩野直喜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的开创者之一,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支那学派”,亦即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先后留下了《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支那文学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学》、《支那小说戏曲史》、《论语孟子研究》、《支那学文薮》等汉学研究名作,还留下了大量汉文古体诗。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首任教授高濑武次郎曾经评价说[②]:

> 狩野博士的学术体系来自清朝考证学派。在日本学术界继承了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岛田重礼这一学术体系的,是接受过岛田先生亲自教导的狩野和我等人。

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第二任讲座教授小岛祐马博士[③]也主张[④]:

> 在东京帝国大学中接受过岛田先生指导的人有很多,但是真正继承了他所传授的清朝考证学的传统并发扬光大的人,除了狩野先生就

---

① 这些活动,特别是请法师作法事,在日本当然要花费很大一笔钱!我不知道这些开销是由谁支出的。

② 引见高田时雄《君山狩野直喜先生小传》文中,见《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 年。

③ 他本来曾经是狩野直喜博士在京都法政专门学校工作时期的学生。

④ 引见高田时雄《君山狩野直喜先生小传》文中,见《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 年。

再也找不出别人了。

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高田时雄博士[1]介绍，狩野直喜生平最喜欢使用的印章是一枚刻有“戊辰年生”四字的篆文印。这一年正是明治元年。高田先生认为这反映了他强烈的时代意识。

和内藤湖南一样，狩野直喜也和很多晚清和民初学者有着深厚的友谊和多年交往。狩野直喜一生中，多次访问中国。最为中国学者所熟悉的大概是他和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交往了。

二、学术述评

狩野直喜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支那学术史三个方面。我们将以对他的史学研究、敦煌文学研究、明清小说和戏曲的研究情况进行介绍和总结。

一般学者更多地把狩野直喜看成是一位中国古代文学的专家。实际上，他更是一位学术史家和思想史家。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的讲义，后来在他的弟子们的努力下基本上全成书出版。按照讲义的时间先后顺序，如：1908 年的《清朝の学术》、1910 年的《清朝の经学》、1912 年的《清朝の文学》、1924 年的《两汉学术考》、1926 年的《魏晋学术考》等。实际上，这些已经是比较系统的清朝学术史、清朝经学史、清朝文学史、两汉学术史、魏晋学术史了。

并且，他后来正式定稿出版了狩野系列六大史学著作《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支那文学史》、《清朝の制度と文学》、《支那小说戏曲史》。当然，狩野直喜博士也是喜欢述而不作的人，这些著作也几乎是在整理学生听课笔记的基础上而成的。

在对史料的使用上面，狩野直喜对古代文献和新发现的敦煌文献双重并用原则，尤其是后者，和内藤湖南的使用新出甲骨史料考证上古史一起，他的使用新发现敦煌史料考证中古文学史的实践，构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专门史）研究上的新的史学研究模式。

受当时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影响，作为支那哲学京都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之一，狩野直喜主张，中国哲学史本质上是对中国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的历史。因此之故，从汉唐训诂学到宋明理学，从孔孟儒学到诸子百家，都被他

---

① 高田时雄《君山狩野直喜先生小传》，见《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 年。

列为“支那哲学史”的当然研究范围之列。

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这是他从他的老师岛田重礼那里继承下来的老本行。根据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和变化的了解，他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孔子以前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时期。如果我们把前两个时期看成上古的话，汉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划分问题，在狩野史学那里可以说是虽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么他和内藤史学的断代差异首先出现在“清代”独立于“宋元明时期之外”这一显著特征。古典学包括了对古典的考证学，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给清代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学术史成了哲学史的集中表现。而考证学作为经学的辅助，成为哲学史的研究范畴。①

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狩野直喜更鲜明地把考证学定位为“排宋儒之说而恢复儒学之原始状态”的角度上。② 在他看来，考证学已经成了沟通现在和过去的桥梁、恢复原始儒学的本来面目的工具。因此，他对考证学的认同，更多的是侧重于对汉学研究工具理性和操作方法的认可。这和他在京都帝国大学求学时代受教于岛田重礼的经历是一致的。为此，严绍璗先生在《日本中国学史稿》一书中分析说：

> 狩野直喜把经学的训诂考证之学与经学的性理之学列在同一位置上，这在事实上改变了在此之前江户时代宋明性理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并把它定格为中国儒学演进中的一个发展阶段，视它为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的诸多的文化现象之一。③

由此而来，他开启了京都学派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和范畴。

在个人思想倾向上，狩野直喜一贯以“儒臣”自称。他也多次进宫为天皇讲授孔孟思想。狩野直喜把孟子的思想放在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地位上，孔子讲仁，孟子发展为仁义。孔子讲性，孟子则发展成性善论。孔子注意到了民的力量，孟子就提出了民本主义思想，等等。以至于王国维先生赞叹他是日本的当代“儒宗”。狩野直喜在肯定汉代学术接近上古之时，又提出了汉代思想的时代性质，这样就为他对宋代思想和清代思想的肯定留下了时代性质的对等评价基础。

如果说内藤湖南喜欢读赵翼，那么狩野直喜更倾向于读崔述。后来，他

---

① 这一对哲学史的认识到了他的弟子小岛祐马博士那里，“中国哲学史”的概念第一次得到了极端阐述。见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 年，第 527 页。

③ 严绍璗《日本中国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 年，第 257 页。

还将在北京购买的《崔东壁遗书》赠送给好友那珂通世。从此，那珂通世手批本的《崔东壁遗书》就成了日本学术界、出版界的一件抢手货。[①] 但是，崔述的疑古思想只是成为他坚定了在学术研究中贯彻清朝考证学的一个依据。因此，他在《中国哲学史》[②]一书中就特别表明了他对崔东壁的批判：

> 在崔述的观点中有非常有趣味的内容。今天我们很公正地考察他的学术价值的话，毕竟在中国经典并不是个可以随便怀疑的对象。而他却能脱离这一传统，以独立而自由的观点，对经典进行颠覆，这对于学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借鉴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是十分必要的，显然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其实，从对怀疑论的肯定走向实证的考证学，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并不远，可是却有着方法论上的本质差别。在这一点上，也许狩野直喜在超越了崔述之后才决定把崔述的著作送出？这表明了他对疑古思想的重视，也显示了他走向实证的选择。

"用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法去研读中国原典"，这是狩野直喜一贯主张的方法。而所谓"中国人自身的解释方法"也就是清代传统的乾嘉考证学和传统的从训诂和版本目录学入书研究儒家经典的方法。狩野直喜认为这是研究汉学的基础。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时，狩野直喜时刻注意利用新发现的文献与古籍版本的相互校勘性研究，与此相关，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考证学功夫。如，他在《旧钞本毛诗残卷跋》[③]一文中，就利用了日本抄本、敦煌抄本和传世善本之间的校证，见如下：

> 古旧钞本《毛诗》，自《唐风·蟋蟀》起，至《鸨羽》止，凡为诗八篇，共一百十三行，字体遒雅，其为奈良朝人士手写无疑。今校以唐石经、宋小字本、相台本，异同甚多，不遑枚举。于《七经孟子考》文所引古本互相对勘，亦有合有不合。……夫隋唐经传之存于我邦者，固不为少。即如足利之藏，其资助考镜，裨益学术，世所共知。然以此校彼，短长互见，究不如此本之佳。岂惟千岁古香。夸美艺林而已哉。此本旧藏山城鸣泷常乐院，今归东京和田氏，顷者借得，影印数部，以饷内外学者，及还之，为撰考语，以明此本之所以可贵者。……予跋此书，因思敦煌石室遗书中，亦有《毛诗》残卷，试取对校，若"绸缪"，经文"邂逅"，敦煌

① 1903年的4月，那珂通世校点出版了崔述的《崔东壁遗书》。

② 狩野直喜《中国哲学史》，岩波书店，1953年。

③ 《先秦经籍考》，江侠庵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

本作“解觏”。“羔裘”,《毛传》:“祛袂也”。敦煌本作“祛袂末也”。绸缪,《郑笺》“斥嫁取者”。敦煌本无“嫁”字。由是则此旧钞本与敦煌钞本,两书正同,可见唐时钞本,往往如此。敦煌遗本,书体拙陋,有类童蒙钞写,伪夺互见,年代亦稍后于此书。而长处究不可没。

从这里可以看出:利用新发现的文献,结合已有的古籍文献,在训诂学的基础上进行版本校勘的研究,这是狩野直喜重要的研究方法。

曾有学者认为:“狩野直喜是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此说可能缺乏具体的参照物。因为,在国际汉学史上,“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是俄罗斯汉学家王西里教士在1873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但是,在日本汉学界,狩野直喜肯定“是第一位对中国文学进行具有近代科学意义的研究的学者”。比如他在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注意到了对俗文学的研究,结合敦煌学文献资料,从说唱文学和杂剧入手,用实证的方法考证了《水浒传》的形成。而王国维先生则立刻对此击节叹赏,称赞说“其言甚确,若《三国演义》则尤有明证,足佐博士之说”。这篇名为《水浒传与中国的戏剧》的论文写成后,刊发在1910年的《艺文》杂志上。

为此,严绍璗先生在《日本中国学史》①一书中评价说:

狩野氏的论文列举了明清两代戏曲谱录中有关水浒的戏,总结了它们的一般特点后,以《双献头》、《燕青情鱼》、《还牢末》、《争报恩》和《李逵负荆》五出杂剧为例,他指出这些“水浒戏”中的情节,与《水浒传》中的相比较,显得粗糙,甚至幼稚,今本《水浒传》中有许多精彩的情节在戏中没有被采用。如果小说早于杂剧,这种情况便是不可思议的了。……小说的情节应该是由类似的戏曲发展来的,……在今本大《水浒传》形成之前,一定存在着许多的“小水浒”,以梁山英雄为题材的杂剧,便是“小水浒”的一个类别,现在流传的《水浒传》当是在此众多的“小水浒”上形成的,“它大概是在元代之后,明代的初期出现的”。这一见解,现在已为治中国文学史的中外学人所接受。

接着,他断定:

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则更获一大发展。

①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特别是他在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崔子玉之名，并判定其为《西游记》中的崔珏之原型，至今已经成为定论，也是《西游记》也有个形成过程，取法唐代故事的证据。

三、学术影响

狩野直喜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在敦煌学、古代戏曲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研究等方面。

（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

狩野直喜亲自调查和收集敦煌文献，开启了日本东洋史学界对敦煌学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的先河。从1909年他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中（如《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萌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不仅如此，他还在京都帝国大学专门开设“中国戏曲史”课程与讲座，汇成《中国戏曲史》讲稿，油印散发。于是，《汉宫秋》、《窦娥冤》等古典名作被正式引入到日本。在教学中，狩野直喜还把当时通行的汉文训读法引入戏曲研究和教学中，教学中按照《北曲谱》、《中原音韵》，一字一句地正确地读解曲文，打破了中国学术界的戏曲唱词不能训诂和考证的传统。这使他成了支那文学京都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之一。

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先生和狩野直喜之间的学术交流，他们二人共同成为敦煌学和中国文学史上俗文学和戏曲文学研究的开创者。

狩野直喜的戏曲研究，后来影响到了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汇文堂书店在1918年出版的《品梅记》一书中，就有滨田耕作在北京观看梅兰芳戏曲演出而写的评论文章。在他的影响下，久保天随、西村天囚、金井保三、宫原民平、铃木虎雄等人也都对元曲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继承了他的这一研

究的当推狩野直喜的学生、京都帝国大学教授、著名中国戏曲史学者青木正儿。他在《君山(狩野直喜)先生与元曲和我》一文中曾经评价说狩野直喜“实为我国元曲研究的鼻祖”。青木正儿的代表作是《中国近世戏曲史》、《南北戏曲源流考》。从此以后,京都大学对中国戏曲文学的研究成为该学派的一个传统。青木正儿之外,吉川幸次郎、田中谦二等中国戏曲史研究大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狩野直喜的首创之功。

除此之外,1920年9月,狩野直喜还发起成立了《支那学》研究杂志,一家反映京都学派风格和特点的专业汉学研究期刊。《支那学》创刊后,成了汉学研究的一个阵地,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专业汉学研究人才。小岛祐马、武内义雄、青木正儿、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等第二代学者成为该刊的核心成员。

在他肯定唐代的俗文学之时,他还对前此的魏晋文学给予了新的评价。《魏晋学术考》中列有专章对魏晋时期的文学进行研究。他和铃木虎雄二人在此问题上的努力,为日本汉学界对中古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准。

(二)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可以说从狩野直喜开始就公开地打出了继承清朝考证学传统的大旗,批判地借鉴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原典的训读和注解,进行文献实证研究。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在狩野直喜为文学部部长的带领下,以弘扬清朝考证学的方法为己任,积极吸收欧洲汉学家的研究传统,真正摆脱了以往受中日两国传统汉学研究的束缚。对中国古典的解释,采用了一种批判的眼光和客观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进行严密的考证。这一实证主义的学风对20世纪日本乃至于国际汉学界的中国古代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狩野直喜研究范围从中国上古一直到清代,研究领域则从哲学到法律制度再到文学。

在治学特点上,他全盘继承了岛田重礼的考证学传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把汉唐训诂、宋元义理、清代考证三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反对当时刚流行的以西方思辨哲学的某一纯粹理论框架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的现象。他还把在文学研究上的俗文学研究引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注意到了道教作为民间信仰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特殊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但是,狩野直喜却坚持着经学为中国哲学史的核心这样一种信念,从他对孔孟思想的认识开始,他赞成孟子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又从宋代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宋代倍受关注的原因。

他因为目睹了清朝的灭亡，所以加深了对《春秋》学的理解和研究。于是，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公羊研究”、“左传研究”等特殊讲义课程，开始了他对清朝灭亡原因的思想研究。后来，这些讲义结集为《春秋研究》一书出版。

池田秀三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对此书有如此评述：

> 本书作为春秋学的概说是第一等的著作，对于《春秋》以及三传的成立、由来与沿革，《春秋》的义例与思想、五行谶纬说的影响，《公羊传》与其他纬书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解说无余。而且其内容亦极为妥当，作为春秋学的概说，至今亦不失为首屈一指的著作。①

而从古典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从他开山之后，至今还是支那哲学史京都学派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到了他的弟子小岛祐马和武内义雄、本田成之等博士那里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确定。②

正是在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期间，甲骨文献和历史研究的结合、敦煌文物和文学研究结合，确立了古典文献和考古实物相结合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促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迅速崛起。池田秀三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认为狩野直喜并不看重对出土文献的研究和使用。对此，笔者并不十分认可池田先生的此说，虽然池田先生是我在博士后时代的导师。③ 正如笔者并不认可“宫崎划分说”一样，虽然他是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的弟子。

---

① 见《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石立善译，第11页。

② 在20世纪30年代，本田成之博士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大名鼎鼎。他的儿子就是著名易学家本田济博士，本田济博士是我在博士生时代导师三浦国雄博士的导师。1996年，本田济博士以近80岁之高龄，亲自出席我在关西大学举行的《彭と楚文化の关系に就て：马王堆帛书周易を中心として》学术报告会。而实在来不了的老一代著名汉学家、中国哲学史家金谷治博士亲自给我写来了贺信。老一代日本著名汉学家给予我本人的这些厚爱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③ 池田先生观点见《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石立善译，第10页。

第二章
桑原骘藏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桑原骘藏博士，这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大师，说是个日本汉学界的异类——我想这是中日两国学术界的一个共识吧！

在中华书局出版的由钱婉约和王广平合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说苑》一书中，附有钱氏撰写的《〈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一文，可惜，该文对于桑原骘藏的生平及其家世几乎没有任何介绍。这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桑原骘藏了解的贫乏。更何况桑原骘藏本人一直否认他是中国学家（支那学者），何谈"桑原中国学"？北京大学教授、我国研究日本汉学的第一流的学者严绍璗先生在《日本中国学史》和《日本中国学史稿》二书中对桑原史学几乎没有介绍、分析和研究，这实在让我感到有点儿遗憾。更为荒唐的是：一些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居然出现退休后的桑原骘藏"被授予东京帝国大学名誉教授称号"这样的记载。①

关于他具体的出生日期，也曾有人对钱氏撰写的《〈东洋史说苑〉及桑原中国学》一文提出质疑。的确，1870 年还是 1871 年？是 1 月 27 日还是 12 月 7 日？有些学者甚至订正钱氏的"桑原骘藏（1871 ~ 1931）"说："查桑原骘藏生于明治 3 年 12 月 7 日，明治 3 年为 1870 年，故此处生卒年应改为（1870 ~ 1931）"。按：桑原骘藏博士出生准确日期是明治四年（1871）西历 1 月 27 日。而户籍上所登记的"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②于是出现了中日双方的学者（如日本汉学史家近藤春雄博士和中国日本汉学史

① 见王晶《试论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科教文汇》，2009 年 4 月中旬刊。

② 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二卷中也持"1870 年 12 月 7 日"说，显然也有失考证。李庆《日本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

家李庆教授等)都有人主张桑原骘藏的生日是“1870 年 12 月 7 日”说的现象。究其具体原因,请看他的著名弟子宫崎市定[①]的话:“户籍上写的却是上一年的十二月七日,是为了上学的方便而改写的。”但是,为何选定在十二月七日而不是八日或六日、或者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的任何一日呢?宫崎市定就没有再回答了。[②] 因此,钱氏的“桑原骘藏(1871 ~ 1931)”说并没有错。相反,“故此处生卒年应改为(1870 ~ 1931)”说显然是不对的。[③]

桑原骘藏出生地是福井县敦贺郡敦贺町,他的父亲是当地一家名叫“鸟の子屋”专门生产日本纸的小作坊主,名叫桑原久兵卫,桑原骘藏是他的次子。

从名字上看,兄长叫桑原喇一郎、弟弟叫桑原勋三郎,那么按照桑原家族的这一命名习惯,桑原骘藏最初的名字应该是叫桑原“某”次郎的吧,而不可能是“桑原骘藏”。从日从制的“制”字和“勋”字的意思全和商业有关,那么,很可能桑原骘藏的本名是“桑原质次郎”或“桑原贽次郎”,而“骘藏”可能只是他的字号。这里的“质”或“贽”也是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字。[④]

根据宫崎市定的回忆[⑤],在他上高中时代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当全班同学拿到桑原骘藏所写的高中社会科教材《中等东洋史》教科书时,作者的名字中的“骘”字却没有人认识。桑原久兵卫不可能给长子命名“一郎”、给三子命名“三郎”却不给次子命名“次郎”。那样不符合日本的命名习惯。在桑原骘藏兄弟三人中,兄长桑原喇一郎继承了父亲的造纸技术,他的弟弟桑原勋三郎学会了修表。桑原骘藏的小学和中学是在京都府立小学和中学渡过的。然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当时最有名的京都第三高中。据说,当时的桑原骘藏曾在日记中写下了“世界の历史家桑原骘藏”这几个字,或许反映了他立志研究历史学的想法就是在这时形成的。从高中毕业后又考

---

① 宫崎市定《中国に学ぶ》,中央公论社,1986 年。

② 我猜想,之所以选定这一日期,“明治三年(1870)十二月七日”是当时日本通行的旧历,换算成西历的话是 1871 年 1 月 27 日。桑原父母显然是把日本农历当成西历来申报出生日期了。明治时代,日本逐渐西化,在申报户籍时,经常出现把日本旧历的日期直接当成西历申报的现象。这一问题至今在我国部分落后和边缘地区也大量存在着。

③ 就是日本学者的观点,因为没有注意到宫崎市定博士的解释,也没有注意到日本旧历和西历的换算问题,也时常有出错的。如,著名的日本汉学史家近藤春雄博士在《日本汉文学大事典》中就是主张“桑原骘藏(1870 ~ 1931)”说的。显然也是错的。当然,无论是钱氏还是质疑钱氏的人,包括日本学者宫崎和近藤两博士,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里面存在着新旧历法换算这一小问题。

④ 这个小问题又是由我首先发起。此书出版后,希望能得到日本汉学界特别是桑原家族直系后人的回答和订正。

⑤ 宫崎市定《中国に学ぶ》,中央公论社,1986 年。

上了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从此正式开始了以研究东洋史为自己的专业的生涯。

1896年,桑原骘藏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直接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日文汉字"大学院"的意思即中文的"研究生院"),在东洋史学祖师爷那珂通世博士(当时是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兼职讲师身份,不是正式的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指导下,进行专业化的东洋史研究。那个时候,一般的研究生多是选择如日中天的白鸟库吉博士或市村瓒次郎博士作为指导教授。对英语和法语十分熟悉的桑原骘藏,却看中了那珂通世研究东洋史时的世界史的范围和视野,而这点也影响了他一生对东洋史学的理解。他的外语专长和他对东洋史的理解,使他挑选了中西交通史这在当时还是十分冷僻的一个科研课题作为研究范围。

1898年,桑原骘藏从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毕业后,成了东京第三高中教授。

1899年,桑原骘藏转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桑原骘藏的确很少和中国学术界有直接的来往,他一生中也只在1907年到1909年来华留学两年。就是他唯一的好友文廷式,也还是在1900年文廷式访日时、经过内藤湖南的介绍才得以结识的。文廷式当场书写了《洛神赋》行书相赠。

1907至1909年,桑原骘藏作为文部省留学生,第一次踏上了来华留学的旅途。在此期间,他先后多次到陕西、山东及河南、内蒙古、江南等地旅游和考察。根据《考史游记》[①]一书的记载,1908年8月,当他来到张家口考察时,他注意到"张家口地当库伦、乌里雅苏台、归化城、丰镇等地来往的要冲,并作为对蒙古及俄国的贸易地,处于交通枢纽之地位。商业大体掌握在山西人之手。除俄国人以外,外国人的商业不甚兴旺"的地理和社会特点。而该书对景教碑和圆书碑的详细考证和记载,显示了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他那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术功力!同年,那珂通世因病逝世时,正在中国留学的他知道此事后,立刻写下了充满深情的《那珂先生を忆う》一文,发表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师生之情,一览无余。他甚至痛斥当时为保守和学阀制度把持下的日本学士院和东京帝国大学不接受那珂通世[②]成为那里的一员,这是"日本学士院和东京帝国大学的耻辱,而不是那珂

① 桑原骘藏《考史游记》,张明杰译,中华书局,2007年。

② 那珂通世从1896年到1904年一直是东京帝国大学汉学和支那语学第三讲座的兼职讲师,没有取得正式的教授身份。

通世博士本人的耻辱”。[1]

1909年4月开始，桑原骘藏结束了两年的在华留学生涯，出任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他比内藤湖南早半年成为东洋史讲座教授。）他负责中西交通史和风俗史的研究和教学，并把他的从世界史的研究视角看待东洋史的观点带到了京都帝国大学。从此以后，桑原史学以显然不同于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博士的清代考证学和京都支那学的研究路数和风格，以他的中西交通史和中国风俗史的研究在京都帝国大学稳稳地站住了脚跟。

1910年，桑原骘藏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1923年，陈垣先生发表在《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前四卷，寄给桑原骘藏。桑原骘藏读后，特别撰写了书评《读陈垣氏之〈元西域人华化考〉》一文，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

> 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忞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

但是，在他肯定了陈垣先生论文的积极意义之时，也指出了他本人不能赞成的论点，如陈垣先生的安世通来自安息说等观点，他表示文章“仅供作者参考”，并声称陈垣如能在公开发表论文时采纳这些意见，他将非常高兴。[2] 主动给一名中国著名学者回信，这在他的一生中也是很少见的。在京都帝国大学期间，他和罗振玉、王国维和董康等人的交往，也仅限于见面打招呼而已，几乎不和他们进行任何学术交流。更多的时候，桑原骘藏在课堂上下公开蔑视中国人和中国学者的言行，也毫不客气地嘲讽他的大学同僚内藤湖南。而更主要的，桑原骘藏的此文并不是想肯定陈垣先

---

① 《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3～4月连载。

②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周刊》第3卷第2期上发表了此文的译文。

生的观点，而是想提醒陈垣先生有些观点是靠不住的，希望他能修改。而陈垣先生在读了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①一书翻译本之后，在他自己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还特别提到了“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一语。

1930年，桑原骘藏从京都帝国大学正式退休。

1931年5月24日，桑原骘藏因肺病卒于京都市上京区塔之段町自己的家中。

桑原骘藏生前和死后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两卷本《中等东洋史》（《东洋史要》）、《宋末の提举市舶船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东洋史说苑》、《东西交通史论丛》、《东洋文明史论丛》、《支那法制史论丛》、《考史游记》、《中国の孝道》等书。有六卷本的《桑原骘藏全集》出版。②

二、学术述评

桑原骘藏的主要研究范围集中在中西交通史和中国风俗史两个方面。但是，他在中国学术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却是他的《东洋史要》和《蒲寿庚考》二书。

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书在日出版后，由上海东文学社在1899年正式出版中文本。樊炳清译，王国维先生亲自为之作序。该书分上下二卷，从总论开始，把全部中国古代史分为四期，即：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近世期。因为他的中国史时代划分比内藤史学要早上至少十年以上，因此，他的所谓“中古期”（“汉族盛势时代”）、“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时代”）和晚出的内藤史学的“中古”、“近世”的概念是明显不同的。而他所谓的“近世期”则是专指“欧人东渐时代，迄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明清时代，一直写到了晚清时期中日之间的竞争和摩擦。

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一书紧紧把握住了从世界史的视野研究中国史的特点，在阐述中国古代发展史之时，还特别突出了古代中国在各个历史阶段和周边民族及国家之间（如印度、蒙古、突厥、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国家和地区）的互动关系。王国维先生在序中对该书的“简而赅，博而要”的特点大加赞赏，甚至发出了“以吾国之史，吾人不能作而他人作之，是可耻也，不耻不能作，而耻读他人所作之书，其为可耻，孰过是也？”的自惭之词。

---

① 《蒲寿庚考》，中华书局，1929年。

② 国内有的学者却在文章中说“《桑原骘藏全集》全五卷”，此说有误。

《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是作者历年研究蒲寿庚的集大成之作。20世纪30年代初期，此书在中国学术界也有多个译文同时存在，相继出版。比较著名的是中华书局1929年译本，陈裕菁先生译。书名为《蒲寿庚考》。其次为商务印书馆1929年译本，冯牧先生译，书名先为《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后又曾名为《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一般将此书简称为《蒲寿庚考》。①

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一书分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共五章。如下：第一章《蕃汉通商大势》、第二章《蕃客侨居中国之状况》、第三章《蒲寿庚之先世》、第四章《蒲寿庚之仕宋与降元》、第五章《蒲寿庚之仕元及其亲族》。本书通过对蒲寿庚个人事迹的考证，深入研究了唐宋元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海上通商往来的史事。从提举市舶官职的建立到阿拉伯国家往来中国的路线及日程、从唐宋元时代海外贸易港口到外国人在华居留地以及居留广州的历代蒲姓等方面的研究，等等。

1926年，此书曾被授予日本帝国学士院奖。此书对于中外学者关于中国古代海上贸易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陈裕菁在译文序中评价说：

> 桑原骘藏《蒲寿庚之事迹》，征引详富，道人之所未道，于中西交通往事，发明不少。非徒事袭绩旧说者可比。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②

在该著作一开始，桑原骘藏就先对“提举市舶”一词进行解释和考证：

> 市舶即互市舶。当时由华往外国或由外国来华之贾舶也，此等贾舶，政府设置管理之，谓之提举市舶司。主其事者即提举市舶。③

然后，他对“提举市舶”一词进行的注解是：

> 提举市舶之名称：提举市舶简称市舶使。又简则曰舶使。（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宋代制置使简称制置，招抚使称招抚，经略安抚使称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称市舶司或舶司。提举市舶官称市舶官

---

① 李宝民等人在《桑原骘藏的〈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史〉及其在中外关系研究中的地位》一文中，只讲此书的商务译本，而根本不提中华译本，甚至还认为“台湾商务印书馆又将之再版发行，此即为今所常见的中文译本”，此说“此即为今所常见的中文译本”，显然和事实有差距。莫非他根本就不知道中华译本的存在？而且中华译本的译者补注更增加了此书的学术价值。见《汉学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2002年。

②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1929年。

③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1929年。

或舶官。据此以推,则所谓提举市舶、市舶使、舶使者,恐皆提举市舶使之简称。①

到此为止,似乎可以终止了,然而,桑原骘藏在注解中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考证,他把它分成专任之市舶使、唐代之市舶使、市舶使名称之初见、波斯僧及烈四节内容,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史料考证,把整个市舶使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梳理。这样一来,有关正文中的"提举市舶"四字,他就进行了将近两千字的史料考证。再比如,他在文中对"行在"地名的介绍时说:"泉州开港后,约40年许而宋室南渡。于是,杭州为南宋一代之行在。中世外人谓杭州曰 Khinzai 或 Khanzai,盖行在之讹也。"②然后,他在注解中又用了将近两千字的篇幅,详细考证了行在的由来、读音的演变以及中外学者对于这一地理位置的考证,而本文却只是上述几十字的结论而已!

总之,该书全体构成上都是这种格局,从正文到注解,紧密结合,相互印证,论证精密而结论真实可信。这也难怪此书一出,精湛的考证功夫立刻震惊了国际汉学界,对日本京都学派的东洋史研究和考证方法的确立实在具有重大的启迪和贡献。和内藤、狩野的述而不作以学生听课笔记整理成个人专著的著述方式不同,桑原本人亲自动手撰写的此书最大的方法论价值就是建立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正规的学术研究规范。当时,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的著作多是利用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的,自然在史料考证和逻辑衔接上远不如自己亲自动手撰写学术著作的桑原骘藏。可以说,没有桑原骘藏的此书,京都学派的考证学方法和学术典范简直就无从谈起!《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一书,光注解就占了几乎一半的篇幅,而每一条注解又是一篇相关术语和史料出处的考证论文。这一严谨的论证和著述方法,成了日本京都学派东洋史学著作的典范。③

如果说这两本书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他的代表性著作的话,那么他的《东洋史说苑》一书就使他成为当时风行一时的中日人种和文化比较优劣论的急先锋。有人曾主张把《东洋史说苑》与阿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辜鸿铭《春秋大义》三书称之为"世界洞悉中国人性格的三个范本"。此说虽甚不当,但也不会相去甚远。

那么,下面我们就介绍一下这部桑原史学体系中的名著《东洋史说苑》一书。

---

①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1929年。

② 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1929年。

③ 至今,此书依然是刚走进东洋史研究的学者学生们学习和模仿的经典。

该书最早在1926年夏由弘文堂书房出版。后来收在《桑原骘藏全集》第一卷。该书分为七大类,即时事类、文化类、宗教类、风俗习惯类、气质类、人物类、杂纂类。共收入作者24篇汉学研究论文。有的作者在介绍此书时说该书"收集了作者较为通俗可读的短篇论文23篇",可能统计上有误。这24篇论文如下:第一,时事类五篇:1.《支那の革命》,2.《黄祸论》,3.《支那の国教问题》,4.《对支政策管见》,5.《对支文化事业についての希望》。第二,文化类三篇:6.《晋室の南渡と南方の开发》,7.《东洋人の发明》,8.《历史より观たる南方の开发》。第三,宗教类六篇:9.《高岳亲王の御渡天に就いて》,10.《旧稿"高岳亲王の御渡天に就いて"の后に》,11.《老子化胡经》,12.《ネストル教の僧及烈に关する逸事》,13.《大师の入唐》,1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に就いて》。第四,风俗习惯类三篇:15.《支那人辫发の历史》,16.《支那人の食人肉风习》,17.《支那の宦官》。第五,气质类两篇。18.《支那人の文弱と保守》,19.《支那人の妥协性と猜疑心》。第六,人物类两篇:20.《秦始皇帝》,21.《支那史上の伟人(孔子と孔明)》。第七,杂纂类三篇:22.《东洋史上より观たる明治时代》,23.《支那学研究者の任务》,24.《支那の人口问题》。

使桑原骘藏的头上被日本汉学界戴上了"シノ嫌いのシノ学者"、"不屈の东洋史家"等称号的直接起因,就是因为这部专著的出版而得来的。在此书中,和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有关的论文只是《ネストル教の僧及烈に关する逸事》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に就いて》这两篇而已,其余全是对中国风俗史的研究。而他对中国风俗史的研究却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性的分析和研究这一核心目的之上的,并且他在学术研究和学术论文中公开地蔑视中国人种和中国文化。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关于中日民族和文化的优劣问题的比较研究和讨论曾经风行一时。特别是随着甲午海战对大清水师的战胜,对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劣等、劣根的指责,成了明治维新时代福泽谕吉等思想家们脱亚入欧论的时代证明。成了"亚洲的白种人"的日本民族,在学术上也开始以白种人的世界史观来看待中国历史了。走在前列的就是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大家、职业历史学家的桑原骘藏教授。

请大家注意这些研究题目:《支那人辫发の历史》、《支那人の食人肉风习》、《支那人の文弱と保守》、《支那人の妥协性と猜疑心》、《支那の宦官》。上述五篇研究论文也是最引起争议的文章。从题目上看,这本来是属于新闻记者或作家才值得动笔的内容,但是却很荣幸地成了一个有着世界史视野的东洋史学家的研究基石。我们把这五篇文章改一下题目,让日本学者换位思考一下:《日本人乱伦の历史》、《日本人の男女混浴风习》、

《日本の官僚》、《日本人の野蛮と保守》、《日本人の好色心と猜疑心》。相信这些研究论文肯定会引起日本学术界的不快。他们很可能把这些文章看成是中国愤青们的反日宣传作品。可是,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一位著名教授的研究论文时,我足可以想像出他们的吃惊和愤怒了……然而,我很遗憾地看到了我们国内有些年轻学者对桑原史学中的这些糟粕的热情吹捧和大力肯定,似乎桑原骘藏成了"日本史学界的鲁迅",乃至于桑原史学中对中国文化和人种的蔑视也成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深刻挖掘"。在有些人看来:"桑原是通过批判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和褒扬孔子等人的伟大思想与人格这两种方式,来建立自己的价值观。耐人寻味的是,桑原对中国人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多有相通之处。"①我实在看不出他们所分析出的上述东西是否真的就是桑原史学的真谛,我进而怀疑他们是否真的了解桑原史学和桑原本人。

在《支那史上の伟人(孔子と孔明)》②一文中,桑原骘藏主张:

> 支那历史上的伟人,我主张第一是孔子,第二是秦始皇,第三是张骞……第四就是诸葛亮。

而他肯定这四个人的重要理由是他们的表里如一的作风。这些话出自一名记者或者作家的笔下,我们可以理解那份情绪,可是出自一名历史学家的笔下,就有些不伦不类了。

在《支那人の食人肉风习》③一文中,桑原骘藏分析了产生这一习惯的五种可能性原因:

> (一)饥荒的年代里吃人肉的情况。(二)城被围困弹尽粮绝时吃人肉的情况。(三)作为一种嗜好品吃人肉的情况。(四)出于对仇敌的憎恨吃其肉的情况。(五)出自医疗目的吃人肉的情况。

然而,上述五种情况并非为我中华古代社会所独有,作为具有世界史视野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桑原骘藏应该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吧?!

在《支那人の妥协性と猜疑心》④一文中,桑原骘藏指出:

> 妥协性和猜疑心这其实是支那人的二大痼疾。这二大痼疾不剔除

① 如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的董炳月和中国北京大学的钱婉约两博士就持有类似之说。

② 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弘文堂书房,1926年。

③ 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弘文堂书房,1926年。

④ 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弘文堂书房,1926年。

的话，我想，支那的改造也就无从谈起。妥协并不是绝对要排斥的东西。互让的精神在任何场合都是必要的。但是一定不能忘记妥协也好互让也好，是不能忘记主义和节操的。像支那人那样放弃了主义和节操的妥协那就是苟合。一时的苟合却播下了百年不安定的种子。……'治日少而乱日多'已经是常用语。考察支那的历史，总感觉太平的日子太少了。上下四千年的历史，就如同梅雨期的天气，阴天多而晴天少。就是为他们所夸耀的所谓黄金时代，太平的日子也不过五六十年。其他时代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是妥协和猜疑的必然结果。征伐也罢，镇压也罢，全是由于一时糊涂的妥协所造成的，因此不安定的原因到什么时候也是无法根绝的。因为无法根绝的这些不安的因素，进而也加大了君臣同僚之间彼此的相互猜疑之心。

在《支那人の文弱と保守》[①]一文中，桑原骘藏又主张：

支那人当然也有其自身的民族性。支那人尤其显著的民族性就是文弱和保守。支那人的文弱和保守这些特点早已经被世间广泛地了解了，决不是什么新鲜事。……支那人在文弱的同时又表现出其保守的一面。有关支那人的保守，有种种原因可以解释：(一)支那人先天的性质就是保守的。(二)从上古开始支那人的文明就是处于超越在四周异族之上的，因此支那人自古以来就以文明之国而自负，甚至相信他们自己才是世间唯一的和绝对的文明之国。这一习惯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三)支那人中间有着恒久和伟大的传统势力的儒教，就是保守尚古的典型。孔子就主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要法先王而赞美三代。尤其是孔子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之说，好古的同时也就表现出对现代的忽视。到了儒家的末学，更多的是表现出保守思想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了。……不仅是儒教，支那产生的各种学说，一言以蔽之，多是倾向于保守思想的。

如此等等，桑原骘藏的中国史观已经表达得十分突出和急进了。虽然他死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前，但是他的学术著作和中国史观却为日本国民进行了一次侮辱中华人种和文化的战前文化总动员。当然，我们也承认，他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问题。早在他来华留学时写下的日记中，他就注意到了：

① 桑原骘藏《东洋史说苑》，弘文堂书房，1926年。

中国人尤好附会，敢于牵强。因此，若乡里名为董家，则必设董仲舒墓。若阵营称细柳，则必建周亚夫祠，比比皆然。其实，像直隶景洲的董家里，像细柳营等，与二人毫不相干。所以探访中国古迹时，需加以细心留意。①

可见，他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对中国民俗和民情的关注。

作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学者，在他死后先后被整理出版了《东洋文明史论丛》和《东西交通史论丛》两部书，由弘文堂书房分别在1934年和1944年出版。其中《东洋文明史论丛》一书收入研究论文13篇。如下：《历史より观たる南北の支那》、《纸の历史》、《经子に见えたる宋人》、《唐宋时代の铜钱》、《长安の青龙寺の遗址に就て》、《司马迁の生年に关する一新说》、《隋唐时代に支那に来往した西域人に就て》、《明の天寿より罗马法王に送呈せし文书》、《创建清真寺碑》、《支那人を指すタウガス又はタムガシといふ称呼に就て》、《支那の记录に见えたるイスラム教徒の猪肉食用禁制》、《新发见のカトリック教の宗论关系の二史料》。

《支那法制史论丛》和《考史游记》二书，也是在他死后才正式出版。其中《考史游记》出版于1942年，书名为狩野直喜所题，矢野仁一、宇野哲人作序。弟子森鹿三负责整理。该书根据桑原骘藏当年留下的来华旅行日记、照片及当年交给文部省的《留学报告书》等材料基础上，详加解读，使之图文相配。全书分长安、山东河南、东蒙古、观耕台、南京等五部分游记。附照片插图271幅。

桑原骘藏一直主张要科学地研究历史。他首先将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博士视为学术珍宝的包括乾嘉考证学派在内的中国历史和学者们的观点及其考证方法一概视为是不可信，他的名言就是“中国人の学者は头が恶い”、“自分のやっいることは东洋史であって，シノ学とは违うものだ”等等。尽管如此，他还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三大创始人之一，虽然他研究的专业主要是中西交通史、中西民俗比较史——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东洋史，但是笔者不认为桑原史学属于东京帝国大学系统的所谓“东京学派”！持“东京学派”说的有韩升、何培齐等人。他们沿袭宫崎市定的划分，也用“东洋史”和“支那史”的区别来划分桑原史学和内藤史学的区别。他们大概忘记了“东洋史”是以“支那史”为核心的这一范畴规定，也完全无视桑原本人对东京学派的批判。② 可以说，他和东京学派的领袖白鸟库吉之间没有任何

① 桑原骘藏《考史游记》，张明杰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124页。

② 韩升论文请见《学术研究》2007年第9期。何培齐论文请见《史学集刊》2008年第7期。

学脉的、师承的、学术风格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研究方法也完全不同。他甚至对白鸟库吉为代表的东京学派更多的也是揶揄和嘲讽，一如他对内藤湖南和罗振玉、王国维！

在20世纪初期，在日本学术界曾经短暂出现过一个提到桑原骘藏就等于提到了东洋史、提到了东洋史就等于提到了桑原骘藏的人、学合一的局面。他的学术观点对大正、昭和年间的日本思想和社会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在学术界！现、当代日本的右翼学者和政治家们经常可以从桑原史学中发现他们感兴趣的东西。而他的儿子桑原武夫又把这些对中日关系"有指导价值的思想"发扬光大成所谓的"新京都学派"。

但是，这个著名的东洋史教授留给学术界的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的就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风。当他旅行到董仲舒墓所在地时，他针对董所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提出了异议：

> 从另一方面来考虑，禁止异学，束缚思想，结果阻碍了人的智力开发，这一点他又不能不受到几分谴责。后世学者只知其功，不识其过，过分颂扬者尤多。①

他甚至在《张骞の远征》②一文中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料精细地推算出张骞的每日行程。他一贯主张："所谓历史的研究就是逐渐逼近事件真相的过程"、"建立在假定基础上的假定结论是最靠不住的"……他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这样做的。《历史より观たる支那の南北》一文和《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一书，都是在多次发表后又多次修正的基础上最后定型的，他在论文的注解中几乎穷尽了当时国内外所能找到的所有相关资料。而每一条注解几乎就是一篇考证短文。这是典型的法国汉学的传统做法。

丰富地占有史料和严密地考证，这为他赢得了"精致坚实の考证学东洋史大家"的美誉。这当然使他有资格看不起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两博士视之为珍宝的清朝考证学。他甚至在东京帝国大学为他举办的东洋史学术讲座上，当场抨击正坐在台下的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白鸟库吉治学缺乏严谨，猜想过多等等③，而白鸟库吉除了面红耳赤之外也只好隐忍不发。他对待自己的母校、日本的头号学阀和东洋史学东京学派的领袖尚且如此，对

---

① 桑原骘藏《考史游记》，张明杰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45页。

② 《桑原骘藏全集》，岩波书店，1968年。

③ 见《石田干之助著作集》，六兴出版社，1986年。

待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人就更不用说是怎样的刻薄了。

但是,他几乎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一下:所谓注解派的法国汉学和实证派的德国汉学,和中国乾嘉考证学派有多大的差别?!我甚至怀疑桑原骘藏是否能够区分赵翼、钱大昕和王鸣盛各自的考证学方法和特点。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如此非议乾嘉考证学派呢?!在他著名的《东洋史要》一书中,对于清代,他只是匆忙地写了《清官制及兵制》一章,而对于清朝和周边民族关系却写了整整十五章!他如此看重边疆史研究,以至于他当年来华留学旅行到华山、看到师雄的题字刻石居然感叹道:"我一直敬仰其为人,今面对其遗刻,追忆其英风,环顾良久,迟迟不愿离去。"[①]而师雄的生平,除了专业研究隋唐史的人,一般人还真很少知道其事迹,可见桑原其人的怪异!当然,清代的思想和学术他也根本无暇涉及。尽管他的弟子宫崎市定在《桑原史学の立场》[②]一文中表达了他个人的见解,他认为:桑原史学和清代乾嘉考证学派的史学思想和方法是相通的。但是,桑原骘藏却不认可这一点,他反而主张清代乾嘉考证学派的考证力度过于软弱和暧昧,认为和他心目中的科学的历史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

在桑原骘藏的设想中,历史学是一门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学术,历史学的研究结果应该是无论谁来研究都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他特别强调历史学研究过程中的"无思想性"的特点,也即没有倾向性的研究。

但是,《支那人辫发の历史》、《支那人の食人肉风习》、《支那人の文弱と保守》、《支那人の妥协性と猜疑心》、《支那の宦官》等篇论文中又有多少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中华民族独有的呢?!至少,文弱和保守、妥协性和猜疑心是人类共同的性格特点。食人肉风习、宦官和辫发也并非中华民族的标志性符号,在古罗马、在南美、在非洲、在印度甚至在日本都曾经或多或少出现过。在这里,我们惊讶地发现追求科学的历史研究的桑原骘藏丧失了他所一贯主张的历史学研究活动中的"无思想性"(也即无倾向性)的特点。好在,我们知道他有个反复地修改论文的"逐渐逼近事件真相的过程"的习惯,就让他来世再继续去进行真正"无思想性"的研究、去"逐渐逼近事件真相"吧。

---

① 桑原骘藏《考史游记》,张明杰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89页。

② 宫崎市定《中国に学ぶ》,中央公论社,1986年。

三、学术影响

早在20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就已经注意到了他。

根据《胡适留学日记》[①]1917年7月的记载：胡适在留学归国途中，路过日本东京，看到了当时发表的一些论著。他在日记中写道："又有日本人桑原骘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陈裕菁先生在《蒲寿庚考》译文序中对桑原骘藏作了如下评价："桑原骘藏《蒲寿庚之事迹》，征引详富，道人之所未道，于中西交通往事，发明不少。非徒事襞绩旧说者可比。为史界所推重者久矣。"

自从《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一书出版后，精湛的学术考证和丰富的史料使该书立刻成了国际汉学界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学术经典。

陈垣先生是最先在桑原骘藏的基础上往前推进的历史学家。1923年，陈垣先生发表了《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寄给桑原骘藏。我们从陈垣先生在该书中对桑原骘藏的"近日本桑原骘藏氏考寿庚事尤详尽"评价，也可以看出他在陈垣先生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了。

1933年，向达先生在桑原骘藏的基础上撰写了长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文，发表在《燕京学报》上。

最近，东京大学东洋史专业副教授吉泽诚一郎博士还在京都大学主持召开的第13届现代史研究会上公开发表了《桑原骘藏の东洋史学と现状分析——战前期日本の政治と学术》一文，在该文中，吉泽诚一郎很认真地研究桑原骘藏的东洋史学思想和战前日本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

就其自身而言，桑原骘藏生前一直否认自己是一名汉学家，他一贯主张他研究的是东洋史，而不是支那学或者汉学、中国学。砺波护在《桑原骘藏》[②]一文中引小岛祐马特别对比创始期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三巨头的学术异同点后，得出结论说："双方都是实证的学风。"那么，在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上，区别桑原考证学和内藤、狩野考证学的异同，也许就成了今后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对于桑原考证学和内藤、狩野考证学的异同，我有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说明这个问题：

---

① 《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② 见砺波护主编《京都大学东洋学一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我把东洋史研究比作一个造纸作坊，内藤、狩野二人看重的是制作工艺流程在造纸技术上的重要性，只要这一点把握精准了，造出的纸张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所造纸张的化学成分。而桑原则看重的却是所造纸张的化学成分，只要这一点符合规定数据了，造出的纸张大致就是合格的，而不去管那些制作工艺流程。我的这一比喻合适不合适，也只有那个造纸作坊老板桑原久兵卫才能作出评判了。

比如他和小川琢治之间有关《山海经》史料价值的论争，他把《山海经》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对那里记载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极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而小川琢治则把《山海经》看成是历史地理学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里面的古代神话记载得到了印证，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作为历史地理学文献的可行性。

当然，在肯定他的严谨的学风之时，更需要看到他的论著对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有着学术规范的意义。《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和《历史より观たる南北の支那》几乎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留下的最典型的考证性论著，从学术观点到考证方法，至今已经成了历年学生学习的范本。

最近十几年来，中断了几十年的出版活动的桑原骘藏的学术著作，又重新被翻译和出版，而且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热烈回应。荣新江和陈国灿、冻国栋等先生皆有专文研究桑原骘藏的中西交通史研究，林梅村先生在《从考古发现阿拉伯文化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初传》一文中也没有忘记桑原骘藏的学术成就。冻国栋教授在《二十世纪唐代商业史研究述评》[①]一文中评价说：

> 其中桑原氏的研究影响甚大，所撰《唐宋贸易港研究》长期以来被视为名作。该书是作者有关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机构的论文结集，共由四篇论文组成。其中《市舶司与市舶》是对藤田丰八《宋代的市舶司和市舶条例》(《东洋学报》7－2，1917)的商榷文章；《波斯湾之东洋贸易港》，对《新唐书》所记夏腊城、提罗卢和国、中国南部无钉船等提出新解；《广府问题及其陷落年代》，参据回教徒之记载，纠正《新唐书·僖宗本纪》载广州于乾符六年陷于黄巢的记载，认为广府陷落应在乾符五年；《伊本所记中国贸易港》，认为唐代与大食之海上通商曾盛极一时，记录当时回教徒航行于中国贸易港之事迹，最

① 冻国栋《二十世纪唐代商业史研究述评》，《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早而确实者当推9世纪中叶阿拉伯地理学者伊本所撰之《道程及郡国志》，所记当时中国四贸易港应为交州（龙编）、广州、扬州、泉州。其中对扬州的考订尤详。桑原氏在该书中的某些论断当然不甚妥帖，如对市舶和市舶使的见解，可修正或补充之处甚多等等，但多数考订至今仍不失其参考价值。

但是，也许是桑原骘藏的反华厌华倾向所致，桑原史学至今还不是国内历史学界和日本汉学史研究的热点研究课题。

第三章
内藤湖南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内藤湖南生于1866年8月27日,秋田县人。属虎行二,故本名为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别号忆人居主、湖南鸥侣、雕虫生闷闷先生等。是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又称京都支那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为什么号湖南呢?原因是他的出生地毛马内町的北面有个小湖泊,名叫景胜十和田湖。而湖的南面就是他的出生地,所以字号湖南的意思就是景胜十和田湖南面出生之人。①

内藤湖南的祖先本不在毛马内町柏崎馆居住。从他的六世祖内藤贞亲开始,从万谷村移居到毛马内町的萱町。到了他的儿子内藤贞安(五世祖)开始,又移居到了毛马内町的下小路。内藤贞安的儿子内藤贞行(四世祖)又把家移居到了毛马内町的砂场。内藤贞行长年膝下无子,就把汤濑家的9岁的幼子过继到自己门下,起名为内藤贞修,号天爵。后来,他自己又有了儿子,于是就把自己的女儿内藤辰子许配给内藤天爵。② 这一复杂的经历成了日后内藤家族财产纷争的直接起因。内藤天爵就是内藤湖南的祖父,内藤湖南的外祖父是泉泽修斋。内藤天爵和泉泽修斋二人共同师承日本近代著名的儒学学派、"折衷学派"中兴之祖山本北山的弟子朝川善庵,是当时朝川门下著名的两大弟子。内藤十湾就是内藤湖南的父亲。最初名叫内藤贞善,又名内藤几太郎、内藤调一。字子祥,号十湾,又号千里。后来,因为其父内藤天爵突发急病而亡,内藤天爵的遗产被内藤十湾的舅舅、叔叔内藤铁

① 以地理位置为姓或名的命名习惯是日本人当时的命名习惯,如松下,松树下面;如田中,田地中央;如村上,村子北面。

② 这是由"养子"改成"婿养子"的特例。

太郎全部继承，而只留给内藤十湾和其生母很少一点，勉强维持生活。为此，内藤十湾自此开始发愤读书和自强。他先后向泉泽修斋、那珂梧楼学习儒学，向浅沼乡左门卫学习剑术。几年下来，内藤十湾不但继承了“折衷儒学”，[①]还精通武术和医学。后来，内藤十湾和自己的老师泉泽修斋的女儿泉泽容子结婚后，生下了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5岁时就开始读《四书》，9岁时已经能写浅显的汉诗，13岁时开始通读《日本外史》。初中毕业后，他考上秋田师范学校四年制高中部师范科学习。在此四年间，他系统学习了中国儒家经典和日本古代文史名著，这期间看得最多的是《全唐诗》和《唐诗别裁集》等书。从这里毕业后，20岁的他成了缀子小学的训导。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了佛教。两年后的1887年，对佛教有了相当信仰的他，辞去小学的工作，来到东京，在一家佛教宣传杂志社《明教新志》开始当记者。虽然这时的他可能和他当时对佛教的信仰有关，但是却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的第一步。以后，又先后在《东京电报》、《日本人》、《万朝报》、《大同新报》、《三河新闻》等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的报社和杂志社当记者和编辑。因为经常发表有关日俄战争的政论性评论而使他名声大振。于是，他的视野逐渐转到了对日本历史和现实的关心，以及与日本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大清和俄罗斯两大帝国的政治和文化的研究上。在东京的六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很多有影响的政论文章，也结识了政界和商界很多名人。在当时他信赖的人生导师高桥健三先生的倡议和推荐下，1893年，内藤湖南来到大阪，成为大阪《朝日新闻》的政论记者。开始了他从关东（东京）走向关西（京都）的重要的一步。

1895年中日之间爆发的甲午战争，为内藤湖南从学术上和政治上集中精力关注晚清时代的中国提供了契机。

1897年，内藤湖南最早的三部著作《近世文学史论》、《诸葛武侯》、《泪珠唾珠》正式出版。其中，除了《近世文学史论》是研究日本江户时代思想和文化方面的著作、《泪珠唾珠》是在报纸、杂志上所发表文章的自选集之外，《诸葛武侯》则是内藤湖南发表的第一部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专著。三部专著的出版，使他成为当时著名的政论记者和文化史家。在大阪的十几年记者生涯中，他去过台湾，到过中国东北，也曾因为政治主张而短期辞职，又再次回到《朝日新闻》报社……他的日本文化观和历史观、中国文化观等

---

① 折衷学派是江户时代从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古学派相互论争中产生出来的一支日本儒学学派。始祖是神原篁洲，经过井山金峨到了山本北山而发扬光大，山本北山就成为折衷学派的中兴之祖。

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这一阶段产生和逐渐定型的。这使他的影响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新闻界。由此可以看出,内藤史学从一开始形成的过程中就带有十分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质。

根据内藤湖南年谱的记载,他一生先后十次造访中国。在他多次来访中国期间,他先后结识了严复、文廷式、罗振玉、王修植、沈曾植、柯绍忞、刘鹗、王国维、李盛铎、董康、郑孝胥、张元济、曹廷杰、宋伯儒等老一代中国朝野硕学之士。也同时和当时正值年轻的胡适、郭沫若、梁漱溟等人保持来往,互赠书籍,交流学术信息。他通过面会笔谈的方式,使他的中国朋友遍及晚清、满洲和民国时代的举凡中国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的学界名流和政界要员。

1899 年 9 月至 11 月,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国土①,从北京一直看到南京,他回国后写成《燕山楚水》一书结集出版,一时间名声大噪。这一次应当说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中国之旅,为他日后走上专业的汉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三年后,他又进行了第二次中国行。这次的重点是东北和江浙一带。毫无疑问,东北的满洲文献和江浙的藏书楼是他此行重点中的重点。又过了三年,1905 年 7 月,他的中国之行成了受日本外务省委托,有着军事目的的调查活动。也正是从这次开始,他经过多次游历中国,实地考察,访求罕见图书写本和善本,大规模地甚至是不择手段地收集和盗取中国古代文献活动正式走上前台:《满文老档》、《蒙古源流》、《清文鉴》、《满蒙文大藏经》、《盛京全图》乃至于著名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篇》,以及宋元善本和唐宋碑帖等一大批珍贵文献,包括刚刚运到北京的大批敦煌文献,或被照相,或被复制,或为收购,从此正式流入日本汉学界。内藤湖南本来就具有深湛的汉学造诣,当他开始掌握了满语和蒙语之后,自由地使用满、蒙史料使他的学术研究视野异常开阔,他当时就已经被公认是第一流的、备受关注和敬畏的日本东洋史大家而蜚声世界。

1906 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东北。他在事先查阅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等古籍的基础上,就鸿胪井刻石一事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该报告中对鸿胪井刻石的历史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该刻石具有"匡正《大明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的疏谬"的学术价值,而且"与渤海有关",进而可以考证日本古代史。由此而引起了当地日本军部的

① 前此,他曾在台湾,任《台湾日报》记者工作一年。而他第一次踏上了中国大陆的国土则是 1899 年的 9 月。

特别关注，终于该刻石被日本军部派人秘密盗往日本。

在内藤湖南一生所结交的中国友人中，他与文廷式堪称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而据神田喜一郎先生《内藤湖南と文廷式》一文中的记载："出于偶然的机会，来中国旅行的内藤先生会晤了穷困潦倒的文廷式。这次会晤的情况详见内藤先生所写的旅行记《燕山楚水》"。[①] 文廷式在1900年亡命日本时，两人又经常晤面，谈论学术。内藤湖南还将他介绍给自己的好友那珂通世和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文廷式的《东游日记》中也详细地记载了他与内藤湖南的谈话内容。1904年，文廷式不幸早逝，内藤湖南亲自撰写了《哭文芸阁》一文，对老友的离去表示怀念和哀伤，并称赞文是"旷世奇才"。这在他一生的文章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

其中，文廷式将他个人秘藏蒙文抄本《元朝秘史》一书，抄录一份后赠送给内藤湖南，经内藤湖南之手又将此抄本转送给那珂通世，后者立刻展开了精心的考证和译著，终于诞生了让国际蒙古史学者震惊的名著《成吉思汗实录》。可以说，没有文廷式把此书转抄再赠送给内藤湖南、没有内藤湖南转赠给那珂通世，则东洋史祖师爷那珂通世一生最为重要的蒙古学研究成果根本就无从谈起！有关这段史实，在《内藤湖南全集》第12卷第149页有如此记载：

> 文廷式芸阁，前年来游，余因前已在沪上与之相识，交往最款洽，日夕相随，以笔代舌，商榷古今，语及元史。芸阁向余道及其所藏《蒙文元秘史》……余因求其归后，钞寄来，且持此书往见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三氏——三氏为当今治东洋史最精深之学者。那珂氏恳求见《元秘史蒙文本》云云。[②]

而当年他亲自拍摄的全套《满文老档》照片，至今也是日本满学界和国际满学界最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宝库，更是日本满学界人才辈出的物质基础。

终于，到了1907年，他在狩野直喜等人的推荐下，成了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新设立的东洋史讲座的第一任教师（讲师职称）。

具体的推荐过程，根据三田村泰助书中的记载[③]："关于这件事情，当时任文科大学筹建委员的狩野直喜博士说了下面一段话：'东洋史的讲座教师的招聘人选问题，这时出现了在招聘桑原的同时，最好也一起招聘内藤的提议。究竟是谁的提议，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在我们这些同仁中一定有像狩

---

① 见《江西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刘美崧译，第64页。

② 译文用刘美崧。

③ 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央公论社，1972年。

野直喜那样了解内藤的人。于是,大家的意见就逐渐统一起来,正式决定了招聘内藤。'"

内藤湖南的再传弟子、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谷川道雄博士在为《内藤湖南的世界》[①]一书所写的序中也介绍说:"狩野开始是打算作为教授招聘他的,但政府当局由于湖南没有大学文凭,对聘其为教授一事感到为难,不得已校方让湖南先做了两年讲师。"

1909 年 9 月,内藤湖南晋升为教授。第二年,他的学位论文经过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特别推荐,被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从此以后,他开始了长达 20 年的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教授的学术生涯。正是在他任上的 20 年中,以他为核心领袖,打造出了世界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作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和核心人物,他被日本学术界称为"京大の学宝"。

内藤湖南先后出版的主要汉学研究著作有:《清朝衰亡论》、《支那绘画史》、《支那史学史》、《支那目录学》、《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燕山楚水》、《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后来被结集成 14 卷本的《内藤湖南全集》出版。

辛亥革命之时,内藤湖南特别邀请罗振玉和王国维东渡日本避难,甚至事先建议罗把全部藏书和文物带到日本,可以寄存在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并且已经为他准备好寓所。毫无疑问,内藤湖南此刻更关心的乃是罗振玉个人收藏的那些珍贵的图书和文物,而一旦这些图书和文物真的交给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临时保管的话,很可能面临着有"借"无还的结局。老练的罗振玉似乎也正担心这一点,他立刻和他的好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进行了一番秘密商议。而藤田丰八[②]早年在上海时就曾在罗振玉主办的东文翻译社里教授日语,他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不但有学术上的,还有经济上和个人感情上的,远非内藤湖南所能比。

我们从罗振玉的《集蓼编》[③]一文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一处理过程的点滴记载:"予乃商之亡友藤田君,藤田君为定计应诸教授之招。"当时在日本国内,新兴的京都帝国大学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开始了对学界老大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叛逆,白鸟和内藤之间的史学论战已经初见端倪。从藤田丰八处

---

① 《内藤湖南的世界·序说》,三秦出版社,2005 年。

② 作为日据时代的台北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的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博士对晚清和民初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他的东洋史研究之外,他是大量把西方先进的农业种植和耕作技术引进到当时的旧中国的日本学者,是近代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先驱者之一。这一点是尤其值得称道的。

③ 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理此事的态度中，我们多少也可以看出当时东大和京大之间微妙的对立情绪。我们还可以从内藤湖南的一篇文章中看出他对东京帝国大学的批判：

> 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最保持其朴学钻研之风，摆脱考证繁琐之弊，由文明的批评、社会的改造起见，古来关西学者所特有，兴起宁固而不杂、峻而不泛的学风，三十年间亦东京大学所缺乏，不能满足世人新思想的特据，或由此间出，未必可知。①

但是，具体的操作过程很可能出自藤田丰八的建议：先暂时存放，再马上建立自家的书库。见罗振玉《集蓼编》②一文中的记载：

> 予寓田中村一岁，书籍置大学，与忠悫往返整理甚劳，乃于净土寺町购地数百坪，建楼四楹，半以栖眷属，半以祀先人接宾友。……寻增书仓一所，……颜之曰：大云书库。……移村大学之书于库中。

实际上，当时罗振玉也的确向内藤湖南和滨田耕作等人出售过古玩和玉器。而且，在罗振玉携全家返回中国后，京都家中所有物品，除土地卖出之外，全部家什包括部分没带走的书籍和文物，均被内藤湖南下令拉回京都帝国大学，如此也可以证明我们上述的推测还是有些道理的……

存放在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内的那些罗振玉的藏书，当时不光是为了罗、王二人的使用和阅读，京都帝国大学的日本学者和学生们也是可以自由阅读的。比如，铃木虎雄就是那些书的读者之一。见他的《王静庵君を忆う》③一文中的记载："而且当时京都帝国大学里有罗叔言先生的寄放书籍，从中我也得益良多。"

国内学术界可能又有很多人热衷于谈论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居日期间对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的建设性和指导性的贡献这类话题，在不少人眼中，罗、王二人简直就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草创时期学术上的"绍兴师爷"或"学术顾问"。④ 而有的日本学者却又不顾事实真相，提出了王国维受内藤湖南影响才从文学、哲学转行研究史学、经学的主张。⑤ 双方的观点都是有

---

① 译文用何培齐，《史学集刊》2008 年第 7 期。

② 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年。

③ 译文引见《追忆王国维》，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年。

④ 此类论著颇多，不过人云亦云而已。如陈俐《论郭沫若文化抗战与中日文化启蒙的话语关联》一文，《中华文化论丛》2008 年第 3 期，第 41 ~ 47 页。

⑤ 见伊园泽周《王国维の号观堂について》，追手门学院大学《亚细亚文化学科年报》1998 年第 1 号。

失公正的。实际上,内藤湖南和罗、王二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多的是学术层面的。毋宁说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在内藤湖南的心里只是维持在"汉学知音兼学术顾问"性质的半师半友关系。这也就不难理解当内藤湖南想同时招聘罗、王二人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时,得到的答复却是(晚清政府可能会不同意的吧)婉言谢绝。从亲密关系程度上讲,内藤湖南的第一中国友人是文廷式,而罗振玉的第一日本友人却是藤田丰八。王国维和藤田丰八有师生之谊,当然和藤田丰八的关系更为亲密。甚至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谈到王国维和日本学者的关系时,也写下了著名的两句诗"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我曾怀疑"藤田、狩野、内藤虎"这个排序很可能是王国维生前曾和陈寅恪先生有过类似的话题。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从汉学研究成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来说,排在前两位的"藤田、狩野"是不能和第三位的"内藤虎"相比的。换句话说,罗、王二人对内藤湖南的京都学派的产生究竟具有多大的启迪和指导性的价值和影响,本书作者是不敢轻下定论的。

以我对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成立前后历史的了解,特别是通过考察内藤湖南一生学术形成过程和与晚清学者交往过程来看,真正对内藤史学和京都学派产生过巨大影响作用的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赵翼,而非时下中国学术界所认为的罗、王二人。相反,王国维先生的甲骨学研究成名大作《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却是在和内藤湖南的相互学术交流和启迪中完善的。见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序文如下:

>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乃为此考以后质诸博士及参事,并使世人知殷契物之有裨于经史二学者有如斯也。

请注意这里的"博士亦采余说"和"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

二句，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了。内藤湖南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甲骨学考证论文是在“博士亦采余说”的基础上才产生的。而毋宁说是内藤湖南的上述论文启迪了王国维，而王国维先生在甲骨史料中“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的精湛的考证论文，则是他“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而成的。① 从内藤湖南首先“博士亦采余说”、利用甲骨史料写出并不十分成熟的《王亥》和《续王亥》二篇来看，是内藤湖南在王国维的启发下写成的，但是他却立刻提出了“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的观点，注意到了这一重要的史学考证方法的潜在价值，到了王国维史学思想中得到了彻底的运用和成熟。这正是王国维先生的智慧和学识所在！

而内藤湖南在和罗振玉和王国维两先生的来往中，特别认识并肯定了他们利用出土文献解释商周两代历史的学术方法：“金文和其他文物的相继出土，逐渐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已经成了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研究的一大倾向。”②

内藤湖南还特别指出：

> 今后值得发展的方向已经很显明就是从对先秦古籍的研究、对金文和殷墟遗物研究的进展而展开的。假如能以这样的方法建构成的新的研究方法的话，对于鼓吹支那古典学的人来说，这才是我们要找的所谓科学的、进步的结论。③

而且，罗振玉正是在内藤湖南那里才获知了东北古代金石碑刻的拓本资料，一览之后大为惊叹，居然发出了“为平生所未及见”的感叹。辛亥革命后，罗从日本返回天津，立刻开始了《满洲金石志》的整编工作。他还在该书出版的序中说：“满洲古刻石不仅入东方士夫之目，并腾于世界学者之叹。”这里的“世界学者”当即内藤湖南。他出版《敦煌石室遗书》则正是在狩野赠送的钞本的基础上，参照伯希和的照片而成的。

1926 年，他正式退休后，在京都府瓶原村恭仁山庄每日以读书和写作为业，一边安度晚年，一边继续他的研究和政论生涯。

在王国维自杀之后，内藤湖南等人迅速出版了纪念王国维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和回忆文章，并盛赞王国维的罕见的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

---

① 在这一点上，内藤湖南博士的功劳是不该被忘却的。为中国学术界所大力肯定的王国维史学的“二重证据说”，在本质上只是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的正式结合和统一。

② 内藤湖南《支那古典学の研究方法に就て》，《东方时论》第 2 卷第 2 号，1917 年。

③ 内藤湖南《支那古典学の研究方法に就て》，《东方时论》第 2 卷第 2 号，1917 年。

当然,我并不否认罗、王二人在和内藤之间的学术交往过程中所带给他的极其重大的学术启迪。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三位史学大师的历史性幸会!在一等一流而不世出的三位史学大师的学术交往之间,相互的学术启迪和学术帮助并不是我们时下喜欢"曰师曰弟子云者"那些浮泛之辈所能理解和概括的。我在这里再引用一封王国维致内藤湖南的信,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关系。王国维1924年1月30日致内藤湖南①:

> 湖南先生有道:违教数载,企仰奚似。春间闻贵体违和,极深驰系,后闻快愈,又极欣慰。历次惠赠书籍,顷又蒙赐大著《宝左文》及十二物影片,伏读一过,如亲晤对。先生大著作多以贵邦文字书之,若能将重要者译成汉文,都为一集,尤所盼祷也。

内藤湖南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一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因为作为日本学者的他远比中国学者更早更全面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内藤湖南在《支那史学史》一书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适、姚名达、刘咸炘三人对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在该书《章学诚の史学》一章中,他首先阐述了自己发现章氏学说的过程:

> 自己第一次读此人的《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是在明治三十三年,那时觉得非常有趣……十多年前偶然得到他全集的未刊本,通读之后,做了这个人的年谱加以发表。②

而据贝塚茂树的回忆:

> 内藤先生对我说,章学诚这个人,在西方来说,像是社会学,他的带有社会学性质的地方很好。正是如此,是社会学啊。是斯宾塞等那一类型的东西啊。③

内藤湖南最为赏识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学思想以及章氏在校雠学和方志学上的突出贡献。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原道说和原学说等观点,深得内藤湖南的赞赏。在《支那史学史》中,内藤湖南还特别肯定了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学术史意义,在介绍这一新学说时,他不惜点出了戴震对方志学的非难,这显然已经暗含着对戴震的批评。

---

① 见《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

② 译文用杨际开文。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校》2008年第1期。

③ 译文用杨际开文。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校》2008年第1期。

在内藤湖南和胡适的往来书信中，特别涉及了对章学诚的研究。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就是在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年谱》基础上的登峰之作。而内藤湖南在读了胡适所写的年谱之后，立刻发表了《读胡适之君新著章实斋年谱》一文，并订正了胡适文中的15处错误和不准确之处。胡适则虚心接受，并来信表示感谢。

正是因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祖师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和方法的注重，由此开启了研究赵翼和章学诚的史学著作成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看家本领。不了解这一特点几乎等于不了解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 Marcel Granet 博士的法国社会学派的历史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国际汉学界和中国学术界流行之时，居然遭到了内藤湖南的弟子、京都帝国大学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小岛祐马的嘲讽和轻视。①

在内藤湖南退休后，他还抱病亲自到当时的伪满洲国，去出任那里刚成立的日满文化协会的学术顾问。临死前两个月还在家中接见老友、伪满洲国政府总理郑孝胥的私人拜访。

1934年6月26日因胃癌逝世。内藤湖南死后被命名为法然上人。② 遗骨被葬在京都市左京区法然院内，而遗发则被葬在家乡内藤家族历代墓地。

二、学术述评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就有“东大の白鸟，京大の内藤”的说法。又有一种说法直接道出他们各自的治学特点和学风区别：“文献学派の白鸟库吉，实证学派の内藤湖南”。所谓“实证学派の内藤湖南”乃是对他一生治史风格的概括。在《京都大学の学の士》一文中，他曾公开地借肯定清代考证学来表达他自己的治史倾向：

> 清二百余年，朴学之士辈出，历代所罕见，昆山的顾宁人、余姚的黄黎洲、以前朝的遗民，不仕使高尚其志，太原的阎百诗、吴县的惠定宇、婺源的江慎修、休宁的戴东原、江都的汪中，以及近时番禺的陈兰甫，研经家法之守，小学训诂之学，极空前之盛者，实此等朴学之徒之力。若在西洋诸国，近世学术的进运，须各专业的钻研，终究非于世途有野心者所能兼，所谓学者即朴学之徒。二百年来，新主义的倡导，新学说的发现，尽出此一窗之下，出自无病呻吟之辈，彼等亦不自以为时代之继

① 见刘正《海外汉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日本习惯给死亡的人要起个法号。或者说这一传统是古代中国谥号的一个演化。

儿,而至为学者之天职,其社会亦对之表示高度之尊敬,自古被称为文学之邦的中国亦有过者,为智慧发挥的方法,使得极为顺便,只可谓之为美风。①

在介绍内藤湖南的著作之前有必要先特别指出一下,即:内藤湖南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课堂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位饱学的历史学家,一般只在一小幅纸片上罗列一下讲课提纲和要点,然后就驾轻就熟地上场发挥了。而且,同样的课程,每次讲课内容会被临场发挥成内容各异的专题学术演讲。尤其在他的东洋史讲座开讲之后,根据听讲的学生各自不同的笔记,他再进行整理和加工,成了内藤湖南的著作初稿。在这一点上,他和狩野直喜完全一样。这也难免会引起桑原本人对他的一些鄙视。在内藤和狩野并出的时代,桑原是唯一一个可以傲视此二人的汉学大师。

他的博学自然不用说了,而他的精彩的演讲才能却是他有意识锻炼而成的。根据三田村泰助的回忆②,在内藤湖南到京都帝国大学讲课之初,并不是这样的形式。后来,当他听说文学院里研究西方哲学的教授谷本富博士讲课深受大家欢迎,于是,内藤湖南多次到那位教授的课堂中去听讲,很快就把自己记者的敏感和学者的饱学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演讲式的上课风格。

面对内藤史学的庞大而精湛,绝不是一两本书、一二十篇论文的研究就可以穷尽的。在此,我选择他最有影响力的两个观点进行介绍和简单述评,即: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文化中心移动说。上述两个观点应该说是内藤史学的精髓和核心。

第一,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

内藤湖南《概括の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主张,中国古代史可以划分为两大过渡时期和三个时代,从远古时代到东汉中期为上古时代。从东汉后期到西晋王朝为第一过渡时期。从五胡十六国到唐朝中期为中世时代,或称中古时代。从晚唐到五代十国为第二过渡时期。从宋朝时代到晚清为近世时代。

他的理论被之后的日本学者所继承,成为日本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观念。

在《支那论》一书中,内藤湖南认为:

---

① 译文用何培齐文。《史学集刊》2008 年第 7 期。

② 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央公论社,1972 年。

历史学家时常划分时代，并使用上古、中古、近世等名称。这些名称并非只是表示站在现代的时代之上，以较远的时期为上古，其次为中古，以最近的时期为近世，等等简单的意思。各个时代的划分方法中都有着与之相应的内容。……包括一般民众的力量是否增长，伴随着新土地的开发，经济上有何变化，社会组织是否出现变化等内容。

又说：

……对中国也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划分。一般人比较单纯地把明代或者清代以后称作近世。这是门外汉的看法。可是如果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就应该看到所谓近世是有其内容，有其意义的。由此可以再追溯到从唐代中叶到五代、北宋亦即离现在约以千年前到八百年前之间，已逐渐形成了我们所说的近世。①

把秦汉和上三代连为一体，统称为“上古”，这并不是内藤史学的首创，在他之前，著名的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博士的《中国上古史》一书基本上就是本着这一划分来著述的。但是，内藤湖南却是在1914年出版的《支那论》一书中首先提出的。而根据内藤湖南著作的成书习惯，毫无疑问，这也是在他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因此，这一观点的产生时间也必然要上推到他开始讲授这门课程之初。当然，既然下限是1914年，那么上限顺理成章地是1907年他来京都帝国大学之初。

小林义广博士在论文《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和人物论》②一文中推定是1909年开始讲授《支那近世史》之时，从时间段上看是在可取的范围内。然而，这一推断却忽略了内藤湖南半师半友的学长、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日本史教授内田银藏博士的首倡之功，因为早在1903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师从德国教授瑞斯、和白鸟库吉是同门的内田银藏在《日本近世史》③一书中就提出了“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的文化”的观点。而内藤湖南和内田银藏之间的交往还是在他当《大阪朝日新闻》的记者时代就已经很频繁了。介绍他们认识的中间人是他们共同的好友、也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新闻记者、早逝的著名汉学家西村天囚博士。可以说，是德国史学界的历史分期说和当时日本史学界对日本近世史分期的成功才使内藤湖

① 引《内藤湖南的世界》，胡宝华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

② 小林义广《内藤湖南的中国近世论和人物论》，见《内藤湖南的世界》，胡宝华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

③ 内田银藏《日本近世史》，葭森健介《内藤湖南与京都文化史学》一文，见《内藤湖南的世界》，张学峰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

南继承并发展了内田银藏首倡的“宋元明的文化是近世中国的文化”的观点。

当然,就他个人的学术观点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来说,内藤湖南的断代标准也不是没有微小的修正。他在1932年的一篇文章①中甚至提出了上古史可以断在新莽时代,而近世也可以划定在晚唐至元代的观点。在这里,他的这一新说就与《概括の唐宋时代观》一文中提出的观点不尽相同。或者,他这时也意识到了过渡期和断代期有时还真难以作出明确归属。

而中古时代的划分大致范围也是颇为一致的。

争议的焦点在于:

第一,关于上古时代的结束点就有战国、秦、西汉,甚至东汉末等多种说法。

第二,关于中古的开始点就有西汉说、东汉说、西晋说等说法,而对于上古到中古之间的社会性质也有奴隶制度、封建制度等说法。

第三,中古的结束点就有晚唐说、北宋说、南宋说、元代说等说法,以及中古以后的时代名称又有近世说、前近代说甚至古代说等说法。

可以说,在20世纪前期的国内外中国古代史学界十分混乱,大的争议的焦点也无非就是时代划分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上。内藤湖南的这一划分却是建立在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考察和研究为基础上的,而大清帝国的专制和国体继承的却是早在宋代就已经正式定型的独裁皇权下的文官制度。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最后终结者——疆域辽阔的封建社会的晚清政府,它在未来的发展走向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联盟的国体问题。在汉唐盛世时代,贵族制度的昌盛成为制约皇权的一个有效的杠杆。对贵族制度的研究,成为内藤史学乃至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基本立脚点。在贵族制度盛行的时代,皇帝只是贵族制度下的公有财产,和近世中的具有独裁特征的皇权有本质上的不同。晚唐以后,随着传统的贵族制度的衰败和没落,政权又重新回归皇帝手中,独裁的皇权出现了。于是,从北宋王朝开始废除了宰相制度,以三省六部制来加强中央集权制。代替贵族制度的是新兴的文人政府及其官僚群体,和与之相应的科举制度,拉近了官僚和平民之间的联系纽带,客观上促进了独裁政权的长期存在。军事活动已经不再具有以往那样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一个成熟而且接近老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从宋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晚清。作为宋代皇权独裁政治制度的后任者,政治腐败、经济贫弱、军事落后的晚清帝国已经是无可救药地走到了它的尽头,如

① 内藤湖南《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序》,弘文堂书房,1932年。

何革新并且超越这一套政治文化体系和模式才是未来中华帝国的前途所在。因此,他还主张:

> 中国的近世史越到后来,独裁君主的力量就越强大。到后来君主干脆靠个人的感情就能处理所有事务。因此,天子的位置在臣僚面前也十分安泰,在这以时代中推翻天子之位的,只有如元、明末期,人民起义愈演愈烈,终成流贼推翻朝廷,或是如近日清朝的革命之乱那样起自民间的骚动才能迫使天子退位。这与靠宫廷事由或是贵族间的力量便能扳动其位的古代相比,完全不同。①

和这一划分密切相关的就是所谓的"唐宋变革说"。②

内藤湖南考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尤其是在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方面,从宋到清保持着一致性,而从汉到唐则表现出相似性。在这两个时间段之间则可以看成是下一阶段的过渡。于是,他锁定宋代为中国历史变化的中枢,以唐宋变革而宋清一体的近世说作为内藤史学的立足点,形成了国内外中国历史学界所熟知的"内藤假说"。

内藤湖南关于"唐宋变革说"的系统论述,一般认为最早出自1922年5月发表的《概括の唐宋时代观》一文中。他考察了唐宋两朝在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文学艺术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种种差异和变异,特别着眼于隋唐贵族制度的崩溃和宋代君主独裁政治的出现,以及他所谓的平民力量的崛起,乃至于货币制度的通行、文艺风格的变迁等。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使学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宋代及其后代的制度延续,特别使发生在唐宋之际的制度变革,在古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扩大到了中原以外的边远地区,并且又反过来影响到中原地区的主体制度。

第二,文化中心移动说

内藤湖南认为:古代的中国文化在其特定的时代和地域内形成了所谓的"文化中心"。而具体到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都会因为地理环境和时间关系的不同产生一个凝聚当时文化精英的"文化中心",这个文化中心形成之后就开始了它的不停地发展变化和向前移动的历史过程。即以中国古代

---

① 内藤湖南《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序》,弘文堂书房,1932年。

② 在中国历史学界一般习惯于把唐宋合在一起,甚至直到今天在古典文学界还通行着"唐宋文学"这样的一体化观念。唐、宋分开这一工作也许在思想史学界早就进行得很彻底了,在"唐宋文学"的并称大盛天下之时,制约了"唐宋哲学"术语的出现,代之以时代性的"汉唐佛教"和"宋明理学"的两大概念和中心课题的出现。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唐、宋的接近,而社会和经济上的巨大差异又使得唐、宋的分离成为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史的最佳选择。

王朝发展的历史而言，从洛阳到长安，再到燕京，最后形成了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文化中心。由此而来就形成了宋代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现实问题和政治势力圈。

其实，到此为止，内藤湖南的观点还是比较正常而且理性的。这一观点的异常是从下面开始的，即：他主张，中国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汉民族、中原甚至中国本土的范围，形成一个他所谓的“东洋文化圈”。换而言之，中国文化的中心下一步将要移动至日本，由日本来振兴中国文化就成了近代日本的文化天职。

造成上述异常观点的产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中日甲午海战。大战以晚清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为结局，当时正任记者的内藤湖南，在极度兴奋之下，以日本的所谓“天职”（上天赐予的职业使命）为核心概念，连续刊发了多篇阐述为新兴的日本进行文化定位的系列文章。后来，这些文章以《支那论》为名，结集出版。在《所谓日本国の天职》一文中，他则公开地主张：

> 日本的天职，就是日本的天职，不是介绍西洋文明，把它传给中国，使它在东亚弘扬的天职。也不是保护中国的旧物卖给西洋，而是使日本的文明、日本的风尚风靡天下、光被坤舆的天职。我们因为国在东亚，又因为东亚各国以中国为最大，我们天职的履行必须以中国为主要对象。①

这是他提出中国文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开始。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主张：中国文化由内向外不断地扩大发展的总趋势，使周边地区的落后民族在接受了中原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后，继续向四周扩散一样、并且和当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完成整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民族文化。而这一文化又反过来影响和渗透到中原地区的文化。日本文化正是在中国文化中心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个民族文化。为此，他提出了“中日文化同一论”，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中国文化中心的延长点和未来中心所在地。内藤湖南是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化的，也是这样看待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及其影响的。何培齐先生在《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一文中曾经试图对此说加以善意的理解，他解释说：

> 另就笔者初步的理解，内藤所谓的文化中心移动，并非必然的兴衰，而是有文化光被的意义在，亦即文化中心转移到何处，该文化随即

① 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吴卫峰译，中华书局，2007年，第183页。

跟着流到何处，而文化所到之处，该处即被开发进而成为文明之境，因而促进了大一统的来临。[1]

这是否是内藤湖南此说的本意呢？我看未必。只要我们想到当时他配合日本军部的那一套文化观点，则“文化中心移动说”也只不过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所推出的一种美化侵略的文化装饰而已。因此，脱离了环境与具体的政治立场来善意理解此说，实在有些南辕北辙。

在阐述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时，他又提出了中国文化的“盐卤比喻”和“波动比喻”。即：日本文化就像是一碗豆浆，而中国文化则是使它集聚成豆腐的盐卤。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波动性质的，从内向外的发展就像波纹一样，而遇到任何阻碍都会自动反射回去，然后再以新的波纹向外发展，形成了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而越到后来，波动的中心就越衰老和虚弱。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和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的费正清学派的“冲击回应说”有若干近似之处。

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就等于把由宋到清历史进程等同为一个早熟而且高度发达的封建王朝走向长期衰老的漫长历史过程。在他看来，固有的中国文化中心已经是一个衰弱的老人，而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并获得新兴的日本文化，则是一个健康生长的青年。这类观点在内藤史学中表现还是很突出的。特别是在《支那论》和《新支那论》二书中，那里面十分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和观点，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有意无意之间却直接提供了文化注解，这成为内藤史学及其本人遭人诟病的直接证据和原因。就连他的再传弟子也公开承认“湖南在《支那论》和《新支那论》中，都暗示了在一定条件下中国有国际管理的可能性。他的这一观点与日本经济输入意见，给人留下了是否具有将侵略中国正当化企图的疑问。”[2]一旦丧失了工具理性，无论他是多么优秀的史学大师也难免成为军国主义政治的文化传声筒。博学而不世出的内藤湖南将其杰出的史学理论拱手送给了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起源上则是和清代乾嘉学者的地理学思想、尤其是和赵翼的史学思想是分不开的。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和气运地气说在内藤史学中被发挥到了极致。不了解这一点也就无法把握内藤史学，乃至于解释内藤湖南的以学论政的一生。赵翼在《长安地气》一文中就公开主张中国古代都城自西向东迁移的原因是“气运”演化的结

---

① 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史学集刊》2008年第7期。

② 引《内藤湖南的世界》，李济仓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

果。而这一点则深深地打动了内藤湖南,并引以为知音。他由赵翼的"气运"的移动说联想到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多次出现的文化中心的南北或东西的移动现象,由此而来终于创建了他自己独特的"文化中心移动说"。[①]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提出的"读史以观世变"的思想,几乎就是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和"文化中心移动说"的立论依据。从此以后,精通赵翼的史学思想成了他的弟子们的看家法宝之一。[②] 赵翼史学中的经世致用学说,通过他的《廿二史札记》对顾炎武《日知录》的模仿表现出来。顾炎武所说的"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的思想,成了赵翼著述《廿二史札记》的立论根本。而以这一点来考察内藤湖南的论著,从早期的《燕山楚水》到晚年的《新支那论》无不如此。

内藤湖南在肯定清代乾嘉考证学派之时,也对清代的公羊学说进行了否定。他在《尚书编次考》[③]一文中说:"公羊学派在清朝学说中不但不主考证,且离考证而从微言大义而下观察,而为其判断之基础者,全属公羊学说。余固不主公羊学说者。"在这一点上,他和狩野直喜保持了距离。

内藤湖南在当记者时代曾经对中国的现实进行过很准确的预言和很精细的观察。比如他对清朝灭亡的预言,比如他对满清腐败和旧北京大小生活细节的观察等,这反映了作为记者的内藤湖南敏锐的观察力和政治预见能力。但是,当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以后,他对现实的预言逐渐被学术史的考证和严谨的治学风气所代替。显然,作为学者的他已经日益占据了他对现实的关心。但是,很快,随着日本占领东北和满洲国的成立,他对政治的关心又重新得到了发挥。他可以说一直在履行着经世致用的赵翼史学思想。

---

① 葭森建介博士在《内藤湖南于京都文化史学》一文中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湖南受到清朝考据学家的深刻影响这一点,读了《支那论》、《支那史学史》等著作后就能充分了解。在六朝时期的门阀和尊重氏族方面,《支那中古的文化》引用了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廿二史札记》卷八《九品中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清议》,因此,在考察六朝隋唐门阀制度的特征、文化时,湖南从清朝考证学家那里获得灵感的可能性非常大。"见《内藤湖南的世界》,张学峰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

② 顺便说一句:笔者在取得日本国文学博士学位进入京都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之时,第一堂课就是跟随池田秀三教授一起研读赵翼的《陔余丛考》一书。而且,仅这一部书的研读就进行了半年多。足以发现清代考证学派对今天京都学派的影响。在笔者就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的一位任课老师、同样毕业于京都大学的中国思想史家山口久和博士就是研究清代考证学(尤其是常州学派)历史的专业学者。

③ 见著《先秦经籍考》,江侠庵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

三、学术影响

内藤湖南及其开创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术影响是世界性的，也将是跨时代性的，我们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史的每个方面几乎都可以发现内藤史学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影子。

内藤湖南的弟子、著名中国文学史家、京都大学教授小川环树曾把《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清朝史通论》四部书列为“内藤史学四大名作”。[①] 这一说法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但是，这是日本学者面对日本学术界的观点。对于国际上整个中国史学界来说，上述四部书并不能概括内藤史学的精髓。

以中国学者的我来看，我把内藤史学分为两大系列，即：《支那史学史》、《支那上古史》、《支那中古的文化》、《支那近世史》、《支那绘画史》可以称为“支那古代史系列五书”。而《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清朝建国史》、《支那论》、《新支那论》可以称为“清朝史系列五书”。我相信上述两大系列十部著作代表了内藤史学的精华。

下面，我分三个方面介绍一下内藤史学及其京都学派在中外学术界的学术影响。

第一，内藤史学对其弟子们的影响

按照日本的习惯，我把内藤湖南的弟子们统称为“内藤史学军团”，简称为“内藤军团”。因为本书中对这些学者都将有专章予以介绍，这里仅对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的观点和成就简要说明。

在中国史研究战将优良而范围广阔的“内藤军团”大旗下，宫崎市定则是最为著名的领军人物。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认为内藤史学中的中国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得到确立和推广，与内藤湖南的直系弟子宫崎市定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宫崎市定本人在《东洋の近世·前言》[②]中干脆就坦然宣称“谨请留意的是：本书的观点基本上是沿袭先师内藤湖南博士的高论”。不仅如此，宫崎市定在其名作《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等书中，对宋代到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研究，调整了以往旧说中的官僚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

① 小川环树之说见《日本の名著：内藤湖南》一书中的解说文，中央公论社，1971 年。

② 《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2 年。

的矛盾,使"内藤假说"逐渐得到充实和实证。尤其是他对九品官人法的分析研究,他发现在隋唐时代的选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一直潜伏着中世时代所流行的贵族制的主线,而从宋代开始则具有了全新的内涵,这样一来,他通过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贵族制形式的变化和延续。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典型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另一位杰出的著名弟子是冈崎文夫,他的《支那史概说》、《魏晋南北朝通史》和《南北朝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冈崎文夫在该书中继承了内藤湖南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势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中央皇权和地方豪族、贵族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同属于统治集团,但是他们的矛盾比一般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地域特征上,北方的皇权集中和南方的贵族势力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师的格外赞许,内藤湖南甚至认为他自己对中世贵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中已经接近完成。谷川道雄曾经在《内藤湖南的六朝论及其对日本学术界的影响》一文中,如此评价冈崎文夫的此书:

> 《魏晋南北朝通史》贯穿始终的主题是贵族制。冈崎从汉代内部开始成长起来的地方名望家阶层那里寻找到了贵族阶级的起源,这是把湖南的学说进一步具体化的论述。

接着,他又分析说:

> 冈崎明确地阐述了六朝时代复杂的政治过程的历史,即是军阀与贵族的协调以及彼此之间纠葛的历史。贵族制国家正是经过上述的反复才渐进形成的。可是贵族制国家的形成,对于贵族阶级来说,却意味着它开始走向了衰亡的第一步。这是因为,本来应该是独立的贵族阶级,可是当它把国家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其原有的独立性也随之丧失。①

不难看出,"内藤假说"在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手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确立。

从此,"内藤假说"变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支柱。

---

① 胡宝华《文史哲》1993年第3期。

尽管在战后，内藤湖南所建构的文化史学，因为其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遭到了野原四郎、增井经夫、池田诚、五井直弘、增渊龙夫等新一代日本史学理论家们的尖锐批评，但是，在远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后，内藤史学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核心组成，还是得到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的高度肯定和深入研究。

"内藤军团"中的其他成员，如丹羽正义、稻叶岩吉、宫川尚志、宇都宫清吉、那波利贞等人，也是全盘继承并分工合作，完善着"内藤假说"。就是打着对内藤史学进行全面修正的名古屋大学东洋史教授宇都宫清吉博士，以宇都宫学派而称著于日本史学界，他只是提出了所谓"时代格"这一概念，来修正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法缺乏终结意义和临界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内藤史学中所谓过渡期的不确定性。

无可回避的是，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70年代，在这30多年中，"内藤军团"的学者们在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的带领下，和有着"百代学阀"之称号的东京大学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奴隶制度、贵族制度和唐宋变革等）问题的学术论战。

因为东京学派的加藤繁博士（白鸟库吉的弟子）看重对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研究，一贯主张在经济制度上唐宋一体论，并且部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一下子击中了主张文化史研究的内藤史学的软肋，打前站的是东京学派的前田直典博士（加藤繁的弟子）。前田直典主张唐末是古代奴隶社会的终结，而宋代则是"中世"而非"近世"。这时的社会性质由古代奴隶制向宋代农奴制的转变，这才是唐宋变革的本质。这一学说对内藤假说的否定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京都学派的宇都宫清吉和宫崎市定二人先后应战。他们都主张隋唐时代大土地法所有制下的耕作者是农奴，而非奴隶，以此反驳前田直典等东京学派的质疑。

持续达三十几年的学术论争，可以说涉及了内藤史学的各个方面，甚至也包括了他的国家主义和积极迎合日本军方的政论与言行①，研究课题则因论战范围不断扩展而深入，客观上催进了"内藤假说"的丰富、充实和发展。至少，在战前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中，加藤繁主张的唐宋一体化现象十分突出，而战后则明显地出现了肯定"内藤假说"唐宋分离观点的局面。

---

① 谷川道雄博士在《内藤湖南的世界序说》一文中就说："战后的湖南，一方面被认为是东方学的稀世巨匠，一方面被认为是在现实政治论上犯过错误的人物，受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见《内藤湖南的世界》，马彪译，三秦出版社，2005年。

第二,内藤史学对国外汉学界的影响

内藤湖南的学术思想,经过法国和美国学者的介绍和研究,特别是其弟子宫崎市定、吉川幸次郎和宫川尚志等人的大力倡导,走上了国际汉学界。最有说服力的是国际汉学界的"宋代研究计划"(Projet de Manuel de l'histoire des Song)的施行。而主持这一国际汉学家之间的合作科研项目的是法国著名汉学家 Etienne Balazs 博士和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主帅宫崎市定博士。他们二人在学术上最大的特点是肯定宋代是中国的近世!而 Etienne Balazs 本来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专家,他能赞同唐宋分离说,真不知道那位同样也是研究唐代经济史的著名学者、东京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加藤繁,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方豪博士曾在《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近况》一文中分析这一国际合作项目产生的原因时说:

> 第一理由是符合西方人近代观念的中国大部分中央官制,到了宋朝可以说已定型。第二理由是宋史有其本身在各方面的重要性,如印刷术、航海术、工艺、科学、纯文学、哲学等,有些是在宋代发明,有些是到宋代发扬光大,同时宋代历史可以满足学者广泛的兴趣,无论是西方的史学家、艺术史专家、哲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并且宋代还有同时并存的辽、金、西夏和前期的五代。第三理由是资料无比的丰富,可供人发掘。第四可以说宋代介乎中国中古和近代之间。①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东京大学的学者们几乎没有人参加这一国际性的科研合作项目。

战后,在美国的《远东季刊》②上首先刊登了宫川尚志博士介绍内藤史学成就及其弟子宫崎市定博士的学术观点的文章:An Outline of the Naito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也许,这是内藤史学广泛地走进西方学术界的开始。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 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博士、英国剑桥大学 Denis Twitchett 博士、美国哈佛大学 Peter K. Bol 博士和普林斯顿大学刘子健博士和 Peter J. Golas 博士等人都在论著中公开地肯定或基本赞同"内藤假说"。③

---

① 方豪《欧美及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近况》,《大陆杂志》第 15 卷第 12 期。

②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XIV. 4, August 1955。

③ 有关这一问题,还可以参考北京大学张广达教授的《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那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从学术史角度研究"内藤假说"及其在国内外影响问题的优秀论文。

第三，内藤史学对国内史学界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学界，因为受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生专治中古史的影响，内藤史学乃至于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们的研究专著和学术观点，一直倍受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胡适先生就曾和陈垣先生一起探讨当时国际汉学研究的中心究竟是在巴黎还是在京都的问题。1920年，当内藤湖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一文在《支那学》刊物上刚一发表，胡适先生看到后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立刻致函内藤湖南，展开学术交流。

内藤湖南以宋代为近世说的出现，最大限度启发了中古史权威陈寅恪先生对隋唐政治制度的研究，大家一定记得陈寅恪先生曾经以“新宋学的建立”或“宋代学术的复兴”作为未来中国文化的支点。在陈寅恪先生那里，唐、宋明显地是被分开的，他的隋唐一体和对宋代学术的寄托，他的以种族文化论来代替贵族论的立场，都可以看出聪明的陈寅恪先生对内藤假说的赞同和发展。如果说宫崎市定的宋史研究丰富和完善了内藤史学关于宋代近世说的理论的话，那么陈寅恪先生的隋唐史研究则是发展和推进了内藤史学关于中古史贵族制度的学说。今天，虽然在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国内学术界早已经出现了唐宋的分离性研究局面，而文学史上的唐宋一体和唐宋分离却是以一种微妙的连接存在着，远不如吉川幸次郎的著作中那十分明确的唐宋分离色彩。

随着最近几十年对海外汉学研究的注重，有关内藤湖南的著作和研究论著开始大量出现在中国学术界，甚至出现了以研究内藤湖南的思想为核心的博士论文。虽然不少中古史学者可能并不清楚内藤湖南的贵族制理论和陈寅恪先生的种族文化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但是，把内藤湖南和陈寅恪先生进行学术思想的对比性研究，也即中日学术界有关中古史理论之间的对话已经成为可能。

最后，我觉得还有必要阐述一下内藤湖南的《支那论》中的那些为日本军部服务的观点。这对于理解学者的内藤湖南与日本军部战略理论家的内藤这双重身份是大有裨益的。我们知道，《支那论》出版是在1914年，它的学术性，我们前面已经涉及了。但是他的文化侵略与战略理论却是我们这里要揭示的。

首先，他主张满洲土地分裂论。他公然地认为：“单从财政上看，把满洲分离出去，是有益的。因为它现在的财力已经没有继续控制满洲的实力。”他认为为了致力于中国领土的真正掌握，放弃东北地区的五族共和空想，分割满洲才是当时中国政治的首选方针。这显然是说明晚清政府、民国初期

政府要放弃满洲了。

其次,他又主张支那领土过于庞大,以至于"支那绝对不需要再设国防",甚至叫嚣:"即使支那拥有四五十个师团的兵力,它的素质之低也是可想而知的。一旦日本、俄国出兵加以占据,则这样国度下的军事力量根本不足以抵御。"因此,不设国防反而是保存国体的不二选择。上述观点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割让满洲,日本应抢在俄国之前占据中国。到了十年后他出版《新支那论》一书时,他甚至开始为日本占据中国后是否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而担心了。而当时的国民如一盘散沙一样的民族劣根性深深地为内藤所了解。他得意地说:

> 打个极简单的比方:支那人有句话,叫常山之蛇,打头尾来扫,打尾头来咬。日本国民就是这样具有非常敏锐的感觉。……然而支那的情况却与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能没有感觉,仍然能够继续活着。例如去年在排日骚动的时候,汉口是排日的中心地,假如日本派兵把汉口给压下去,那么为此绝不必担心会造成整个湖北的骚乱。①

为此,王向远先生分析:

> 湖南的领土过大论和国防不必要论是赤裸裸的瓜分中国的理论,是为日本侵占满洲、乃至整个中国制造根据的理论。当时日本政府正勾结列强,策划满蒙独立运动,扩大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支那论》的出笼,显然是自觉地服务于日本的国策的。

这一分析是极其准确的。

内藤博士将其敏锐的学术洞察力错误地运用在了积极地服务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学术研究上,实在可惜。

---

① 译文用王向远《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学者、文化人的侵略战争》,昆仑出版社,2005年。

第四章
矢野仁一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矢野仁一生于1872年5月13日，山形县人。他是日本东洋史学界最长寿的历史学家之一，见证了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从诞生的第一代到全盛的第二代、直到成长的第三代和踏入大学校园的第四代的整个历史过程。

1890年，矢野仁一因为成绩优秀从家乡的山形中学直接考入东京第一高中。

1893年，矢野仁一高中毕业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专攻历史学。

1896年，矢野仁一结束了三年的大学生涯，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西洋史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历史学特别是近代东西交通史为研究方向。这是他接触中国历史的开始。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把研究方向由西方近代史转到了晚清中西外交和政治史。

1899年，矢野仁一从东京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讲师。

矢野仁一第一次来中国是1905年，他受清朝政府的邀请，到北京法政学堂，任进士馆教习。讲授“近世政治史”和“政治地理”等课程。但是还不擅长中文的他，专门由曹汝霖担任他的讲课翻译。这一来就是将近七年，直到他到京都帝国大学任教为止。尽管在华时间很长，但是他却很少有和他交往深厚的中国学者朋友。

七年的在华生涯中，他收藏了不少中国文物，他的私人书房里挂着的就是出自晚清著名书法家和贵族成亲王亲笔书写的条幅墨宝。作为一名清史专家，也许，这是最能显示他和清代关系密切的地方。

他对中国晚清时代的大小政治变革十分清楚，他曾亲自投身到当时的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在他临回国之前还亲自组织在华日本人发起反对袁世凯执政的活动。从这一角度而言，矢野仁一似乎表现出其革命性。但是，这只是我们的一点主观热情想象而已。因为，作为在华日本人，他的国士归属的自觉性正是从这时的浪人政客时代开始的。

1912年，在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桑原骘藏的推荐下，他离开早稻田大学，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东洋史学第二讲座副教授。

1918年，矢野仁一前往美国留学，专攻晚清中西方外交和政治史研究。

1920年，矢野仁一回国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并以论文《日清战役时期中国外交史》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1932年，矢野仁一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1932年5月30日，根据《郑孝胥日记》中记载："西京帝国大学矢野仁一博士持狩野书及内藤诗来访。"可见当时他和满洲有很密切的联系。

1970年1月2日，矢野仁一以98岁高龄因病逝世。①

因为长寿和勤于著述，矢野仁一一生著述很多，论文不算，仅专著就多达几十种，至今还没有整理并出版他个人的学术全集。但是，他一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集中在中国外交史、民族史、清朝史和现代中国政治史四个方面。在外交史研究上，主要著作如：《日清战役时期中国外交史》、《アヘン战争と香港：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1〉》、《アロー战争と円明园：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二）》、《支那近代外国关系研究》、《支那近代外交史》等；在晚清史和民族史研究上，主要著作如：《清朝末史研究》、《近代蒙古史研究》、《近代支那の政治及び文化》、《近代支那论》、《满洲における我が特殊权益》、《大东亚史の构想》等；在中国现代史研究上，主要著作如：《现代支那研究》、《现代支那概论》、《中国人民革命史论》、《古中国と新中国》等；在东洋史研究上，主要著作如：《东洋史大纲》、《国民东洋史大纲》、《最近东亚百年小史》、《东洋历史大辞典》（主编）等。在第一代东洋史家中，他以罕见的长寿和惊人的勤奋，亲自笔耕，一直著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二、学术述评

在他漫长的生命里程中，矢野仁一的研究是丰富多彩的。

作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本人却一直以"日本国

① 关于他逝世日期，一说是"1月4日"。可供参考。

士”(也即我们所谓的“国策顾问”)的称号自居。他认为他的一切研究都是服务于日本政府的,而非无功利的纯粹学术。因此,我们必须区分作为历史学家的矢野仁一博士和作为政论家的矢野仁一“国士”这两个身份,虽然这是统一为一体的。但是,从事学术史的研究时,我们必须分清学者的他和政客的他,不然的话很可能我们的评价有失公正。指出学者的矢野仁一的史学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时我也批判政客的矢野仁一错误的历史观和政治观。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了在他晚年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史论》一书中对中国革命的肯定。

第一,矢野仁一的清史和近代中西交通史研究

矢野仁一的清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史、边疆史和外交史等范围内。

矢野仁一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晚清时期的中俄关系,因此,清史研究应该说是他的看家的学问。他敏锐地注意到了近代中英关系的最大问题点就是由鸦片及其引发的鸦片战争。针对中国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矢野仁一通过对清代史料的考察,指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程含章是首先意识到从英国输入鸦片危害的人。他郑重其事地说:“首先认识到中国的白银流出来自鸦片的,据我迄今研究,似是程含章其人。”[①]用了一个“似是”表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谨慎。而程含章,云南景东人。乾隆五十七年举人。先后任山东兖沂曹道、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浙江巡抚等官。有《岭南集》、《山左集》等传世。在鸦片战争史研究上,国内一般人还很少注意到他。他出名是因为曾经修改了昆明的大观楼长联。他认为大观楼长联虽然“才雄气猛,为海内第一杰作,惟连用排偶八句,而无虚字跌宕之,又无单句疏畅之,似嫌气滞”,于是修改为:

>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金马,西峙碧鸡,北耸青虹,南翔白鹤。高人韵士,定当击节讴歌。况栏外树色江声,随地皆诗情画意;更云开雨霁,何时不鱼跃鸢飞。登斯楼也,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
>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临风,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争欲同符天地。至今日离宫别馆,悉化为苦草长林;并断碣残碑,都付于苍烟夕照。游于浦者,止剩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一行秋雁,两岸芦花。

---

① 矢野仁一《中国的鸦片问题》,《近代支那の政治及び文化》,弘文堂书房,1926年。

除了专业的清史学者,谁会知道他还是"首先意识到从英国输入鸦片危害的人"。我们当感谢矢野仁一的研究!

而中英关系除了鸦片之外,就是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了。发生在1903~1904年之间的英军入侵西藏的军事战争,成了他的又一个注意点。英国不久就在中国西藏岗巴宗与锡金的边界处挑起争端。1902年,英国派军队闯入西藏岗巴宗一带,驱逐世代居住在那里的中国藏民。并擅自划定西藏与锡金的边界。这些挑衅行为遭到了晚清政府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坚决反击。于是,上万名英军在将领荣赫鹏带领下,开始了对西藏地区的血腥屠杀和侵犯。就这一历史事件,矢野仁一在详细地分析和研究了中、印、英等国文献后,主张英军入侵西藏的真正目的是想使西藏成为印度防御外来势力干涉的真空地带。这一揭露对于一直主张西藏军队首先制造贸易和边境摩擦的英国侵略军而言,当然是极其有价值和符合事实的一个研究结论。毋宁说,站在日本立场上,不想看到英国独霸晚清中国利益的一个"日本国士",对英国侵略西藏的行为发出了一个比较客观而中立的研究报告。在当时的日本,如何培养西藏的反英亲日倾向已经是日本的基本国策之一。在此意义上,他肯定了西姆拉会议在处理中藏关系、中印关系上的重要价值。因此,为了日本的利益,他很客观地研究和评估着英国在西藏的实际地位和影响。当时日本朝野对西藏一直有很大的政治野心,希望它能成为又一个满洲。这是日本涉藏目的所在。在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和日本西本愿寺之间互相派遣的留学僧活动中,日本的留学僧青木文教、多田等观二人,"广泛地与西藏僧俗上层交往,刺探情报,并不失时机地给西藏僧俗上层灌输亲日思想,极力蛊惑、煽动达赖寻求日本的援助和保护,并扮演着日、藏双方联系人的角色",[①]矢野的这一研究正是当时的日本学术界为日本军部的战略意图服务的一个反映。

在对清史研究中,1771年发生的"土尔扈特人"逃亡事件,也是他的关注点之一。这是当时发生在中、俄两国之间有关民族问题的重要历史事件。

所谓"土尔扈特人",是我国蒙古族中一个古老部落。早在1628年,他们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环境,部族中的大部分人离开新疆故土,越过哈萨克草原,渡过乌拉尔河,来到了当时尚未被俄国占领的伏尔加河下游、里海之滨,建立起游牧民族的封建政权土尔扈特汗国。在以后的100多年里,土尔扈特人始终保持着与清朝政府的关系。到了18世纪60年代,他们又决心返回故土。关于这一问题,学术界一直争议颇多。何秋涛在《土尔扈特归附始末》

① 译文用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

一文中提出了俄国压迫说，魏源在《圣武记》一文中提出了抢占伊犁说……而矢野仁一则提出了宗教仪轨说。他认为：土尔扈特人从俄罗斯帝国再次长途返归大清朝，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土尔扈特人信奉佛教，而从俄国入藏熬茶礼佛又极为不便，这一宗教仪轨上的不便直接导致了大批土尔扈特人归清的现象。在具体的归清人数上，矢野仁一根据对当时文献史料的考证，他公布的数字是"有3.3万户迁离了伏尔加河，或者说有16.9万人"。[①] 这一详细的数字统计，和俄罗斯方面所发布的七八万人、十二万人，乃至二十七八万等说比较起来，真实而准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离开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人有十七万人，最后"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也就是说，只有约八九万人成功地到达新疆。

对史料进行精确的研究和考证，成了他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他和桑原骘藏对汉代张骞西行时每日具体里程的计算，都有相同的方法论研究意义和学术参考价值。

在他的那本《支那近代外国关系研究》一书中，他从上述对中葡贸易的研究开始，一直关注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而矢野仁一对于明代中国与葡萄牙的交通和商贸关系，成为他研究的开始。他在《明代澳门の贸易及び兴衰》[②]一文中研究了中葡交通史的大致经过。1511年，葡萄牙军队占领马六甲。1514年，葡萄牙人的商船始出现在中国澳门，进行着商品交易。1517年，葡萄牙商船抵达广州。早期中葡贸易交易的场所，他认为是在商船上进行的。因为受当时大明政权的禁海令的限制，葡萄牙商人的贸易只能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进行。这一研究很可能是受到了桑原骘藏对蒲寿庚的研究的影响所致。

第二，矢野仁一的政治史研究

1927年7月25日，据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上奏了著名的《田中奏折》，该奏折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该奏折核心主张是：

>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

① 矢野仁一《中国的鸦片问题》，《近代支那の政治及び文化》，弘文堂书房，1926年。

② 见《史林》第3卷第9期。

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①

这一奏折的真伪至今也是中日历史学界和政界争议的焦点之一。（所以，京都考证学派出身的我使用了“据说”一词。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这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和实际行动与《田中奏折》内容大致无二！因此，作为“文件的《田中奏折》”和作为“事实的《田中奏折》所预期而确实出现的后果”之间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这就难怪中国学术界对这一奏折的真伪问题上一直持肯定态度了。

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涉及矢野仁一，是因为当时他提出了著名的“满洲は支那に非らず”说。1928 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成名作《近代支那论》一书。在该书中，矢野仁一首先抛出了“满洲本来就不属于支那领土”、“支那如果希望完成新国家组织，就要抛弃满、蒙、藏等支那在军事和政治上所不能及又非其领土的边疆地区。”③他公然地主张：1905 年的《日清关于满洲的条约》还有秘密协定，该秘密协定中规定：如果中国不能保证满洲内外居民的安全，日本就有正当的权力与义务出兵满洲，来维持和恢复那里的安全。这就为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地区提供所谓的理论根据。

在此书中的《支那无国境论》和《支那非国论》两篇文章中，他力图阐述这样一种观点：中国不能称之为一个民族国家，因为满、蒙、藏民族和领土本来就不属于汉族和中国领土。如果要维持大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那也就根本没有必要去推翻什么满清王朝，因为满清和汉全是大中华民族概念中的一员。而一旦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也必须放弃以往的中央对边疆地区的军事和政治的控制。④ 根据我最近才阅读到的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叶碧苓同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中的记载萧一山在日本面会矢野仁一的一段历史史实：

经日本时，曾至京都东方文化学院拜访矢野仁一，矢野自陈己见，

---

① 1930 年，日本外务省向中国国民政府抗议，称田中奏折出自苏联情报部门伪造。当时中国也曾出版此书，该书 1932 年曾由唤民印刷书局出版。据说，《田中奏折》是台湾人蔡智堪 1928 年化装成修复古籍的工人，潜入日本皇宫书库秘密抄录而得。此说实多不可信。中日历史学界和政界对其真伪，一直争论不休。

② 我倒是想奉劝日本学者，一份文件的真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历史居然就是按照那份文件所说的那样发生了· ·这应该是值得日本学术界和日本政府认真思考和反省的！判断奏折的作伪并不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解脱词！这就是我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态度。

③ 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弘文堂书房，1928 年。

④ 《支那无国境论》，见 1921 年 12 月 25、26 日《大阪朝日新闻》。

认为："满洲事变后，满洲已不是中国的领土。"但萧一山予以反驳，提出："此说法虽然也有合理之处，但贵国如今以满洲为附庸对象，这又如何解释呢？"担任会谈翻译的吉川幸次郎追忆此事时，认为矢野对于萧一山的诘问，心中当有所感。①

后来，不甘示弱的矢野又为此特别撰写了《满洲は支那の完全な一部であるといふ支那の学者の主张を驳す》一文，来反驳我国历史学者对他的批判。

到了1932年，矢野仁一终于按捺不住了，他在《外交时报》上公开发表了他一贯主张的《满、蒙、藏は支那の领土に非ず》一文。此文并没有任何新意，但是却完成了从学术研究的"矢野仁一博士"到给日本侵华国策提供论点的"矢野仁一国士"之间的身份转变。他甚至还大声疾呼"我国应动员利用一切公私机关，探查中国、满洲、蒙古……有关历史及现状的说明和必要的知识，现今这项工作实在是当务之急"。②

为此，我想再次以叶碧苓同学论文的结论作为对这一问题的结语，因为在对矢野仁一这一著名观点的剖析上，她做得非常出色：

> 日本历史学者矢野仁一秉持近代日本之"大陆政策"，提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的理论，认为满洲、蒙古、西藏乃是中国的"边疆地方"，都是中国力之所不及的"特殊地域"。亦即"支那≠清"、"支那＝支那本部"、"支那＝汉民族之领域"。刻意将长城内十八省界定为中国（支那）"本部"与"满蒙藏"等边疆民族区域分割开来。从日本利益出发，定义"满洲"自古以来即为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地域，不在中国政治体系管辖的范围之内，使日本军部、关东军藉此理由对此区域展开军事侵略，扶植"满洲国"的成立，都是符合"王道建国论"。相对而言，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态度与立场当然与之对立。换言之，自古以来"东北"就是包括在中国的"疆域"之内，"东北"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东北史"研究就和"西北史"研究一样，都是定位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在仓促中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主要是作为说服国联李顿调查团的说帖。而从调查团的裁决结果来看，国际社会也认同中国方面的见解，说明此书已达到外交宣传的效果。这种经世致用的救亡图存思想，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国事蜩螗，而思报国之道的具体实践。不过傅斯年满腔学术救国的热情，却在

① 在同类研究论文中，这是一篇十分优秀的博士论文。我在此特别推荐给大家。

② 见《满洲の今昔》，目黑书店，1941年。

国内史学界出现了“学衡派”的严苛批评。撇开学派之争与民族主义情感的角度,这些评论也并非全是无的放矢。从学术的立场出发,欲致力于东北史研究的学者,的确需要将当时中日学者的论争,作全盘的认识、检讨,以为今后研究的基础,亦应对当时中日学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同理心”的角度看待。

第三,矢野仁一的东洋史研究

矢野仁一在《东洋史大纲》一书中,也在进行着变学术研究为国策研究的工作。但是,该书也多少表现出一些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比如,他主张:“支那的文化早在周秦汉晋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大致定型,此后经过唐宋元明清,几乎没有显著进展。”①其实,这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思想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认识的一种通识。而他自己不过是添油加醋发挥如下:“中国的文化,不过是模仿自己,即模仿自己古代的文化,因袭前代的文化。随着时代的推移,由于历代的模仿之模仿、因袭之因袭行为造成该文化日益退化。如今的中国文化……虽说是古代文化的遗留物,实质上只是前代文化的僵尸而已。”②

然后,他和内藤湖南“英雄所见略同”的也开始主张文化中心移动说:

> 支那周边诸民族,除我国外,都受到了支那政治文化势力的刺激和影响,而开始了民族活动、促使了文化的发生。而且虽然在政治军事上对于支那也有反抗,但结果还是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未能展开独立的政治文化历史。而惟独在我国,受了支那文化的刺激和影响,却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且和支那周边的其他民族不同,没有被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所压倒,而独自展开了自己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到了近世,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东渐,侵入了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圈,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刺激和影响力。……而我国由于西洋的政治文化势力的侵逼,却受到了非常的刺激而崛起,取代支那在其政治文化圈内发挥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势力,而且,对支那的政治文化势力圈之外的南亚、西亚、东南亚等各民族,也给以激发,唤起他们民族的自觉,使他们产生东洋与西洋对立的意识。③

---

① 矢野仁一《东洋史大纲》,目黑书店,1929年。

② 矢野仁一《东洋史大纲》,目黑书店,1929年。

③ 译文引自《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书,昆仑出版社,2005年。

1940年，日本外相正式提出了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新概念，并且首先确定了以日本、满洲、中国三国为核心的基本国策。于是，矢野仁一的东洋史研究又开始与时俱进了。他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在这一“大东亚共荣圈”下的大东亚史的问题。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水野正次出版了《大东亚战争の思想战略》一书，已经把纳粹德国的侵略思想和理论武装到了当时的日本思想界和理论界。

不甘落后的矢野仁一读后倍受鼓舞，到了1943年，他出版了他在这两年中的研究成果《大东亚史の构想》一书。此书无非是一名东洋史家对水野正次思想战略说所作的辅助说明而已。为了积极地配合当时的日本国策，由侵占中国东北的满、蒙地区变为要吞并全中国以实现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矢野仁一把以往的“支那史”和“东洋史”等概念，现在在矢野史学中全自动进化成了“大东亚史”的概念。经过两年的深思熟虑，加上水野正次思想战略说的鼓励，矢野仁一此刻的观点，已经和日本军国主义理论家北一辉、大川周明、水野正次等人完全一致了。

三、学术影响

实话来说，矢野仁一和中国学术界几乎很少有纯学术性质的交流。相反，因为他的一些反华主张，在解放前，使他时常成为中国学者笔下受批判的对象。比如，傅斯年先生就曾写文章批判矢野仁一的“满、蒙、藏は支那の领土に非ず”（满、蒙、藏非中国领土说）。并组织学者编写了《东北史纲》第一卷一书。该书1932年10月正式出版。陈槃先生曾评价此书说：“这部用民族学、语言学的眼光和旧籍的史地知识，来证明东北原来是我们中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一块地方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可以说，这本书完全是中国历史学界反击矢野仁一的“满、蒙、藏は支那の领土に非ず”说而写的。

最近以来，矢野仁一的史学研究开始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部分重视。比如，他对中葡贸易史的研究，他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他对中国满洲史和蒙古史以及西藏史的专题性研究，都已经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关注。

1964年，中国的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第16辑：“矢野仁一专号。”这是战后中国官方学术界注意到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开始。那个时候，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名日本蒙古史专家。

在日本学术界，他的弟子如宫崎市定和桑原武夫等人都先后写出来对他的相关记载和回忆文章。战后，因为他右翼的政治观点和积极主动的国

士表现成了日本战犯在学术界的典型代表而受到了批判和冷遇。

有关这一点，宫崎市定在《矢野博士の追忆》[1]一文中就有很真实的揭示：

> 矢野先生在日本军部有非常多的友人，假如把日本军部比作王道的话，矢野先生就如同是为了实现周文王那样的王道而考虑的（似姜太公一样的人物）。

这一评语和矢野仁一自身自觉的国士归属意识很贴切地统一在一起。

正如刚才我所说的那样，因为至今为止日本国内还没有出版《矢野仁一全集》，所以，对他的全面研究目前还有待于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但是，他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一代学者中唯一一个以近现代中国政治和外交作为一生研究方向的人，和以研究中国古典著称的京都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和美国的费正清几乎同时开始了对“中国研究”这一学科的创建。因此，了解他的学术研究传统和主要观点有助于理解京都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师承。在某种意义上，他和现代的新京都学派之间是“心心相印”的。或许，京都大学的现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设立，正是作为对他的积极投身日本政治、甘当国士的一个回报？

---

① 宫崎市定《矢野博士の追忆》，《中国に学ぶ》，中央公论社，1976年。

第五章
小川琢治和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小川琢治生于1870年6月26日，和歌山县西牟娄郡田边町人。本姓浅井。父亲浅井笃（南溟）是当时旧纪伊田边藩藩主安藤家的一名儒学教师。小川琢治是浅井南溟的次子，原名叫浅井琢二。后来过继给当地的小川家族。在成了小川家族的婿养子①后，名字就被改成小川琢治。

小川琢治的小学和中学时代是在和歌山学校渡过的。然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京英语学校。第二年参加日本海军学校的考试，不幸受挫。这次年轻时代从军志愿的失败为今后小川热衷于为侵华日军提供学术支持的行为找到了前后对应点。后来他转考和歌山第一高中。高中毕业后，1889年，他成了纪伊田边藩武士小川驹橘的婿养子。

1893年，他又参加考试，这次考取了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理学院）地质学科。

1896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又考取了该大学大学院，攻读研究生课程。第二年，他到日本的农商务省地质调查研究所任技术员。

1908年开始，小川琢治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新设的地理学第一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

1909年，他获得东京帝国大学理学博士学位。

小川琢治和晚清、民初中国学者的交往并不是很多。很可能是他的积极地为日本军政府服务的特殊背景使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退避三舍了吧？小川琢治一生多次来华，仅在20世纪的初期，他就几乎是一年一次来华，进行所谓的地理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我们中国学术界还时常提起他，

① 日本的婿养子类似于国内所谓的倒插门女婿，如内藤湖南博士的祖父也是婿养子。

那是因为有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个是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和开创了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工作，一个是因为他是著名东洋史家贝塚茂树博士、著名中国文学史家小川环树博士和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博士兄弟三人的父亲。如果只是上述两者中的其中一项的话，他是不可能成为中国学者口中的话题常项的。相反，很可能因为他的研究积极地参与了日本军政府的对华侵略行为，他要面临着遭受中日两国学术界对他的痛斥了。

罗振玉是小川琢治的好友。

1915年，罗振玉从小川琢治那里得到了敦煌文书《本草经集注》全卷的照片，并将其照片制版，编入《敦煌石室丛书》中影印出版。

王国维先生也是小川琢治的好友。

1917年8月，小川琢治到上海拜访王国维先生。他见王国维还保留着头上的辫子，就劝说王剪掉。王颇有些不快。王国维在给罗振玉的信中还特别提到此事："小川博士过沪见访一次，永以不出未能往答，因告以不出之由，彼云：'此甚不便，何不去此障碍物？'殊可笑也。"不过，通过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小川博士多少还可以和王国维先生直接说得上话，起码还没有人敢当面如此谈王国维头上的辫子。然而，王国维的一句"殊可笑也"实在意味无穷！

1920年，他当选为帝国学术研究会议会员（相当于我们所谓的学科评议组成员）。

1921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理科部地质学科讲座教授。

1926年，他当选为帝国学士院院士。

1930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

1941年11月15日，他因心脏病突然发作逝世。

小川琢治一生先后出版了《台湾诸岛志》、《人文地理学研究》、《支那历史地理研究》、《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地质现象的新解释》、《战争地理学研究》、《数理地理学》、三卷本的《中等地理学外国之部》等学术著作，被学术界尊为日本人文地理学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创始人。

除了学术声誉之外，小川琢治最让人佩服的是他的几个名声显赫的儿子，除了五子小川增树死于"二战"外，其他四个都是日本第一流的大学者。小川琢治和小川小雪结婚后，先后生育了五个儿子：长子小川芳树博士是日本第一流的著名冶金学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次子贝塚茂树博士是世界级的历史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三子汤川秀树博士则是日本第一个取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世界级大物理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四子小川环树博士

则是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兄弟数人同时成为世界级大学者，这在日本、在京都大学是绝无仅有的一例。

二、学术述评

1868年以后，西方地理学思想开始逐渐传入日本学术界。小川琢治成为新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地理学讲座的教授，很自然地把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引入到当时的日本。而这一职位的设立又是当时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主任教授内田银藏一手促成的。河野通博在《日本历史地理学家略论》一文中曾如是阐述说：

> 小川出自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学科，很早就从事中国地质调查，但由于其生长于和歌山县南部旧边藩的一个儒学者家庭，所以自幼习知四书五经等汉学经典，有较高的汉学素养，爱好中国古典文献。因此，作为文学部地理学科的指导者来说，小川自身具备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对中国学的深厚素养，是其他任何人也无法替代的，可以说是非其莫属。①

但是，我也想特别指出一点：因为他父亲的教诲，小川琢治对中国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并不陌生，相反却是十分的熟悉。浅井笃（南溟）的家庭汉学教育，也是贝塚茂树兄弟五人自幼就开始接受的传统汉学教育并走上汉学研究的决定因素。

小川琢治在地理学的研究上，又可以分成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地缘政治地理学研究和地理学理论研究三个方面。而和中国有关的则是前两项。

（一）关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

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出版了《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和《支那历史地理研究续集》等书，但是这两本书并不是系统的研究专著，按照日本的习惯，它们是小川琢治以往发表论文的合集，因此，这两本书也包括了对《山海经》、《穆天子传》和敦煌文书的几篇研究论文。我们分别加以说明如下。

---

① 译文用辛德勇文。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期。

(二)《山海经》和神话研究

在这类研究上,小川琢治先后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天地开辟和洪水传说》、《昆仑与西王母》、《山海经考》和《穆天子传考》四篇。而《山海经考》和《穆天子传考》篇幅之长其实就是两部各自独立的神话研究专著。他对《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的考证长篇论文,显示出了一名东洋史家深厚的学术素养和研究成果。

对《山海经》的研究,他先从对《山海经》的版本研究入手,对汉唐之间的各种传本篇目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已经是对中日传本的总结性研究了。然后,他利用古今各种传本的比较,开始了《山海经》错简和佚文的研究。最后又和《尚书·禹贡》进行相互引证,他得出结论说:

> 此经名实为名山道理记,即山川祭祀之指南记,既如毕沅所言。而其记载,以洛阳为中心,西为泾渭诸水之流域,即雍州之东部诸山。北自汾水中流以南,即冀州南部诸山。最为详密,殊于洛阳近旁,伊洛之间,及豫州诸山,极为精细。然于东方东南方诸山,能考定者极少,至于北方更少。观其所说山名之祭典,于五岳无特设之盛腆泰山与东岳无区别,唯记嵩山用太牢。凑合此等诸点而考之,则五藏山经之文,其在东州都洛阳时所者乎?从其志山岳及地名之得考定者,记事颇能正确者而推,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者与?①

其次是对《穆天子传》的研究,他首先对此书的性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 此书与《山海经》均未被秦以后儒家之润色,尚能保存其真面目与今日,比《尚书》《春秋》根本史料之价值为尤高,因此书是记录周室开国百年后之王者,与围绕此王者之百官之生活状态,颇能忠实。至欲知周室古代文化达于何种程度,除此数千言之一书,尚未有信凭之文献。②

然后,他详细考证了竹书出土的历史背景和相关史料,对整个《穆天子传》的形成史提出了他个人的见解。但是,最有价值的是他对《穆天子传》中相关地名的考证。他对《穆天子传》中出现的南郑、宗周、雷水、焉居、阳纡、积石、西夏等二十几个疑难地名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在日本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再如他对西王母人名和

---

① 《先秦经籍考》,江侠庵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

② 《先秦经籍考》,江侠庵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

地名一体化现象的考证，他主张：

> 今西王母，殆亦为西夏之缓音。显于汉代之大宛，想与西宛为同一民族，而比西宛更迁与远方者乎？《山海经·海外西经》无西王母国，而有女子国，想至战国时忘却有西夏、西宛，尚记有女子国。秦汉之间，匈奴自天山东边，攻略甘肃泉地时，岳氏因此而迁于西夏、西宛之西，迁后遂名为大夏、大宛。①

有些考证，涉及了历史语言学的范畴，显得很有创意。比如他对《穆天子传》中的八骏名称的考证，就提出了八骏名称由来的突厥语说。八骏名称，见《穆天子传》："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踰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这里的"盗骊"，其语音与突厥语称呼马的 toruğ一词十分相似，"盗骊"就是突厥语 toruğ的音译。一骏如此，则其他七骏也当出自相同的语言系统。现在，这已经成为日本汉学界的一个通识。有些研究已经超出了历史地理学范围，进入了古史研究领域。如小川琢治在《穆天子传·地名考》②一文中也补充说："《山海经·海内北经》所载'王子夜之尸，两手、两股、胸、首、齿，皆断异处'一句，仍为记述王亥之事，夜字为亥字之形讹，所记为王亥惨遭杀戮。"显然，这是受王国维先生的考证影响所致。

王国维先生 1917 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中详细考证为：

> 甲寅岁暮，上虞罗叔言参事撰《殷虚书契考释》，始于卜辞中发见王亥之名。嗣余读《山海经》、《竹书纪年》，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辞·天问》之"该"，《吕氏春秋》之"王冰"，《史记·殷本纪》及《三代世表》之"振"，《汉书·古今人表》之"垓"，实系一人。尝以此语参事及日本内藤博士，参事复博搜甲骨中之纪王亥事者，得七八条，载之《殷虚书契后编》。博士亦采余说，旁加考证，作《王亥》一篇，载诸《文艺杂志》。并谓"自契以降诸先公之名，苟后此尚得于卜辞中发见之，则有裨于古史学者当尤巨"。余感博士言，乃复就卜辞有所攻究，复于王亥之外，得王恒一人。案《楚辞天问》云："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又云："恒秉季德。"王亥即该，则王恒即恒，而卜辞之季之即冥（罗参事说），至是始得其证矣。又观卜辞中数十见之田字，从甲，在□中。及通观卜辞，而知田即上甲微。于是参事前疑卜辞之 [illegible] 回 回（即乙丙丁三字之在 [illegible] 或 [illegible] 中者，与田字甲在□

① 《先秦经籍考》，江侠庵译，商务印书馆，1929 年。

② 《先秦经籍考》，江侠庵译，商务印书馆，1929 年。

中同意),即报乙、报丙、报丁者,至是亦得其证矣。又卜辞自上甲以降皆称曰示,则参事谓卜辞之示壬、示癸,即主壬、主癸,亦信而有征。又观卜辞,王恒之祀与王亥同,太丁之祀与太乙、太甲同,孝己之祀与祖庚同,知商人兄弟,无论长幼与已立未立,其名号、典礼盖无差别。于是卜辞中人物,其名与礼皆类先王,而史无其人者,与夫父甲、兄乙等名称之浩繁求诸帝系而不可通者,至是理顺冰释。

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一文根据对卜辞中相关资料的考证,证明了《山海经》及《竹书纪年》等古籍中的该、核、胲、垓、鮌、冰、振等字是由"亥"字讹变而来。结合《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的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重新复原了郭璞《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所述的那段史事:"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緜臣也。"

在这一商代传说和历史人物的考证上,中日学者之间的互动和交流是很多的,也是很及时的。

(三)敦煌文书研究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

高田时雄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①]一文中也分析说:

> 1910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

① 高田时雄《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

回国后，小川琢治发表了《北支那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

1919年，小川琢治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于是，小川琢治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四）历史地理研究

小川琢治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古地名研究和神话研究。比如张骞出使西域时，《史记·大宛列传》记载："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这里所谓的"传闻其旁大国五、六"既有"南则大夏，西则安息，北则康居"的安息，也有"其西则条支，北有奄蔡、黎轩"等国。小川琢治博士考证出"条支"是Antiokia被省去An音后而形成的音译地名。而Antiokia也就是音译地名"安条克"，也就是两河流域南部底格里斯河口的安条克城。至今，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和赞同。

小川琢治以历史地理学家的视野，经常从中国古籍中发现出新的价值。比如，1910年，他在《地学杂志》第258号上发表了《近世西洋交通以前の支那地图に就て》一文，注意到《五岳真形图》的地图学价值。因为《五岳真形图》与现代等高线绘制的五泰地形图很相似。1928年，他在《〈山海经〉考》中推测《山海图》当是"据周职方氏所掌天下之图而编纂"，与中世纪欧洲的古地图相似，等等。今天，对地理学的研究表明：《五岳真形图》确与五岳的地形地貌有一致性，在《五岳真形图》中"黑者山形，赤者水源，白者是室穴口也。画小则丘陵微，画大则陇岫壮。葛洪谓高下随形，长短取象，其源画神草及石室之处，自是后来仙人辈于其图处尽识之耳。"已经达到了对地图和地貌的客观描述，具有了和地图同样的实用价值。

1921年，因为神田喜一郎[1]的大学毕业论文中大量引用《山海经》，这使得桑原骘藏看过极为不满，认为十分不严谨。这让我们联想到他对白鸟库

---

① 神田喜一郎博士是著名东洋史家、敦煌学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王国维的好友。我在日期间，他的儿子、著名东洋史家、满学家神田信夫博士对我多方照顾，关爱有加，让我十分感动！2003年年底，神田信夫先生也已驾鹤西去，让我倍感痛惜！

吉的类似批判。眼看神田喜一郎就要毕不了业,同为毕业论文审查委员之一的小川琢治及时地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不惜与桑原骘藏当场展开争论——足见桑原这个人对待学术是多么苛刻和认真!小川琢治以他和王国维先生对《山海经》的史料考证为根据,反驳桑原骘藏的质疑。桑原骘藏把《山海经》看成是中西交通史的古籍,他对那里记载的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和位置是极端表示怀疑和不信任的。而小川琢治则把《山海经》看成是历史地理学的古籍,他只要看到那里面的古代神话记载得到了印证,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史料作为历史地理学文献的可信性。于是,审查论文变成了两个审查委员之间的学术争论。一时间成了京都帝国大学的热门话题。实际上,小川琢治在《山海经的考证及补遗》[①]一文中即已经公开表明:"《山海经》一书远比一向认为金科玉律之地理书《两贡》为可靠。其于中国历史及地理之研究为唯一重要之典。"

其次是关于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

在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上,小川琢治则是日本侵略政策和军事行动的急先锋。他比京都帝国大学任何一位教授都更早地涉足于对华侵略的各项准备活动中。这让我们再次想到了他年轻时代从军的梦想。他的《论黄河下游平地之战略地理的意义》、《最近支那的历史概观和作为战场的地理考察》、《北支那黄土地域的战争地形考察》、《反映战争的支那地理特色》和《北支那大平原的诸战场及其地名意义以及读法》等论文就是他为日本军政府直接服务的地缘政治地理学论文。

1923 年,小川琢治编辑出版了《日本地图帖》一书。在该书中,他首先从地图上把整个钓鱼岛划归给了日本。而且,他还很狡猾地把这一地理范围统称为"南西诸岛",一个"诸"字则把这一带地理区域以逐渐膨胀的和范围不确定的模糊语言全划归到了日本一方。此书至今也是日本政界主张他们对钓鱼岛"享有主权"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

不仅如此,小川琢治还曾亲自出马,参加"满洲产业调查会",对抚顺、烟台等地的矿产资源进行所谓的"调查",为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时掠夺我国矿产资源进行先期准备工作。

到了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小川琢治又立刻展开了战争地理学的研究。1939 年,他终于给日本军政府贡献出了一部战时重要的"学术"著作:《战争地理学研究》。[②] 该书对中国黄河中下游的军事地理学意义有十分老

① 小川琢治《支那历史地理研究》,弘文堂书房,1928 年。

② 小川琢治《战争地理学研究》,古今书院,1939 年。

到的论述,对侵华日军的军事战略部署有着指导性的意义和价值。他还急不可待地写出了该书的第六篇《最近北支那战争的地理学考察》三章内容!特别论述了黄河流域的黄土地地理特点在战争中的存在价值和防御策略。

三、学术影响

小川琢治,作为日本的历史地理学、支那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开创者,自然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当时,他和东京帝国大学历史地理学先驱山崎直方博士,被学术界称为"东大の山崎,京大の小川"。比如,小川琢治关于注意到《五岳真形图》的地图学价值之观点,就得到了英国著名中国古代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的肯定。[①] 他说:"小川琢治曾注意到一幅很值得注意的泰山图,这幅图见于《五岳真形图》(作者姓名不详,现存有17世纪的版本)。从图中可以看出,这幅图中所用勾画山形的方法完全不逊于近代所用的方法。"1938年,王庸在《中国地理学史》[②]一书中引用了小川琢治博士的观点:"据日人小川琢治之考证,知吾国中古时期之五岳真形图为表示地势高下之地形图。"

但是小川琢治的地缘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也遭到了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对他的批判。侯甬坚先生在《小川琢治的战争地理学研究》[③]一文中就对小川琢治的这一研究进行了深入地剖析。鞠德源先生在《破解日本"南西诸岛"之谜》[④]一书的第十一章中也特别痛斥了小川琢治为日本帝国主义长期霸占我钓鱼岛提供理论根据的流氓行为。另一方面,小川琢治的地理学研究之间也是引起争议的话题。石田龙次郎先生的《山崎直方と小川琢治:东西两大学の地理学讲座创设まで》一文和水津一郎先生的《小川琢治先生とその后の日本における历史地理学》一文,以及冈田俊裕先生的《日本地理学史论》一书都曾肯定了作为地理学者的小川琢治博士对日本地理学建设的贡献。

其实,在研究方法上,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中,只有小川琢治的研究方法和论文风格是最中国化的,即,他是百分之百地使用中国传统的从版本学的研究入手,利用文字训诂学和地理学来考证文义。他所增加的只是西方的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而已。这是他和其他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

---

①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中译本,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

③ 侯甬坚《小川琢治的战争地理学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3期。

④ 该书尚未出版。

们的最大区别。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小川琢治在肯定和收买杨守敬《水经注疏》手稿一事上的作用。在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非常注重中国的古文献资料和著名学者的稿本的收藏。内藤湖南对章学诚《文史通义》稿本的收集、狩野直喜对崔述著作版本的收集以及他们二人对敦煌文献的收集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在历史地理学著作版本和手稿的收集上,京都帝国大学的教授也不甘落后。

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发内藤湖南的访中视察报告,第一次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抄本:

> 在我到达武昌期间,我到菊湾(即菊花湾)拜访了杨守敬的遗族,并且拜访了杨的高徒熊会贞。当我问起让我非常挂念的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一书去向时,熊会贞告诉我说他正在整理着杨守敬的稿本,两三年后就该完成了。说着他就拿出了两三页清钞本手稿让我观看。[①]

于是,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内藤湖南和小川琢治的委托,从上海到武昌拜访杨守敬的孙子杨树千和熊会贞二人,当时的翻译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②]一文中以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见过熊会贞的人",由上述资料来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说是不准确的。

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发表了《熊固之翁的追忆》[③]一文,文章中特别提到说"他让看了放在书桌上的手稿,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写的稿本都堆放在那里"。六七遍抄写之说也见于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书凡六七校"。可见此说不误。

此事后来由小川琢治的弟子森鹿三直接负责收购。

今天,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共计四函三十八册,原始抄本应该是四函四十册。但是,此抄本自当初传到日本之时就已经缺了两册,因此,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④]一文所言"抄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之说,实则有误。

具体提到森鹿三得到此抄本问题的是日比野丈夫在《杨守敬的〈水经

---

① 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

② 日比野丈夫《杨守敬の〈水经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同朋社,1977年。

③ 松浦嘉三郎《熊固之翁の追忆》,《东方学报》1936年第7期。

④ 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注〉研究》[1]一文：

> 武汉某人给森鹿三来信，说已经弄明白了《水经注疏》钞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他的介绍，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钞本的手写复本。于是，大喜过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这份钞本。几个月后，这份钞本就被逐渐地送到了日本。

正是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逐渐送达过程，所以才会有第27册和第28册丢失一事出现。而这里的所谓"武汉某人"只能在杨树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产生。因为这里的"武汉某人"既可以指"在武汉的某个中国人"，也可以指"当时在武汉的某个日本人"。[2] 又据陈桥驿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3]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谈及，说森教授生前曾亲口告诉他，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当时相互间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时，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这部抄本"。并不排除此说有为森鹿三开脱"盗取版本"的嫌疑。因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贺昌群教授已经点出了"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4] 连日比野丈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5]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计想盗取此书手稿的传说一直流传在中国"一事。不过至少可以说明《水经注疏》到了熊会贞定稿前后至少有了三套抄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处（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杨勉之处（后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会贞处（后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还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书凡六七校"。而又依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抄本《水经注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定为四十卷"。[6]

诚如是，则80卷本的《水经注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40卷本的定稿不过是个删节本而已。而80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从出售给

---

① 日比野丈夫《杨守敬の〈水经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同朋社，1977年。

② 我曾在2000年3月致函日比野丈夫博士，向他请教"武汉某人"的具体指代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答。不过，没有回答就等于有了回答，即说明我对"武汉某人"的指代分析是正确的。

③ 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④ 《影印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⑤ 日比野丈夫《杨守敬の〈水经注〉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同朋社，1977年。

⑥ 《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

森鹿三的这份稿本中可以猜测:被杨守敬的孙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或许不过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罢了。……这部抄本就是这样到了日本学者森鹿三的手中。1964 年 4 月到 1970 年 3 月的六年间,森鹿三曾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此抄本进行了专门研究。后来,他把此稿本送给了京都大学。

从小川琢治到森鹿三,他们连续多年跟踪终于收购了一套稿本《水经注疏》。有关这一版本的《水经注疏》,我本人在京都大学期间,曾经亲自研究数月,手摸目看,可以说极其熟悉这个版本了。也曾发表一篇研究论文,先附录如下,以供参考:

附　录

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概述

作者:刘正

前　言

杨守敬和熊会贞合著的《水经注疏》一书,先后修改和抄写多次,所以有关此书的版本问题,也就成了中外郦学研究的一大首要问题。一般地说,迄今为止《水经注疏》一书先后有五种抄本存世,即:第一种,日本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第二种,中国科学出版社 1957 年影印出版的钞本《水经注疏》。第三种,台湾中华书局 1971 年影印出版的抄本《水经注疏》。第四种,中国科学院所藏稿本《水经注疏》。第五种,武昌亚新地学社 1949 年所排印的铅字本《水经注疏》。尽管有的学者坚信《水经注疏》还有更多的抄本和稿本存在,但是,至少目前为止,只有这五种版本存世。以上五种版本中,又前三种版本大致完整,而后两种版本则只是各存一册而已。其中,第二、第三种版本在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先后出版,对于郦学的普及和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第一种版本由于长期流传和保存在国外,至今尚未影印出版,所以对它的实际存在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认定和提高。

笔者在日留学的十余年期间,曾先后多次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中心图书室,查阅和研究该抄本。又曾在日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博士后)研究员的身份,对该抄本进行了专业化研究。几年下来,可以说我对该抄本的每一页都进行过认真和仔细的研读。不仅如此,和此抄本

有关的中外学者的研究论文和借阅活动，我也略知一二。更为重要的是：在京都大学期间，我终于取得了一套此抄本的真实原大而又清晰无比的复印件。[①] 这使此抄本在中国和日本两国首次有了复印本存在。

与此同时，因为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若干不当介绍的误导，致使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抄本还有几点误解存在。现在，我将此抄本的详细情况概述如下：

一、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介绍

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共计四函38册，原始抄本应该是四函40册。但是，此抄本自当初传到日本之时就已经缺了两册，因此，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所言"抄本分装四函，共四十册"之说，实则有误。

现将这38册图书保存编号和每册抄本页数详细说明如下：

第一函收八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06到1951313，每册抄本页数分别为56、95、55、72、102、72、57、68页。第二函收十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14到1951323，每册抄本页数分别为82、79、57、21、58、64、59、78、39、17页。第三函收九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24到1951332，每册抄本页数分别为93、44、45、99、48、69、69、77、52页。第四函收十一册，现在图书编号分别是由1951333到1951343，每册抄本页数分别为61、55、55、69、32、50、70、62、63、58、84页。图书编号用章为长方形章，上一行刻有"京都大学"四字，下一行刻有图书编号。

从内容来看，此抄本缺第27卷和第28卷。因此此抄本只有四函38册。

现将每一册抄本的详细情况说明如下：

此钞本每一页按竖行抄写。每行25格，每半页八行。《水经注》原文一字一格，用大字。而《水经注疏》正文则两字一格，用小字。在每一页（即下半页）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大□□□"来表示，疏文字数以"小□□□"来表示。在每一卷最后一行上部，注有该页经文字数和疏文字数。经文字数以"经注□□□字"来表示，疏文字数以"疏□□□字"来表示。

全部抄本使用字数分别为：第一册用大字6957字、小字29021字。第二册

---

① 特别说明：复印此珍贵抄本一事，我多次请求复印均被那里的工作人员拒绝，因为珍贵的稿本是不准复印和借出的。但是，我采用特殊的渠道和方法才得以完整复印出来。复印一事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善本书保管员无任何关系。此是我个人行为，请不要为难善本书保管员。

用大字6884字、小字26400字。第三册用大字11282字、小字49422字。第四册用大字9730字、小字34311字。第五册用大字12352字、小字52389字。第六册用大字9577字、小字33012字。第七册用大字4744字、小字22659字。第八册用大字8803字、小字32429字。第九册用大字12022字、小字35873字。第十册用大字9689字、小字39499字。第十一册用大字7733字、小字26746字。第十二册用大字2821字、小字9104字。第十三册用大字8867字、小字26039字。第十四册用大字9021字、小字29271字。第十五册用大字8991字、小字24561字。第十六册用大字10781字、小字36361字。第十七册用大字5701字、小字17563字。第十八册用大字2119字、小字8088字。第十九册用大字11617字、小字47062字。第二十册用大字5999字、小字21462字。第二十一册用大字6261字、小字26418字。第二十二册用大字7593字、小字30916字。第二十三册用大字13778字、小字22818字。第二十四册用大字61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五册用大字9337字、小字33442字。第二十六册用大字10764字、小字36235字。第二十七册用大字7224字、小字23199字。第二十八册用大字6222字、小字20764字。第二十九册用大字7858字、小字25771字。第三十册用大字5891字、小字没有注明字数(显为抄写时所遗漏)。第三十一册用大字7431字、小字36795字。第三十二册用大字4886字、小字14001字。第三十三册用大字4998字、小字27663字。第三十四册用大字10004字、小字32026字。第三十五册用大字8876字、小字27499字。第三十六册用大字7745字、小字30704字。第三十七册用大字7028字、小字28658字。第三十八册用大字10985字、小字39500字。

经文顶格抄写,疏文空出第一格,自第二格开始抄写。第五卷第七和第八页的下半页有撕裂痕,但不影响最下面一格文字的认定。名为清抄本,但是在第四卷第70页下半页的第四和第五行上方留有陈旧墨点三处。从颜色看,和抄本墨色相近,可以断定为是抄本作者在抄写时所留。

在每一册卷首右下方都有用黑色钢笔书写的"森鹿三"三个字,名字是写在一个长方形印章中的,印章中预先刻有"寄赠"二字。这是京都大学在接受赠与图书时使用的一种固定印章。并非如陈桥驿教授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每卷首均有毛笔正楷'森鹿三氏寄赠'六字"。

所用的稿纸是浅绿色格纸。我仔细查看了用纸,不像是印刷出来的稿纸,因为每一页稿纸都在固定的位置上出现弯曲的格线,加之微微散出的油墨味,所以极有可能是用手绘制在蜡纸上油印而成的自制稿纸。

此抄本《水经注疏》的署名是"后魏郦道元撰　宜都杨守敬纂疏　门人枝江熊会贞参疏"。

此抄本最初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五代所长森鹿三博士个人收藏保

存，而后他本人把此抄本寄赠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并开始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保存。2000年4月开始，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下属的“东洋学文献中心”更名为“汉字情报研究中心”。于是，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室收藏的这一抄本正式移交给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字情报研究中心阅览室下属书库收藏保存。

以上数次变动，图书编号不变。

现抄本上留有多处修改和眉批，这是陈桥驿教授文中所没有提到的。或许是他时间匆忙没有看到吧。修改所使用字体和墨色，与抄本相近。通览修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形式：其一为增加标点，其二为修改抄本中笔误之字，其三为对个别用字进行圈点，其四为贴原稿纸重抄。从颜色和字体看，和钞本墨色和字体相近，可以断定为抄本作者所为。

眉批大多数使用铅笔书写，从第二十三册开始使用红色笔（即国内市场上的所谓红蓝铅笔，而非传统的“朱砂批”）书写。眉批内容也可以分为四种形式：其一为抄本内容进行删定，其二为对圈点的个别字进行解说，其三为考证版本，其四为对正文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眉批没有注明出自何人之手，但从使用的铅笔和书写字体来看，眉批内容肯定出自森鹿三博士之手无疑。

现将眉批部分内容举例说明如下：

如，第一册第一页下半页第二行，现抄本作“三字非也”。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三”字，并修改为“山”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山字非也”。再如，第一册第十一页下半页从下数第六字，现抄本作“东”字。森鹿三博士也是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东”字，并在此页天头部位加有如下眉批“要删。东字尚作西，或作西南”。这里的“要删”，是指根据1905年刊行的《水经注疏要删》一书。此书是定稿本《水经注疏》的前身，在此书中，“东”字作“西或作西南”。又如，第一册第十三页上半页第七行和第八行，先被原抄本作者修改后贴稿纸重新抄写为“字误当以也国东南登山”，又被森鹿三博士在字的左侧用铅笔圈住“也”字，并在此字旁修改为“此”字。即正确原文应该是“字误当以此国东南登山”。换句话说，眉批是森鹿三博士对钞本所作的校勘。

实际上，杨熊二人生前就已经知道稿本需要精心校勘。贺昌群教授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就曾说“据说熊会贞临终时，亦曾以此稿错误颇多，未经修改为憾”。

二、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的由来

最早提到此抄本问题的，出自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内藤湖南博士。他在1918年12月25日《大阪朝日新闻》上刊发的访中视察报告中第一次

向日本汉学界介绍了这一抄本:“在我到达武昌期间,我到菊湾(即菊花湾)拜访了杨守敬的遗族,并且拜访了杨的高徒熊会贞。当我问起让我非常挂念的杨守敬的未定稿《水经注疏》一书去向时,熊会贞告诉我说他正在整理着杨守敬的稿本,两三年后就该完成了。说着他就拿出了两三页清抄本手稿让我观看。”

1930年4月,日本人松浦嘉三郎受内藤湖南博士和小川琢治博士的委托,从上海到武昌拜访杨守敬的孙子杨树千和熊会贞二人,当时的翻译是程明超。前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以为“松浦嘉三郎可能是日本人中唯一见过熊会贞的人”,由上述资料来看,日比野丈夫博士的此说是不准确的。1936年11月7日,松浦嘉三郎发表了《熊固之翁的追忆》一文,文章中特别提到说“他让看了放在书桌上的手稿,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有六七遍修改抄写的稿本都堆放在那里”。六七遍抄写之说也见于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书凡六七校”。可见此说不误。

具体提到森鹿三博士得到此抄本问题的是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武汉某人给森鹿三来信,说已经弄明白了《水经注疏》抄本的去向,如果想要的话,可以通过他的介绍,为森鹿三搞到一份此抄本的手写复本。于是,大喜过望的森鹿三就支付了重金,希望能得到这份抄本。几个月后,这份抄本就被逐渐地送到了日本”。正是因为经历了几个月的逐渐送达过程,所以才会有第27册和第28册丢失一事出现。而这里的所谓“武汉某人”只能在杨树千、程明超、松浦嘉三郎三人之中产生。因为这里的“武汉某人”既可以指“在武汉的某个中国人”,也可以指“当时在武汉的某个日本人”。我曾在2000年3月致函给日比野丈夫博士,向他请教“武汉某人”的具体指代问题。遗憾的是没有得到他的任何回答。不过,没有回答就等于有了回答,即说明我对“武汉某人”的指代分析是正确的。

又据陈桥驿在《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一文中所言的“船越教授和我谈及,说森教授生前曾亲口告诉他,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当时相互间订有一项君子协定,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时,森不得以任何形式在日本出版这部抄本”。并不排除此说有为森鹿三开脱“盗取版本”的嫌疑。因为早在1955年7月出版的影印本《水经注疏》的出版说明中,贺昌群教授已经点出了“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加以压力”。连日比野丈夫博士在《杨守敬的〈水经注〉研究》一文中也提到了“日本人森鹿三千方百计想盗取此书手稿的传说一直流传在中国”一事。不过至少可以说明《水经注疏》到了熊会贞定稿前后至少有了三套抄本存在,一套保存在徐行可处(后为中国科学院所得),一套保存在杨勉之处(后为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所得),一套保存在熊会贞处(后为森鹿三所得)。除此之外,熊还是多次修改稿的唯一保存者。前引刘禹生的《述杨氏水经注疏》一文中就已经说了“书凡六、七

校”。而又依据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抄本《水经注疏》前言中汪辟疆教授之言“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原稿共八十卷。全赵戴诸家之说,悉皆载入。晚年觉其篇幅冗长……定为四十卷”。诚如是,则80卷本的《水经注疏》才是完整的定稿,而40卷本的定稿不过是个删节本而已。因此,所谓“熊会贞当年曾许森录出一部《水经注疏》的副本”之说,可能只是熊的一种托词。而80卷本的那部稿本,至今下落不明。我们从出售给森鹿三博士的这份稿本中可以猜测:被杨守敬的孙子所出售的那部稿本(即台湾中华书局出版的那部),或许不过是多次修改本中的之一罢了。其中,据李子魁教授所说“熊氏深虑稿本失传,许汉口华实里书商徐行可抄录副本”。则科学出版社那套稿本不是出自熊会贞的亲笔。李氏此说就和贺昌群的“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之说完全矛盾。

总之,这部抄本就是这样到了日本学者森鹿三博士的手中。1964年4月到1970年3月的六年间,森鹿三博士曾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对此抄本进行了专门研究,也许写在此抄本的天头地脚上的那些眉批就出自这一时候。而后,他又把此稿本送给了京都大学。

在2000年的上半年,我集中精力以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为基础,对比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出版的抄本《水经注疏》和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影印出版的抄本《水经注疏》两种版本的异同,进行了汇校研究,并写出了数万字的校勘笔记。中国学者阅览此抄本的时间之长,可以说无有过我者。在此先成此文,以就正于同道。

参考文献:刘孔伏、潘良炽《〈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明报月刊》1986年第11期。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影印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1957年。《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日比野丈夫《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第387页,同朋社,1977年。松浦嘉三郎《熊固之翁的追忆》,《东方学报》1936年第7期。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辑。

第六章
滨田耕作和考古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中国学术界对他的名字极其熟悉，很多学者一提起他就充满了敬意。他那充满霸气和神秘的目光紧紧地盯在从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那些荒山和古坟中挖出来的精美的青铜器、彩陶，乃至于残砖断瓦，他和瑞典的考古学家安特生博士曾经主持了我国近代考古学创始期的发言权……他就是日本考古学之父、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京都帝国大学第11任校长滨田耕作博士。

滨田耕作生于1881年2月22日，号青陵。大阪府岸和田市人。[①] 滨田耕作是大阪府警察署警察科长滨田源十郎的长子。他的祖上曾是岸和田藩著名的武士。因此之故，他自幼开始接受的并不是传统的汉学教育，而是日本传统武道的教育和训练。成年以后，他曾经说"中国的古书不可信"、"越看中国古籍脑子越乱"等等，假如要是明白他的少年时代出自一名武士家庭，本来是不怎么读日本古籍的，更不要说读很难懂的中国古籍了，我想多少可以理解他在掌握了考古学理论和实证态度之后对中国古书所作的抨击。

1886年，他在大阪市中之岛小学校读书。后来，因为他父亲工作地点的变迁，他先后在山形市、高松市、德岛市小学断断续续地读书。

1894年开始，他在大阪府立北野中学上学。

在此期间，1898年，一向喜欢行侠仗义的他，因为声援自己的好友与学

① 一说滨田耕作出生在"南河内郡古市村"，待证实。我在日本时，曾在"南河内郡古市村"居住三年，还真没听当地的日本友人向我这么介绍过他们曾有这样一位同乡。

校体育老师之间的矛盾冲突,[1]结果被学校开除学籍。他的父亲托了自己在警界的很多关系,终于把他转学到东京的早稻田中学,继续读书。也许,正是他身上具有的那种武士素养和武士道精神才养成了他的那种充满霸气和神秘目光的特殊气质吧?我一直这么主张。[2]

1898 年,中学毕业后,他考上京都市第三高中读书。

1902 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

1905 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专攻美学美术史。

1909 年,他成为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大学文学研究科美学美术史讲座讲师,主讲美术考古学。

因为受研究专业和考古调查的需要,滨田耕作多次往来于中国各地。从 1910 年 8 月开始,滨田耕作在此后的两年间多次到旅顺刁家屯古墓、牧羊城和老铁山积石塚等地进行汉墓的调查发掘。在此期间,他开始结识了很多中国学者,如沈兼士、马衡等人。

第二年的 10 月,滨田耕作再次率领考古队来到这里进行系统地考古发掘工作。这次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持续到 1912 年的 6 月。后来发表的考古报告滨田耕作《旅顺刁家屯古墓调查补遗》就是这次考古活动的记录。[3]

1911 年 10 月,滨田耕作再次带队对老铁山西北山脉三处积石冢进行考古发掘,这次考古活动中出土了石剑、石斧、石镞、白陶片、蛋壳黑陶片、陶杯、盂、罐、鼎、鬻、盆、豆、壶等大量文物。同年,为了调查运到北京的敦煌文物,滨田耕作等五人组团来到北京。而正是在此期间,滨田耕作却独自一人前往洛阳,进行考古活动。这是由于小川和滨田二人结束北京调查后,与其他团员分手单独活动的缘故。即,其二人于 10 月 6 日:"离京赴河南游览洛阳及龙门石窟,后又由北京归国途中赴奉天(现沈阳),参观了南满洲铁路沿线的抚顺、烟台、熊岳、瓦房店等地而拖延了归期。"[4]

1912 年 6 月,滨田耕作又带队发掘了旅顺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

1913 年,他从美学美术史讲座调到东洋史学讲座,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副教授。然后,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的考古学院留学,在著名埃及

---

① 据说滨田耕作冲上去把体育老师打了一顿。

② 对中国武术和内家拳法有着特别喜好的我,总能从滨田耕作的照片中看出他的武士道气质。

③ 见《东洋学报》1921 年第 3 期。

④ 《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 年。

考古学家彼特利(Sır Fliudses Petrıe)教授的指导下,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并专攻埃及考古学。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教授的继任者就是著名埃及考古学家惠勒(M. Wheeler)教授,他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留英期间的导师。夏鼐先生留学伦敦大学时,经常去拜见定居在耶路撒冷的彼特利(Sır Fliudses Petrıe)教授,从这一角度说,夏鼐先生和滨田耕作有同门之谊。

1916年,滨田耕作留学归国主持设立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讲座,这是日本学界第一个考古学讲座。

1917年,滨田耕作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第一讲座教授。从此以后,以他为核心,以梅原末治、水野清一、角田文卫、末永雅雄、小林行雄等人为骨干,形成了考古学京都学派。滨田耕作吸收了日本和英国的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并且多次前往中国和朝鲜等地进行实地考古学调查和挖掘,对日本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贡献重大。滨田耕作被学术界称为"日本近代考古学の父"。

1921年,北京大学国学门正式成立考古学研究室,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是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为了发展中国的考古学事业,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先生派人造访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教授滨田耕作。请他就北京大学考古学的发展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要求和京都帝国大学建立考古学合作关系。于是,滨田耕作建议先从美术史入手,以美术考古学作为北京大学考古学建设的基础。一时间,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美术考古学"成了考古学的代名词和热门课题。这应该说是滨田耕作对北京大学和旧中国考古学事业最积极的作用和影响。

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开始,日本政府为了侵略意图的全面展开,日益注意到了我国东北地区所具有的特殊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作用,于是,日本全国从上到下,论证东北地区满、蒙二族及其领地不属于中国固有领土的观点开始大量出现。诚如上述,日本陆军中将、战略理论家石原莞尔已经发言在先。于是,这股邪风也吹到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矢野仁一首先跳了出来,大肆鼓吹"满、蒙领土非支那"说,详细请见《矢野仁一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一章内容。

在考古学界,和日本右翼政客和军国主义分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滨田耕作也立刻关心起整个东北地区的考古活动了。1927年,由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出面牵头,约请北京大学金石学家马衡、沈兼士、朱希祖等先生,和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等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了所谓的"东亚考古学会"。具体牵线人是岛村孝三郎先生。当时,老练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桑原骘藏却首先表示:"和中国学者的合作,发展

前景不看好”。[1] 事实也果真如此，不到一年，因为中国学者朱希祖先生首先带头，不满日本考古学家的专横和“东亚考古学会”为日本军部服务的功利性，全体中国学者退出了这一学会。

1928 年，在东亚考古学会会长、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亲自主持下，发掘了东北地区的貔子窝、单砣子、高丽寨、牧羊城等地遗址。这是首次在我国进行的中日联合考古遗址发掘活动，对中国考古界的影响很大。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对整个东北地区的占领，使得对满蒙地区的考古活动成了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日常科研课题。一时间，满蒙考古成了日本考古的辅助和构成之一。

1931 年，滨田耕作当选为帝国学士院院士。

1933 年 5 月，滨田耕作亲自主持了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发掘。同年 7 月，在日军侵占赤峰以后，为了配合日本政界和右翼学术界的“满、蒙领土非支那”说的观点并给其提供所谓考古学证据，日本考古学界组织了一次别有用心的所谓“满、蒙学术调查团”，在朝阳、凌源、兴隆、承德、赤峰等地，对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实地考古调查活动。其中，该调查团成员八幡一郎在赤峰红山后发掘了数座方形石棺墓，发掘出了一批石器、陶器、青铜器。该团返回日本后，记载这些考古发掘成果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滨田耕作的极大兴趣。

于是，带着这一政治目的，1935 年 6 月，滨田耕作带队亲临赤峰，由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京都帝国大学考古队，主要成员有三宅宗悦博士、水野清一博士、三上次男先生、岛田贞彦先生、岛村孝三郎等七人组成，对赤峰红山后遗址进行了三个星期的大规模的盗掘活动。正是在这次考古发掘中，滨田耕作发现了史前红山文化的遗址。在日本驻华占领军武力和财力的双重支持下，所有考古文物，约计青铜器 14 件、陶器 16 件、骨器 33 件、玉器和石器 380 件，以及人和动物遗骨数十具和大量其他考古采集品全部被非法运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以后成了该大学考古学陈列室（后增大更名为考古学博物馆）的重要和核心藏品。从此以后，在考古学界，红山文化和滨田耕作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连带关系。后来，滨田耕作主持出版了考古报告《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2]一书。该报告详细地介绍了在赤峰发现的中国北方古代文化遗存，特别是它的彩陶与细石器共存的考古学文化

---

① 见宫崎市定《中国に学ぶ》，中央公论社，1986 年。

② 滨田耕作、水野清一《赤峰红山后——热河省赤峰红山后先史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 6 册，东亚考古学会，1938 年。

特点。滨田耕作把西辽河地区古文化遗存概括为“赤峰第一期文化”和“赤峰第二期文化”。

1937年开始,滨田耕作就任京都帝国大学第11任校长。

1938年7月25日,滨田耕作因病在京都帝国大学校长的任上突然逝世。死后被安葬在京都市著名的法然院墓地。

滨田耕作出版的学术著作先后有:《希腊纪行》、《南欧游记》、《通论考古学》、《百济观音》、《桥と塔》、《ミハエリス氏美术考古学发见史》、《博物馆》、《考古游记》、《东亚文明の黎明》、《天正遣欧使节记》、《考古学研究》、《日本美术史研究》、《考古学入门》、《东洋美术史研究》、《东亚考古学研究》、《青陵随笔》、《古物概说》、《支那古玉概说》、《陈氏旧藏十钟》、《泉屋清赏》等。

从1987年开始,同朋社陆续出版了7卷本的《滨田耕作著作集》。1989年,岸和田市教育委员会没有忘记他们这位著名的市民,他们整理出版了《滨田耕作日志》,一部出自滨田耕作他本人学生时代的学习日记。

二、学术述评

在7卷本的《滨田耕作著作集》中,有关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论著收录在第三卷和第四卷《东亚古代文化》中。实际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滨田耕作和东洋史研究有关的考古学论著几乎全有中文译本。他的主要学术成就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建立科学的考古学体系

滨田耕作是留学欧洲的日本考古学的祖师。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就是发源于那里,从对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和历史文献学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对埃及文明的考古研究的成功,则使英、法、德三国成为早期科学的考古学的学术基地。

在伦敦大学考古学教授彼特利(Sir Fliudses Petrie)博士的指导下,滨田耕作在考古学理论上的学术专著《通论考古学》、《考古学研究》、《考古学入门》、《东亚考古学研究》等则成了他把欧洲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到日本学术界的一个象征。[①] 这是他从事东洋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基础。樋口隆

① 在我留学日本期间,我曾很认真地选修了一学年的《埃及考古学》专业课程,任课的大参义一教授就是埃及考古学家。尽管我是他的课堂上唯一一个根本没去埃及参加考古发掘工作的研究生,但是,我的学科成绩还是被他给了“优秀”,只是因为我写下了详细的听讲笔记。

康博士曾经如此评述早期的创始活动：

> 真正开始把考古学当作学问来搞的是滨田耕作先生。滨田先生出身于东京大学美术史专业，曾留学英国，与夏鼐先生一样，师从伦敦大学的彼特利先生学习考古学。然后，为了将英国的考古学研究方法引入日本，最早在京都大学开设了考古学讲座。……滨田先生还完成了一部真正的考古学著作——《通论考古学》。这是一部首次将欧洲风格的考古学——英国的方法介绍到日本的考古学教科书。①

比如，在对中国古代玉器的研究上，滨田耕作的《支那古玉概说》②一书，他就力图为其建立科学的玉器考古学，尽管这一努力可能有失误之处。

在该书一开始，把玉器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作用和著录研究史进行了一番总结：

> 玉器和铜器皆是中国古代特殊的考古学的遗物，那惊人的技术在世界各国中不易找出同等的例子。玉器自古中国人以为瑞宝，其地位仅居铜器之次，但因玉器上记铭文字不如铜器之多，而样式变化亦少，故考古家之爱玩者亦较少。关于玉器的典籍，先有北宋吕大临之《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亦有玉器录入，但数仍寥寥。南宋龙大渊著《古玉图》一百之多，而图则谓为画家刘松年、马远、夏珪等名手所绘，卷帙虽浩瀚，而材料则极芜杂，多非可信据者，为可憾耳！其后元有朱泽民撰《古玉图》，亦为不足言之作！至清吴大澂出，成《古玉图考》四卷，可谓于玉的学术研究始着端绪。此书考证最为精到，吴氏将其自收集之宝物均图成之。

然后，他利用化学分析，把玉分为软玉和硬玉两类：

> 玉是什么？《说文》："玉，象三玉之连，其贯也。"但从玉佩之装饰视之，其质料之本无何等限制，究不如总名称之为宝石，恰如英语中之Jade。此Jade之意义包含蛇纹岩Serpertine石笔石Agolmotolite大理石Marble等，较切实的话说来，就等同之玉字。在矿物学上之软玉Nephite及硬玉Godeite是也。

这里，他把玉等同为"究不如总名称之为宝石，恰如英语中之Jade"之说，则明显有了西方考古学解释中国考古问题上的硬伤。故宫博物院研究

---

① 见《日本考古学的前瞻与回顾》，《东方文化》2001年第11期，第7页。

② 滨田耕作《支那古玉概说》，胡肇椿译，中华书局，1936年。

员、著名古玉学家杨伯达先生就曾批评滨田耕作的这一划分“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①] 在此基础上，他以产地、种类与加工法、玉器与石器、圭类、璧类、琮类、玉饰类、葬玉类、其他类九章内容，详细阐述了他的新式的玉器考古学理论。最值得注意的是葬玉类的研究。在这里显示出了他把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及风俗习惯研究相结合的特点。他主张：

> 古代中国人以为玉是天地之精，且为阳精的至纯之品，于是吞食玉屑以求长寿，假令人不免于一死的话，若把玉放在死者身旁也可令尸体不致朽坏。这种信念跟着道教的发达而更加显明，但按前所引《周礼·典瑞》有“大丧共饭玉含玉”一语来看，死者口中之有玉的含放，早已始于周时。……这类丧玉中最重要之品是含在口里的含玉——琀，从《古玉图》以来，大家早拟定它是蝉形的玉器……但口中为什么要含着这种虫形的东西呢？这理由一时间很难详为解答的。仅就蝉的特殊形态、鸣声和它仅在盛夏一个时间内出现，这几点在上代中国人或作有趣味的观察。形式上也早在三代铜器上发见了蝉蚊，有汉以后的冠饰、带钩等也有蝉的纹样刻上。更把它的翅翼形容为蝉纱，那蝉蜕出的情形用来作解脱秽脱的比喻等。这可知蝉在上代中国人思想与生活上发生很深的关系。

他又从考古器形图上绘制了琀蝉的考古图形，然后引欧洲汉学家 Laufer 博士的话说：“汉人从蝉的退脱复能成虫之义，因‘转生’而感悟‘再生’的道理，所以把蝉含在口中以寓 Momento mori（暂死）之意。”这就已经开始做着以考古解释古代风俗习惯的尝试。

在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上，他的《爵与杯》[②]一文也尝试着对古铜器爵和斝的造型和定名提出看法。他说：“中国古代之饮酒器中，最有特殊之形态，因之在古铜器之内具有最华丽的美术品形状者，名曰爵。……具以此器像雀形，表示能飞而不能溺。或如雀之少饮，而戒酗酒之意，惟此非说明爵之起源，不过其后付随之中国学者伦理的解释耳。”

当然，滨田耕作发现商周青铜爵的形状和西方古铜器有相似之处：

> 铜爵之形成，由汉民族在中国自为之与？抑采取其他民族之形式，或获得暗示与？此非容易解决之问题。惟吾人有宜讨究者，为一器物，即小亚细亚特罗耶城遗迹所发见之黄金之“舟形杯”是也。……凡见其

① 杨伯达《杨伯达论玉——八秩文选》，紫禁城出版社，2006 年。

② 滨田耕作等《古物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6 年。

实物者，无论何人，均能唤起其与中国之爵与杯有类似之注意。

到此为止，他似乎想为殷商铜器西来说提供考古学证据。但是，他也交代可能这只是一件孤立证据，并不能成为定论。发现殷商铜器和小亚细亚特罗耶城遗迹出土之铜器器形相近，这大概是此文意义最大之处。

第二，利用考古学证据，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在这方面最为有名的著作就是他的《东亚文明の黎明》一书。20世纪30年代，此书在日本和中国都曾有多种版本出版，其中，中文译本还有《东亚文明の黎明》和《东亚文明の曙光》的微小的书名差异。多个译本的同时出现，反映了此书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此书最初是滨田耕作在京都帝国大学和日本其他地方所做的考古学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整理成书的。此书的初稿曾分三次刊发在日本的《历史と地理》杂志上。

全书共收演讲稿13篇，如下：《序言》、《东亚的旧石器时代》、《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及其人种问题》、《彩绘土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殷墟的遗物与金石并用期》、《中国青铜器文化的极盛期》、《铁器的使用与所谓秦式的艺术》、《所谓斯基脱文化及其影响》、《汉代的文化》、《汉代文化的东渐与南满北鲜》、《南朝鲜与西日本的中国文化》、《原始日本》、《日本文化的黎明》。除了最后两篇题目上与中国无涉之外，其他文章全是有关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学研究论文。

滨田耕作在序中明确表示：

> 想从考古学上，以中国为中心，就朝鲜、日本即东亚的文化源流，基于现在的学术的造诣，有了如何的观察法，尤其是我自己的观察法如何，叙述一个大概。①

在《东亚的旧石器时代》②一文中，他列举了欧洲考古学家在中国北部和西部发现的大量的旧石器时代的工具，得出了下列结论：

> 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自中国北部到蒙古西伯利亚的地方，制作那与欧洲的旧石器时代中，其后期摩斯梯或奥利纳克期的石器相类似的器具的人类，在悠久的古代，曾经栖息过。

这篇讲稿是1928年出版的，但是一年后，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就震惊了世界考古学界，足可以见滨田耕作预言的准确。

---

① 滨田耕作《东亚文明の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1932年。

② 滨田耕作《东亚文明の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1932年。

在《殷墟的遗物与金石并用期》和《中国青铜器文化的极盛期》二文中，他在承认自己并不精通甲骨学的基础上，并不影响他对罗振玉的考古学和甲骨学研究给予的肯定。他说："我虽不能读，但据罗氏等的研究，其内容以祭祀、田猎等事为主。由此，可以知道当时的宗教思想与种种社会生活的状态，所以实在，当作中国古代史的文献，可以说是最古的东西。"①但是，他利用自己考古学的专长，对石器、陶器和青铜器进行了分类和器型学对比，这种科学的梳理工作，为建立规范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进而，他意识到了考古学在印证中国上古史上的突出作用，他说：

> 总之，殷墟……作为周以前的东西，在其性质上，毫没有什么差池，我们由此，可以说发见了联络中国的古典时代与先史时代的一个"环"。在这一点上，殷墟的发见，与在使联络希腊的古典时代与先史时代上的作最初的大贡献的休利曼的发见相比较，也没差异罢。

他郑重地表明：

> 在中国，在周、汉时代的灿烂的金属文化发现以前，中国既非无人之地，无论造成它的是汉民族或其他民族，总之，石器时代的文化在中国存在过，这是谁都能推测的。不但如此，近年来的倾向，求人类的初现地于亚细亚大陆的高原地，这更使我们在中国期望着最古的人类的遗物了。

他的这番话说完不到一年，中国考古学界的成就立刻就轰动了世界……在滨田耕作对东洋考古学的研究中，利用考古学来研究中国商周时代的制度史和风俗史，分析商周时代的宗教和思想，是他从事考古研究的一个中心主题。

当然，也无可隐讳，他的这一研究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但是在当时却因为过分主张中原文化和满蒙文化的差异性，为当时日本右翼学者的"满、蒙、藏は支那の领土に非ず"说提供了所谓考古学证据。不管他是有意而为之，还是无意而为之，他的考古学研究以及日本侵华期间他在日本军队支持下在中国各地强盗般的考古活动，更拉近了他与日本军部的关系。日本陆军中将、战略理论家石原莞尔早在1927年就曾声称："满、蒙并非汉族的领土，相反其关系与我国却很密切。"②而滨田耕作恰恰是从这时开始，集中力量从事中国东北满、蒙地区的考古活动。也许，他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

---

① 滨田耕作《东亚文明の黎明》，汪馥泉译，黎明书局，1932年。

② 《石原莞尔资料》，原书房，1967年。

误的地点，从事了错误的考古行为后，发表了考古学上结论正确的言论，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右翼政客和军国主义分子的错误……

三、学术影响

作为日本近现代考古学之父，滨田耕作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了日本，也影响到了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

已故哈佛大学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①]一文中曾经如此评价滨田耕作：

> 30年代到40年代的外国学者多采折衷的说法，即中国本土有人长期居住，但远在史前时代就受了西方文明的影响，而产生文化的进展。这种说法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日本的滨田耕作，在他1930年出版的名著《东亚文明の黎明》一书中，介绍了安特生根据彩陶而主张的西来说以后，作了如次的观察："那么彩画陶器，或此时的中国文化，何由而发生？换言之，这种陶器或文化，是随从具有这种陶器、文化的人种从西方进来的呢？或者是仅仅其文化技术，受了西方的影响呢？这是当然要发生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发现者安特生氏早就立说，谓这大约是具有和生产彩画陶器的西方各地一样文化的原中国人(Proto-Chinese)，当新石器时代从土耳其斯坦方面移动到中国西疆，入了甘肃而终于深入河南及其他各地，留下了那些陶器的。同是瑞典人语言学者高本汉，则谓中国人在产生这种彩画陶器文化以前，早已居住中土，制造了鬲式三代陶器；至于彩陶文化和它的民族，是后来从西方流入的。……我将安特生和高本汉两说比较，反而觉得高本汉说较善。依我的意思，中国人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已经住在中土，及其末期，乃有彩画陶器的文化，随同新人种侵进来。"

实际上，在对待中国文化的西来说这一问题上，滨田耕作还是比较慎重的。比如，他在《爵和杯》[②]一文中就曾很明确地主张："总之，此特罗耶之黄金杯与中国铜爵之类似，不仅不得否认，且与次述之中国耳杯之亲缘，亦得承认之。惟余以今日仅此一例，实无断定中国爵起源于西方之勇气也。不若谓为此系偶然的一致，将来当综合多种资料考察之，始敢断言。"他只是主张"关于铜和青铜的知识，就说是从西方传到中国，也是大可以有的事"，并

---

① 张光直《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2004年第1期。

② 滨田耕作《古物研究》，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

且认为在起源上可能存在着“铜或青铜的使用……至少在旧大陆,是发生于西方亚细亚的一个中心,传播到各地的……”这样一个结论。但是,这个结论是否成为定论,这是至今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不过,彩陶文化的西来说早已经随着对仰韶文化彩陶的考古发掘活动的展开和科研结论而宣告其彻底破产。在北京人、仰韶文化等考古发掘活动还没有得到世界学术界认可的滨田耕作时代,他的若干观点和结论都是在很谨慎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是我想特别表明的。

滨田耕作的考古学研究,建立在所谓“东亚文明”这一角度上。在使用“东洋”和“支那”概念为核心的时代,表面看起来,他的这一视野多少还具有若干进步意义在内。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他这一视野的提出客观上配合了当时日本政界和军界开始鼓吹“满、蒙领土非中国”说和“大东亚共荣圈”说,则他以“东亚”取代“支那”的概念,有形无形之中成了1936年日本政府制定《国策基准》的考古学证据,直接导致了1938年11月近卫文麿政府发表了关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考古学为政治的服务和互动关系得到了比较积极的配合和印证。甚至连他自己的儿子、正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的滨田稔,也成了侵华日军“中支那防疫给水部”的少佐——这是一支专门从事在华发动细菌战的特殊部队,日本战败后,滨田稔又回到京都帝国大学继续读书和研究,并最终成为京都大学农学部教授,“滨田稔少佐”一变而为“滨田稔博士”。滨田耕作的另一个儿子滨田敦博士是研究日本语言学的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曾经整理其父的手稿。滨田耕作的女儿,嫁给了著名中国古代文学家、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小川环树博士。滨田耕作、小川琢治、贝塚茂树、小川环树,再加上汤川秀树、滨田敦、滨田稔,看到他们这个大家族就几乎等于看到了京都学派的一多半精英了!今天,这个大家族的第三代也出了好几位大学教授和著名学者。

成了日本兵的考古学专业的学生和学者还有末永雅雄博士、江坂辉弥博士等人。而末永雅雄就是滨田耕作的考古学研究室的得意弟子之一。

直到今天,在日本最有名的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奖项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滨田青陵奖。”[①]由他亲自翻译的蒙特利乌斯(O. Montelius)《考古学研究法》[②]一书至今也是日本考古学研究的入门经典著作。因此,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和历史时期,有意也罢,无意也罢,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家们

---

① 该奖项一年评选一次,1988年由岸和田市和《朝日新闻社》共同发起,至今已经评选20年。

② 此书中文译本名为《先史考古学方法论》。蒙特利乌斯(O. Montelius)曾经大力支持过瑞典的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对华考古活动。《考古学研究法》,滨田耕作译,雄山阁,1932年。

的学术研究直接成了日本右翼政府的学术辅助。这是“学术的京大”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的现实。另一方面，滨田耕作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古代文学和历史的考古学研究，开辟了日本田野考古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体系，打破了前次以往的对古坟时代的日本文化进行纯粹的研究的传统，把佛教建筑和碑刻，乃至于古钱币和古人类学全引入到了日本考古学领域，使他赢得了更高的荣誉和学术影响，他能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和他的这些考古学成就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和本书的研究范围无关，我们就不作任何介绍了。但是，这些学术上的成就并不能阻挡和掩盖滨田耕作在考古背后的为日本军国主义理论提供考古学证据的错误行为。坂诘秀一先生就曾专门写有《太平洋战争と考古学》[1]一书，探讨这个问题。该书就专有《大东亚共荣圈の考古学》一章，显然主要是针对滨田耕作的东亚考古学的政治目的而来的学术反省和批判。近藤一郎、森浩一等先生也有相关的论文公开发表。

① 坂诘秀一《太平洋战争と考古学》，吉川弘文馆书店，1997 年。

第七章
羽田亨和敦煌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羽田亨生于1882年5月15日,京都府京丹后市峰山町人。他本姓吉村,父亲叫吉村和。他是吉村和的第四子。上中学时代,他成为羽田家的养子,从此正式改名羽田亨。

根据间野英二博士的介绍:羽田亨自幼就非常聪明,享有神童的美名。不到14岁就已经成为当地小学的教师。[①] 当时,他的愿望是成为一名记者。

为了实现他的梦想,1901年,羽田亨放弃了在小学教学的工作,考入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学习,以求深造。

190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在白鸟库吉的指导下,开始了对支那边疆史和民族史的学习。他的外语天赋在这个时候就开始显现出来,他几乎把业余时间全用在学习各种外语上。导师白鸟库吉本来就是个精通数种外语的东洋史家,现在,聪明的羽田亨对外语的学习兴趣和对东洋史的研究兴趣同时得到了发展。东京帝国大学的学术环境和严格教育为他走上专业化的历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7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毕业,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的文化。然后,他离开东京,直接考到了刚刚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成了那里内藤湖南门下第一个东洋史学的研究生。[②]

---

① 间野英二《羽田亨》,见《东洋学の系谱》,大修馆书店,1992年。

② 至于说为什么他没有直接考母校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权威白鸟库吉博士的研究生,笔者疑惑很久,也曾多方查询,一直苦无让我满意的答案。莫非是白鸟博士向他推荐京大的元蒙史研究水平更高?可是1907年时候的内藤和桑原两博士还没有在这方面的力作,当时,东大的兼职教师那珂博士才是名震中外的元蒙史专家。在当时的日本,东大的本科毕业生却离开东大去考其他的大学或帝国大学,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异常的事情。

1909年，羽田亨从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了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讲师。

目前为止，羽田亨访华的最早记录是1911年。羽田亨和内藤湖南到达沈阳，专程为给满文老档照相而来。他们使用当时所谓“晒蓝”的复制方法，一下子复制了4000多张满文档案。这次经历使他尝到了占有中国珍贵文献资料的甜处。以后，出现他秘密收购敦煌文献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1911年前后，罗振玉全家来到日本，那时还是讲师的羽田亨经常造访罗振玉。年轻的他对长辈的罗相当尊敬。甚至他经常利用造访罗家的机会，教罗的小孙子们几句日语。见方宝川《刘蕙孙教授学术传略》[1]一文中介绍：

> 刘蕙孙，谱名厚滋，字佩韦，祖籍江苏镇江。1909年7月出生于北京。是晚清《老残游记》小说的作者刘鹗的嫡孙，甲骨文研究的开创者、近代学术大师罗振玉的外孙。辛亥革命后，刘蕙孙与父母一起随外祖父罗振玉寓居日本京都。其间，罗振玉以学者的身份得到了京都大学的关照。当时，日本学术界早著名的一些东方学教授，如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人，经常到罗家，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讨论学术问题。因刘蕙孙是罗的外孙，且天资聪颖，为长辈所珍爱，所以也常常静静地坐在外祖父的身旁。虽然年纪尚小，听不懂所讨论的学术问题，但是那种恬静严肃的学术氛围，已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最初的印象。据他后来回忆说：教他学会第一句日本语“早安”的人，就是当时常到罗家旁听学习，后来成为京都大学总长的羽田亨教授。

1913年，羽田亨因为杰出的外语才能受到当时京都帝国大学语言学讲座教授新村出博士的赏识，于是，羽田亨转任京都帝国大学的语言学讲座副教授。[2]

1922年，羽田亨获得京都帝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按说，他肯定也在那里经常地向王国维先生请教。因为那时的王国维

---

① 方宝川《刘蕙孙教授学术传略》，《学林漫录》第14辑，中华书局。

② 虽然同在一个学部，但是更换教研室的现象还是比较异常的。按照当时日本的习惯，羽田亨似乎应该不会迟到1913年通过更换教研室才获得副教授的职称吧？从资历上说，1913年之前和他同为文学部讲师的就有富冈和滨田等人，矢野更比他早一年由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在当时的日本，同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几乎可以立刻出任教授或副教授，而羽田亨却等待了四年还无望，成了个老讲师，于是，在新村出博士的赏识下，本来该留给自己学生的副教授职位和工作机会，新村博士送给了年轻的羽田。这或许就是他离开东洋史讲座的真相吧？我是这么考虑的。

先生已经开始了对元蒙史和商周史的双重研究。而且,当王国维先生自杀后,羽田亨也亲自出席了在京都举行的悼念活动。我们在《王静安先生殉节纪念帖引》中也发现了当时到场的人员中也有他的大名。[①] 同年,已经是副教授的羽田亨,以文部省国费留学生的身份,再次来到沈阳,他开始跟随一名藏族喇嘛学习藏语、蒙语和满洲语。

胡适先生自美国返回路过日本时,也曾和他有过接触,见《胡适日记》1922年2月12日:

> 日本学者小柳司气太邀我吃饭,席上见着京都大学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为东洋史专家,通数国语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纪年考》等书。他新从欧洲回来,携有敦煌石室影印本四千余卷,将次第印行之,此极好事,我们都应该感谢。

1924年,羽田亨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②]

1928年,羽田亨当选为京都帝国大学学科评议组成员。

1932年,羽田亨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长。

1936年,羽田亨再次来到沈阳参加东方文化协会中国分会机构的成立大会,并在那里短期停留。在此期间,他还亲自应友人金毓黻的要求,为他前往日本申请签证。见金毓黻《沈阳蒙难记》[③]一文中的记载:

> 24年春,余母吴太夫人年七十有九,弃养于辽阳,余假奔丧守制之理由,常任辽阳,即将所修通志结至清末,草草编成,而出走之计亦定于是时。余于逻骑如织之中,何能私自出走?且出境须有凭证,否则一经察觉,则首领不保矣。适值……羽田亨等过沈,余早与之相善,乃托其向日军部商洽,谓金某研究东方学术及东北文献为吾等所敬佩,应其准赴日留学2年,以收联系之雅,竟借其力得以无阻。

实际上,羽田亨很少和中国学者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他当了京都帝国大学教授、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京都帝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官"以后,直至后来当了京都帝国大学校长,就连日本学者平时也

---

① 《王静安先生殉节纪念帖引》,《艺文》第8号。1927年。

② 这一讲座本来就是常年空缺的,罗、王二人不想当,别人想当而又得不到文学部教授会的支持。而羽田博士得到这一职位后又和矢野博士分享,成了一个讲座双教授制度。看起来,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的校长和文学部长对羽田博士的学问是很赞赏而大开绿灯的。就连自己的导师、名满天下的内藤博士也要亲自说出"在元蒙史和外语上,我不如羽田博士"那样的话来。

③ 《静晤室日记》卷62。

觉得他让人感到了一种“畏惧感”。[1] 这无非就是说他身上的官气太重，难以接近。再加上他和旧日本军部和外务省高层之间有很深厚的私人交情，使他的著名学者兼政府高级官员的形象十分浓厚和突出。

1938 年 11 月，因为前任校长滨田耕作的突然逝世，羽田亨被文部省任命为京都帝国大学第 12 代校长。

正是在羽田亨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校长期间，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们数千人参加了日本军，利用他们各自的学术专长，成为侵华日军战利品部队和细菌战部队的一员。

2006 年 6 月 10 日，现任京都大学校长尾池和夫博士在《京都大学文学部创设百周年纪念》讲话中说：

> 1943 年 11 月 20 日，羽田亨校长在地域预备队学生入伍践行式上如下说：“各位，安心走吧，再平安归来，大学的门一直为你们开着，在等待着你们。”……根据大学文书馆的调查，在学生入伍仪式上，京都大学有 4500 名在校生成为了日本军人。其中，文科的学生将近八成全都成了军人。后来确认有 260 名学生死在战争中。

特别说明：

> 臭名昭著的 731 细菌部队的负责人、杀人恶魔石井四郎就是 1920 年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毕业生！他生于 1892 年 6 月 25 日，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人，石井四郎兄妹 4 人，他是次子。1916 年，他从千叶第四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医科大学。1920 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大学毕业。1921 年，他参加了日本陆军。1924 年，他以代培军事研究生的身份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专业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1927 年，石井四郎以有关防疫学的论文获得了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在当时的日本，能够获得京都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意味着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职位已经是顺手可得的事了。可是，石井四郎并不想成为专业的医学教授，而是热衷于细菌对大规模人体的攻击性研究。从此走上了邪恶的杀人魔鬼的不归路！九一八事件后，他向日本军部提出建议：应该加快把细菌转用于武器的研究。此建议获得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的赞赏和支持。于是，石井四郎成为细菌部队（即 731 部队）的创建人和首领。战败后，为了逃脱法庭审判，他伪装病死，并让其家人公开为他举办了丧葬仪式。但很快被当地美军识破。后

---

① 语出间野英二。

来，通过和驻日美军高层谈判，以交出全部细菌战试验资料作为免除对其战犯审判的条件。于是，他终于逃脱了对他的战犯审判。晚年，他因为细菌战杀人魔鬼的经历遭到了当地善良的日本民众对他及其家族亲属的冷淡、白眼和指责。此时，面对战败的现实和他在日本家乡的亲身感受，他终于逐渐找回了他曾经有过的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和道德观念。成千上万的中国老百姓死在了他那双邪恶的手上，出于良心的谴责，石井四郎正式皈依了基督教，并且长期免费为当地儿童和老年人治病。1959年10月9日在家中病死。当时响应羽田亨校长的指示参加侵华战争的人中，成为731细菌部队下属一员的还有滨田耕作的儿子滨田稔！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使石井四郎从一名科学家成为战争野兽！顺便说一下，石井四郎在医学上的最大贡献是发明了人尿过滤装置，可以成功地从人尿中分离出盐分，使人尿变成可饮用水。然而，就是这个装置居然成为日军在没有淡水支持的硫磺岛上对抗美军包围的重要的生存设备！在邪恶的年代，任何科学的发明都会成为邪恶的辅助。石井四郎成了京都大学医学部永远也迈不过去的一道沉重的门槛！

1943年，羽田亨当选为帝国学士院院士。

1945年，羽田亨出任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

1952年，羽田亨获法国儒莲汉学奖。

1953年，羽田亨获日本文化功劳者称号和文化勋章。

1955年4月13日，羽田亨因病逝世。羽田亨之子羽田明教授也是一位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京都大学教授、文学博士。

在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创始时期，羽田亨和他的两位老师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共同打造出了世界闻名的史学学派。而他作为东洋史学的两个分支元蒙塞外史和西域中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利用他精通十几种外语的语言特长①，建立了一个巍峨璀璨的西域学京都学派。特别是在内藤湖南、桑原骘藏两博士退休和病故之后，正是由于他的存在，使第二代学者②宫崎市定、田村实造、贝塚茂树、佐泊富、安部健夫等人在学术界迅速崛起，他

① 十几年前，笔者曾经对羽田亨的论著中出现的语言和文字进行过统计，发现羽田亨掌握的语言和文字种类除了日文、汉文之外还有英文、德文、法文、俄文、土耳其文、蒙文、文语、藏文、梵文、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回鹘文、突厥文、契丹文，共17种。后来读了间野英二的《羽田亨》一文，他统计的是12种。以上，请大家参考。

② 中日学者几乎全不提羽田亨和铃木虎雄二人才是最早的第二代弟子这个事实，大家共同倾向于把他们二人划归第一代创始人之例。足见他们的地位和贡献之大远在所有第二代弟子之上。

们共同创造了辉煌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羽田亨先后出版的学术著作有:《西域文化史》、《西域文明史概论》、《满和辞典》(主编)、多卷本《敦煌遗书》(主编)、18 卷本《明代满蒙史料》(主编)、《内藤博士还历祝贺支那学论丛》(主编)等,有些论文几乎就是一部独立的专著,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后人为他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卷本《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

二、学术述评

羽田亨的学术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元蒙史的研究,第二是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第三是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上述三个方面中,毫无疑问,西域史和敦煌学研究是他的学术事业的核心和顶点。

(一)首先是羽田亨对元蒙史的研究

我们知道,元蒙史的研究实际上是羽田亨起家的本领。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蒙古窝阔台时代の文化》。在他成为一名东洋史家之后,他一直没有忘记对这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清朝中后期的西北舆地之学的振兴,为研究元蒙史提供了新的起点。《皇朝藩部要略》、《蒙古游牧记》、《西陲总统事略》、《新疆识略》、《西域水道记》等相关学术著作的刊印,为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家们提供了最为直接的文化师承。

羽田亨首先在对中国古典元蒙史料文献的整理上迈出了一大步。他指导学生田村实造博士完成了多达 18 卷本的《明代满蒙史料》一书。他又先后撰写了《蒙古驿传考》、《元朝驿传杂考》、《元朝の汉文明に对する态度》等著名论文。而这些论文表现出一种对元蒙文化制度史进行专题研究的倾向。

请看羽田亨的名作之一的《元朝驿传杂考》[①]一文中的相关考证:

> 《元朝秘史》卷十二所载,漠北施行驿传制度时,已置札木臣及兀剌阿臣于各驿。所谓札木臣者,其为 Jamcin 换言之,即掌握驿务之人之名称,固不可待言也。兀剌阿臣为 ularaoin,ulaoin 之对音或作兀剌赤(ularaoi,ulaoi),ulara 为驿马,ci 系管护人之接尾语,其意不外驿马人。初似来自土耳其语,后讹为蒙古语。

① 羽田亨《元朝驿传杂考》,何健民译,《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 6 卷第 4 号单印本。

如此考证之后,则札木臣及兀剌阿臣的意思已经涣然冰释。再如他对《经世大典·站赤一》中出现的"脱择能干官一员充脱脱禾孙"一语的考证:

> 置脱脱禾于都会关要之地,以辨诘奸伪往来之使臣或押运。沙畹(Chavannes)氏尝解此语与 Todotkhaktchi,即"说明者"(Explicateur)同源语,而白鸟博士为解 Toqtora,即"定"或"止"义而加语尾 - Sun 之对音者,并谓似因此等官员止问往来人,故名。上引二说,均似有理,然余今从其职责上考之,以为 Todotra,即系"使之明了"(Deutlich machen, aufklaren)之语源而加 - Sun 之接尾者。此名见于史乘,如前所述,自中统元年始,然在《经世大典》中,前亦屡见验使臣之记事,是以吾人不妨为从前已置驿长及驿令人。①

我想,通过以上两例已经足以说明他的元蒙史研究的特点和贡献所在了。即这些研究在史学方法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大量使用。因为元蒙史研究的难点就在于语言文字的繁杂和混乱,涉及地域的广博和史料记载的残缺更是问题之问题。但是,掌握了十几种语言文字的羽田亨,在从事这一研究中可说是得心应手了。其他如该论文中对"首思"一词的解读和文化制度史的考证研究,无不如此。

在他的名作《西域文化史》②一书中,他也对蒙古研究列有《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专章进行讨论。他首先分析了蒙古政权占据西域地区的由来:

> 中央亚细亚地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归蒙古所领。成吉思汗将所属领地分封诸子。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沙漠之北,前乃蛮部所据之地分给了第三子窝阔台。其西一带直到阿姆河地区和天山南路分给了第二子察合台。这样中亚细亚为此两汗国所领有。他们此后在各自的领地上使其一族和部下住下来进行统治。从而蒙古族也像在其他领地一样广泛分布在这一地区。

然后,他特别分析并研究了蒙古贵族出身的帖木儿王朝建立政权振兴蒙古统治的过程:

> 帖木儿是个生于 Kesh 并受突厥文化教育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本来是蒙古族出身,按其家系与成吉思汗属于同一氏族。他的理想是统

---

① 羽田亨《元朝驿传杂考》,何健民译,《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6卷第4号单印本。

②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一分裂的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他的这一理想曾大致实现过：平定了波斯的伊儿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开拓之领地）和伏尔加河直到南俄的钦察牙国（成吉思汗孙拔都开拓的领地），征服了据有小亚细亚的奥斯曼突厥，侵略北印度，与东察合台汗国连和，死在要进而东征明朝的路上。帖木儿一代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经略，实为历史上的一个伟观。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崛起于萨马尔罕即两河地方的势力。古来这个地方未曾出现过以此为根据地的强大势力。在这点上应看作为历史上的异例。从当时形势来看四周无特别强大的势力，他从少数部落酋长中崭露头角时，虽曾遇到一些困难，但一旦统一了两河地方，羽翼丰满之后，就没有能对抗他的强敌。另外，帖木儿之所以能完成其伟业，还因为他作为蒙古族的后裔怀有恢复其祖先故业的大志。所以他的活动自然应算作蒙古族的活动史中。

他还肯定了帖木儿在国中废除波斯语的行动对弘扬突厥文学的贡献："帖木儿本人虽为蒙古族系出身，但如前所述，他和其属下都早已突厥化，是成长在突厥文化中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们知道，帖木儿很羡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并以恢复其大业为己任。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虽然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值得重视。由于帖木儿所持的态度和方针，该王朝时代遂成为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期。"就是他在研究这一问题之时，也注意到了"敦煌出土的唐代汉文基督教经典中已有大概为粟特语音译的二三个名词，它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看起来，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使他随时能有所发现。羽田亨博士的这一研究特色，在元蒙史学界立刻形成了一股风气，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入手，对元蒙史进行文化制度史的研究和解读从此以后成了中外元蒙史学界的一个重点研究路数。

（二）其次是羽田亨的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

羽田亨的西域史研究和他的敦煌学研究是紧密地结合成一体的。他在这方面所下的工夫远远超出当时包括狩野、内藤、滨田等博士，也绝非探险家的大谷光瑞氏所能及。我们试分为几小点分开说明：

第一，羽田亨对敦煌文献的收购

日本人接触敦煌文献，羽田亨并不是最早的。但是，他却是收获最多的。当敦煌文物被晚清新疆巡抚何秋辇负责押运到北京后，没有马上直接交付清朝的学部，而是却先被直接运到了何秋辇在北京的家中。狡猾而老

练的贪官何秋辇把敦煌卷子中那些篇幅较长的，截割为数段以充数。于是，何秋辇本人手里就掌握了大批珍贵的敦煌文献。而这些被他私自截留的珍贵文物后来又被他的子女们秘密地出售给了专程来华寻宝的羽田亨。

不仅如此，对中国珍贵文献的搜求和占有已经成了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家们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日常工作”了。每一个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家们的手上，都曾经利用合法手段和非法手段双管齐下，占有过中国珍贵的文献资料和传世文物。本书中所披露的就有从红山文化玉器、殷墟甲骨文物、敦煌文物、宋元善本直到稿本杨守敬《水经注疏》等等。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和其他日本的著名大学之间甚至展开了收购和占有中国珍贵文物的拉力赛……1935 年 12 月《中央时事周报》上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一文，神通广大又深明此道的羽田亨并不甘心落后于他人和这个难得的掠夺中国文物的时代，于是，他在日本企业界有实力的老朋友三岛总裁和武田总裁这两位大企业家的丰厚的财力支持下，羽田亨出面亲自考察验证后，委托某位在华日本商人①全数代为收购了著名藏书家李盛铎家中的敦煌文献，然后保存在著名的杏雨书屋。② 而这两位财界大老，后来又出巨资在京都帝国大学建立了豪华而典雅的羽田亨纪念馆。

相关报道，请见《南方日报》对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教授的采访——李冀《苦寻十五年，李盛铎旧藏大宗敦煌文献日本露形迹》③一文：

> 1990 年左右，荣新江在已故日本汉学家羽田亨的史学论文集中偶然看到，其中一件经卷的照片上赫然盖着李盛铎收藏印。1991 年春天，在日本学者高田时雄的陪同下，荣新江走进了京都大学羽田亨纪念馆。他看到了 933 张羽田亨生前研究敦煌的文献资料照片，照片上，相当多的敦煌卷子上有李氏的收藏印……荣新江回国将匆匆抄录的印文以及一些卷子的题目和北大馆藏目录一一比较后，坚定了自己的判断——羽田亨是接触过李氏旧藏的人。……1996 年，在《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一书中，荣新江提到在羽田亨纪念馆中的所见，引起了日本敦

---

① 具体收购接洽人和上述两大财团之关系，因为当事人已故，至今仍是日本学术界的秘密而难下定论。这些文书的保管者杏雨书屋更是一言不发。

② 方广锠《敦煌遗书三题》：“李盛铎的敦煌遗书，则是 1910 年敦煌遗书奉命解京时，串通押运人员窃取的。李盛铎死后，他所收藏的 400 余件敦煌遗书精品，由其后代拿到日本兜售。经过著名敦煌学家羽田亨的鉴定，全部入藏杏雨书屋。其后，杏雨书屋又通过其他途径陆续增加收藏，现收藏总数已达 700 多号，成为日本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单位。”《吴越佛教》第 2 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年。

③ 2006 年 9 月 26 日《南方日报》。

煌学权威、东京大学池田温教授的注意，他立即去羽田亨纪念馆考察，又抄录了一批照片中的文献，比较研究后认定，这确实是敦煌卷子的真品。几乎同时，另一位日本学者落合俊典从京都大学牧田谛亮那里得到了意义重大的一部羽田亨手稿——《敦煌秘籍目录》。这本目录共著录敦煌文献432号，和北大李氏旧藏目录完全对应！随后落合又根据《敦煌秘籍目录》封桶内保存的书信线索，揭开了李盛铎旧藏敦煌文献流落日本的谜团。原来，1935年李氏藏卷为一日本企业家购得，交给时任京都大学校长的羽田亨研究。"二战"后期，为了躲避空袭，这些敦煌文献被运到兵库县多纪郡大山村西尾新平宅第的地窖中秘藏。战后又被运回了这个企业家自己企业附属的研究机关中存放至今。

②羽田亨对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的研究

因为羽田亨的研究特点就是先从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入手，因此，他的论著对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的研究，有其突出的贡献。而他自己在论著中也曾经对欧洲的这一研究方法进行过如下总结：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面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中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Iran与Arya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之名下。于是，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之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这一点，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之摇篮地。如波特（Angust Pott）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地方为此民族之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Max Müller）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印度—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作印度—欧罗巴语的

语言简呼之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的理论,并因语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而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但已有此等诸语言的方言胚胎的语言。①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对欧洲的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的由来基本已经有了初步了解。而这正是羽田亨论述简洁而清楚的特点所致。当我们看到东京帝国大学的白鸟库吉、羽田亨的大学时代的导师也是位精通十几种中国边疆地区和中亚地区的语言和文字的历史学家时,就不难看出羽田亨在大学时代接受白鸟库吉指导的痕迹了。②

西域和中亚地区语言文字种类繁多,而且解读十分困难,因为不少语言文字已经人去楼空,成了死文字。比如,著名的《郎君行记碑》,那上面使用的文字究竟是何种文字,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到了1925年,羽田亨发表了《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第一次揭示出《郎君行记碑》上所刻文字是契丹文字,不是以往所以为的女真文字。他的这一结论在解释了部分碑文内容之后成为定论。从此,契丹文字的研究开始走进了学术界。

在如对西藏历史和语言的研究上,羽田亨对《序听迷诗所经》名字"序听"即景教的"耶稣"的解读,也是具有重大启发性的。有关这一问题,可以参见佐藤长博士在《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③一文中表达的一段定评如下:

序听迷诗所经(以下简称序经)。此经为日人高楠顺次郎博士所藏。全经共一百七十行,每行约十七八字,是所有景教经典中最古的一篇,大约在景教入唐后不久,奉唐太宗之命写成的。经文文字晦涩难解。根据东洋史权威羽田亨的说法,此经的题名"迷诗所"的"所"字为"诃"字的误字,所以"迷诗所"应为"迷诗诃",即景教惯用的"弥师诃",是默西亚的音译。"序听"的"听"字可能是"数"或"鼠"字的误字,全名应为"序鼠弥师诃"即"耶稣默西亚"(序鼠或序数即经文中

① 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② 津田左右吉《白鸟博士小传》,《津田左右吉全集》第24卷,岩波书店,1963~1966年。

③ 佐藤长《日本西藏历史研究的起源和发展》,向红笳译,《国外藏学译文集》第12辑。

的移鼠，Jesus 的音译）。全经的主要内容是从新旧约圣经讲解基督宗教的教义。

公元前 128 年，当汉代张骞到达月氏时，提到了那里的都城所在地。但是该地具体位置，一直难以知晓。羽田亨博士认为该城名字在发音上与“坎塔（kanda）”很接近，而“坎塔（kanda）”就是“马尔干达（markanda）”的缩写，只是省略了前面的“mar”。

③羽田亨的敦煌学及其对西域文化史和宗教史的研究

在占有了很多第一手文献资料之后，羽田亨利用其掌握的十几种外文和珍贵文献资料立刻展开了对敦煌学的高水平研究。[①]《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吐鲁番出土摩尼教祈愿文の断简》、《回鹘文の天地八阳神咒经》、《回鹘文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大月支と贵霜》、《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论著相继出版和发表。这些论著为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

羽田亨的经典著作应当首推《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又称《中央亚细亚的文化》）二书。这两部学术专著至今也是这一领域的学术经典和入门必读之书。羽田亨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二书，由弘文堂书房分别在 1931 年和 1936 年出版。有关此二书的经典译本如下：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钱稻孙译，钱氏私人出版，1931 年。羽田亨《西域文明史概论》，郑元芳译，商务印书馆，1934 年。羽田亨《中央亚细亚的文化》，张宏英译，商务印书馆，1935 年。羽田亨《西域文化史》，耿世民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1 年。

《西域文化史》一书共有前后两篇，前篇有 11 章，内容如下：

原序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西域的民族》
第三章《西域史的曙光》
第四章《亚历山大的东方经略与巴克特利亚及安息》
第五章《民族的移动》
第六章《汉之西域经略》
第七章《贵霜王朝》

---

① 我在京都大学期间因为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西周金文和历史地理，对于敦煌学及其相关文献，除了收集并研究过日本几位敦煌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备汉学史研究之需要之外，很遗憾我对此没有进行过任何调查，特此说明如上。日本著名的敦煌学家池田温博士是位对我有很多教诲和帮助的老朋友，但是他远在东京大学。对此问题感兴趣者，请直接参阅《草创期の敦煌学》一书。

第八章《嚈哒、突厥之活动》
第九章《唐之西域经营与伊斯兰教势力之东渐》
第十章《回鹘的西迁》
第十一章《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
后篇一书共有十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西域与希腊文化》
第二章《粟特人与商业》
第三章《粟特语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诸种语言》
第四章《西域流行的各种宗教及其典籍》
第五章《宗教美术》
第六章《西域与汉文化》
第七章《回鹘的西迁与西域文化》
第八章《突厥族与伊斯兰教》
第九章《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
第十章《其后之概观》

《西域文明史概论》一书共有十一章，补充一章，内容如下：

一《西域的形势》
二《东西交通及西域》
三《古代西域人种》
四《西域的宗教》
五、六《佛教美术》》
七《西域中的汉文明》
八《汉人的西域经营及西域文明》
九《回鹘部族转往西域》
十《回鹘时代的西域文明》
十一《结论》
十二《补正三则》

近年来，国内学者耿世民曾将此二书包合在一起，以《西域文明史概论（外一种）》作为书名，由中华书局翻译出版发行。但是，却没有了“十二《补正三则》”内容。这两部书中，羽田亨的《西域文化史》一书以罕见的学识和考证功夫、加上精炼的语言，向学术界描绘出了一部西域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宗教信仰的发展史。在此，我略作介绍如下：

在《西域文化史》一书的开始，羽田亨博士先对“西域”的地理位置及其

和中国的关系进行了定位：

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但所谓中央亚细亚地区在学术上并未划出一定的界限，有的学者指出有广、狭二义的区别。我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通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从而此名称所包括的地域，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Lop nor)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东突厥斯坦(Turkestan)，即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流入伊塞克湖(Issik kul)、巴尔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湖(Ala kul)等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犁、准噶尔盆地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Chu)、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咸海(Aral)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南面以昆仑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为限。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Richthofen)曾用此名指诸水成潴不通流的亚细亚大陆盆地地方，大体包括南从西藏高原北到阿尔泰山脉，西从帕米尔分水岭东到黄河分水岭及兴安岭山脉地区，而帕米尔以西注入咸海、里海诸河流域则与其余地方一起划入其周围地区。我从历史研究的立场出发，把这一周围地区的一部分也包括进来。这一地区东面为中国东部、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所包围，处于亚洲诸大势力之中央，应自成一区。……因为如前所述，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或为中国、波斯、印度诸国所占有，或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占据之地所包围。从地图上一望可知，位于其中央的这一地区绝不具备出现强大国家的自然条件，古来也未兴起过以此地区为根据地的大势力。……中国古来曾多次对所谓狭义上的西域进行经略，正如象当时经世家所说，保有此地，除了能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贡物外，还便于攻掠中国内地。

然后，他开始讨论这一地区的民族问题。他发现：

时代越在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由于对该地进行发掘所得语言、绘画、骨骼、头盖骨等材料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为亚利安种族所居住，这是没有疑问的。

而这里出现的“亚利安种族”，汉代开始称他们为乌孙族。到了唐代，颜

师古曾经描述他们的形象是："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羽田亨就此判断说："无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兰人种。"

但是，在这些民族之中诞生的"贵霜王朝"和班超的交往成了当时的重要事件：

> 当贵霜之翕侯丘就卻时代，灭了其他四翕侯，自号贵霜王，更并有安息及其近傍诸国。到了其子阎膏珍时代，又灭天竺，益发强大起来。此吐火罗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即西方纪录中的 Kushan 王朝，著名的迦腻色迦王即此王朝之人。……但当班超从事经略天山南路时，它曾援汉讨车师，又在永元二年(90 年)出动大军攻班超，结果以败北而告终。以后与汉通好。这大概为前述丘就卻或阎膏珍时代之事。这时因康居、乌孙都各据原来之地拥有势力，贵霜朝之势力在北方大体以妫水为限。与班超之接触似为从葱岭之西方或南方之进行的前哨行动。班超南越葱岭出入辛头河上流地方应为对领有该地的贵霜势力之行动。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其势力遂越过葱岭而达于天山南路。

围绕着这一地区先后出现的嚈哒、悒怛、突厥的种族的历史和交通，羽田亨以罕见的史家才能，简洁综述了随后出现的民族和历史，及其文化特点。然后又集中精力研究粟特人与商业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和影响。他认为："在中亚细亚的曙光时代，曾发挥了旺盛的伊兰民族精神的粟特人，此后可能由于受到不断入侵的北方民族的压迫，遂利用其自然地理环境，从事于广泛的世界贸易，凡利之所在，没有不留下他们的足迹的。"

在对商业活动进行充分研究之后，羽田亨又开始分析了这一地区的语言和宗教信仰问题，特别是佛教和摩尼教(也包括了拜火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这一地区传播和发展的历史。由此，中亚地区错综复杂的民族和语言及其宗教信仰等问题，到此开始逐渐清晰起来。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沙畹、伯希和、罗振玉、王国维、陈垣等中外学者都曾先后介入其中，而最初以沙畹和羽田亨二人分别撰写的对摩尼教的研究论文为其先导，功德无量。

到了本书后篇，羽田亨开始对汉和西域的关系进行总结。这可以发现从汉到唐之间的显著变化。即：

> "中国对西域的统治方针，汉代以来常为表面的，不过是为了防止该地归于北方游牧人势力，保证中国与葱岭以西地方交通贸易的安全。达到了这个目的后，对其实际政治并不进行深入的干预。"而从唐代开始，这种局面就开始改变了。即："这种情况到了唐代为之一变。至少

在天山南路的西域地方唐朝官吏直接深入地干预了当地人民的政治。这从新出土的诸种文书中可看出。……到了晚唐以后，此地文化的汉化色彩逐渐显著，明显有了东西融合的趋势。”

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羽田亨博士主张人种的变迁。即：“因为这时的西域人已不是中唐以前的西域人，即不是亚利安种系统的人种，而是没有高度发达文化的、对唐和伊斯兰文明一样亲近的突厥族的一部回鹘（Uigur）人了。”

（三）最后是羽田亨的中西交通史的研究

在《西域文化史研究》一书中，羽田亨首先指出了这一地区在中西交通史上的特殊意义：

> 中央亚细亚，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中亚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极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历史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传播情况，是历史上最有兴趣的现象，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言而喻，是以相互间的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的。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对当中西交通之初，和前后开拓的蒙古地方与西方交通而言，无疑也是经过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的历史也具有很大的意义。

羽田亨对《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古代中亚旅行记进行了认真的版本学和文字异同的考证工作，并且亲自编写了文字索引。为中西交通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信史。

三、学术影响

羽田亨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敦煌学和西域史研究。

正如滨田耕作有以他个人命名的考古学奖项一样，羽田亨也有他个人的专属纪念馆。间野英二博士的上文中对此评价说：“现在在京都北郊上贺

茂,在地近羽田住所处设有附属京大文学部的羽田纪念馆(内陆亚细亚研究所),其促进内亚研究的基金出自羽田教授的亲友三岛海云、武田长兵卫等人的捐助。由学界外的朋友捐资,为一位学者创建这种纪念馆还是罕见的。"①尤其是他的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该文作者指出:"羽田亨毕生精力投诸之所在,尤其在敦煌学的研究方面,他称的上是先驱。早在1910年,他发表了《伯希和中亚旅行——敦煌石室遗书发现始末》一文,指出敦煌所现的新史料意义之重大。他精心研究了大谷探险队带回的李柏文书,撰写了诸如《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说》等享誉日本国内外的论文,而他在此基础上所写的《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更被公认为里程碑式的著作。"②

在中国学术界,《西域文明史概论》和《西域文化史》二书,我们从上述的一本书有多个译文同时出版的现象也可以看出羽田亨的影响了。除此之外,羽田亨的重要论文,如《元朝驿传杂考》、《契丹文字之新资料》等也立刻被翻译出版。

再如,羽田亨对契丹文字的研究。1925年,他的《契丹文字之新资料》一文的发表,对著名的《郎君行记碑》的研究,成为契丹文字研究的新的起点。而以往学术界却一直主张《郎君行记碑》的文字是女真文字。从此以后,中日两国学术界的研究就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煊、田村实造、小林行雄、长田夏树、爱宕松男等学者对契丹文字的解读,从文字构造到读音等方面的研究,使死的文字成了活的契丹学。当然,也有些观点未必是定论,一直引起了中外学术界的讨论。如,蔡鸿生《胡名试探》③一文中就曾指出:"羽田亨博士高才卓识,但他将'拂耽延'一名拿来与持摩尼经入唐的波斯人'拂多诞'(Furs-todan,即'知教义者')比附,是智者千虑之失。其致误之由,即在对'延'字之不可易未能觉察。当代粟特学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拂耽延'……意为'第一件礼物'"。张承志先生《从象牙塔到吐鲁番》④一文中也曾记载了羽田亨在《回鹘文女子卖渡文书》⑤一文中把"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的硬伤。但是,这也未必就是定论。因为羽田

① 间野英二《羽田亨》,见《东洋学の系谱》,大修馆书店,1992年。

② 间野英二《羽田亨》,见《东洋学の系谱》,大修馆书店,1992年。

③ 见《仰望陈寅恪》,中华书局,2004年。

④ 张承志《从象牙塔到吐鲁番》:"日本西域学术泰斗羽田亨曾发表《回鹘文女子买卖文书》,后来被严厉驳正。因为他把葡萄园(borluq)一词误读成了女子,买卖问题变成了奴隶问题。"见《读书》20周年合集。

⑤ 羽田亨《回鹘文女子卖渡文书》,《东洋学报》第6卷第2期,1916年。

亨的学生护雅夫博士主张那是一件葡萄园卖渡文书。[1] 而根据古代史料记载,买卖西域女子的事件在当时非常多。唐诗中就屡见“胡姬”、“胡女”、“胡姬酒”等术语。应该都是对于这一买卖现象的一个辅助描写。北京大学考古系林梅村教授的《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权贸易》[2]一文,对此问题有很好的阐述。看起来,在对这件文书的解释上,中日学者还在顺着羽田亨博士的成果继续研究着。

但是,无可置疑的是,在西域史和敦煌学的研究,在中亚历史和语言的研究,在中西交通史的研究等方面,羽田亨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① 护雅夫《ウィグル文葡萄园卖渡文书》,《东洋学报》第42卷第4期,1960年。

② 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权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

第八章
铃木虎雄和支那文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铃木虎雄生于1878年1月18日。字子文,号豹轩,别号药房。新潟县西蒲原郡吉田町人。诗人、歌人、著名汉学家。祖父是铃木文台,是当地有名的汉学家,后来开设了专门教授汉学的教室长善馆。铃木文台和日本著名的学者僧人良宽是好友。父亲是铃木惜轩,铃木虎雄的妻子是著名思想家陆羯南(一位著名的新闻记者、报纸发行人和政论家)的次女。

在如此深厚的家学背景下长大的铃木虎雄,自幼就开始进入长善馆学习作诗,从汉诗到和歌,后来他无不精熟此道。结束了在家学习的小学生活后,1888年,他考入了东京英语学校初等科,学习英语。那个时代,学习英语已经成了当时的风气。

两年后的1894年,他又考入东京府寻常中学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入了东京第一高中。

1897年,铃木虎雄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他梦寐以求的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同学中有日后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宇野哲人博士。①

1900年,铃木虎雄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卒业后,来到了陆羯南主办的《日本新闻社》任记者。也正是在此时,他结识了陆羯南的女儿,并开始同她建立恋爱关系。

1902年,他成为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兼职教师。这时,他和老板陆羯南女儿的恋爱却一直遭到了陆羯南的反对。为此,他又来到《台湾日日新》报

① 宇野哲人、宇野精一、宇野茂彦祖孙三代皆东京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毕业生、文学博士,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权威学者。我只和当时任名古屋大学教授的宇野茂彦先生有过通信和电话联系。

社当记者。在他和陆羯南的女儿结婚后，在昔日的东京帝国大学的老同学的帮助下，他出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从此开始了在大学的教书生活。陆羯南本人其实也是位汉学家。当年他到中国旅行时，曾经亲自拜访了著名学者刘铁云，并且刘还把自己的著作《三代瓦豆文》和《秦汉瓦当文》赠送给了他。

1905 年，铃木虎雄晋升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

1908 年 12 月，在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的学长、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学长狩野直喜的推荐下，铃木虎雄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的副教授。从此，他正式走入了一流的学术研究殿堂。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11 月，王国维先生携家眷随罗振玉东渡日本，暂时居住在京都。铃木虎雄认识了王国维。铃木虎雄在《王静安君を忆う》[①]一文中说："我知道王静庵君是在他《戏曲考原及曲录》问世的时候。读过这本书后，我在《艺文》上介绍了其概要。后来，他避乱我国，侨居京都，此时我们初次订交。"尽管他们二人相识比较晚，但是，毫无疑问，他是王国维先生最亲密的日本友人之一。王国维先生的论文一般多是由他翻译成日文发表的。以至于王国维先生在 1912 年 5 月 31 日给他的来信中还特别表示感谢。[②] 为此，王国维先生专门给他写了答谢诗，感谢日本学者的高情厚谊。在王国维先生的诗中还对日本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表示肯定和赞赏。而王国维先生也亲自给他注解沈增植先生诗稿中出现的全部人名字号……在京都的那些日子，铃木虎雄和王国维先生之间的来往非常密切。铃木虎雄自己也承认"他寓居京都田中村的时候专心于词曲研究，当时我也起了研究词曲的念头，屡次敲他的门，领受教诲。"甚至是"难解之处，时时乞教于王君。"[③]

1916 年，铃木虎雄作为日本文部省国费留学生来华留学。当时，他已经是京都帝国大学的副教授了。

到了 1917 年，铃木虎雄到达上海后，他和王国维先生的密切来往又一次展开："我到中国留学，大正六年末在上海勾留半年，其间我又频繁与王君来往。"[④]正是在这次的来往中，铃木虎雄发现："在与王国维的谈话中我发现，

---

① 译文引见《追忆王国维》，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年。

② 《王国维全集・书信》："《简牍检署考》承展大笔译为和文，甚感厚意。唯近复有补正之处，别纸录呈，仍乞附译为祷。"中华书局，1984 年。

③ 译文引见《追忆王国维》，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年。

④ 译文引见《追忆王国维》，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年。

他甚少推许别人,但独对在上海的学者,他极推赏沈子培曾植先生,称其学识博大高明。一天,我跟王君一起拜访沈先生。"①于是,铃木虎雄的中国交往录中就又增加了一名大学者沈曾植先生。除此以外,王国维先生还介绍他认识了阮庵、况夔笙等先生。铃木虎雄本人承认:"我从王君那里得到的启发不限于词曲一事,关于书籍、清朝典故、社会风俗、日常琐事等等受益处不胜枚举。"②看起来,铃木虎雄博士和王国维先生相互之间是诗人和学者的双重理解。

1919年,铃木虎雄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并且成为新设立的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二讲座的教授。于是,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的双讲座制度由此正式定型。

1938年,铃木虎雄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

1958年,铃木虎雄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称号。

1961年,铃木虎雄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

1963年1月20日因病逝世。

常年的勤奋笔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写下了上万首的汉诗。其中,当日本政府主张废除汉字并规定了汉字的使用数量时,铃木虎雄当即愤怒地写下了这首《七律·癸巳岁晚书怀》:

> 无能短见愍操觚,标榜文明紫乱朱。限字暴于始皇暴,制言愚驾厉王愚。不知书契垂千载,何止寒暄便匹夫。根本不同休妄断,蟹行记号但音符。

诗写得很有韵味,比内藤湖南的古体诗要好得多!

铃木虎雄的汉学研究著作数量庞大,著名的就有《支那文学研究》、《支那诗论史》、《赋史大要》、《豹轩诗钞》、《禹域战乱诗解》、《骈文史序说》、《白乐天诗解》、《陶渊明诗解》、《陆放翁诗解》(上、中、下)、《玉台新咏集》(上、中、下)、《李长吉歌诗集》(上、下)、《杜诗》(全8册)等。③

二、学术述评

作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杰出学者,和史学有关的研

---

① 译文引见《追忆王国维》,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② 译文引见《追忆王国维》,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

③ 对杜甫诗歌的翻译和注解,是铃木博士一生的伟业。他本来计划是想写成20卷的规模,没有完成就病故了。参见兴膳宏《铃木虎雄》,见《东洋学の系谱》,大修馆书店,1992年。

究，铃木虎雄的学术观点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学批判史、赋史和魏晋文学史等方面。

（一）铃木虎雄的中国文学批判史的研究

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一书，由三编组成，即《周汉诸家对于诗的思想》、《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其中，第一编《周汉诸家对于诗的思想》共有七章；第二编《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共有六章；第三编《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共有六章。最初，先后连载发表于《艺文》杂志上。在国内，由孙俍工译为中文，名字改为《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分上下两册，分别于1928、1929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89年，广西人民出版社曾经出版此书新的译本，但是书名却更改为《中国诗论史》。从文字量上看，前两编总和大约是第三编的四分之三。可见，此书的核心内容是诗论史，也即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学批评史。

这本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是第二编：《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论》。

在该编一开始，铃木虎雄就正面提出了“魏时代：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期”的主张。他以曹丕和曹植的诗论为立论根据，提出：

> 自孔子以来至汉末都是不能离开道德以观文学的，而且一般的文学者单是以鼓吹道德的思想作为手段而承认其价值的。但到了魏以后却不然，文学的自身是有价值的思想已经在这时期发生了。所以我以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①

他对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提出的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给与了很高的评价。然后，他通过对晋、宋、齐梁时代出现的各种文艺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进入了北朝文学和南朝文学在诗论上的对比研究之后，得出结论是：

> 中国文学到了魏才承认有独特的地位，至晋之陆机其研究进了一步，到了南朝自宋以下发生各家的评论，在这时期，虽有时隐见文学无用说，但大概都以为文学是有利的，至齐梁而其议论最为精致了。只可惜这种渐次进步的文学论，至齐梁而达于绝顶点，遂不能再进了，到了陈反倒流于颓势。在北朝呢，只有颜之推一人持中庸说，其余都是在道德或政治上欲直接地利用文学的儒者一流的实用说，所以很可以看作为一种排斥纯文学的倾向。

---

① 铃木虎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上卷，孙俍工译，北新书局，1928年。

在第三编《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中，他首先对格调、神韵、性灵的产生含义进行了训诂学的解释和考证，精于考证的铃木虎雄接下来用了一章的篇幅考查了格调、神韵、性灵诸说产生之前的诗歌批评理论，然后就用大量篇幅详细研究了王渔洋和袁枚的诗学思想。于是，对王渔洋和袁枚的诗学思想的研究，成了铃木虎雄《支那诗论史》一书的中心主题。在该书中文译本的下卷全部一百七十多页的文字量中，关于王渔洋的生平及其诗学思想的分析和研究就占了快一百页！而袁枚则占有约五十页！王渔洋的神韵说成了此书核心中的核心！按照日本学术论文命名的习惯，我反而觉得长达一百七十多页的第三编《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一文的准确日文名称应该是：《神韵说の成立史研究——王渔洋诗学を中心として》。

在此文中，他首先就提出了王渔洋诗歌成就的四大因素，即天资、家学、乡土关系、师友关系。然后，他对王渔洋的神韵说的具体产生进行了详细的史料考证工作，认为这一学说是从唐代司空图和宋代严羽的诗学理论中变化而来。为了揭示这一思想，他还从画趣、禅趣和诗歌艺术境界的关系，进行了对比研究。这已经很接近最近几十年国内所流行的通过比较诗学来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特点和风格了。诚如是，则铃木虎雄又成了这一研究方法的开路先锋了。

最后，铃木虎雄总结了这三种诗学理论的利弊：

> 总之，格调说是意力的，热情的，而以不失诚实为主，神韵是情的，而以其平静淡白为主，性灵说是智的，而以其清新机巧为主。一主体格，一主兴趣，一主意匠。一是实字的，一是叠字的，一是虚字的。那雄浑、高华、悲壮、浏亮，等形容词可以冠之于神韵派的诗，轻巧机活等可附在性灵派的诗上。易陷于形式，易流于靡弱，易倾于浮薄，是三者各有的弊病。

（二）铃木虎雄的赋史研究

作为文学史家的铃木虎雄，除了上述那部著名的《支那诗论史》一书之外，就是这里出现的《赋史大要》一书了！如果说前者还短于对宋元明清文学的分析研究和阐述的话，这部《赋史大要》则是贯穿中国古代文学通史的学术专著了。

铃木虎雄在《赋史大要》序中首先做了如下陈述：

> 中国文章中极侈丽者，有四六文，欲知四六文，必解一般骈文，欲知一般骈文，必解汉赋，欲知汉赋，必解楚骚，此为一贯系统。摘出其议，

则不免支离矣。楚骚、汉赋、一般骈文，四六文四者，虽可以骈文概称之，然骚赋有韵，骈文四六者无韵也。予平日以区别二者为便，且欲观其迁变所由，则自骚赋源头而下，为极自然而必要者。于是乎轮赋。赋之形体，小者数十言，打者数百千言，网罗古今实例二说明之，非容易事，故本其实质，主于其随时代而发扬之特异性，冀学者先得其要，苟得其要，他一般骈文及四六类亦阶之而可达焉。

此书全书共分七篇，如下：第一篇《赋原及赋史之时期区分》，第二篇《骚赋时代》，第三篇《辞赋时代》，第四篇《骈赋时代》，第五篇《律赋时代》，第六篇《文赋时代》，第七篇《八股文赋时代》。以上各篇少则一章，多则六章，全书共二十五章，另有两篇没有分章，只是罗列论文若干篇未计在内。

然后，铃木虎雄将赋的历史分成六期，如下：

赋史时期只区分，凡得六期：第一为骚赋发生成立时期，自周末屈原宋玉前后，至汉文帝景帝之期间属之。第二为骚赋变化为汉赋，产生汉代特有之赋之时期，自汉武帝时代至魏晋之交之期间属之。昔人所谓古赋时代者是也。第三为晋宋以后，声律、对法、字句用法，渐趋工整之时期，自晋宋至唐初之时期属之。昔人所谓俳赋或骈赋时代者也。第四为置重声律对偶外，于韵法字数，及其他设限，因之课于官吏登用试场，而产生赋之存在之时期。唐及宋初属之。昔人所谓律赋时代者也。第五为对法，虽为对法，然或用长句，或用成语，作偶语而带散文单行气势之产生时期，宋代属之。昔人所谓文赋时代者是也。第六为于对法中杂入制艺文句法存在之时期，清朝属之。是类虽亦可视为文赋之别体，然未闻昔人对之而特有所命名，可假称之八股文赋与？

在进行具体研究时，他还是先对整理各个时期的保存下来的赋入手，也即先从目录学开始了赋史的研究。这使他的史学方法完全等同为乾嘉考证学派的治史方法。然后，他又利用文字声韵学的方法，研究了古代赋的变化的音韵学基础。但是，这一视角已经超出了乾嘉考证学的范围。他的个人体验是：

关于韵者，既可就时代确实之作品，考其韵脚，以决定其文字之韵类，反之。若是某时代之韵类性质先已得知，则更可据此以察押韵之状若何，而可决定作品之时代。据近时古韵研究，究厥部类，有试合部类与否，而欲推定作品之制作年代。亦有据此方法，传说欲编制宋玉等赋制作年代之学者。确一有益之方法也。而余以为韵之部类，不应取定于抽象，应来就具体作品，搜集其种文字，而后以之分类之术。在作之

者，唐以前之诗赋皆其有力之材料也。

铃木虎雄可贵之处是它的全部研究和立论全是建筑在举例分析的基础上，这使他的这一研究模式成为今后京都学派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范本。而他对清赋、也就是所谓八股文赋的专章研究显示出他文学史家独特的眼光。铃木虎雄主张：

> 就清代赋与前代赋之关系而观，可由句法、股法、押韵，以及股法与押韵之互相关系等方面以为之。余始区别赋之时期，谓可以清赋看作八股文赋之时代，有谓特设此称使之独立为无必要者，顺余使之独立，为有实际之便。故就清赋而通观之，余前述所有形式，无不具备。但仅具备所有形式，未有何者成为一己之所特有。勉强言之，其自身具备所有不可不谓为其特色。然余于其具备所有者中，觉其所带八股色彩，显然著明，故主此点，欲少有所述。

把中国学者一般视为没有文学性的八股文，铃木虎雄却从整个古代中国赋体的发展角度上给予了特殊的地位，无疑，这加深了我们自己对这一文体的新认识和考察的角度。在明清小说和戏剧文学中，八股文以赋的变体而出现，从而增加了我们研究的范围。铃木虎雄的这一视角还真有些启发意义。其实，早在他的《支那文学研究》一书中，他已经关注到了这一问题。《论骚赋的生成》一文中对于骚赋和楚辞之关系的研究，已经是本书《赋史大要》的一个先河。铃木虎雄还特别总结了楚骚与汉赋两者之间的四大区别：句式差异、虚字助字差、押韵差异、叙述差异。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部手稿《骈文史序说》。根据莫道才教授《关于铃木虎雄的骈文史序说》一文的介绍：铃木虎雄晚年还有这样一部文稿存世。本拟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但是后来因故没有出成……云云。

其实，此书日本在1961年已经出版了。

但是，1961年出版的那本《骈文史序说》是他的弟子们根据他在大学讲义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是否就是当时准备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的那本文稿，因为没有亲自目睹过两种文稿，笔者还无法得出结论。

在该书中，他提出了骈文的五个条件是：字句的整齐、对偶的精切、声律的谐调、典故的利用、修辞的巧美。并且指出了骈文中“气息”的重要性。[①]

---

① 详细可以参见莫道才教授《关于铃木虎雄的骈文史序说》，《柳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9期，第1~5页。

三、学术影响

铃木虎雄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首先，他对魏晋文学自觉性的研究和肯定，就直接得到了当时国内著名作家鲁迅先生的全盘接受。1927年夏，鲁迅先生在广州作了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先生直接使用铃木虎雄的"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的观点，而且提出的论据也是曹丕的《典论·论文》，甚至对曹植诗歌的分析，也完全等同于铃木虎雄：

>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不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但是，请注意：这里鲁迅先生并没有说"据我的意见"，而是含蓄地使用了"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一语，联想到他认为顾颉刚先生"尧舜禹传说否定论"是对白鸟库吉"尧舜禹传说抹杀论"之剽窃的指控，鲁迅先生在此文中自己先给自己观点留下了退路。也就是暗示着："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主张出自"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而不是出自"据我的意见"。这些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深入，已经有学者注意

到了鲁迅先生在此文中对铃木虎雄观点的使用问题。[①] 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值得特别肯定的。而且,根据《鲁迅日记》1925 年 9 月的记载,他"往东亚公司买《支那诗论史》一本"。这应该是鲁迅使用并了解铃木此书的铁证之一了。[②]

现在,随着对魏晋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铃木虎雄的"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上的自觉时代"的观点,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立足点。

而他对唐诗的研究、尤其是对杜甫的研究奠定了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的真正基础。从此,唐诗研究、特别是杜甫研究成为京都学派汉学研究的看家本领之一。他对李商隐的研究、对白居易的研究、加上他对杜甫的研究标志着脱离了对古典儒学研究的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科和专业在日本京都学派的正式形成。内藤湖南等人将传统儒学研究范围中开设出了新的东洋史学研究,而他则在传统儒学研究范围中开设出了新的支那文学史研究。

其次,铃木虎雄对中国古代诗论史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上拓荒性的著作。这一点是尤其值得特别指出的。

许总先生在《中国诗论史·序》[③]中就曾公开地承认:"细察陈中凡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以铃木此书为借鉴,也是有迹可寻的。"

在日本京都学派,至今对杜甫的研究、对魏晋文学的研究、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可以说一直继承着铃木虎雄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在欧美汉学界,某种意义上说,宇文所安教授的魏晋文学研究也是对铃木虎雄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向的发展。正是在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的双重培养下,才出现了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第二代杰出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家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和小川环树等汉学大家!从他们二人开山之后,戏曲史和杜诗的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上的看家本领之一了。

---

① 见赵敏俐《"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2 期。

② 见《鲁迅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562 页。

③ 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许总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第九章
高濑武次郎和支那哲学京都学派

一、生平小传

在京都学派的学者们中间，一部分人主张狩野直喜是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讲座的开创者。持这一主张的有北京大学教授严绍璗、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池田秀三等人。这一观点有部分合理性。因为当时的确是他首先在京都大学开设中国哲学史课程的。但是，他当时的身份是“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第一讲座”的教授，而真正以“支那哲学史讲座”的名称开始讲座的教授却是后来的高濑武次郎博士。

高濑武次郎是京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以“支那哲学史讲座”副教授的名义正式开始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教学的京都学派汉学家。但是，对于他的生平却一直缺乏研究。迄今为止，最有权威的研究出自东洋大学的吉田公平教授。他在《东洋大学井上円了センター年报》2006 年第 15 号上刊发了他撰写的《高濑武次郎年谱稿》长篇论文。①

1869 年 12 月生于香川县谳岐市，原姓佐佐木，号惺轩。中学和高中是在著名的京都府立洛北中学、洛北高中度过的。

1894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

1898 年，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他还经常参加日本著名的“研经会”组织的学术活动，作为主讲人，在那里举行了三次学术报告，记载如下：

第一次是 1900 年 5 月，演讲题目《天人合一说》。

第二次是 1901 年 3 月，演讲题目《杨朱ノ利己说》。

---

① 吉田公平《高濑武次郎年譜稿》，《东洋大学井上円了センター年报》，第 161 ~ 324 页，2006 年。因为受国内阅读环境的限制，可惜笔者至今尚未读到此论文。

第三次是1901年6月,演讲题目《朱王ノ致知格物说》。

1909年,在狩野直喜的特别推荐下,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支那哲学史讲座副教授。

1911年开始,他先后到中、英、法、美留学数年。在华期间,他写有《支那游记》一书。

1913年4月9日,正逢王羲之撰写《兰亭序》的1560周年纪念日。由日本书道协会发起,在京都举行"兰亭纪念会"。内藤湖南主持,分别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展览会与纪念演讲会。高濑武次郎当时正在上海也特地赶来参加。当年,日本书法家河井仙郎在西泠印社兰亭纪念会社员合影上留下一跋如下:

> 今年为晋永和九年后第二十六癸丑,西泠印社举行兰亭纪念会。是日天朗气清,与会者无虑百人,类擅郑虔三绝之长技。庭中设右军画像及永和九年古甓,别具长几,供客染翰,相与贻赠。又各出金石书籍交换,会中陈列名书古画多至三四百种,皆藏家精品。而日本长尾雨山、高濑惺轩、小栗秋堂、纪成柯庭、岸田雨臣、友永霞峰、吴县曹蘅史、山阴吴石潜诸君,且自兰亭修而来。金陵哈少乎则自沪上遥集。就中余杭盛剑南□□□开何庚生,皆年登大耋,精神矍铄,亦与斯会。诸君酒酣□□,即席题咏,爰为摄影全图,以至一时之盛云。

见陈振濂《西泠印社史研究导论》一文:"此外吴昌硕带动日本社员参加印社活动,又用西泠印社为窗口来与日本共同举办兰亭纪念会(1913),皆是吴任社长对于西泠印社的积极推动作用。"但是,该文也明确表示不清楚高濑武次郎是何时与吴昌硕相识的。而京都学派的汉学家们皆知道高濑武次郎擅长书法!他的作品至今也是日本古董商眼中的热门货。

1914年,他回到京都帝国大学继续任教。

1919年,他晋升为教授。

在周霞撰写的《蒋维乔与佛学》一文中,记载了蒋维乔访问日本时拜见高濑武次郎的一段史实:

> 1925年7月,蒋维乔就任东南大学校长,并于1926年4月参加南京校长参观团赴日本考察教育。在这次访日过程中,他广泛与日本佛学界人士接触,并多次到日本著名寺院参观。据《竹翁自订年谱》,……5月3日与日本帝大诸博士一起饮宴,"到者有历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哲学家高濑武次郎,经学家狩野直喜,文学家铃木虎雄,医学家佐伯理一郎,诗家堂野前种松,席间互谈振兴东洋文化方法",其间又推蒋维乔演

讲，后又互相再进行讨论。5月5日又到法隆寺参观，临行前寺僧赠他《法华经疏》写真印品。这次访日使他对日本的佛学研究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在日文版胡适《先秦名学史》一书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和胡适之间的学术互动：

> 余未识胡氏，然久闻其名。胡氏之游学美国，师事教育学大家杜威博士。博士曾来游我国，于我京都帝国大学亦有一场讲演。其时通过水崎基一君而问余日本是否有支那学术研究方面的大作，余乃向博士赠呈拙作《支那哲学史》、《阳明学新论》二书。其后博士游中国，以胡氏之《中国哲学史》赠余，且付书信一封以示答谢之意。是故余得以很早就有机会翻阅胡氏之哲学史。胡氏为现代之新进学者，其所论亦不少崭新奇拔之处。世之欲攻中国哲学之士，翻阅此书必有游于先人未到之境之感。①

1932年，他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

1930年，他转任立命馆大学教授兼文学部长（文学院院长）。

退休后的高濑武次郎一方面在私立大学中继续任教，一方面又积极参与了日本儒教和阳明学的推广。多次进皇宫给日本的昭和天皇讲授儒学和阳明学。

1938年，他成为日本平安书道会审查委员。

1950年2月9日因病逝世。

高濑武次郎著述先后有：1899年，参天阁出版《精神教育——阳明学阶梯》。1901年，东京哲学馆出版《支那文学史》。1902年，东京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出版《杨墨哲学》。1904年，文明堂出版《王阳明详传》。1906年，东京榊原盛堂出版《阳明学新论》。1910年，文盛堂出版《支那哲学史》。1918年，东亚堂书房出版《阳明主义の修养》。1922年，洗心洞文库出版《四言教论》。1926年，弘道馆出版《易学讲话》。1928年，弘道馆出版《阳明学讲话》。1924年，东京出版《陆象山》。等等。

二、学术述评

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传统思想上，一向很尊崇中江藤树的学说。中江藤

① 译文引见刘岳兵《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日本》。

树生于1608年4月21日,卒于1648年10月11日。滋贺县人。是日本江户时代初期著名的儒学家,尤其擅长阳明学。被当时人称作"近江圣人"。字原,号惟命,通称与右卫门。曾主办藤树书院。受朱子思想和王阳明思想的影响,开始研究格物致知学说。公开提倡阳明学。他的主张和阳明学的思想对于幕府时代末的尊皇攘夷运动的兴起,产生了重要作用。高濑武次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热衷于研究阳明学的。

他在《日本之阳明学》一书中公开地说:

> 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藤树之孝、蕃山之经论、执离之熏化、中乔之献身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之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予。

他撰写的《王阳明详传》、《年谱》、《传习录》等有关研究著作是早期日本汉学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特别是王阳明研究的重要资料,出版后对日本、对韩国、中国学术界的王阳明研究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他成为京都学派支那哲学史研究和阳明学研究的先驱。

高濑武次郎在《阳明学新论》一书的《序》文中就曾阐述说:

> 清朝之王学者大抵皆无不受念台之遗风,李二曲、孙夏峰、汤潜庵、万充宗、万石园、沈求如、史孝感、劭念鲁、王金如,皆为清初著名之王学者。然继之而兴起者少,此学可谓日趋衰颓,如清国现今之态势,百事皆非,岂独王学而已!试见我邦之王学者,始于近江圣人,后如熊泽蕃山、三轮执斋、中根东里、大盐中斋、佐藤一斋、春日潜庵、吉村秋阳、东泽泻、池田草庵、西乡隆盛等,其人虽不晤,或以德行,或以学问,或以事功,活跃一时。我邦当今之世,岂可不奋起回顾王学者乎!①

高濑武次郎在《孔子教普及策》②一文中,他首先把儒家定位为儒教,进而他主张推广儒教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儒教思想中掺杂佛教、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加以融合会通,就可以实现对儒教的普及。他的这一主张显然是想比照佛教、基督教的宣传方法,以宗教的方式来普及推广儒教。本质上还是三教一统的思想。

高濑武次郎还对《孙子兵法》进行了研究,他对此书给予了与众不同的评价。他认为:

> 孙子之文,精至而简约,曲折而峻洁,不能增减一字,故孙子兵法不

① 《阳明学新论》,榊原盛堂,1906年。

② 《汉学》第2卷第4号,1911年,第105~113页。

但是武经，也是文学上不可多得的大雄篇。

在《杨墨哲学》一书中，高濑武次郎对墨子的博爱学说表示出强烈的否定态度。

1910年，高濑武次郎出版的《支那哲学史》一书，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但是，该书并没有对传统的春秋公羊学的思想史意义进行说明。这和当时狩野直喜对中国哲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的理解有了一定的距离。此书后来由赵兰平编译成《中国哲学史》一书，在上海出版。

三、学术影响

末冈宏教授在《梁启超と日本の中国哲学研究》一文中曾指出，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一书中对墨子的介绍，曾经大量采用了高濑武次郎的《墨子哲学》一书。进而他断定梁启超是模仿高濑武次郎的《墨子哲学》一书的形式来撰写《子墨子学说》的。[①] 此说或许值得特别关注。就连七十多年后和梁启超一样也是清华大学教授的葛兆光含蓄地表示：

> 我们注意到，对于整个中国哲学或者思想史进行描述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多多少少都与日本学术资源有关。[②]

但是末冈宏接着强调，梁启超写《子墨子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提倡利他主义，以克服中国人的利己主义。与梁启超不同，高濑武次郎对墨子的博爱说则持有否定态度。由此可见，高濑的学术观点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

其中，国内学术界对他的介绍和著作翻译先后有：1925年1月，赵兰平编译上中下三册《中国哲学史》，上海国立暨南学校出版部出版。但是，此书并不完全是翻译，而是所谓的编译。70多年后，葛兆光在《为什么是思想史？——“中国哲学”问题再思》一文中还在评价此书：

> 应当看到，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哲学史的成立，不仅是接受西方学术强势的影响，而且也是中国学者试图回应西方学术，在自己的思想传统中建构一个与“西方哲学”一样历史悠久的“哲学传统”。随着20世纪初大学教育制度的转型和文史哲三分的学科建立，谢无量、钟泰、胡适、冯友兰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于是中国哲学史开始成立，因此我很同意并且同情中国哲学史成立背后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

① 见《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东京みすず书房，1999年，第168页。

② 葛兆光《西潮又东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4页。

在“民族本位”与“世界大同”之间重新为中国的“传统”与“思想”寻找位置的努力。也许从来源看各有不同，有的是试图用传统中国学案加上史传体，配以哲学史的新名目，像钟泰“以史传之体裁，述流略之旨趣”的似新实旧写法；有的是挪用日本或西方哲学史的现成套数，比如谢无量对于哲学史想当然的草创之作，比如赵兰坪用日本高濑武次郎书为底本“略参己见”写成的哲学史。①

1928年，蒋竹庄编译《杨墨哲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可以说，高濑武次郎的著作对民国初期学术界的发展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① 见《江汉论坛》2003年第7期，第24～26页。

下篇

鼎盛与辉煌

第一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一、《诗经》和《楚辞》为主的先秦文学研究

不论哪一个国家的汉学，当他们对中国古代文学史展开研究时，总也绕不过去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因为这是构成中国古代文学原点的两大主干。京都学派也是如此。千年之久的古代日本汉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一样，也承载着历代学者们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早在日本平安朝时代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就已经记载了当时流传到日本的相关研究专著：

《韩诗外传》十卷　韩婴撰
《毛诗》十卷　汉河间太守毛苌传、郑氏笺
《释注毛诗》廿卷
《周诗》十卷　陆善经注
《毛诗谱序》一卷　郑玄撰、大叔求注
《毛诗周南召南篇诀》一卷
《毛诗义疏》十四卷
《毛诗义疏》二卷
《毛诗草木虫鱼疏》二卷　晋陆机撰
《毛诗正义》四十卷　孔颖达撰
《毛诗述义》卅卷　刘炫撰
《毛诗不忘记》六卷
《毛诗私记》十卷
《毛诗音义》一卷　徐灿氏撰

《楚辞》十六　王逸
《楚辞音义》　释智骞撰

《楚辞集音》　新撰
《离骚》十　王逸
《离骚》二
《离骚经润》一

日本学者江口尚纯为此专门写有《江户期における诗经关系书目》一文，该文总结在江户时代日本研究《诗经》的学者多达450多家。而在《大日本古文书》中记载："《离骚》三帙，帙别十六卷。天平二年七月四日，高屋连赤磨。"

在《诗经》研究上，著名的内藤湖南如是表达了他对此书的看法：

> 总而言之，在民族发展的道路上，遭遇到空前的异常事件时，将会引起民族对自己过去的回顾，而进行汇集传说的工作。这是传说方面的自觉，中国的《诗经》正相当于这种情况。尤其是《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之类，是最适当的例子。中国的势力因内乱的中兴君主，从此逐步上溯，再回到本民族的过去、民族的发生，这就是《大雅》、《小雅》。《颂》可以说反映了民族与祖先神的关系。《国风》使地方民间传说与民间歌谣结合起来，使它成为乐官能够唱的歌，这就是一种汇集的工作。这种汇集就反映了传授方面的自觉。①

内藤湖南的这一评价是有决定性的，从此奠定了京都学派对《诗经》的认识。

在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上，《诗经》研究的大家是白川静博士。

他虽然是毕业于立命馆大学的汉语教授，但是却是以论文《兴の研究》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加之他大学时代的老师中田勇次郎是京都学派第二代传人，他属于京都大学和京都学派认可的正式一员是没有问题的。为此，他本人也撰写了《京都の支那学と私》一文。②

白川静生于1910年4月9日，福井县福井市人。1923年，他小学毕业后就开始在律师事务所打工。然后就读成器商业高中夜校，这时他才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1935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立命馆大学专门部汉学科夜校学习。第二年毕业后，他成为立命馆中学教师。1938年，他才正式考入立命馆大学法文学部汉文学科，在中田勇次郎指导下，开始接受正规的大学本科教育。可以说，国际著名的汉学大师、古文字学大师的白川静在起点上百

①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夏应元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② 《学林》第33号，2001年3月。

分之百是学徒工起家、靠夜校学习而自学成才的，和我国著名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以及国际著名的中国青铜器研究学者、京都帝国大学考古学教授梅原末治先生的经历几乎不相上下。1942 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该大学助手。1954 年，他晋升为该大学文学部教授。1962 年，他以论文《兴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6 年，他从立命馆大学退休。1977 年，他被立命馆大学校长聘请为特命教授（终身制）。1998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称号。2004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除此之外，他还取得了十几项日本各大研究奖。2006 年 10 月 30 日因病逝世。（他的妻子以 91 岁高龄，在他的家中京都市西京区桂稻荷山町 39 番地——我曾经多次来访过的地方，先他几年而去。）

他的主要著作有：全 8 卷本的《金文通释》、全 16 卷本的《说文新义》、《诗经——中国の古代歌谣》、《金文の世界》、《甲骨文の世界》、《中国の神话》、《中国の古代文学》等 40 多部学术专著。现有 12 卷本的《白川静著作集》和 22 卷本的《白川静著作集·别集》出版。该大学为他特别成立了“白川静纪念东洋汉字文化研究所”、“白川静纪念馆”、“白川静纪念东洋汉字文化基金会”等机构。有关他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请见本书《京都学派的汉语言文字研究》一章。更为详细的研究，我将在《日本汉字研究史》一书中进行专业化的研究。这里仅谈论一下他的《诗经》研究。

白川静在《诗经》研究中主张要以历史学、民俗学和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经过一番考证，他主张：《国风》中只有《定之方中》和《黄鸟》二诗属于记载历史事实的诗。而更多的诗则与中国古代的祭祀制度和民俗习惯有很深的连带关系。在这里，他使用了法国《诗经》学者研究《诗经》时的理论和观点，打破了以往京都学派的学者对法国《诗经》学者研究方法的质疑。如，他将《蒹葭》从过去的寻找情侣重新定位为祭祀水神。并将其与《楚辞》中对湘君、湘夫人的祭祀活动相比较，得出了上述结论。甚至在对《无衣》、《缁衣》、《渭阳》、《女曰鸡鸣》等篇的男女赠送衣服和礼物的研究中，白川静也从中考证出具有避邪、灵魂寄托等巫术和祭祀、民俗等含义的内容。

在对《诗经》语言的研究上，白川静根据《礼记·月令》中的“吁嗟求雨之祭也”一语，判断《东门之枌》中的“谷且于差”的“于差”即为“吁嗟”，亦即求雨之辞的用语。这一点可以说十分精确。

总之，他摆脱了以往的以史论诗的传统研究方法，用历史学、民俗学、比较学的方法，对诗进行了全新的研究。他将《诗经》置身于古代民俗和祭祀活动的背景下的研究，显示出他对法国《诗经》学派研究视野的超越，特别是

利用古文字考证来重新解释《诗经》,增加了这一研究的可信度。他甚至在研究《楚辞》时就曾将屈原也归人巫祝一类！因为“屈原是王族,应该也是率领巫祝的人”。

除此之外,西村富美子也是一位专业研究《诗经》的学者。她生于1934年12月14日。1953年,她高中毕业后考入大阪府立女子大学文学部。1957年,她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专业研究先秦文学。现为爱媛大学教授。她曾发表了《〈韩诗外传〉の一考察——说话を主体とする诗传の持つ意义》等论文。

比西村富美子晚一年的福岛吉彦,生于1935年10月14日。195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诗经》和《楚辞》文学。曾有多部专著出版。现为山口大学教授。

日本京都学派的《楚辞》学研究,其研究范围涉及从对《楚辞》作品的分析到屈原其人生平和思想、楚国的历史文化、《楚辞》对后代文学的影响、重要《楚辞》注本和注家的研究等诸多方面。京都学派《楚辞》研究的开创者是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非常勤讲师西村天囚博士。

西村天囚生于1865年9月12日,鹿儿岛县种子岛西之表大园町人。本名西村时彦,号天囚。别号硕园。他的父亲西村助时树也是位儒学家,当时和重野安绎齐名。但英年早逝。因此,少年时代的天囚在其母亲家接受儒家经典教育。1877年,他在种子岛学校上小学。1879年,他来到当时的东京,投靠他父亲的好友重野安绎。1880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古典讲习科。1884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专业研究儒家经典。1887年,他退学后成为《大阪朝日新闻》主笔。1916年9月,在狩野直喜的安排下,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非常勤讲师。1920年,他以论文《支那文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24年7月30日因病逝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屈原赋说》、《日本宋学史》、《楚辞集说》、《楚辞王注考异》等。正是在他出任非常勤讲师期间,他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了特殊讲义,专门讲授《楚辞》学。他把自己的书房取名为“读骚庐”。足见他对《楚辞》的爱好。他在《屈原赋说》上卷的《叙》中说:“以上十二篇,时彦在京都帝国大学,为学生讲述”,可佐证此书和《楚辞》学是他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里开设的讲义。

在《屈原赋说》一书中,他将屈原定位为“前继《诗经》的风雅而后启秦汉的大赋,是文学的大宗”这样一个地位上。此书分上下两卷,共由22篇文

章组成。即上卷名目、篇数、篇第、篇意、原赋、体制、乱辞、句法、韵例、辞采、风骚、道术。下卷名字、放流、自沉、生卒、扬灵、骚传、宋玉、拟骚、骚学、注家。他收藏了上百种研究《楚辞》的中日古籍。根据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一文中的考证,他收藏的上百种《楚辞》研究古籍大致是:

1. 中国明代刊本十六种。
2. 中国清代刊本四十余种。
3. 中国钞本二十七种。
4. 中国民国刊本十五种。
5. 日本刊本十二种。

由此可见,"就规模而言,几乎无人能与之匹敌,就质量而言,则更是可观"。[①] 特别是他收藏的日本刊本十二种,"对中国学者而言,这些都极为罕见。例如,宽延二年十一月皇都书林刊印《楚辞章句补注》十七卷"。[②]

西村天囚在《楚辞王注考异》中从版本学、训诂学的角度发现了不少用字错误和传抄时注解掺入正文的问题,解决了不少《楚辞》学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比如王逸注本中的"此言怀襄二王世不明"一句,西村就敏锐地指出:"王逸以《离骚》为成于怀王之时,而此言怀襄二世不明,乃似《离骚》成于襄王之世,可谓矛盾矣。"崔富章、石川佐三郎在《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一文中评述:"王逸所见之本,多有遗存,沉淀于《章句》之中,是乃矛盾之源头千余年来无人识破,西村时彦乃较早发现并设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人,实属难能可贵。"[③]

京都学派现代研究《楚辞》的代表性学者有:铃木虎雄、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白川静、小南一郎等人。[④]

青木正儿本身是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的著名学者,但是,他也对先秦文学有过研究。他曾将《楚辞》译成日文,并且增加注解,由春秋社出版。除此之外,他还曾写过《支那文学思想史》和《支那文学艺术考》二书,应该是他戏曲史研究之外的学术成果。

吉川幸次郎是京都学派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戏曲史研究和杜诗研究本是他的特长,但是,他在先秦文学史研究上,也是贡献卓著。他先后翻译和著述有孔颖达《尚书正义》全4卷、《虞の书》、《夏の书・商の书》、《周の

① 见《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9月。
② 见《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9月。
③ 见《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9月。
④ 说参徐志啸《日本楚辞研究论纲》。

书・上》、《周の书・下》、《诗经国风・上》、《诗经国风・下》、《论语の话》、《论语のために・私の古典》、《凤鸟不至・论语杂记・新井白石逸事》、《论语・上》、《论语・下》等。他尤其精通对《诗经》的研究。早在他刚回国工作时,他就开始主讲《毛诗正义》,并加以校勘。在筑摩书房所出版的全二十八卷本的《吉川幸次郎全集》中,第三卷就是先秦篇,该卷主要是以对《诗经・国风》和《楚辞》译注和研究为中心。此卷主要收录的论文如下:《中国文学の发生》、《诗经と楚辞》、《诗经・国风》、《私のいきごみ—〈诗经・国风〉の译者として》、《松本雅明氏〈诗经诸篇の成立に关する研究〉》、《诗に达诂无し》、《藤野岩友氏〈巫系文学论〉》、《〈老子〉に于ける对偶の句法について》、《古代の结婚》、《忘れえぬ书物—〈礼记〉について》等。第四、五卷是《论语》孔子篇,主要是对《论语》的注释。可见,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在吉川幸次郎的研究生涯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他把《楚辞》定位为:

> 存在于比《诗经》更深刻的怀疑和绝望中,尽管如此还是超越了这些怀疑和绝望,强烈坚持的自我主张使人觉得仍有回归善的强烈期待,那是不屈服于命运支配的精神。①

他的弟子中继承了他的《楚辞》研究并成就卓著的是小南一郎、小池一郎等人。

小南一郎1942年3月13日生于京都市。196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64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他是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门下学术最为精湛的京都学派第三代中杰出的学者。他的研究范围大致包括中国传承文化、古代神话、先秦礼制、古文字学、中国考古学、民间口承艺能、中国宗教史等很多方面。著作甚多,第78卷《东方学报》上专门刊发了《小南一郎教授著作目录》②一文。其中《中国の神話と物语り:古小说史の展开》(1984)、《西王母と七夕传承》(1991)、《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2003)、《古代中国天命と青铜器:诸文明の起源》(2006)堪称现代日本汉学界的名著。在楚辞研究上,他的论文《王逸〈楚辞章句〉研究 - 汉代章句学的一个面向》③一文和专著《楚辞とその注释者たち》代表了他对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他研究十分精细,考证严谨,几乎完整地再现了桑原史学的风格。在治学上,

---

① 译文用张哲俊。

② 见《东方学报》第78卷。

③ 见《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11卷4期,张超然译,2001年12月。

他平时最喜欢的一句话是“结果よりも过程を重んじたい”。1973年,小南一郎将《楚辞》翻译成日文出版。

小南一郎认为武帝命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或“离骚赋”这两种说法,其实早在汉代就有流行了,根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后叙》,还可以找到汉武帝命刘安作“离骚经章句”的记载。小南发现《楚辞章句》中有些注文采用四字一句、隔句用韵的形式,它既是对《离骚》的训释,又是以《离骚》为范本的文学作品,所以对这些训释既可称“传”,也可以称为“章句”,更可以称为“赋”。

研究《楚辞》之时,小南一郎还在撰写着研究《诗经》和《山海经》的两部专著。

小池一郎生于1945年7月24日。196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68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小川环树,专业研究先秦文学。现为同志社大学教授。他曾写有《楚辞音律论》等论文,研究《楚辞》中的音韵问题。

在先秦文学之后,吉川幸次郎在研究汉赋时,主张司马相如的赋是以形式美为本的,由此他揭示了中国文学之自觉时代的开端。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的教授今鹰真也是京都大学出身的学者。他1934年生于上海。1953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小川环树,专业研究《史记》和两汉文学。1962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出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助手、讲师、副教授。1987年,他晋升为教授。1995年,他从名古屋大学退休后,转任金城学院大学教授,现为该大学校长。主要著作合译有:全8卷本的《正史三国志》、全3卷本的《史记世家》等。主要论文有:《史记にあらわれた司马迁の因果应报の思想と运命观》、《后汉における七言の人物评语について》、《史记における二人称代名词の特徴について》等。

二、诗歌美学和《文选》学为主的六朝文学研究

最早,还是在铃木虎雄在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开设了特别讲义“《文选》学”。在当时只有吉川幸次郎和斯波六郎两位学生选修的情况下,京都学派的诗歌美学和文选学为主的六朝文学研究就这样起步了。而铃木虎雄本人在这一领域留下了《赋史大要》和《支那诗论史》等名著,吉川幸次郎则撰写了《陶渊明传》一书。

斯波六郎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工作。从此以后，广岛大学成为日本汉学界研究《文选》学的绝对权威基地，并使日本汉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日本汉学广岛学派。

石川忠久博士曾说：

> 我国于六朝文学，真正意义的研究当始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两博士。狩野师于六朝文学以俯瞰的综合性视野，显示在京都大学的讲义录《中国文学史》中，有着对其本质的深刻洞察。铃木师在《赋史大要》和《中国诗论史》中，就六朝文学的两大支柱"赋"、"诗"做了尖锐的剖析，显示了对作者、作品的准确评价。两师在这方面的业绩至今仍是六朝文学研究的指针，其辉不泯。但继承、发展其学问者是广岛大学草创时期开设的中国文学讲座的斯波六郎博士。斯波师在京都大学之际，受狩野、铃木两师的讲筵熏陶，在广岛大学，高扬六朝文学中的《文选》学旗帜。因此，在昭和初期的广岛大学，对六朝的研究是生生不息且得以发展，一脉相授之下，优秀学者辈出，以至于今日。其实，六朝文学研究的山脉是广岛大学架构起来的，如此盛事，他所未见也。斯波六郎师之后，小尾郊一博士有更大的拓展，继之者是森野繁夫博士。佐藤利行君乃森野师的私淑弟子，素受其熏陶，青年时代即取得了博士学位，今已荣晋教授，而继承了母校的传统。①

斯波六郎生于1894年3月9日，石川县凤至郡七浦村人，字皆月。1910年4月，他在石川县师范学校上学。1915年，他考入广岛高等师范学校文科第一部。1919年，他任大阪府池田师范学校教师。1922年3月以后，他转任广岛高等师范学校副教授。1923年4月，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铃木虎雄。1926年4月，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1929年4月，他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就任广岛师范学校教授兼广岛文理科大学副教授。1942年1月，他以论文《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3年4月，他转任广岛大学文学部教授，兼广岛文理科大学文学部教授。1957年3月，他从广岛大学退休。1958年4月，他回到京都，任大谷大学文学部教授。1959年10月2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文选李善注所引尚书考证》、3卷本《文选索引》、《文选诸本の研究》、《陶渊明诗译注》、《六朝文学への思索》、《中国文学における孤独感》等，和花房英树等人合译全7卷本的《文选》等。

---

① 见《西晋文学研究·序》，周延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主要弟子有冈村繁及森野繁夫等人。但这已经属于日本汉学“广岛学派”的历史了:斯波六郎的《文选》学、六朝文学研究和池田末利的古文字学、上古宗教史研究共同组建了以广岛大学为核心的一个崭新的汉学研究团体。

斯波六郎对于六朝文学,尤其是《文选》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他的博士论文中,他对于《文选》李善注引《尚书》的情况加以缜密地考证,恢复了李善注的本来面目。斯波六郎在《文选》学上堪称日本第一人。他还对《文心雕龙》也有很深入的研究。1952 年,他发表了《文心雕龙范注补正》,对范文澜《文心雕龙》加以补正,补充了范文澜著作中所未言及的典故。

兴膳宏生于 1936 年 10 月 25 日,福冈县人。1957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61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古文学理论和诗歌。1966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他退学先后就任爱知教育大学讲师、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74 年起,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89 年,他以论文《中国の文学理论》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并接替退休的清水茂,晋升为教授。2000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出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

主要著作有:《潘岳、陆机》、《庾信:望乡诗人》、《中国の文学理论》、《中国文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和川合康三合著《隋书经籍志详考》、《异域の眼:中国文化散策》、编著有:《六朝诗人群像》、《乱世を生きる诗人たち:六朝诗人论》、《古典中国からの眺め》、《中国文学理论の展开》、《中国古典と现代》、《杜甫:忧愁の诗人を超えて》等。翻译著作有:《文心雕龙》日译本、《春秋左氏传》、《诗品》、《书品》等。

可以看出,出身于京都大学的兴膳宏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六朝美学和《文选》学的研究上。为此,他曾陈述其原因:

> 文学史如果只着眼于唐代,而空缺六朝,无论如何是不充分的。还有一个动机是:唐诗当然发展得很成熟,成果很大,比较之下,六朝诗歌当然是不成熟的。然而正是这种不成熟,使它有自己独特的魅力。所以我想只研究唐诗是不行的。我研究六朝,大概就出于这两个动机。

当然,他还没有说明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国际汉学界从美国开始日益重视对六朝诗歌的研究。兴膳宏发起的六朝文学研究和美国汉学界的六朝文学研究无形中形成东西方联合之势。为此,他先后写下了《潘岳、陆机》、《庾

信:望乡诗人》、编著《六朝诗人群像》、《乱世を生きる诗人たち:六朝诗人论》等多部学术著作,终于奠定了京都学派在六朝文学和美学研究上的学术地位,使得铃木虎雄发起的汉魏六朝文学和文论的研究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光大。

诗歌之外,兴膳宏主要研究重点就是对六朝诗歌美学的研究。他领导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诗品》研究班、《文心雕龙》研究班的研究项目。他认为:"《文心雕龙》的创作理论使《文选》的编辑倾向受到了显著的影响。"兴膳宏为此对《诗品》和《文心雕龙》进行了翻译和注解,并且对比了这两者的艺术美学理论和各自的渊源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他和川合康三博士合著的《隋书经籍志详考》则是集中研究了六朝到隋唐之间的文学文献学。

除此之外,研究六朝文学的还有森博行,他生于 1948 年 7 月 18 日。1967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1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六朝文学。现为大阪艺术大学教授。曾发表《碧草と绿草》、《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首の世界》等多篇论文。

三、杜诗为主的唐诗研究

日本很早就开始了对杜甫诗歌的研究。平安朝时代诞生的《千载佳句》中就收录了杜甫的几首诗作。这或许可以看作是日本汉学史上杜甫研究的原点吧。日本近世时代诗人室直清、赤松勋、久松元志等人对杜诗的模仿和介绍,为京都学派杜诗研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铃木虎雄那里,多少还保留着对白居易诗的研究传统,为此他专门著述了《白乐天诗解》一书,而《千载佳句》中白诗数量占据半数就很说明了当时日本汉学史上白诗地位和重要。在近现代日本汉学界,铃木虎雄对杜诗的翻译和研究,真正开启了京都学派杜甫研究的大幕。从此以后,对杜诗的研究和注解成了几代学者们手中的看家的本领之一。推而广之,借助京都帝国大学时代创下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经过铃木虎雄和吉川幸次郎师生的努力,杜甫研究也就变成近现代日本汉学界唐诗研究的核心,彻底扭转了古代日本汉学史上白诗(白居易)研究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局面。

青木正儿关于唐诗,他曾翻译并注解过《李白》一书,作为遗著出版。但此书在他本人学术生涯中或者对学界来说,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毕竟他是研究明清戏曲史的专家,对唐诗的研究和他喜爱中国戏曲并没有多大

区别。真正开始了大规模作业的是吉川幸次郎。

吉川幸次郎生于1904年3月18日,兵库县神户人,号善之。他的父亲是个普通的商人。1916年,他从上中学时代就开始接触到了《史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文译本。一读之下,大喜过望。原来汉学不完全都是说理的儒家经典。从此坚定了他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志向。1920年,他开始学习汉语。1922年春,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游览了上海、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当时他曾感叹地说:"中国天生是我的恋人。"1923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成为狩野直喜、铃木虎雄教授门下的弟子。1926年,他大学毕业时用流利的中文写出了毕业论文《倚声通论》。大学毕业后,他考入大学院,在铃木虎雄的直接指导下,专攻唐诗研究。1928年4月,他来到北京留学。在京期间,他和仓石武四郎上午向旗人奚待园学习《红楼梦》,下午练习会话。平时,他最喜欢逛琉璃厂、穿长袍。很快,他就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腔汉语,与当时国内很多学人结下深厚的友情。1929年开始,他到北京大学文学院听课,先后师从杨钟义、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陈衍等人。又跑到中国大学来听吴承仕的课,专业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还曾向黄侃、吴梅等先生问过学。这为他日后与中国学者保持长时间的学术交流和友谊奠定了基础。[①] 1931年,他回到日本后任教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讲座副教授。因为整理京都帝国大学东方研究所所藏陶湘氏明清线装古籍,写成《东方研究所汉籍目录及作者书名索引》一书而倍获好评。后来,他接替仓石武四郎的职位,成为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教授。1956年,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长。1967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69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勋章。同时还获得法兰西学士院院士称号。1975年,他作为日本政府学术文化访中使节团团长,访问中国。在华期间,他受到了邓小平和郭沫若的接见。1980年4月8日因病逝世。死后获得日本政府追赠的従三位勋一等瑞宝章勋章。

在筑摩书房出版的全28卷本的《吉川幸次郎全集》中,涉及唐诗研究的是第8卷到第12卷,而以第12卷《杜甫篇》篇幅最厚,计736页,足见他的确是"少爱杜陵诗,篇什颇成诵,所爱音辞壮,抑扬意飞动"。他认为,"像李白那样的诗,似乎别的国家也有,而杜甫的诗才是中国所独特的"。他在京都大学期间,还特别组织了以教师为主体的"读杜会"和以本科生、研究生为主体的"小读杜会"。1950年,他出版了《杜甫私记》一书。1952年,他出版了

① 详细记载请参阅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一书,钱婉约译,中华书局,2008年。

《杜甫ノート》一书。1963年,他又出版了《杜诗讲义》一书。1967年,他出版了杜诗选注本《杜甫Ⅰ》一书。1972年,他又出版了《杜甫Ⅱ》一书。从1977年开始,他以杜甫全诗的翻译和注解为目标,出版了《杜甫诗注·第1辑·书生の歌·上》一书第一卷,其他各卷出版时间为:《杜甫诗注·第2辑·书生の歌·下》,1979年。《杜甫诗注·第3辑·乱离の歌》,1979年。《杜甫诗注·第4辑·行在所の歌、归省の歌》,1980年。遗著《杜甫诗注·第5辑·侍从职の歌》,1983年。1978年,他还在NHK教育电视台上开始了长达26讲的《杜甫诗抄》讲授活动。1980年又出版了《杜甫论集》一书。1981年,他出版了《华音杜诗抄》和《箋杜室集》二书。

在他的杜甫研究中,他首先肯定了自己的老师铃木虎雄在杜诗研究上的贡献,"关于杜诗,日本人以前作了不少的研究。尤其铃木虎雄先生翻译全诗甚为可观"。

在《新唐诗选》一书中,他首先将杜甫定位为:"不光是代表唐代文学的人,而且更是中国古今伟大的诗人,这大概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事情。"①

在《杜甫诗注》一书中,他时有新的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 《行次昭陵》这首五言长律,算是名作之一。对它写作的时间,有两个说法,以新发现的北宋王琪的本子为始,宋代的本子,大都将它排列在安禄山举兵以前。以为是天下太平时节的诗。只有南宋人的《草堂诗笺》,排在乱后。后来钱谦益采用了《草堂诗笺》,以后清人的注解,仇兆鳌等,皆从钱说,只有顾炎武反对。我个人认为,还是乱前正确,不是乱后。

再如他对杜甫"幽人拜鼎湖"一句诗的解释。他主张这里的"幽人"就是幽囚之人,是因为冤曲受到处罚之人。他以《邵氏闻见录》中出现的"唐故事,天下有冤者,许哭于太宗昭陵之下"这一记载为证,因而断定此句诗具有受冤之人向昭陵哭诉之含义。并且自信他的这一解释是"以前的注释没有考虑到的"。这一解释是有立论根据的。现在已经是日本学术界的定论之一。他还利用敦煌文献来研究杜诗。比如,杜甫《夔州诗》中的"客居媿迁次"一句中的"迁次"二字,古今不少学者以为其含义是搬家。而他根据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一书中的观点,认为"迁次"就是"造次"、"草率"、"匆忙"等含义。而前人注解为搬家,那肯定是不对的。

在《杜甫ノート》一书中,他对于晚年杜甫的诗作中的悲壮情调进行了

① 见《新唐诗选》,岩波书店,1952年,第2页。

分析,他认为:

> 我认为,晚年的杜甫,津津涌出的是自己的忧愁,在这种忧愁的底层,是一种对人类生命力的承认。而人的生命力是无限的,并且一直持续着。在这样持续的生命力中既有对人类社会的忧愁,另一方面也有对自己的忧愁。

在他眼里的晚年的杜诗已经不仅仅是出于对自己忧愁的感叹,而是包含着对人类社会的忧愁和感伤。这使得杜诗的悲壮超出了个人情感而具有社会意义。

吉川幸次郎把自己的杜诗研究,从具体操作方法上归纳为两点:一是看重宋人的注解,一是看重《昭明文选》。这是他自己觉得与他人不同的地方。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杜诗研究之外,他还撰写了不少研究唐诗的著作和论文:如,1952 年,他和三好达治共同选编了《新唐诗选》一书。1954 年,他和桑原武夫又共同选编了《新唐诗选续篇》。1957 年,他又选编出版了《唐代文学抄》一书。论文方面有《唐诗の精神》、《牡丹の花一李白のおはなし》、《王昌龄诗》等。

他和小川环树门下的学生先后有竹之内静雄、竹内实、清水茂、一海知义、高桥和巳、黑川洋一、筧久美子、筧文生、今鹰真、兴膳宏、高田时雄等人。和宫崎市定把桑原骘藏的中国史研究努力解释成从世界史角度来研究的中国史相同,兴膳宏也试图把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打造成从世界文学史角度来研究的中国文学史。可见,京都学派第二、三代学者们没有忘记要重新塑造他们各自老师的学术方法论。

目前国内对他研究比较详细的是张哲俊教授的博士论文《吉川幸次郎研究》一书。该书内容如下:

序言
绪论　吉川幸次郎汉学的意义
一、吉川幸次郎的汉学研究
二、"吉川中国学"的国际意义
第一章　吉川幸次郎与中日学术界
第一节　吉川幸次郎的生平与日本学术界
一、吉川与老一辈学者
二、后辈学者记忆中的吉川
三、汉学或中国学:吉川与竹内好的论争
第二节　吉川幸次郎与中国学术界

一、吉川与中国的老一辈学者
二、吉川与新中国的学者
第二章　吉川幸次郎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第一节　吉川的学术研究方法
一、学术水平的标志：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二、考据成历史的方法：吉川与乾嘉学派
第二节　中国文学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一、比较文学的问题意识：中国学者的盲点与问题
二、比较文学的具体方法：背景、局部与关系
第三章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观
第一节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化观
一、语言观：美的语言与美的文学
二、宗教观：无神的文明世界
三、士庶观：社会定位与作用
第二节　吉川幸次郎的中国文学史观
一、中国文学的基本特征：政治性
二、中国文学的人生观：希望与绝望
三、中国的虚构文学：贫乏与迟滞
第四章　先秦汉魏六朝文学的研究
第一节　先秦文学的研究
一、《诗经》与楚辞：前文学史的时代
二、《中国的智慧》：孔子的思想
第二节　三国六朝文学的研究
一、文学史时代的开始：悲哀的诗歌与美的汉赋
二、三国六朝文学：汉代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第五章　唐宋文学与杜甫研究
第一节　唐代文学的研究
一、唐代诸诗人：热烈如酒
二、唐代传奇：空想力的驰骋与健康的意识
第二节　作为“诗圣”的杜甫
一、杜甫的新贡献：现实主义的开拓
二、杜甫的两个方面：扩散与凝聚
第三节　宋代文学的研究
一、宋诗特征：日常、哲理与悲哀、情感的抑制

二、宋代诸诗人:平淡如茶
三、宋代话本:娱乐与人生观的关系
第六章　吉川幸次郎的元曲研究
第一节　《元杂剧研究》
一、选题意识:先期研究与问题
二、历史意义:最初戏剧与假想、口语、作者
三、文献意义:《元曲选》的问题与论证
第二节　元杂剧的观众
一、庶民观众:兴盛的勾栏和频发的禁令
二、贵族观众:杂剧爱好者的天子
三、文人观众:文人与杂剧俳优的密切关系
第三节　元杂剧的作者
一、前期作者:士人作家的身份与教养
二、后期作家:北方作家与南北社会差异
第四节　元杂剧的题材与语言的形式
一、题材情节:承继性与合理性
二、语言形态:口语体的形成与运用
三、文章特征:语言的流动与内容的写实
第七章　元明清的诗歌研究
第一节　元代诗歌概说
一、元初诗坛:一流诗人元好问与前期抵抗诗
二、市民诗人:杨维桢与艺术至上
第二节　明代诗歌概说
一、明代初期诗歌:简易的科举与朴直的诗歌
二、明代中期诗歌:市民诗的再起与简易的古典主义
三、明代末期诗歌:市民诗的饱和
第三节　清代诗歌研究
一、清顺康诗说:走向现实主义
二、清康雍诗说:神韵说与其他诗人
三、清雍乾诗说:文学与艺术的最初分离
附录　吉川幸次郎年谱

此书放在日本学术界也是一部成功的著作。他特别肯定了吉川的问题意识:

吉川正是以问题意识研究学术的。吉川问题入手的研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提出问题,二是解决问题。解决了问题是学术水平的标志。其实问题的提出本身也是学术水平的标志……他以问题为核心研究的方式,贯穿于他的很多具体研究之中。这是吉川学术方法的精髓。①

吉川幸次郎退休后,他的弟子、研究六朝文学和诗歌美学的兴膳宏,也没有忘记继承京都大学的看家本领,专门著述了一本研究杜诗的专著:《杜甫:忧愁の诗人を超えて》。

小川环树生于1910年10月3日,京都府京都市人。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小川琢治。我们在前面对小川琢治的介绍中已经提到了他。1916年,他在京都府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学。因为成绩优秀而跳级。1922年,他考入京都府立第一中学。还是因为成绩优秀而跳级。1926年,他考入京都第三高中。192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193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在铃木虎雄指导下,专业研究中国古代文学。1933年开始,他成为铃木先生的教学副手。1934年4月开始,他来到中国留学。1936年回国后,他再次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手。1937年,他转任大谷大学文学部嘱托教授。1938年,他就任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支那学第二讲座讲师,接替调往京都帝国大学任教的青木正儿。1939年7月,他晋升为副教授。1947年,他晋升为教授。1950年4月,他接替调往东京大学任教的仓石武四郎,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讲座教授。1951年,他以《元明小说史の研究》论文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65年开始同时兼任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74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1981年,他从京都产业大学退休。1983年,他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勋二等瑞宝章勋章。1989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93年8月31日因病逝世。

他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是20世纪日本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著作宏富,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特别是唐宋文学)研究建树颇多。

他研究唐诗的著作主要有:1958年出版了《唐诗概说》、1967年和吉川幸次郎合著出版了《唐诗选》、1975年出版了《唐代の诗人——その传记》、1972年和别人共同翻译出版了《李白》一书、同年又和别人共同翻译出版了《王维诗集》一书。兴膳宏选编并出版了全5卷本的《小川环树著作集》。其

① 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第55页。

中,《风と云: 中国诗文论集》一书,曾由友人周先民兄译成中文,2005 年在中华书局出版。

1934 年,小川环树到中国留学,30 年后,他在《我所遇到的中国人》一文中回忆说:

> 海关的工作人员是中国人。我看到排在前面的人们过关时,行李箱被打开了,看上去检查得相当仔细。我等在后面,对此已有了心理准备。终于轮到我了,海关人员所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为什么来中国?"我回答说:"我是来留学的。"那人听罢脸上立刻浮现笑容,说:"啊,你是来求学的,过去吧。"说完,几乎没有检查我的行李,就用粉笔在我的箱子上画了个圆圈,让我通过了海关。遇到这种优待,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拎上行李,一边往停车场走去,一边反倒感到有点不自在。与此同时,有种感慨在我脑海中突然升起:啊!我来到看重学问的国家了!我边走边想,不知不觉中这种感慨如涟漪越荡越大,逐渐漾满了我的全身。我当然连那个个子不高、稍显肥胖的海关人员的名字也不知道,可是他的微笑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样一种起初的好感,让他们在整个日本陷入军国主义的狂热时,仍保留了一份日本的良心。

清水茂生于 1925 年 12 月 8 日,京都府人。1944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1948 年,他从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师从吉川幸次郎,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1952 年,他从京都大学毕业后成为该大学文学部助手。1954 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4 年,他接替退休的小川环树,晋升为教授。1989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2008 年 2 月 3 日因病逝世。①

主要著作有:《语りの文学》、《中国诗文论述》、《中国目录学》等。翻译著作有:《唐宋八家文》、《水浒传》第 7 ~ 8 册(和吉川幸次郎合译)、《顾炎武集》、《书经·春秋》、《清水茂汉学论集》、《流观室诗词稿》等。

---

① 我只是在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东方学会的京都分会场上见到过清水先生几次,虽然和他老人家只是一般性寒性暄几句而已,但他的低调和谦和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也难怪另一位中国学者蒋寅教授也在《我和清水先生的交往》一文中就此感叹再三了:"他是京都分会会长,但从不像学会其他核心人物那样,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晚间酒会,他也不四处游动和众人碰杯寒暄,只是独自站在一张桌子边,悠悠地喝着啤酒。我一则认识人少,二则也不习惯这种场合,便过去和先生一起喝酒,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谈。时而有后辈学人过来敬酒问候,他都谦和地礼接。他给我的感觉是有浓厚的学人本色,除了学问,对一切都很淡泊,和他在一起,你心如止水。"我真的很感动他的这副安静和谦和!

清水茂很少有长篇论文，他多是喜欢针对一些小问题进行精细的考证研究。甚至出土文献和敦煌文献也成了他研究唐诗的重要证据。《中国目录学》一书和《流观室诗词稿》文稿充分显示出他深厚的古典文献学的造诣和学术功力。2003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蔡毅博士编译的《清水茂汉学论集》一书。

该汉学论集由如下论文构成：《〈尚书·秦誓〉及其周围》、《〈伪古文尚书〉与中国文学》、《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正始的文章》、《唐代古文运动与骈文》、《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印刷术的普及与宋代的学问》、《钱澄之的诗》、《论金堡的词》、《澹归和尚与药地和尚》、《龚鼎孳论》、《陈维崧的词》、《徐履枕的传记和诗》、《屈大均的词》、《吟诵的文学——赋与叙事诗》、《从诵赋到看赋》、《辞赋的虚构》、《辞赋与戏剧》、《杜牧与传奇》、《水浒传的地理知识》、《〈金瓶梅〉的人性》、《西门庆营造花园——大观园的先驱》、《〈诗经〉中"孔"字的分布》、《乐府"行"的本义》、《释"白日"》、《"春""秋"之词性》、《对伏与重复——苏轼〈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手法》、《朱熹的口语和文言》、《说"青"》、《说"黄"》、《屈大均词的押韵》、《中国文学在日本》、《日本古代文学中的韩愈》、《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清诗在日本》、《日本汉文学》、《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评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解〈钦定词谱〉解题》。在《清水茂汉学论集》一书中，他撰写的《唐代古文运动与骈文》、《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杜牧与传奇》、《日本古代文学中的韩愈》、《日本留下来的两种柳宗元集版本》等文都曾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且先后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又如他对金堡词的研究，就从版本学开始到诗歌特点的研究甚至到词中一个小小的地名"黄巢矶"的具体位置，他都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我国出版的《金元明清词选》中就注解为"黄巢矶在蜀江边"。他则考证后主张："金堡的足迹并未到过四川境地，因此这个注释难以成立"，然后他提出自己的见解："黄巢矶应该在这（指南京）附近的长江岸边。"①此说显然是比较合理的。

在该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清水茂对金堡、陈维崧、屈大均等人物的词的专门研究，对涉及词的赋、叙事诗、戏剧等问题的关联分析，比较细致地体现出他对词的研究视角。

和清水茂的低调与谦和类似的还有小南一郎教授。也许，我只能举出

① 《清水茂汉学论集》，中华书局，2003年，第125页。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两位声名赫赫却十分低调谦和的日本著名汉学家了。①

黑川洋一 1925 年 12 月 14 日生于广岛。1944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1948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专业研究中国古代文学。1953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出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58 年,他转任大阪大学文学部副教授、教授。1976 年,他以论文《杜甫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6 年,他从大阪大学退休后,转任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1990 年,他从奈良女子大学退休。2005 年 9 月 23 日因病逝世。

他被人称为是吉川幸次郎之后"日本研究杜甫的第一人"。②

主要著作有:《杜甫の研究》、《杜甫》、《李贺诗选》等。合著有:全 4 卷本的《中国文学岁时记》、全 7 卷本的《汉诗岁时记》等。主要论文有:《杜甫"又呈吴郎"の诗について》、《中唐より北宋末に至る杜甫の发见》、《关于〈唐书〉杜甫传中的传说》、《杜甫"凤凰台诗"における佛教的舍身の影》、《江戸后期における杜诗の享受について——六如上人を中心にして》等。

他通过对杜甫撰写的古体诗和今体诗的对比研究,得出了全新的结论:

> 所谓今体,是指杜甫稍早的时代里伴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而起的一种定型的短诗。所谓古体,是指杜甫以前已经具有 700 多年的传统的、比较自由的长诗。杜甫利用它们各自诗歌形态发挥了其非凡的力量,两个诗歌形态,和它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相对应的,就是锁定它们各自不同的特征。今体,即律诗和绝句的诗歌形态,是用来表达个人感情的抒情诗。而古诗的诗歌形态是用来表达社会事象和杜甫思想的叙事长诗。杜甫在紧密性和艺术性方面的诗歌,更多的发挥是前者,而杜甫的具有人民性和思想性方面的诗歌,更多使用的是后者。③

---

① 在我硕士毕业后正考虑报考是研究《周易》还是研究古文字学的博士研究生期间,身在关西地区的我曾将自己的几篇代表性论文寄给小南先生审查,希望能考到他那里读博,研究上古神话或者商周金文中的礼制问题。小南先生亲自给我写来了回信,他真诚地建议我:要想研究《周易》可以直接去考东京池田知久教授或者就近报考三浦国雄教授的研究生。他可以给我写推荐信云云。甚至有一次在召开日本中国学会的年会上,当电梯门一打开,急匆匆地走进电梯的我差点和正稳步走出电梯的小南一郎相撞,还没等我说"对不起",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小南先生"すみません"却先随口说了出来。

② 记得还是在 1999 年的秋冬季节,他曾为我在取得博士学位毕业后的工作和去留意向等问题,亲自为我奔波、斡旋,并在百忙之中给我写来了信函,说明进展。

③ 黑川洋一《杜甫》,岩波书店,1957 年,第 13 页。

说到这里，我们觉得还需要叙述一下京都学派的白居易研究。

铃木虎雄的《白乐天诗解》是很重要的一部著作。他认为："《长恨歌》叙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情事。不可相信它有'恐尤物、诲淫'等用意。如有，是失败的。"吉川幸次郎也继承了这一传统。认为《长恨歌》是依对二人爱情的深刻同情而写的。1945年开始，吉川幸次郎和神田喜一郎共同领导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白氏文集研究班"。成员包括吉川幸次郎、神田喜一郎、平冈武夫、小尾郊一、花房英树、太田次男等人。最后出版了3卷本的《白氏文集》校刊本。成员中不少人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论文，如神田喜一郎的《读白乐天诗记》、平冈武夫的《白氏文集札记》、花房英树的《白居易の文学》等等。

现在的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研究科主任教授川合康三博士，他生于1948年4月4日。1967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1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唐文学。1976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1979年，他转任东北大学文学部讲师。1981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87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95年，他晋升为教授。他以论文《中国のアルバ》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曹操》、《中国の自传文学》、《中国のアルバ》、《中国古典文学彷徨》、《终南山の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中国の文学史观》等。合著有：《隋书经籍志详考》等。主要论文有：《诗は世界を创るか——中唐における诗と造物》等。

他一直注重研究盛唐和中唐之间的诗歌转换问题，他特别注意这一转换所具有的时代因素，因此他更看重中唐文学，为此专门成立了日本中唐文学研究会，发行了会刊，定期举行学术研究会议。他也继承了日本汉学界的白诗研究传统。在《论长恨歌》一文中，他主张此诗"前半部分专门描写了玄宗对贵妃的宠爱，加上后半部分贵妃对玄宗爱的描写，才可以说是确立了男女之间的恋爱关系"。川合康三发现该诗中存在的"搜求－获得－丧失"的三个连环情节的构成模式。尽管川合康三的大学毕业论文是以研究李贺的诗为主的，但是他利用日本文学理论和西方的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唐诗，比如他发现的上述三个连环情节的构成模式，还是具有和前人不同的时代意义。他认为："中国文学首先是产生在中国文化之中的一种现象，应当在文化背景下面研究文学"，这一主张明显和兴膳宏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角度有所区别。

滋贺大学的户崎哲彦教授也是一位专业研究中唐文学的学者。他生

于1953年12月16日。1972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6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唐文学。

曾发表《柳宗元と中唐の佛教》、《柳宗元の明道文学》等多篇论文。

附录:关于唐代其他文学题材的研究

在这一方面主要是对唐代传奇的研究。《中国の神语と物语り:古小说史の展开》是小南一郎的名著之一。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了孙昌武译本《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该书对每条史料都详细考证和分析。并采用了多种版本对比研究的方法,寻找演变脉络。比如关于唐代志怪小说的人仙之恋、人神之恋时,小南一郎看到的是神灵对巫觋的附体这种萨满教文化现象,当宗教信仰世俗化、文学化后,就只有人仙之恋的情节表象了。对上清派在茅山构造传承体系、创制道书的行为,他敏锐地发现,这是南方知识分子为摆脱南方土著道教和北方新来者道教的框限的一种努力,结合东晋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这种做法就具有了特别的意义。[①]《搜神记》卷一所载的杜兰香、成公智琼的故事是公认的人神恋故事,早在《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就已经记载了当时流传到日本的两种版本的《搜神记》的存在。因此,对它的研究虽然一直不是古代日本汉学史主流,但是今天的学者却可以加以大力研究。小南一郎以为《搜神记》卷一所载的"这些人创造出与神女交往的传说,是为了给人造成他们的咒术来自天上,并特别神秘的印象。这也是一个为了取得实利的目的"。[②] 杜兰香故事中的男主角张硕的身份有可能为巫医,而成公知琼故事中的男主角弦超则可能为巫师,这从故事中神女所吟之诗和所赠之物可以看出端倪。考虑到当时社会信仰的问题,1982年,小南一郎又发表《六朝隋唐小说史の展开と佛教信仰》一文,充分肯定了《观世音应验记》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四、苏轼为主的宋词研究

王水照先生在《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述评》一文中首先就注意到了在京

---

① 平成12年12月4日到8日,小南一郎专门到东京大学以《唐代小说の研究:传奇小说の场と作品》为题,进行了四天的专场学术讲课。见《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第4号》户仓英美文章。

② 小南一郎《中国の神语と物语り:古小说史の展开》,孙昌武译,中华书局,1993年,第266~268页。

都学派早期出现的有关词的起源问题的学术探讨："他们二三十年代起，就发生过争论。铃木虎雄《词源》、青木正儿《关于词格的长短句发达的原因》、目加田诚《词源流考》等文就是这场争论的记录。"①

对词的起源问题进行关注之外，就是对诗人和作品的分析研究。

早在13世纪时，苏轼的作品就已传到了日本。② 日本的僧侣和文人们很喜欢苏诗，如先后成立了"赤壁会"、"寿苏会"等诗歌团体，一起研究和唱和苏诗。1916年"寿苏会"组织的一次活动中，出席的就有中国的罗振玉、王国维和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的狩野直喜和内藤湖南四人！罗振玉甚至当众展示出他所收藏的《苏文忠行书真迹诗卷》、《北宋搨本醉翁亭记》、《沈子培书东坡生日诗》等九件文物珍品。因此，研究苏轼的诗词，是从京都学派创始人时代就已经开始的传统。

在《吉川幸次郎全集》中，涉及宋诗研究的是第13卷《宋代文学篇》，内容包括《宋诗概说》等名作。在该书中，他把宋诗按照南北宋两个时代，划分为六个阶段进行研究：北宋初期、北宋中期、北宋后期、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南宋后期。

吉川幸次郎对宋诗深入研究和充分肯定，一改陈卧子、严沧浪至王国维等人所谓的唐后无诗之说，改变了中国诗学的主流看法，至今明清诗学研究也成为显学，这不能不说是吉川幸次郎的开创之功。他曾如是评价宋人的诗歌说：

> 要说北宋读书人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特色，那就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二重性。他们一方面创作诗和文这种严肃的作品，另一面又创作词这种浮艳、柔靡的作品（宋人的抒情精神寄托在词之中）。并且，在文学用语上，也表现出二重性。从六朝至唐的散文，既然已经常常掺入了口语，也就不再好洁成癖；但北宋的散文对于口语的混入却是取好洁去污的态度。诗不像散文那样的排除口语，但诗的语言范畴已经确定了，而词则大量的吸收口语。③

他在《宋诗概说》中，他认为宋诗在诗史上的学术价值是视界的开阔和悲哀的扬弃。他发现："宋人不但把诗视为抒情或流露感情的场所，同时也

---

① 见《学术月刊》1988年第11期，第51页。

② 1353年印行的《普门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目录》一书中有《注东坡词》二册及《东坡长短句》二书。

③ 吉川幸次郎《中国文学史》，黑川洋一整理，陈顺智，徐少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把诗当作传达理智的地方。”为此，他主张：

> 宋以前的诗歌，很久以来都是以悲伤为主题的，脱离这种悲伤主题，才是宋诗最重要的时性。正是苏轼，才使得这种脱离完全成为现实的。在他之前，欧阳修已经具有这一倾向，但欧阳修尚不是充分自觉的，并且，是以保持心境平静这种消极的态度为方法的，梅尧臣也同样如此。苏轼则是明确的、自觉的、积极的。他用多角度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多面性，根据这种哲学，他扬弃了悲哀。①

因此，他得出结论说：

> 唐诗显得如火如荼，紧凑而激烈。简言之，在匆匆趋向死亡的人生过程中，诗人作诗只能抓住贵重的瞬间，加以凝视而注入感情，使感情凝聚、喷出、爆发。诗人所凝视的只是对象的顶点。这是唐诗之所以显得激烈的原因。唐诗是凝缩而简洁的，但视界的幅度却也因而受到了限制。宋诗则不然。宋人以人生为长久的延续，而且对这长久的人生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具有广阔的视界。诗人的眼睛不只盯住在产生诗的瞬间，也不只凝视看着对象的顶点。他们的视线广泛地环望四周，因此显得冷静而从容不迫。

宋代理学思想的发达，造成了宋代诗人可以很理性地看待世界和社会，于是也就形成了宋诗的说理的艺术特点。

吉川幸次郎还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对宋词的分类进行了阐述：

> 北宋是理趣横溢于文学作品中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五代诗余的趣味也原原本本地被继承下来了。北宋的诗余作家，大致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门创作小令、民间小调之类的诗余的人。他们出没于烟花柳巷、秦楼楚馆之中。一类是堂堂正正的士大夫们，他们一方面写正统的诗文，另一方面也作为余技来从事诗余的创作。还有一类是在宫廷中训练的艺人，和教坊有一定联系的人。

田中谦二虽然是元曲研究专家，但是却对中国古代文学有系统的研究和了解。在1970～1972年他参加了平凡社编辑出版的全60卷本的《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的编译活动，负责主编第20卷《宋代词集》。

在《风与云：中国诗文论集》一书中，小川环树先生从细节着手，阐述了

---

① 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蔡靖泉等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96页。

“风景”、“风流”等词语在中国诗歌中的演进，并通过诗人们对“风与云”的应用叙述了中国诗歌中的感伤主义色彩，还对宋代大诗人苏轼的诸多事迹进行了分析研究。

青木正儿当时研究了词格、词律的问题。他撰写了《词格の长短句发达の原因にて就》、《乐律溯源》、《燕乐二十八调考》等论文。他还在《支那文学思想史》一书的第五章专门研究宋代的文学思想，集中分析宋代的词说。其中，《词格の长短句发达の原因にて就》一文中探讨了词格的形成问题。在该文中，他主张：

> 初盛唐的词采用绝句调。到了中唐，为了突破其单调而对绝句加以变化：(一)或者对句子进行伸缩分裂。(二)或者在泛声、和声中填入实字。(三)或者在乐曲的“间之手”中填入实字。依靠这种方法，使词格逐渐发展起来。到了晚唐，词语完全从绝句系统中独立出来。(四)有的顺应乐曲本来的曲调改动句式的长短。(五)有的任凭语言自然和谐长短不齐的句子。这样词调越来越复杂。①

当然，这些观点可能是由于他以戏曲的曲调来考察词调的结果吧。为此，王水照在《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述评》一文中针对青木的上述观点，提出：

> 他的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其实，敦煌发现的资料足以说明，唐声诗和唐曲自始就并行发展，不分先后的。据《教坊记间订》，开元、天宝流行的长短句调，已达五十个以上。其次，他对(一)(三)(五)三种原因的推测，也略嫌证据不足。②

中田勇次郎1905年1月7日生于京都市中京区。号有庐，书斋名心花室。他的父亲中田佐久造是京都一家出售纤维的名叫“中与商店”的老板，精通书道。这使他自幼就开始学习书法。1932年，他从京都第三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193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师从铃木虎雄、青木正儿，专业研究宋代诗词。1941年，他大学院毕业后成为大谷大学文学部教授。1954年，他转任京都市立美术大学学生部长。1963年开始，他当选为该大学学长。1969年，他从该大学退休后，转任大手前女子大学教授兼文学部长。1976年，他被日本政府颁发勋三等瑞宝章勋章。1978年，他出任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长、理事长。

---

① 译文见《日本学者中国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② 见《学术月刊》1988年第11期，第52页。

1990年,他受到京都市政府表彰,被授予文化功劳者称号。1998年10月23日因病逝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宋代の词》、《读词丛考》、《历代名词选》、《词选》、《黄庭坚》、《中国书论大系》、《米芾》、《文人画论集》、《王羲之》、《中国书论集》、《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中国书法理论史》等。有全10卷本《中田勇次郎著作集》出版。编著有:全9卷本的《中国书道全集》、全24卷本的《书道艺术》、《中国书人传》、全20卷本的《文人画粹编》等。

中田勇次郎在词的研究上,早年他发表的论文颇多。在他晚年专业研究书法史之前,他长期研究宋代诗词。《读词丛考》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京都学派第二代学者中宋词研究的经典著作。该书由《南宋词の特质》、《唐五代词韵考》、《词律に见たえる重叠韵の例に就て》、《唐五代词の韵律に就て》、《草堂诗余の版本の研究》、《清初词选刻版考》、《两宋词人姓氏考》、《鱼山の诗余》、《道藏に见える诗余》、《白乐天の文殊赞》、《温庭筠の金荃词》、《韦庄の浣花词》、《蜀の词人李珣の琼瑶集より》、《花间集より》、《毛震熙の词》等数十篇论文组成。从他的研究题目就可以看出他的视野十分宽阔而且气势宏大,他的研究考证论文也非常出色,甚至从《道藏》中研究考证出词的痕迹,是第二代学者中研究宋词的权威学者。

我们看一下唐圭章教授1935年在编辑《全宋词》时给他的两封通信,通读唐氏来信内容就足以了解他的宋词研究水准及其在我国学术界的地位:

中田勇次郎先生大鉴:

拜读大示,欣慰之至。所指陆敦信、莫少虚、陆永仲、李长庚四则,尤感高谊。陆敦信见《花庵词选》,莫少虚见《梅苑》,向皆不知其名。今得先生发明,亦大快事也。惟据《洞霄图志》云:"陆凝之,字永仲,号石室,馀杭人。"似可与《咸淳临安志》互订也。又李长庚,字子西。但据陶梁《词综补遗》云:"李子酉,号冰壶。"尚不知孰误。弟辑《全宋词草目》,罅漏颇多。尚望先生不吝赐教。兹有询者数事:

①贵国贞享初所刻《事林广记》内有宋人佚词。吾国无此书,便乞先生代查一过赐寄可乎?吾国《蕙风簃随笔》中录得五首,度其他必仍有也。

②吾国明人之《喻世明言》,惟贵国有之。其间或仍有宋人佚词,亦仰望先生见示。

③吾国曹元忠云:汲古阁所景《梅苑》,归诸贵国岩崎氏。不知视今李祖年刻本《梅苑》为何如。先生亦得见此书否?

琐费清神,感荷无极。天涯比邻,幸希不弃。

此请著安

弟唐圭璋上　七月十九

中田勇次郎先生雅鉴:

读八月五日手示,快慰无似。多累代钞《事林广记》中之词,亦至感歉。陈元靓为宋末元初人,可信也。惟《十万卷楼丛书》所刊《岁时广记》为四十卷,作四卷,盖误也。所钞九词,《东坡判词》曾见之。《张魁判词》,《中吴纪闻》谓是仲殊词,究未知孰是也。吾友赵万里辑仲殊《宝月词》引之。惟谓《事林广记》不注撰人,则非是也。判僧奸情《江南竹》一首,《留青日札》(以上第一纸)载之,惟作方国珍词。其僧名竺月华,亦非法聪也。先生所举九词见癸集卷十二、卷十三,但吾华况蕙风《餐樱庑词话》引其戊集亦有《满庭芳》、《鹧鸪天》等词,先生可勿须钞也。又谓卷八有《音乐举要》,论谱字颇详。又谓卷二《文艺类》有言宫拍,与白石词颇可印证,则此书信可宝矣。李祖年《梅苑》系自印分送者。现渠已死,无从问得。坊间如有发见,当购奉台端。《静嘉堂书影》已见过,惟无《梅苑》耳。赵万里以二百金,自贵国写真,可以假弟。则此本可以见到,至快意也。又《皕宋楼藏书志》卷一百二十载宋陈经国《龟峰词》一卷,又载陈人杰《龟峰词》一卷,后者,《四印斋所刻词》已印出。惟前者则无从得见也。令师有一知己在静佳堂,务恳托之钞得。钞值若干,当寄奉也。闻诸桥辙次为静嘉堂文库代表者,或径托渠可乎?贵国专究词学者,尚乞见示地址。此次分笔画《词目》印成,将再乞贵国学人指教也。弟仅知盐谷温在帝大,他不知也。

匆此敬上,并请著安。

弟唐圭璋　上八月廿日

就中田勇次郎先生的书法研究,刘正成先生在《快雪时晴忆岚山》一文中加以评述说:

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处理他们所尊崇的中国传统,这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学术研究的分水岭。中国乾嘉以来的汉学传统,在矫正宋学传统以后,对

中国的古史更多的是释义。中国的考据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实事求是，义理明彻，演变成了具有现代品格的“支那学”。看一看日本《书道全集》的“作品考释”，就是一种全新的著录方式，是对中国古代沿袭至今的著录方式的革命性改革。《中国书法全集》编撰工作向《书道全集》借鉴所体现的“支那学”研究方法最大的特征，就是对古代某一样式、某一书家作品的“考释”，有了这种“考释”，就有了作品的编年。

而在中田勇次郎出版的《黄庭坚》一书中，他也努力挖掘最新的史料：“他从京都一个寺庙里尘封三百年的书堆中找到了出版于江户早期的《虎啸集》，那是一个日本学者在南宋时期访问中国搜集黄庭坚诗文题跋的文集，为他的黄庭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①

小川环树在宋代诗歌研究上也是贡献颇多。他先后出版了两卷本《苏轼》、《宋诗选》、《陆游》、合著两卷本《苏诗佚注》、合著《苏东坡诗选》、合著有：全四卷本的《苏东坡诗集》等。他在晚年全部身心都投入了对苏诗的研究中，并且主持了京都大学举办的苏诗研究会的各项活动。这对京都学派的苏诗和宋诗的研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吉川幸次郎先生曾和他有约定，希望他专业研究苏轼：“私が杜甫をやるから、あなたは苏轼をやりなさい”。② 可以说，他忠实地完成了他的这位学长对他的嘱托。

村上哲见1930年7月18日出生在中国的大连。194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在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的指导下，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从那时起，宋词就成了他的研究专业。1953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京都教育大学副教授。后来又调任东北大学教养部教授。但很快他又出任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1984年，他又调回东北大学文学部，接替突然逝世的志村良治，出任中国文学科教授。1972年，他获得日本中国学会奖。1974年，他以论文《北宋词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从东北大学退休后，出任奥羽大学教授。1999年，他从奥羽大学退休后，又被聘为近畿福祉大学教授。2007年，他从近畿福祉大学退休。2009年，他的《宋词に关する研究》一书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奖。

他先后出版的研究宋词和宋代文学的专著有：1959年，出版《李煜》一

① 见刘正成《快雪时晴忆岚山》一文中。

② 见《东方学》第95辑，第177页。

书。1973 年，出版《宋词：中国诗文选》一书。1976 年，出版《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一书。1983 年，出版《陆游：圆熟诗人》一书。1989 年，和浅见洋二合著《苏轼·陆游》一书。2002 年，出版《宋词の世界：中国近世の抒情歌曲》一书。2006 年，出版《宋词研究：南宋篇》一书。

村上哲见在《词に对する认识とその名称の变迁》一文中主张："唐代既有以诗充当的歌辞，也从一开始起就有了合曲调而作的长短的歌辞。"他还在此文中提出了"诗词并存说"。王水照先生在《日本的中国词学研究述评》一文中对此给予高度肯定，称其为"这一考辨有助于从文学体裁上体认词的性质"。[①] 村上哲见还在《李煜》一书中对李煜的词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李煜的词在独抒性灵上可以和《诗经》不相上下。

《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一书由上、下两篇，外加序和附论组成。上篇研究晚唐五代词，下篇研究北宋词。在《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一书中，村上哲见考察了词的起源、发展及各个时期的词人，对苏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强调了"豪放"与"天然"二者之间的关系。他主张唐末以来的词一直就有沉溺于伤感的倾向。但是到了苏轼却以豪放之态，组成其作品的基调。这和苏轼的人生观有着紧密的关系。他分析苏轼词的三大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内容丰富，超越感伤而豪放达观，来源生活而体验深刻。并且，他敏锐地看出了宋词的两极化倾向的出现，正式开始于苏轼，从苏轼之后，格律化趋势和散文化趋势成了宋代词学的发展方向。

相反，对于文弱而婉约的柳咏之词，村上哲见也给予了很好的分析和研究。同时他也对词的作者和当时妓女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 唐宋文人题咏妓女或写赠妓女的诗词决不在少数……问题在于其态度和立场。例如，如果采取把女性当作风流游戏的手段，说得极端些，看作任人玩弄之物的态度，反而不会被特别地当作问题的吧。耆卿的情况不是这样，他吟咏时采取的不是居高临下的态度，而常常是以几乎对等的人与人的关系而进行吟咏的，这正是因为他本身的生活就处于那个社会之中的缘故。[②]

他在对柳咏等人的词研究中发现了"某种观念性"的东西，而这正是对传统的词为小道之说的反动："同耆卿的这类词进行对照，人们可以发现包括温飞卿在内的以前的'闺情'诗词都具有某种观念性的东西。那些诗词尽

① 见《学术月刊》1988 年第 11 期，第 53 页。

② 村上哲见《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杨铁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222～223 页。

管有美妙而优雅的意境,但都是作为观念的象征而构成的。"①

其实,他已经开始涉及对词的雅俗之辨的问题。在论述中,他特别注意到了从晚唐到北宋中国科举制度的规范化给当时士阶层主动的对"雅"的认同所带来的影响,这一影响曾经相当程度地制约了士阶层对词的接受,直到李后主词的出现。在这里,他已经接受着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只是已经消化得很彻底而已。

他还对周邦彦的《西河·金陵怀古》一词给予高评:

> 这是一首以刘禹锡《金陵五题咏》为底文,并随处括六朝的乐府和谢的诗等,而典雅地咏古都金陵、缅怀往昔的佳作。虽然几乎每一句都是六朝和唐代的诗歌,却丝毫不使人有不协调感,而通过联想可以将形象扩大。这样一种用典的效果,在这首词里发挥得很出色,同时天衣无缝地构成了一个其自身具有完整性的诗的世界。②

总的来看,村上哲见在研究宋代词史的时候,并不把词人"视作孤立的封闭的存在,而是紧密联系整部词史的发展确定其历史地位和总的特色。在北宋词坛上,他突出张先、柳咏、苏轼、周邦彦四家。他认为'从转变来说,以张、柳更值得注目'"③的观点。

村上哲见多次来访我国,和我国著名学者吴世昌等许多人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友谊。

我国著名词学家唐圭璋先生逝世后,清水茂教授亲自写词一首悼念:"清平乐·用梦桐词悼获村老人韵。望西魂断,怎见金陵岸。巴蜀流离空有怨,未托过洋鸿雁。博搜全宋声韵,无穷嘉惠文人。翻读梦桐词集,由他滴泪成痕。"

他和夏承焘老先生也是关系深厚。清水茂曾专门撰写了《评介夏承焘著〈唐宋词人年谱〉》一文,该文评价夏老的此书是:"今日研究词学,此必为重要参考书之一。"他还主持出版了《群类诗余》、《钦定词谱》两部词学古籍。

除此之外,还需要肯定的是:1970 年,仓石武四郎、田中谦二等人主持出版了精选注释本《宋代词集》一书。

---

① 见村上哲见《宋词研究:唐五代北宋篇》下篇第三章,杨铁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② 村上哲见《宋词研究 唐五代北宋篇》,杨铁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第 317 ~ 318 页。

③ 见《学术月刊》1988 年第 11 期,第 54 页。

五、《西厢记》为主的元杂剧研究

日本对《西厢记》的翻译早在19世纪就已开始，将近200年来，译本达10多种。20世纪初，罗振玉收藏当时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原藏的现存最早的元杂剧总集《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同样也喜欢研究元曲的狩野直喜见到后，欣喜异常，立刻介绍京都帝国大学出版会影印出版。王国维曾如此评价说："凡戏剧诸书，经后人写刊者，往往改易体例，增损字句。此本虽出坊间，多讹别之字，而元剧之真面目，独赖是以见，诚可谓惊人秘籍矣。"从此以后，中日学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此书的研究和校勘。现已有多部相关研究著作出版。①

诚如我们在前面所述说的那样，狩野直喜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专门开设了"中国戏曲史"课程，并汇集成《中国戏曲史》讲稿散发给选课的学生。尤其是他在教学中引入了对戏曲剧本的一字一句的训读研究，打破了中国学术界的戏曲唱词不能训诂和考证的传统。这使他成了京都学派支那戏曲史研究的实际开创者之一。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和狩野直喜之间的学术交流，他们二人共同成为敦煌学和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奠基人。从此以后，京都大学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成为该学派的一个看家的传统。这不能不说是狩野直喜的首创之功。但是，狩野直喜本人也承认他曾向王国维请教研究元曲的方法。他在《王静安君を忆ふ》一文中回忆1910年他在北京见到王国维时的情景：

> 当时，我研究元曲已有一段时间了，并已在京都帝国大学讲授元杂剧。恰巧王静安先生也在进行同样的研究，并已著有《曲录》、《戏曲考原》，因此，我利用在北京逗留的机会会见了王先生，听他谈元杂剧研究，感到很有意义。②

王国维的《曲录》共6卷：一、《宋金杂剧院本部》。二、《杂剧部·上》。三、《杂剧部·下》。四、《传奇部·上》。五、《传奇部·下》。六、《杂剧传奇总集部》。而他的《戏曲考源》只一卷。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王国维最早的宋元戏曲和戏曲史概论。王国维谈元杂剧研究，狩野直喜感到有意义的应

---

① 如，郑骞《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湾）世界书局，1962年。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华书局，1980年。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② 狩野直喜《王静安君を忆ふ》，《艺文》1927年第8期。译文引《追忆王国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第343页。

该就是如下这些话：

>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着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遂使一代文献，鬱埋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辄思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以为非求诸唐宋辽金之文学弗能得也。

继承了他的这一研究方法的是他的学生、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教授、著名中国戏曲史学者青木正儿。在《君山先生と元曲と私》一文中，青木正儿曾经评价说狩野直喜“实为我国元曲研究的鼻祖”。

在元曲研究上，王国维对日本汉学界的指导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就连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的教授盐谷温也公开地承认：

> 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学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于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底研究吐卓学，或竟先鞭于名曲底绍介与翻译，呈万马骈辕而驰骋的盛况。[①]

虽然盐谷温在东京帝国大学最早开设了元曲研究课程，但那仅限于东京帝国大学，而且，“盐谷温出去留学时，曾从狩野那儿得到过如何研究元曲的建议”，而狩野则又是曾在王国维那里“听他谈元杂剧研究，感到很有意义”——直到后来，“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等一系列的研究著作给了盐谷温的戏曲研究很大的影响”，[②]可以说，王国维是东京和西京两所帝国大学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共同祖师。

青木正儿出生于1887年2月14日，是山口县下关市人。字君雅，别号迷阳。少年时代他开始喜欢文学和美术，尤其擅长画水墨画。1907年，他从家乡的第五高中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成为狩野直喜门下的弟子。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学老师。一度迷恋写作，曾经师从当时日本著名作家幸田露伴先生。1920年，他和小岛祐马、本田成之等人一起

---

① 译文用陈彬和，《中国文学要略》，志诚印书馆，1926年，第1页。

② 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史研究》，《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创立了一份汉学研究刊物——《支那学》。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筹建了汉诗写作组织“丽泽社”和美术创作组织“考槃社”。1924年，东北帝国大学正式设立支那学讲座，于是他成为那里的第二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1938年，京都帝国大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讲座讲授铃木虎雄退休后，他正式调回京都帝国大学，成了那里的第二任讲座教授。1947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成为山口大学中国文学科教授。1957年，他从山口大学退休，成为立命馆大学大学院特任教授。1964年，正在上课时他因病突然发作而逝世。

关于他的戏曲史研究著作，最有名的是以下两部：《支那近世戏曲史》和《元人杂剧》。其他著作还有：《元人杂剧序说》、《中国文学论薮》、《中国文学概说》等。

青木正儿在《支那近世戏曲史》一书中先后对120多部传奇和70多部杂剧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涉及元明清三代八十几位主要的戏曲作家。他对每一位作家都从生平事迹、戏曲介绍和学术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叙述和考证，奠定了京都学派中国戏曲史研究的模式和学术规范。此书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特别关注，先后有多种译本出版，相关评论一直就没断过。真正可以说对我国的元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曾经在《支那近世戏曲史》一书的序中自述了他受王国维影响的经过：

> 明治四十五年二月，余始谒王先生于京都田中村之侨寓。其前一年，余草《元曲研究》一文卒大学业，戏曲研究之志方盛大。欲向先生有所就教，然先生仅爱读曲，不爱观剧，于音律更无所顾，且此时先生之学将趋金石古史，渐倦于词曲。余年少气锐，妄目先生为迂，往来一二次即止。遂不叩其蕴蓄，于今悔之。

从此，青木正儿一直把自己的事业当成是王国维的继续。他自己公开承认他研究明清戏曲史是“出于欲继承王忠悫国维先生名著《宋元戏曲史》之态”。因此，《支那近世戏曲史》一书成为日本汉学史上的名著，其著述由来，大概如上所述。而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高度关注和肯定，以至于当时国内著名的戏曲史家吴梅先生在为此书译本作的序中，也赞美说：“青木君遍览说部，独发宏议，诣力所及，亦有为静安与鄙人所未发者，不尤为难能可贵耶。”

吉川幸次郎从1939年开始，他在青木正儿的指导下开始研究《元曲选》

和著述《元曲辞典》的资料准备工作，于是又把他的书房命名为“诂典居”。同时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开设“元曲研究班”。成员有：吉川幸次郎、青木正儿、入矢义高、田中谦二等人。他们每周举行一次元曲典籍的会读活动，并定期举行学术发表会。还将每次的会读结果写成《元曲选释》连续发表在《东方学报》上。以后就正式出版了四卷本的《元曲选释》一书。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吉川幸次郎也因为他一贯的亲华立场而受到日本特务的监视。战后的1947年，他以论文《元杂剧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除此之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的研究上，他先后出版的著作有：《元曲金钱记·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元杂剧研究》、《元曲酷寒亭·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元曲选释》等。传田章教授在《日本的中国戏曲史研究》一文中高度肯定了吉川幸次郎的学术贡献：“进入昭和年代以后，日本的元曲研究被以吉川幸次郎为中心的京都大学学派推进到新的阶段。”①

专著之外，他很多研究元曲的论文还曾经名传一时，如《元杂剧の文学》、《〈汉宫秋杂剧〉の文学性》、《〈赵氏孤儿记〉解说》、《〈元杂剧研究〉补注》、《诸宫调琐谈》等。

滨一卫1909年生于大阪。1930年，他从大阪浪速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193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铃木虎雄、青木正儿。专业研究元曲。1934年5月13日至1936年6月15日，他被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公费派遣到中国留学。回国后的1938年，他就任松山高等商业学校教授。1949年，他转任九州大学教养部副教授。1965年，他晋升为教授。1973年，他从九州大学退休。日本的福冈曾举办过多次“滨一卫と京剧展——滨文库の中国演剧コレクション”的展览。

主要著作有：《日本艺能の源流：散乐考》、《支那芝居の话》等。主要论文有：《最近に于ける北崑の变迁》、《春柳社の奴吁天录について》、《脸谱と隈取》等。今天，在九州大学有“滨文库”，收藏了他寄赠给九州大学的有关中国戏剧类古籍中、日文约860种。另有20世纪30年代前后旧北京有关戏剧的出版物（报纸、杂志）数百种。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近代北京戏剧史上。

田中谦二为日本继青木正儿之后，在中国古典戏曲文学上造诣最深的日本汉学家。他研究方向虽然侧重于中国古典戏曲，但是却对元杂剧《西厢记》情有独钟。他对《西厢记》的贡献，分别反映在翻译、注释、考证、鉴赏等

① 传田章《日本的中国戏曲史研究》，《文学遗产》2000年第3期。

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可以说是全方位的研究与介绍。

田中谦二1912年生于滋贺县大津市。他父亲对中国古典文学非常熟悉，家中藏有一批中国古典文献的善本，他的高中时代是在著名的京都第三高中渡过的。1930年，他考进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在铃木虎雄教授的指导下，田中谦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上打下了深厚的基础。1934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手。1936年，他转任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助手。正是在此期间，还是高中老师的他，和同为高中老师的入矢义高等人一起参加了吉川幸次郎组织的"元曲研究班"。1944年，他来到北京留学。1946年归国后，他成为京都大学教养部助手。两年后，他晋升为副教授。1953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56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设立了"元曲研究班"，由他任班长。1969年，他晋升为教授。1962年，他以论文《西厢记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76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又成为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2002年11月17日因病逝世。

他的主要著作有：补注《元曲五种》、合著《元曲选释》、《朱子语类外任篇译注》、《乐府·散曲》、《元曲：救风尘ほか三篇》、《龚自珍》、《元代散曲》、《元曲：西厢记ほか三篇》等。与别人合译多卷本《史记》。有3卷本《田中谦二著作集》出版。

从1987年起，田中谦二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新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科研工作。这使他获得了"中国古代戏曲史研究第一人"的尊称。国内学术界也对他的研究给予了研究和关注。《田中谦二及其对元杂剧研究的重大贡献》①一文就是一例。

田中谦二的元杂剧及中国古典戏曲史的研究，在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之后取得了无人能及的成就，成为日本汉学界京都学派在元曲研究方面承先启后的大师。经过长期的考证，他发现元杂剧的体制脱胎于金代的诸宫调。为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从《天宝遗事诸宫调》、《刘知远诸宫调》到《西厢记诸宫调》等等，他都进行了深入的版本校刊、源流考辨的工作。在《杂剧〈西厢记〉の南戏化——〈西厢记〉物语演变のゆくえ》一文中，他认为杂剧《西厢记》的出现是杂剧南戏化的开始，并且判断《东墙记》其实是《西厢记》的模仿之作。他的《元曲における险韵について》、《元杂剧の题材》、《西厢记版本の研究》、《西厢记诸本の信凭性》、《文学としての董西厢》、《杂剧西厢记における人物性格の强调》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

---

① 见《齐鲁学刊》2000年第2期。

岩城秀夫生于1923年5月8日。194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1948年,他从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青木正儿,专门研究中国戏曲史。1952年,他成为山口大学文学部讲师。1955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8年,他以论文《汤显祖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晋升为教授。从山口大学退休后,他转任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他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剧の研究》、《中国戏曲演剧研究》、解说《中国善本戏曲三种》、《中国人の美意识》等。翻译著作有:《还魂记》、《牡丹亭》、《五杂组》、《入蜀记》、《板桥杂记》、《苏州画舫录》等。

他在京都大学学习时,就搜集了汤显祖的相关资料。他的《汤显祖研究》论文长达10章、20多万字、400多页的篇幅,内容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为《汤显祖の传记》,下篇为《汤显祖の剧本》。通过对汤显祖的生平经历、交游交往、与论敌的争执等具体情况的考证和分析,勾勒出明代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文化史和思想史,并对汤显祖的文学在明代的地位给予定位。该论文出版时名为《中国戏曲演剧研究》。除了这部分内容外,他又增加了对宋、元、明各时代戏曲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考证。而他的另一部专著《中国古典剧の研究》则是系统地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历史、剧作家的思想及其生平活动、创作理论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学术史论著。其中主要论文有:《南戏の〈せりふ〉の骈体化について》、《南戏に于ける语の机能》、《戏曲评论の研究》、《元の裁判剧におけゐ包拯の特异性》、《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の流传》、《梅花と返魂——苏轼における再起の悲愿》、《温州杂剧传存考》、《宋代演剧窥管》、《"采菊"考》、《丁都赛杂剧雕砖出土の意味——北宋演剧の流转を探る》等数十篇论文组成。

在《中国戏曲演剧研究》一书中,岩城秀夫认为,《还魂记》是一部恋爱至上主义的作品,它的影响来自李贽:"李贽标榜真实人的姿态,对于失掉'真'的'假'不断否定与斥骂;'真'是情的根本,自然的情欲就是'真'。而汤显祖也强烈肯定男女之'情'。《还魂记》就是从肯定欲望出发的。"

今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金文京教授、关西大学文学部井上泰山也是研究明清戏曲史和小说史的专业学者。金文京生于1952年,日籍韩裔。1971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元曲和明清小说。1979年,他在取得京都大学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退学。1994年,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2000年,他晋升为教授。2005年,他当选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曾经主持"元明代散曲の解释"、"明代の散曲研究"、

“南宋、金、元代文学の综合的研究”等专项课题研究。

他的主要著作合著有:《花关索传の研究》、《广东木鱼书目录》、《董解元西廂记诸宫调研究》、《邯郸梦记校注》等。主要论文有:《南戏中的婚变故事和南宋状元文化》、《元杂剧〈盆儿鬼〉考》、《关汉卿身世考》、《敦煌本〈舜子至孝变文〉と广西壮族师公戏〈舜儿〉》等。

井上泰山,生于1952年,山口县下关市人。1971年,他考入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197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继续研究汉语。为了研究元曲,1977年,他硕士毕业后来到关西大学,考入关西大学博士研究生,师从田中谦二,专业研究元曲。我想:这肯定是由于他对他的前辈老乡青木正儿的仰慕才使他作出了研究元曲这一决心的吧。[①] 1980年,他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曾任明治学院大学文学部助手、讲师、副教授。1986年,他转任关西大学文学部副教授。现在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专业研究“元杂剧の成立过程”。

他的主要著作有:《〈西廂记〉研究在日本》、《元杂剧の道士と道姑:その性格と役割をめぐって》、《文学と道教(近世小说・戏曲)》、《中国近世戏曲小说论集》等。合著有:《花关索传の研究》、《董解元西廂记诸宫调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杂剧〈硃砂担〉演变考》、《元杂剧の“旦”について》、《元杂剧の传来と受容》、《元曲辞典のあり方を问う》、《元杂剧の传来と受容に关する觉书》、《日本における〈西廂记〉研究》、《元杂剧の翻译と注释:战前篇》、《关汉卿作剧法试探》、《朱买臣离缘谭演变考》、《中国社会と演剧》、《神仙道化剧における何仙姑の幻》、《元杂剧〈拜月亭〉考》等。

井上泰山是田中谦二晚年最为重要的学术传人。

上述二人之外,专业研究元曲的京都学派的学者还有赤松纪彦,1957年2月11日生。1976年,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8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元代杂剧の形成とその受容”。现为金泽大学教授。主要论文有:《汗衫记剧について——元刊本、明抄本と明刊本について》、《山西中南部の戏曲文物とその研究》、《赵氏孤儿剧小论》等。

---

① 井上泰山先生曾是我硕士生时代的任课老师之一,当时,我选修了整整一年他主讲的元曲研究课,学会了以日式训读来注解元曲的方法。

六、明清小说为中心的文学史研究

在这里，我们试分为以下五点进行总结。

第一，《水浒传》

铃木虎雄本人就很喜欢读《水浒传》，他曾收藏有现今日本学术界最早的《水浒传》版本。《水浒传》全译本，在日本多达五十几种。选译、节译就更多了。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和清水茂等人都有译本出版。

青木正儿对《水浒传》及其相关版本有很深的研究。比如他考证出日本保存的《水浒传》出现之前的早期版本《二剑英雄谱》为明刻本，就已经是一力证。当胡适对《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展开考证研究时，也得到了青木正儿在版本材料上的支持和帮助。见如下：

1920 年 1 月 24 日胡适致青木正儿：

> 冈鸣璞的《唐语便用》二本，我已转请钱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报告。先生说冈鸣的著作中有"《忠义水浒传》二卷，自第一回至第十回，附训点刊布"。此本是否圣叹批本若是明本百回本的前十回，我极想得着一部。不知能求得着吗？明代之《忠义水浒传》百回本不知在日本尚可购买吗？如能购得，我极愿买一部。我近来买得一部一百十五回本的《水浒》，是一种六十六回本与《征四寇》合并起来的。

1922 年 2 月 8 日胡适致青木正儿：

> 谢谢你的十、二、三的信，与你寄赠的《忠义水浒传》二册！

关于这里出现的"冈鸣璞的《唐语便用》二本，我已转请钱玄同先生拿去察看，不久他定有报告"之事，张晓刚博士在《青木正儿博士和中国——关于新发现的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信》一文中解释说："从信中我们知道，青木博士已经给胡适先生寄去了日本江户时代最早翻译李卓吾《忠义水浒传》的冈鸣璞冈屿冠山氏的《唐语便用》。"①

吉川幸次郎从他 1916 年上中学开始，他就醉心于阅读《史记》、《水浒传》、《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日文翻译本。1947 年开始，吉川幸次郎翻译施耐庵的《水浒传》。该译本共分八册。各册出版时间

---

① 张小钢《青木正儿博士和中国——关于新发现的胡适、周作人等人的信》，《吉林大学学报》1994 年第 6 期。

如下:第1册,1947年出版。第2册,1948年出版。第3册,1948年出版。第4册,1949年出版。第5册,1950年出版。第6册,1957年出版。第7册是和清水茂共同翻译的,1962年、第8册还是和清水茂共同翻译的。

宫崎市定也是一位研究明清小说的专家。《宫崎市定全集》第十二卷是他研究《水浒》的专集:《宫崎市定说水浒》。该书的《前言》一开始说:"从少年时代起,我就是一个《水浒传》迷。"对《水浒传》的研究,宫崎市定也是先以文本研究为切入点。他非常看重《水浒传》中所体现出的那些对宋代社会和经济真实状况的描写及其史学价值。他甚至说:"要想了解中国,读《水浒传》也许要比读四书五经更管用"、"要想了解当今的中国,《水浒传》也是必读的书目之一。"因此,他京都大学上课时就专门把《水浒传》作为教材,因为那里反映了"《水浒传》における支那近代社会状态"。而《宫崎市定说水浒》一书也正是出于这一了解古代中国社会和经济真实的状况的前提下著述的。本书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徽宗と李师师》、《妖贼方腊》、《奸臣蔡京》、《宦官童贯》、《鲁智深と林冲》、《戴宗と李逵》等各章,具体细致地分析了小说中的宋代和历史上的宋代发生的种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如实地再现了胥吏阶层的生活状态,努力还原了小说中所体现的历史的真实。而他提出了两个宋江说则又是把对《水浒传》中人物的研究和历史人物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主张小说中"身为众寇之首的宋江"和"身为朝廷大将宋江"是当时并存的两个人物。一个从一开始便是盗贼,而另一个从一开始便是官军。"身为众寇之首的宋江"和讨伐方腊的"身为朝廷大将宋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和宫崎市定的研究风格很接近的还有历史学家佐竹靖彦教授。他本人是研究隋唐史的专家,也热衷于研究《水浒传》。或许这是受到了他的老师宫崎先生的影响。而且,他也写出了《梁山泊——〈水浒传〉一〇八名豪杰》一书。他从历史学角度,利用它对宋代历史、地理、社会、经济以及民间传说的考证研究,努力复原出《水浒传》的真实地历史画卷。作者对宋江、李逵二人的人物分析和他们在构成小说中的价值地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指出了对反叛军事力量代表李逵的绝对掌握才是宋江彻底把握众多豪杰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宋江的存在,才是使李逵等人彻底摆脱反叛者的立场,造成《水浒传》在小说叙事结构上起到了符合当时朝廷教育意义的目的。对于宋江,他也赞同宫崎市定的"两个宋江"说的观点。作者还着重分析了晁盖、杨志、公孙胜和林冲四人在构成小说发展线索上的特殊作用。而且,他还从道教的角度,提出了小说结构受道教影响的观点。再比如他在书中对《水浒传》中梁山泊至青州一带出现绿林豪杰和强盗问题的分析,他指出了唐朝末

期反朝廷的黑市盐商当时就大量出现在这一带，因此小说中描写的在宋代梁山泊至青州一带出现绿林豪杰和强盗的问题，有着晚唐时代真实的历史背景。就这点来说，可以说发我们所未发。

第二，《三国志演义》

金文京曾对京都学派的《三国志演义》研究有过如下评述：

> 罗贯中的生平籍贯，是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却被日本学者冷落了。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学者一般对罗贯中的作者地位持不置可否的态度，因为有关罗贯中的唯一的文献就是《录鬼簿续编》，而没有具体的资料足以证明《录鬼簿续编》所说的罗贯中就是《三国志演义》的作者。日本学者并不积极地探索罗贯中籍贯诸问题，原因也即在此。

他又说：

> 对于《三国志演义》的主题，日本学者的兴趣不是很大。[①]

但是，日本国内保存的元代两种不同版本的《三国志平话》、明版《三国志演义》等珍贵文献，皆为国内所无，可以说已经给日本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金文京主张京都学派对《三国志演义》的研究，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超过国内学术界：一是对《三国志平话》的研究，一是对《花关索传》的研究，一是对研究文献目录的整理和编的纂。[②] 这三个方面正是国内学术界目前所短而为京都学派所长者。

1968 年，小川环树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一书。在该书中，他指出明代万历以后出版的若干《三国志演义》版本，因为在内容上完全没有对关索故事的描写情节，可见这些版本的此书直接来源并不是出自嘉靖元年刻本。

金文京自己曾发表了一篇研究《三国志演义》作者籍贯问题的论文《罗贯中の本籍》。在该文中，他主张：

> 罗贯中或他的父祖辈也很可能先是太原人，后来移居东平，再转到杭州，因为我们有理由相信写定《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熟悉北方地理，可能是南方人。[③]

---

① 见《文艺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② 见《文艺研究》2006 年第 4 期。

③ 见《文艺研究》2006 年第 4 期。

第三,《红楼梦》

狩野直喜早在1909年就发表了研究《红楼梦》的论文《中国の小说〈红楼梦〉について》,在此文中,他肯定了该小说作者就是曹雪芹,成书年代应当在雍正—乾隆之间。因为该论文分两期刊发在《大阪朝日新闻》1月10日、17日上,让人怀疑这是否是内藤湖南组织的稿子。

1921年,青木正儿撰写了《胡适著〈红楼梦考证〉读后》一文。他因为和胡适关系密切,往来书信颇多,因此青木对胡适寄予了厚望。此文是他介绍胡适的红学研究观点的文章。

1963年,神田喜一郎撰写了《〈红楼梦图咏〉について》一文。《红楼梦图咏》为清代李光禄辑,改琦绘图,淮浦居士重编,1879年刊本。这本木版画集共绘制了50幅画作。内容有通灵宝玉、绛珠仙草、警幻仙子、黛玉、宝钗、元春、探春、惜春、史湘云、妙玉、王熙凤、迎春等55人。神田喜一郎此文从版本考证和美术分析入手,研究了画家的作品和小说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艺术效果。

我国学术界在50年代开展《红楼梦》评论后,对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也有所触及。1955年4月,村上哲见就在《中国文学报》上刊发了《围绕红楼梦研究批判讨论的经过和论点》一文。

在196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研究》一书的第六章,小川环树也没有忘记陈述他对《红楼梦》的一些基本看法。该章的名字就是《红楼梦简说》。

1997年,金文京发表了他对《红楼梦》中人物进行研究的论文《香菱考》。

现在,研究红学的还有井波陵一教授。他是1953年1月2日出生。1972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6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小说。现为滋贺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教授。他研究《红楼梦》的主要论著有:《曹寅》、《林黛玉论》、《红学界现状简介》、《红楼梦の意义と王国维の评论》、《薛宝钗と饰物》、《梦の续き——〈红楼梦〉续编の世界》等。

第四,其他小说

1956年,吉川幸次郎又翻译了《西山一窟鬼·京本通俗小说》一书。

第五,明清诗文

在明清诗学的研究上,吉川幸次郎还出版了《元明诗概说》、《中国诗人选》等著作。在《元明诗概说》一文中,吉川幸次郎首先肯定地指出:“明代诗

歌的风格一般简单率直,相当多的市民参与了诗歌创作。这使得诗风更为简单率直,简单率直的诗风又把更多的市民卷进了诗歌创作。"①

张哲俊在分析吉川幸次郎的元明清诗歌研究时,他将吉川幸次郎的明代诗歌分为初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这一分析使我们看清楚了吉川幸次郎观点的阶段性。

吉川幸次郎在《元明诗概说》一文中特别肯定了沈周诗歌的价值。他认为:"(沈周)虽然是一个市民,作为文化人和有教养的人,居于代表那个时代的地位,那是最应当受到社会尊敬的地位。中国社会对一流文化人的尊敬,至少曾经是无与伦比的。这几乎可以与对一流政治家的尊敬相提并论。"②

而对于清代的诗歌,按照张哲俊的博士论文中的考证,吉川幸次郎"编写的讲义就是《清初诗说》(《清顺康诗说》、《清康雍诗说》、《清雍乾诗说》)。他的讲义是以古汉语写成,上课发给学生,这是模仿他在北京大学留学时教书讲课的办法而做的"。③

吉川幸次郎特别指出了清人以学为诗的特点:"清人往往以学为诗,亭林已然,竹垞次之。然在国初,宗尚犹稀。风气之遍殆由此期。盖考证之学行将兴起,诗亦与之也"。

与此相应,他对王渔洋的诗歌及其神韵说的理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归纳为典、远、谐音律、丽以则四大特点。

七、通史研究

日本汉学界撰写中国文学史的科研活动还是比较早的。1882 年,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出版了《支那古文学史略》一书。1891 年,儿岛献吉郎在《支那文学》杂志上发表《支那文学史》论文。1897 年,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就撰写了一部《支那文学史》。1898 年,日本汉学家川种郎又撰写了《支那历朝文学史》一书。同年,笹川临风也出版了《支那文学史》一书。

在京都学派,最早著述中国文学史的学者是松本文三郎。

而后,随着京都学派的正式形成和研究风格的确立,通史类的著述已经不为喜欢精致考证和微观研究的学者们所看好,以至于至今在汉学研究上专题学术史的研究很盛行,而文学通史的著述却很少有人愿意去作的局面。

---

① 译文用张哲俊文。

② 译文用张哲俊文。

③ 张哲俊《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52 页。

最初,京都学派的创始人狩野直喜本人也曾撰写过一部“上古より六朝まで”的《支那文学史》一书。在该书中,他特别看重先秦诸子之思想与文辞并重的特点。为此,他由衷地感叹说:“先秦时代所谓六经诸子,皆以思想为本,而同时文辞之精彩亦为后世之楷模。思想家与文人乃是一而不二的。”[①]他的这一观点可以说一针见血地表明了当时的文、质关系。但实际上,他这部所谓的通史也仅仅局限于从上古到六朝时代为止而已——“上古より六朝まで”,和我们后来所谓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基本通史范围还有很大差距。

铃木虎雄的《支那文学之研究》一书,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而他撰写的《支那诗论史》、《赋史大要》更是专题文学史的先锋。他的上述几部文学史,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模式。但是,在本质上,铃木虎雄和狩野直喜实际上是专题学术史的开创者。

接下来,青木正二的《支那文学》(1932)、《支那文学概说》(1935)、《支那文学思想史》(1943)等专著已经是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文学通史了。而《支那近世戏曲史》(1930)、《清代文学评论史》(1950)则依然是建立在专题文学史研究角度上的著作典范。在《支那文学思想史》一书中,他用上下两篇来加以研究。上篇阐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历史,下篇则以评论为中心。他把文学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三个时期。尤其肯定了中古为文艺至上的时期。他研究了当时对文艺规律的关注和阐述。

仓石武四郎也著有《中国文学讲话》一书。此书当然也具有中国文学通史的特点。但是,其内容在考证中加入了太多的评论和轶闻,表现出很强的文史掌故特点,是笔记体文集的翻版。该书的内容如下:

一、神话の世界
二、诗歌のはじめ
三、论理と话术
四、诗人屈原
五、人间のうた
六、怪をかたる
七、北朝と南朝
八、唐の诗人たち
九、奇をつたえる
十、说教のなかから

① 译文用刘岳兵文。

十一、词のさかえ
十二、さかり场のかたりもの
十三、さかり场のうたいもの
十四、北方の剧
十五、南方の剧
十六、《三国志》と《水浒传》
十七、《西游记》と《金瓶梅》
十八、文艺批评のおこり
十九、《儒林外史》と《红楼梦》
二十、文学革命と鲁迅

可以看出，该书从上古神话一直到文学革命，完全是一幅中国文学通史的格局。作为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的弟子，吉川幸次郎也撰写有《中国文学史》一书。但此书实际上是由其口述、弟子黑川洋一整理而成。在该书中，他将中国文学同西方文学和日本文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中国古代文学的七大特色：传统的悠久性和持续性、地位的崇高性、内容的日常性、描写的精确性、高度的修辞性、强烈的政治性、典型的重要性。他认为上述七个特点是中国文学所独有的。

第二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狩野直喜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的开创者之一，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支那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他先后写下了《中国哲学史》、《两汉学术考》、《魏晋学术考》、《论语孟子研究》、《支那学文薮》等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著作。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首任教授高濑武次郎和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第二任讲座教授小岛祐马分别高度肯定了他在研究上体现出的“来自清朝考证学派。在日本学术界继承了大田锦城—海保渔村—岛田重礼这一学术体系”的治学特点。

一、先秦思想史研究

毫无疑问，在这里，对《论语》的研究是当然的重中之重。最早，王仁来日携带的古籍中就有古本《论语》。至今，日本保存了几十种不同时代、不同学者抄录的《论语》版本，对它的研究自然也就成为京都学派的学者们当然的课题。

武内义雄是狩野直喜早期的弟子之一。武内义雄1886年6月9日出生于三重县内部村小古曾町，号述庵。他的父亲是著名佛学家武内义渊。1906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支那语学、支那文学文学科。1910年，他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大阪府立图书馆、怀德堂任教。1919年4月至1920年9月，他受怀德堂的资助，来到中国留学。[①] 1920年9月，武内义雄与小岛祐马、青木正儿、本田成之、神田喜一郎等创办《支那学》杂志。1923年，他任东北帝国大学法学文学部支那学第一讲座首任教授，并以论文《老子原始》

① 见桑兵《近代日本留华学生》：“在北京的京师图书馆看到浩瀚的四库全书和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看到印行中的四部丛刊各种珍稀典籍时，心情激动不已。”《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曾为日本天皇讲授中国哲学史。1942 年，他当选为帝国学士院院士。1946 年，他从东北帝国大学退休。1960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勋章。1966 年 6 月 3 日因病去世。

主要著作有：《诸子概论》、《论语の研究》、《儒教の精神》、《儒教の伦理》、《易と中庸》、《老子原始・付诸子考略》、《老子原始》、《日本における老庄学》、《老子と庄子》、《支那思想史》、《王夫之》、《支那学研究法》、《史记残卷解说》等。翻译著作有：《礼记・大学》、《论语》、《孟子》、《老子》等。有 10 卷本的《武内义雄全集》出版。

他是京都学派在东北地区的重要代表。也是日本汉学界研究《论语》和《老子》的权威学者。

他的儿子京都大学文学部佛学教授武内义范博士也是一位汉学家，从事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专业学者。师从京都学派哲学家田边元。1995 年，武内义范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2002 年 4 月 12 日因病逝世。父子两代同为院士，这在日本并不多见。

武内义雄的弟子中最著名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哲学科教授金谷治博士。

武内义雄对先秦思想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对儒家、道家的研究两方面。

对于儒家的研究，在《论语の研究》一书中，武内义雄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以“敬”为中心和以“致良知”为中心的两派儒学，但是却没有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而这后者正是日本儒学的核心，而且符合日本国情的日本儒学才是“忠孝一本”的“诚之道”。他认为鲁论、齐论都是在古论发现以后才兴盛起来的。鲁论系统中的鲁扶卿曾从学于孔安国，齐论系统中的庸生曾从孔安国弟子都尉朝受《古文尚书》，鲁论与齐论很可能是因为对古论的解读、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学派。[①] 他还主张《论衡》中记载的齐、鲁二篇本《论语》就是今本《论语》中的《学而》与《乡党》二篇。《学而》篇记孔子及主要弟子言论，《乡党》篇记孔子日常举止，它们进入《论语》是由孟子学派后加上去的。他进而提出今本《论语》中的《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子张》、《尧曰》七篇就是最早的齐人所传七篇本《论语》。[②] 在《易と中庸》一书中，他将《表记》、《缁衣》、《坊记》三篇置于“《中庸》正本”与“《中庸》说”的中间，认为是反映子思学派思想发展的文献。而后又提出《礼记》之《中庸》、《表记》、《缁衣》、《坊记》四篇为《子思子》之一部分。于是，他将《中庸》分为以“中庸”为主题的“《中庸》正本”，和

① 见《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72 年，第 75 页。

② 见《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72 年，第 90 ~ 105 页。

以“诚”为主题的“《中庸》说”两部分。并且主张“《中庸》正本”产生在战国前期，而“《中庸》说”则出现在秦始皇统一后的观点。

对于道家的研究，1926 年，他在其所著《老子原始》一书中就提出《老子》“是荟萃种种材料而成”的观点。理由是如下五点：一、有很多句子重复现象。二、文体不一。三、相同用字却读音不一。四、相同用字却意思不一。五、内容杂道、法、兵、神仙等家之说。他利用《史记》所载老子子孙的系谱为依据，认为老聃便是老子。

在先秦时代其他哲学的研究上，他也努力以考证学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如他主张《晏子春秋》似应为淳于髡等人所作。① 他在研究《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的思想时，他认为《中庸》的前一部分，很接近子思的思想。而后一部分及其他各篇，则是明显是子思学派的作品。其他的三篇，又可以推定为战国末秦初的子思学派的著作。武内义雄认为，子思学派的导向是《周易》的经典化。可以说，对古典文献的批判研究和考证是他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最大操作方法。

武内义雄的同学小岛祐马和他的研究方法就截然不同。

小岛祐马 1881 年 12 月 3 日出生于高知县吾川郡春野町。1903 年，他从当地著名的高知县第五高中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法科大学。1907 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游学。1909 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支那哲学科，师从狩野直喜，专业研究中国思想史。1912 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京都府立第一中学任教。1916 年，转任同志社大学教授。1920 年，他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任东洋经济思想史讲座讲师。1922 年，转任文学部支那哲学科第一讲座副教授。1931 年，他接替退休的高濑武次郎的职位，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科第一讲座第二任讲座教授。同年以论文《支那古代社会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从 1936 年开始，他担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1939 年，他担任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41 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1949 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65 年，他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二等瑞宝章勋章。1966 年 11 月 10 日因病逝世。

他留下的著作有：《古代支那研究》、《社会思想史上における孟子》、《中国の革命思想》、《中国の社会思想》、《经学概说》、《中国思想：社会经济思想》、《中国思想史》等。

和武内义雄不同的是，小岛祐马在研究中国思想史时，更注重对史料的

① 见《武内义雄全集》卷八《中国思想史 稷下学》，日本角川书店，1978 年。

思想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的审查。即,从社会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过程成为他最大的研究特点。[①] 他在《支那に于ける刑罚の起源に就いて》一文中研究上古法律问题时,主张中国刑罚在起源上二元论,即所谓"族外制裁"和"族内制裁",这也就是主张"兵"与"刑"具有镇压异族的功能,因此在价值功能上被看成是相同的。[②] 而他一贯坚持的从社会思想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方法也尤其值得肯定。比如他对"商人"名称由来的理解,在《古代支那研究》一书中,他就直接追溯到西周初期,殷商王朝的贵族失去土地和权利后,只好经商为生,因而成为中国"商人"的直接来源。[③]

在先秦思想的研究上,他的《社会思想史上における孟子》一书是其代表作。

而《公羊家の三科九旨说》一文则成为代表性论文。池田秀三教授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曾评价:

> 可见春秋特别是三科九旨说对小岛来说,是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话题。小岛认为革命思想乃"纵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三千年以来一贯的根本思潮",将其断定为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课题,而上述对三科九旨说的倾倒,即起因于此。作为第二期儒家思想,小岛并列于春秋学,举出了易与五行(五德终始说),两者均为有关革命的理论,从此亦可见其对革命思想抱有不同寻常的关心。[④]

他的《古代支那研究》一书,本田济博士曾经在为收入东洋文库出版的该书前如下介绍说:"著者は草创期の京都シノロジーを代表する中国思想史家で,河上肇の终生の友でもあった。旧中国の社会と精神文化の本质を,精致にしかも雄劲な笔致で解きあかした不灭の名著の复刊。"

此书1943年由弘文堂出版,此后多次再版。1967年筑摩书房重新排版时,此书已经更名为《古代中国研究》。1988年,平凡社又再版此书。足见其学术影响力经久不息。上述几个版本都先后多次翻印。

他门下的著名弟子有重泽俊郎、木村英一、福永光司、本田济等人。

刘岳兵在《日本近代儒学研究》一书中对他有专章加以研究,该书第三章内容如下:《小岛祐马论:"共同社会"——大同理想的再兴》。引言:为什

---

① 见砺波护、藤井让治编《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2年。

② 见《东方学报》第12册第2分册,1940年。

③ 见小岛祐马《古代支那研究》,弘文堂,1943年。

④ 见《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

么要研究小岛祐马。一、小岛祐马思想基础中的诸要素分析。二、小岛祐马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社会。三、小岛祐马的思想特征与理想社会。尽管简略而且十分粗糙,但是毕竟已经开始了对他的研究之旅。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还缺乏全面而系统地研究小岛祐马的思想及其学术贡献的学术专著。

在先秦哲学的研究上,1904 年出生的著名历史学家贝塚茂树先后出版有《孔子》、《孟子》、《韩非》、《诸子百家:中国古代の思想家たち》、《论语:现代に生きる中国の知恵》等专著。其中,在《论语:现代に生きる中国の知恵》一书中,他具体分析了《论语》中《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治长》、《雍也》、《述而》七章的思想内涵及其现实意义。另一个著名历史学家宫崎市定撰有《论语の新研究》一书,该书偏重于孔子的历史及其生平事迹的考证。

重泽俊郎 1906 年生,1928 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支那哲学科。1932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小岛祐马,专业研究秦汉哲学。1937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1942 年,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讲座副教授。他以论文《原始儒家思想と经学》获文学博士学位。1950 年,他晋升为教授。1970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90 年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周汉思想研究》、《中国四大思想》、《支那古代に于ける合理的思惟の展开》、《汉代における批判哲学の成立》、《原始儒家思想と经学》、《左传人名地名索引》、《古代诸思潮の成立と展开》、《战国策固有名词索引》、《中国哲学史研究—唯心主义と唯物主义の抗争史》等。翻译著作有:《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其中,《周汉思想研究》和《原始儒家思想と经学》、《荀子研究》等著作是专门研究先秦思想的著作。在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第 13 号上有《重泽俊郎博士著作目録》一文,可供参考。

他对春秋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在《公羊传疏作者时代考》一文中,他主张郑玄的《孝经注》在南北朝时代尚未传到江南,而当时实际流传到江南地区的只是郑偁之注。[①] 他的《荀子研究》从生平、学术风格到经济、政治、法律、逻辑等各个角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荀子思想,该书是日本近现代学术界研究荀子思想的第一部专门著作。

《原始儒家思想と经学》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原始儒家思想

① 见《支那学》第 6 卷 4 号,1932 年 12 月。

的研究。在这一部分,他通过对孔子、孟子及其他弟子思想的研究,努力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原始儒家的历史观、革命观、王道思想和社会进化思想。第二部分为经学的本质。

就在中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重泽俊郎在日本共产党主办的《中国研究》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孔子·秦始皇运动和批判刘·林》[①]一文,该文针对当时国内学术界缺乏从历史事实出发、缺乏实事求是的科研态度的现状,进行了尖锐地批判。池田秀三教授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曾评价:

> 重泽首先是以严密的文献实证主义的方法,开始踏上了其作为研究者的道路。光是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泽,或被加以揶揄地宣传,然而那并不是重泽的学问之全部。直至晚年,重泽一贯地保持了其文献实证主义的方法。为了纠正对重泽的偏见,也要重新注意重泽的学问基础乃在于文献实证主义上。但是,若将重泽的学问限定为文献实证主义,则固然错误。他的本领与其师小岛一样,在于社会思想研究上,此乃毋容置疑之事实。重泽亦同样是以思想是社会的产物为自明之前提的。我想这一事实,若翻开《周汉思想研究》的话,任何人都会一目了然吧。在初期的文献学的经学研究中,亦保持着这个前提,《今古文学の本质》与《谷梁传の思想と汉の社会》即是证明。重泽首先选择经学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他认为经学才是中国思想之根干,才是中国式思考方式之典型(此源自小岛的影响,恐不必待言吧)。重泽的这种经学观之收获是《原始儒家思想と经学》一书。本书可见其对经学所下的定义:'儒家对于称之为经的这一一定范围内的古圣典所作的创造性解释学',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还有如此简明扼要的经学定义。后来,重泽的研究对象亦扩及到了法家与道家,但其自身主持的京都大学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的机关杂志《东洋の文化と社会》跨经数年连载了他的论文《周礼の思想史的研究》,正如我们可以从此事实中得知,其研究中心依然是经学、儒学,其经学观亦持而未变。[②]

木村英一1906年生。1926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科。1930年,他从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留学。1939年开始,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科讲师。1944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48年10月,他转任大

---

① 见《中国研究》1974年第3期。

② 见《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2卷第2期。

阪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讲师,[1]同时兼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49 年 8 月,他晋升为教授。他以论文《老子の新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0 年,他从大阪大学退休后,转任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1983 年因病逝世。

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哲学の探究》、《慧远研究:研究篇》、《慧远研究:遗文篇》、《老子の新研究》、《中国民众の思想と文化》。翻译著作有:《老子》等。

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上,他主要著作有:《孔子と〈论语〉》、《法家思想研究》、《老子の新研究》等。1970 ~ 1972 年,他参加 60 卷本的《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的编译工作,主编第 3 卷《论语》。刘韶军在《日本现代老子研究》一书中有专章研究了木村英一的《老子》研究。第五章内容如下:《木村英一的老子研究》。第一节,对老子其人的考察与论证。第二节,对《老子》其书的考察与论证。第三节,《老子》的原型研究。第四节,《老子》的思想分析。第五节,汉初至魏晋的老子学。从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木村老子学的特点所在。

《老子の新研究》一书,主要由以下四篇组成:第一篇《老子についての私见の出发点》,第二篇《老子の成立》,第三篇《道德经の原形》,第四篇《道德经の思想》。当然,限于当时还没有出土文献资料的参考,木村把《老子》的出现定在汉初显然是错误的。毕竟此书出版于 1959 年。这也难免此书出版后引起了町田三郎的非议。[2]

木村英一在此书中对时下日本学术界将历史事实性和思想本质性分离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他所谓的"新研究"也正是建立在这一意义上的两者统一基础上的研究。他尤其看重历史的、社会的事实在解读老子思想本质上的作用。

福永光司 1918 年出生于大分县中津市。1938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42 年,他大学毕业后应征从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到日本的高中任教。1974 年 4 月,他出任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第三讲座教授。1980 年 4 月,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82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先后转任关西大学、北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

---

① 木村英一为何放弃在京都大学的副教授不当,却跑到大阪大学当了讲师?这实在让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问了很多日本学者,谁也没有给我满意的答案。尽管他只当了两个月的讲师,就飞速地晋升为教授了。难道说是当时有人许诺他来到大阪大学可以快速晋升为教授的吗?! 因为在京都大学,木村英一恐怕没有资格和他的同学重泽俊郎竞争教授。或许,受制于只有一个教授职位的限制,而到了重泽退休时他也要一起退休、也许就没有机会晋升教授了吧。

② 町田三郎的文章见《东洋学》1959 年第 2 期,第 102 ~ 106 页。

2001年12月20日因病逝世。

他的著作甚多。作为日本道教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先秦思想史研究上也著述颇丰。他先后撰写有:《庄子:古代中国の实存主义》等。翻译著作有:《老子》、《庄子》、两卷本《列子》、与别人共译《世界古典文学全集17:老子·庄子》等。他翻译的《老子》最大的特色是"尽可能地读解《老子》的文章"。他说:"既然要把玄而又玄,难以把握的《老子》文章,用书面语言表现出来,把其浑沌逻辑分明地加以译解,就要遵从书面语言的'自然性',尽可能正确地解读《老子》的文章。"

他还说:

> 老子的无为,乃是不恣意行事,不孜孜营私,以舍弃一己的一切心思计虑,一依天地自然的理法而行的意思。在天地自然的世界,万物以各种形体而出生,而成长变化为各样的形态,各自有其一份充实的生命之开展;河边的柳树抽发绿色的芽,山中的茶花开放粉红的花蕊,鸟儿在高空上飞翔,鱼儿从深水中跃起。在这个世界,无任何作为性的意志,亦无任何价值意识,一切皆是自尔如是,自然而然,绝无任何造作。①

他在研究先秦时代道家的"气"论时,将其大致区分为用"气"来说明世界之始、天地开辟和万物生成的宇宙生成论和在天地宇宙间禀生的人怎样保全自己之生,用"气"来说明怎样得到《庄子·齐物论》中所肯定的"一受其成刑,不忘以待尽"之睿智的养生·养性两部分。《庄子:古代中国の实存主义》一书由五章构成。第一章探讨《庄子の生いたちとその时代》,从对庄子出生地的考察到庄子所处时代进行了阐述。第二章《庄子の人间观》和第三章《庄子の人生观》两章,作者在研究庄子的哲学思想与人生观之时,又处处把自己的理解注入其中,使庄子学说成为对今天尚有实用价值的学说。这就是此书成为"福永庄子"的由来。第四章《真实在の世界》和第五章《真实在の世界に游べ自由人の境界》两章是此书的核心所在。作者肯定庄子思想之时,又对"道"的实存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才是万物生存变化的根本。在《庄子:古代中国の实存主义》一书中,他在论及庄子对人世的观察时分析了庄子强调的人间世对人的生命的伤害,并且,人操作"知"的方式与耍弄武器无异。因此上他将庄子看作是中国古代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应该说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

① 见福永光司《庄子:古代中国的存在主义》,陈冠学译,三民书局,1969年。

本田济1920年1月7日生于三重县宇治山田市。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经学家本田成之博士。1936年,他从京都第一中学毕业后,考入京都第三高中。193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4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小岛祐马和重泽俊郎,专业研究先秦哲学。但很快应召从军,作为海军参加日本在南洋的作战,差点死于美军鱼雷的袭击。直到1946年,他才回到京都帝国大学,继续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他大学院毕业后就任高槻高中老师。1949年,在神田喜一郎先生提拔下,他就任大阪市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他以论文《易经の思想史的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并晋升为教授。1983年,他从大阪市立大学退休后,转任梅花女子大学教授、学长。晚年还热心在日本东京一带给财经界人士主持并举办多次"讲《易》会"。甚至这些讲义《易经讲座》也曾被出版,足见受欢迎的程度。2009年9月21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东洋思想研究》、《易学——形成と发展》、《庸齐注老子讲义录》、《中国哲学入门》、《易经讲座》等。翻译著作有:《易》、《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列传选》、《抱朴子》、《韩非子》等。主要论文有:《春秋会盟考》、《王禹偁——宋代思想史の一环》、《惠栋と焦循》、《真德秀について》等。

其中,他的博士论文《易经の思想史的研究》出版时名为《易学——形成と发展》。该书是研究先秦思想的名著。此书和他对《周易》的翻译本密切相关,《御纂周易折中》成为他研究和考证《周易》思想的底本,他对古代易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叙述。正是因为他的《周易》研究和白川静的《说文解字》研究学术专著的出现,彻底打破了当年狩野直喜曾经忠告京都学派的弟子们的"《易》和《说文》非尔等所能为也"之言!在对《周易》的注解研究上,他更多地采用了程氏《易传》的观点,以此展开他的注释活动。晚年在东京一带讲《易》时也是以程氏《易传》为本。

另外,加地伸行对儒家思想的研究,也值得介绍。

加地伸行生于1936年4月10日。195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6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1963年,他大学院修士毕业后到台湾留学两年。1965年回国后就任高野山大学文学部讲师。1970年,他转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82年,他以论文《中国论理学史研究——经学の基础的探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7年,他转任大阪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教授。1998年,他从大阪大学退休后,出任甲子园短期大学教授、学长。2003年,他转任同志社大学特命教授。2008年,他转任立命馆大学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所长。

主要著作有:《儒教とは何か》、《中国人の论理学一诸子百家から毛沢东まで》、《论语译注》、《史记——司马迁の世界》、《沈黙の宗教——儒教》等。主要论文有:《〈太史公自序〉の成立——《史记》研究その一》、《中国哲学史研究ノート》、《〈孝经〉の汉代における思想的位置》等。

在《儒教とは何か》和《沈黙の宗教——儒教》等书中,加地伸行主张儒家是一种宗教,这是他的主要观点。他重新评价儒家思想的研究引起学术界的注意。特别是他强调儒家重视生死问题、注重葬礼,因此可以视为一种宗教。晚年,他一方面大力支持日本右翼分子,一方面又开始了所谓"现代中国学"的研究。

二、秦汉思想史研究

在对于汉代董仲舒思想的研究上,狩野直喜主张今本《春秋繁露》就是《汉书·艺文志》中的《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之残存,而后经汉代学者们整理而成。重泽俊郎是研究汉代思想的专家,他在《周汉思想研究》一书中认为《春秋繁露》中的《离合根》、《保位权》和《立元神》三篇中就有法家思想,是当时注重法家思想的反映。

重泽俊郎的《汉代における批判哲学の成立》一书,1957 年 9 月由大东文化研究所出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研究王充的著作。邓红教授在《日本的王充研究综述》一文中评价重泽俊郎的汉代思想研究说:

> 狩野直喜的《两汉学术史》在 1925 年就认为王充的自然论带有唯物论色彩,其鬼神论以唯物论为基础。小岛的《中国思想史》重申了这一观点,在重泽那里得到了全面继承。重泽的"汉代以后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王充"《中国哲学史研究——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抗争史》第二部"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诸问题",是至今为止对王充唯物主义哲学最全面的阐述。……京都学派还认为王充思想是"合理主义"。所谓"合理主义"即西方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指冲破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对神学的批判而以人的"理性"来认识存在的根源和解释世界的思想流派。重泽俊郎是这一主张的集大成者,他认为自孔孟开始的中国的古代合理主义,在荀子韩非那里得到发展,给以王充的批判主义以强烈的影响,换言之,王充是汉代最大的合理主义者。(见"支那古代合理思维的展开",哈佛燕京同志社东方文化讲座,1956 年)。这一观点在日本流传甚广,在一些教科书和有关王充的论文里都有提及。周桂钿先生写有《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一书。他在《自述学术历程》一文中曾经如是评价

重泽俊郎："我发现京都大学前辈学者很多是研究先秦与秦汉哲学的，也很重视研究王充哲学。我在《王充哲学思想新探》一书中引了日本学者重泽俊郎的话，而重泽俊郎正是京都学派重要人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据重要地位。"①

福永光司在《王充の思想について——王充と老庄思想》一文中主张将老庄思想乃至魏晋思想的特征全等同为"自然的思想"。由此他展开对王充思想的研究，认为王充思想的"疾虚妄"的批判思想其实根源在于老庄思想。②

日原利国是研究两汉思想的专家。

日原利国1927年12月26日生于山梨县盐山市。1942年，他小学毕业后考入山梨县立日川中学。1945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静冈高中。194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5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哲学史。1956年，他取得修士学位后成为京都市立日吉ケ丘高中教师。1961年，他成为爱知学艺大学讲师。1962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0年，他晋升为教授。1971年，他以论文《春秋公羊传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1984年6月21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汉代思想の研究》、《春秋公羊传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春秋学の发生と春秋三传》、《华夷观念の变容》、《荀悦の规范意识について》、《汉代の刑罚における主拐主义》、《春秋公羊传における侠气の礼赞：所引の说话をめぐって》、《白虎通义研究绪论：とくに礼制を中心として》和《白虎观论议の思想史的位置づけ》等。

他的《汉代思想の研究》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六章依次是：《中世の思想》、《汉代思想研究の现状》、《灾异と谶纬》、《汉代の刑罚における主观主义》、《春秋公羊学の汉代の展开》、《王道から霸道の转换》。第二部分也由六章组成，依次为：《〈盐铁论〉の思想の研究》、《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研究绪论——とくに礼制を中心として》、《白虎观论议の思想史的位置づけ》、《王符の法思想》、《荀悦の规范意识について》。他首先从对董仲舒学说的天人关系说入手，论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出现及其学术意义。他肯定了董子的儒教国教化的观点。特别从汉代政治体制角度、从乡村共同体制的角度阐述独尊儒术的社会意义。他还以谶纬神学和儒学共同作为汉代

① 邓红《日本的王充研究综述》，《先秦两汉学术》第以期，2004年3月。

② 见《东洋史研究》1954年1月号。

政治体制的思想基础这一轴心，来分析灾异和谶纬的关系。从《易》和《春秋》等经书中解释汉代思想和政治体制。而第二部分对《盐铁论》和刑罚思想的研究，又成为对汉代思想研究的主干。

在《〈白虎通义〉研究绪论——とくに礼制を中心として》和《白虎观论议の思想史的位置づけ》等章中，他对《白虎通义》的思想特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池田秀三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春秋学研究之传统》一文中给予日原的公羊学研究很高的评价：

> 作为春秋学之泰斗，享有高名的日原利国的京大在职期间虽仅有一年多，但在讲述京都大学春秋学研究的传统之际，其名不可逸阙。因为，不仅仅由于日原是春秋学的大家，他才是最体现了这一传统的人。小岛与重泽的弟子们或多或少，受其师之影响而具有作为社会思想史家的 Vector，而其中尤其可以称为重泽的学问之正宗继承者的是日原吧。不过，日原并非是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论亦非其所取，因此更准确地说，日原是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重泽的学问继承者。我认为：日原将考察政治与社会道德上的思想意义置为研究之中心，将经学特别是春秋学作为其主要对象并非偶然，是否有意识地承袭了重泽的立场呢？①

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科出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第 7 号中有《故日原利国教授略历・著作目录》一文。

三、魏晋隋唐思想史研究

在魏晋思想的研究上，和内藤博士的隋唐一体而唐宋分离的研究观点相一致，在思想史的研究上，也是采取了这一断代模式。

宫川尚志生于 1913 年。1932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36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羽田亨，专业研究隋唐史。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出国留学两年。回国后就任东海大学文学部讲师、副教授、教授。1976 年，他以论文《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6 年 8 月 2 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六朝史研究・宗教篇》、《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

① 见《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 2 卷第 2 期。

《六朝宗教史》等。主要论文有:《六朝时代女性の宗教生活》、《中正制度の研究》、《天台大师以前の天台山》、《道教鬼神论》、《唐室の创业と茅山派道教》、《民间の巫祝道と祠庙の信仰》、《南宋の道士白玉蟾の事迹》、《魏晋及び南朝の寒门・寒人》等。

他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六朝佛教和道教思想的研究,一是对内藤湖南中世说的大力介绍。他对六朝时代宗教的研究,开启了以后日本汉学界注重六朝时代思想研究的先河。特别是他的佛道交涉史的比较研究方法,至今还是京都学派中国思想史研究活动中对六朝思想研究的主要模式。

吉川忠夫是京都学派研究魏晋思想的代表。

吉川忠夫生于1937年1月5日。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京都学派第二代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1955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9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中国文学研究科。1964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来到东海大学文学部任讲师。1966年,他晋升为副教授。然后调入京都大学教养部任副教授。1974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4年,他晋升为教授,并以论文《六朝精神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91年,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2000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花园大学客座教授・国际禅学研究所所长。2002年,他转任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2006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直到最近的2009年1月9日,他还成为天皇的教师,进宫讲授"后汉、六朝时代における中国人の佛教受容"课程。

主要著作有:《刘裕:江南の英雄宋の武帝》、《王羲之:六朝贵族の世界》、《侯景の乱始末記》、《六朝精神史研究》、《中国古代人の梦と死》、《秦の始皇帝》、《书と道教の周边》、《古代中国人の不死幻想》、《风呂で读む竹林の七贤》、《中国人の宗教意识》等。主编有:《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六朝道教の研究》、《唐代の宗教》、《郑玄の学塾》等。翻译(含合译)著作有:全十卷的《后汉书》、《魏晋清谈集》、《世说新语》、《汉书五行志》、《弘明集・广弘明集》、《慧皎・高僧传》、《真诰研究・译注篇》、《周氏冥通記研究・译注篇》等。

他的著述很多,但最有名的专著是《六朝精神史研究》,也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由五部分15章组成,内容如下:

序章　六朝士大夫の精神生活

第Ⅰ部　汉代から六朝へ

第一章　党锢と学问——とくに何休の场合

第二章　真人と革命
第Ⅱ部　范氏研究
第三章　范宁の学问
第四章　踞食论争をめくって
第五章　范晔と刘知几
第六章　范晔と后汉末期
第Ⅲ部　沈约研究
第七章　沈约の传记と生活
第八章　沈约の思想
第Ⅳ部　颜氏研究
第九章　颜之推论
第十章　颜师古の汉书注
第Ⅴ部　六朝人と宗教
第十一章　师受考——抱朴子内篇によせて
第十二章　中土边图の论争
第十三章　夷夏论争
第十四章　中国におけるの排佛论の形成
第十五章　六朝时代孝经の受容

他对六朝时代的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有很精湛的研究。在该书中,他详细地论述了沈约、颜之推、范晔等六朝士大夫的思想发展,以及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纷争等。

吉川忠夫在研究当时的思想状况时,他首先从传统的儒家思想入手。他发现:儒教对于超越世界的问题敬而远之,这使得面对体制崩溃,作为孤绝与社会的个体而密切关心生死问题的人,开始转向了对老庄思想的关注,借以灌溉他们干渴的精神。相应的,还有对佛教的渴求。他先从当时的文化意识的改变谈起。他指出,在魏晋时代的思想和文化界出现了把域外的印度当作中土、而把中国当作边土的流行看法,这一意识变化的情况,说明了传统的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到魏晋南北朝时代已逐渐淡化了。另一方面,固有的道家思想和道教的结合,在汉魏变革之际,五斗米道首先承认革命并拥戴曹魏政权这一事实,可以认为在对内外显示曹魏政权的神秘性上是有一定的辅助意义的。而早期道教的修炼"静室"大多设在名山大川之间,并备有香炉、香灯、章案、书刀等工具,供修行者静坐思过、与神交接。这和传统的隐逸行为是息息相通的。于是,五斗米道理所当然地受到曹魏政权的支持和保护。琅邪王氏、高平郗氏等东晋贵族和王室成员们成为其信

徒。但是，尽管如此，吉川忠夫经过研究发现，道教和佛教在当时的核心表现还是以儒家思想和礼制为主。特别是当否定上述两教的思想时，传统儒家的礼制成了三教共同恪守的准则。①

福永光司《魏晋思想史研究》一书也是有关这一时代的研究专著。他在《谢灵运の思想》一文中指出：

> 谢灵运的老庄思想，贯穿于他生活中的各个时期，但表现最充分的是第二、三时期。盖第二时期是流放永嘉的不遇时代，第三时期是仕途绝望的始宁归隐时代，因此处于生活中最易与老庄思想结缘的环境。……这一时期成为他老庄思想之核心的是自适思想。……谢灵运的"自适"，最具体的便是沉浸在山水自然之中。……山水的清旷使人精神清旷，在这精神清旷中，便建立了人真正的幸福，山水使人精神愉悦、净化，使人成为宇宙万物之一。在这层意义上，山水成为实践自适哲学的最佳场所。②

四、宋元思想史研究

在某种意义上说，宋明思想史的研究核心一直是九州大学。从该大学中国哲学科开山祖师楠本正继开始，中经荒木见悟、冈田武彦，直到福田殖、佐藤仁等人，他们一直从事着对宋明理学的研究。直到岛田虔次宋明思想研究论著的先后出现，才使得京都学派的宋明理学研究一时间蔚然大观。③

汤浅幸孙 1917 年生于冈山县上道郡富山村。他的父亲汤浅廉孙是著名的京都第三高中的教授。1941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科。1945 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山口大学文理学部副教授。1961 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副教授。1970 年，他晋升为教授。并以论文《中国伦理思想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3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86 年，他任佛教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教授。1988 年，他从佛教大学退休。1990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三等旭日中勋章。2003 年 2 月 28 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伦理思想の研究》、《京都大学汉籍善本丛书》、《两

---

① 参见《六朝精神史研究》的《真人と革命》、《静室考》和《踞食论争》等篇。

② 见宋红《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

③ 李今山在《日本当代儒学家冈田武彦》一文中主张楠本正继毕业于京都大学中国哲学科。此说错误。楠本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科，是宇野哲人的弟子。

苏经解》。翻译著作有:《翰苑校释》、《近思录》、《孟子》等。整理出版了其父的遗著《初学汉文解释ニ于ケル连文ノ利用》一书。

他的儿子汤浅和夫是冈山大学教授。

在《中国伦理思想の研究》一书中,他的《シナに于ける贞节观念の变迁》和《清代に于ける妇人解放论:礼教と人间的自然》二文对于古代中国社会中贞节问题的伦理学意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汤浅幸孙教授的研究主要围绕在中国伦理思想史和宋代理学。

我的同门师弟石立善博士在《战后日本的朱子学研究史述评:1946~2006》一文中如此评价:

> 与京都大学的历代中国哲学史教授不同,汤浅善于运用西洋哲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思想。汤浅精通德国哲学,尤其受黑格尔与韦伯的影响较大。他在本书中,用韦伯的"存心伦理"(Gesinnungsethik)与"责任伦理"(Verantwortungsethik)两个范畴来解释中国思想的伦理规范。汤浅认为,与西欧思想史相比,中国思想史的一大特征就是排斥"存心伦理"。此书的贡献,在于确定春秋公羊学与朱子学的伦理属于"存心伦理"。虽然近年有些大陆与台湾的学者将春秋公羊学与朱子的伦理学判定为"责任伦理",但笔者的看法与汤浅完全一致。汤浅还有一个创见是在"存心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外,提出"世间体伦理"的范畴,用以解释说明东方伦理的道德规范。小说与笔记作为思想史的材料,同儒教经典一样受到了作者的重视,堪称本书的一大特点。①

竺沙雅章1930年出生在京都府。1949年他从高中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3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1981年,他晋升为教授。并以论文《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93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大谷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苏东坡》、《范仲淹》、《宋の太祖と太宗:变革期の帝王たち》、《征服王朝の时代》、《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汉文大藏经の历史——特に宋元版大藏经について》、《宋元佛教における庵堂》、《中国における政治と宗教》、《敦煌吐鲁番期の僧官制度》、《宋代官僚の寄居について》、《宋代における东アジア佛教の交流》等。

---

① 见《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他是研究宋元思想、特别是宗教思想的专家。

在《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一书中，他提出宋元时代的中国华北、杭州仍有法相宗的发展踪迹，法相宗之学并没有中断，只是没有像天台宗、华严宗、禅宗那样兴盛而已。而对于当时的摩尼教，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王国维在《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一文中研究了所谓摩尼教"吃菜事魔"的表现问题。自此以后，国内学术界不少学者都把有关"吃菜事魔"的记载归为摩尼教的行为。

竺沙雅章在《吃菜事魔について》一文中则主张：

> 不能因为一见记载中有"吃菜事魔"字样的，就一概视作摩尼教的资料。但是，资料的记录者对于诸秘密宗教的识别究竟明确到何等程度，尚属疑问。况且，当局在取缔邪教时并不管它是否为摩尼教，而只是针对所有不可靠的宗教社团，因此在上呈的报告中并未对这些社团加以严格的区分。有鉴于此，即使记载中称为"吃菜事魔"的，也不能一律断定它们是摩尼教。[①]

他在《方腊の乱と吃菜事魔》[②]一文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继续的研究。

对于朱子的思想，著名汉学大师岛田虔次在《中国の传统思想》一书中，他如此评价：

> 朱子学は空前绝后の体系的哲学であり、それ以前の中国民族の思想的な成果はすべてそのなかにとりこまれているといってよい。つまり、中国民族の最大公约数的な表现が朱子学で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のである。

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京都学派乃至日本汉学界对朱子思想的价值评定。当时，跟着他一起研究朱子思想的是我的博士生时代的导师三浦国雄。那时，他正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最近，日本关西大学《东アジア文化交涉研究》别册5号中还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 三浦教授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において田中谦二教授、岛田虔次教授らのもとで《语类》研究を早くから进めてこられた先驱者である。

1979年，三浦国雄出版了他研究朱子的传记《朱子》一书。该书在利用

---

① 见《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省心书房，1974年，第259页。

② 见《东洋史研究》1974年第3期。

《朱子语类》和书信集的基础上,研究并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朱子形象。而且,他还注意到了朱子思想对朝鲜儒学的影响,显得尤其有特色。这一特点还表现在他对《周易》的注解中。实际上,他对中国思想的理解一直处在宋代理学的基础上。

五、明清思想史研究

岛田虔次1917年8月生于广岛县三次市。1938年,从广岛县立三次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在宫崎市定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东洋史研究。1941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长野县立野泽中学教师。1943年,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同年应征入伍。1949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69年,他晋升为教授。1966年至1975年间,岛田虔次还领导主持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辛亥革命研究班"和"五四运动研究班"。1975年,他转任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三讲座教授。1981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97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2000年3月21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中国革命の先驱者たち》、《新儒家哲学について:熊十力の哲学》、《朱子学と阳明学》、《隐者の尊重——中国の历史哲学》、《中国の传统思想》、《中国思想史の研究》等。翻译著作有:《大学・中庸》、《王阳明集》等。主要论文有:《明代文化の庶民性》、《体用の历史に寄せて》、《宋学の展开》、《中国での兆民受容》、《ある阳明学理解について》、《章学诚の位置》、《明代思想の一基调——スケッチ》、《中国近世の主观唯心论について——万物一体の仁の思想》等。

他曾经说:"京都的中国学是以与中国人相同的思考方法、与中国人相同的感受方式来理解中国为基本学风的。"[①]那么,他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是首先从这一特点着手的。

2002年,出版了他的遗著《中国思想史の研究》一书,其实就是一部研究明清思想史的论文集。该书由4部共22篇论文构成,如下:第一部《关于中国近世的主观唯心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第二部《阳明学中人的概念与自我意识的展开及其意义》、《王龙溪先生谈话录及解说》、《儒教的叛逆者李贽(李卓吾)》、《异人邓豁渠略传》、《浅议明代思想的一种基调》、《王学左派论批判之批判》、《关于某个阳明学理解》、《评朱谦之〈李贽——十六

① 见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钱婉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第三部《论“体用”的历史》、《桓玄和慧远的礼敬问题》、《宋学的展开》、《杨慈湖》、《三浦梅园的哲学——从远东儒学思想史的角度来考察》、《日本学界中国思想史研究之动向——到1959年为止》,第四部《历史性的理性批判——“六经皆史”说》、《章学诚的历史地位》、《清朝末期学术的状况》、《辛亥革命时期的孔子问题》、《儒教中有生命的东西》、《对“儒教和二十一世纪”的建议》、《黄宗羲·横井小楠·孙文》。①

而他的另一部专著《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则早已经是国内学术界尽人皆知的了,也是他的成名作。该书1949年出版,由以下四章构成:第一章《王阳明:作为人的自然的圣人》、第二章《泰州学派:从大丈夫到“吾”》、第三章《李卓吾:童心——新的“人伦物理”之发现》、第四章《一般的考察:近代士大夫的生活和意识》、补论《王学左派论批判的批判》。② 该书对王阳明、泰州学派和李卓吾三人的所谓“王学左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活动和影响展开研究,重点分析了近代市民意识和伦理价值观的兴起,并且完整地勾画了阳明学所标志的个体、理性、自主精神在中国近世的崛起和陨落的全过程。

岛田虔次发现随着六朝隋唐贵族制时代的结束,宋代开始了近世的君主独裁体制。在这一大环境下,士大夫阶层通过科举成为进士,变成新兴的政治势力。到了明代,士大夫阶层的参政意识热情,在学理上产生了朱子学到阳明学的变迁,而阳明学发展壮大成为泰州学派,出现了李卓吾那样极端的思想家。对于李卓吾思想的出现,他认为:“如果心学的人的概念之新局面从天理这一方面无法打开的时候,那么,就只能从人欲这一方面,从对人欲的容许与肯定着手。”他认为李贽是继泰州学之后,最能体现中国“近代精神”的思想家。岛田虔次更通过对晚明士大夫阶层生活与意识形态的分析,以说明三教合一思想对士大夫阶层生活的部分渗透。他将李贽思想称为中国近代思维的一个顶点,给李贽以极高的评价。

由于该书使用的“近代”这一概念,明显有别于国内历史学界,和京都学派的近世说上下呼应,开启了战后的日本汉学界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模式。该书出版后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它的影响力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阳明学和明末儒学成为研究热潮。

对于如何理解这里出现的“挫折”一词,我想引用吴震教授对此书的评

① 译文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出版邓红译《中国思想史研究》。

② 译文见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价中的一段论述,他以为:

> 岛田此后一直坚持认为,中国思想既具有独特性,同时又可以通过将其与西方思想进行比较之后,从中找到两者的异质性之所在,进而就可以发现中国思想的普遍价值及其在世界精神发展史上的独特意义。并且有可能以此来纠正致力于建构"知识论"体系的西方思想的某些"偏见"。显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方法"的问题,而这正是岛田的中国研究所自觉使用的"一种方法"。由此可见,岛田的中国研究已经与传统的京都学派大异其趣。诚如他的学生小野和子所指出的那样,"明末清初"这一时代,经岛田的一系列研究工作而被"重新发现,至少在日本是如此"(《中国的传统思想·解说》第429页)。这是说,岛田一反以往京都学派将明代思想视为"空疏之学"而加以蔑视的传统看法,通过致力于明代思想的研究挖掘,从而"发现"了明末清初的思想意义,并得出结论说,清代考据学并不是以奉行实证主义为自豪的京都学派所认为的那样——是什么中国学术思想的最高峰,相反,清代实是一个令人感到"悲惨"的文明时代,其学术思想在规模上是极其"狭小"的,其对明末思想动向所绽露出来的"近代进程"则是一种"扼杀"。晚明以后,开始激发出来的对名教体制形成冲击的那种"能量"被扭曲变形,由此产生的学术形态便是所谓的追求精细的清代考据学。①

吉田公平、市来津由彦合著的《日本宋明理学研究情况概述》一文中,对岛田虔次的《中国における近代思惟の挫折》一书进行了如下评价:

> 该书广泛地放眼于宋、明、清的基础上,解析了明代后期的王阳明—泰州学派—李贽的思想及其行动,揭示了近代思维的萌芽。它不只是对思维构造进行了逻辑性的分析,而且把驱使他们的思想和行动的热情作为思想来叙述。这是以前的宋明理学思想研究中根本没有的一个很大的特色。②

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对于岛田虔次的汉学研究尤其是他的宋明理学研究,有很高的评价。余先生多次使用了"伟大的"来称赞岛田虔次。把日本的宋明理学研究从传统的九州学派的模式中带出来,并开拓了国际汉学界对明代思想的注重和研究,给我国的中国思想史学界以极大的震撼和影响。

---

① 见《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② 吉田公平、市来津由彦《日本宋明理学研究情况概述》,《中州学刊》1985年第3期。

岛田虔次先生的学术贡献足以担当得起“伟大的”这一称号！[①]

六、道教研究

吉川忠夫教授主编出版了《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六朝道教の研究》、《真诰研究·译注篇》等专著，对于提高京都学派的道教研究水准，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木村英一也已经开始了道教研究。他曾和别人合著了三卷本的《道教》一书。他主张把作为哲学的道教和作为宗教的道教要区分开来。他认为作为哲学的道教就是先秦时代的老庄学说，而作为宗教的道教则是汉代开始的各种道家学派。可是，他不承认宗教的道教是哲学的道教蜕化的产物。宫川尚志研究了六朝道教的传人多出自寒门这一事实，因而得出了道教被称为庶民宗教的真正由来。

但是，在京都学派，真正对道教开始大规模研究的是福永光司。

福永光司是京都学派乃至日本汉学界道教研究的第一人。他撰写的专著和合著，先后有：《道教と日本文化》、《古代日本と江南の道教》、《道教と日本思想》、《道教思想史研究》、《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日本古代史·新考》、《日本の道教遗迹》、《道教と东アジア：中国·朝鲜·日本》等。

福永光司本来是研究儒家思想的。他年轻时代身体强壮，但是很快他被宣布从军。在经历了血腥的太平洋战场后，他开始思考老庄思想和道教关于生与死的问题。“二战”结束后，他回到家乡的高中，一边教书一边翻译《庄子》。当时，日本学术界对于研究中国道教还是不太支持。他后来回忆说，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访华归来的日本著名学者曾经指责说：“类似道教这样的东西，国立大学的教授却在研究，这成什么事了?！那些不过是迷信而已。”可见，对道教的研究在战前和战后的日本，都很难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当时已经产生了小柳司气太、福井康顺、吉冈义丰等著名道教研究的专业学者。直到1974年4月，他成为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第三讲座教授时起，才正式开始了在日本著名大学里讲授道教课程的生涯。他一反过去日本学术界鄙视道教的立场，发表了大量有关日本的天皇制度和社会文化同道教的关系的论著。从此，日本的道教研究和东洋史、中国哲

---

① 当我的导师、岛田虔次先生曾经的学生三浦国雄教授在匆匆出席完我的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后，立刻前去京都——哀悼那天凌晨刚刚去世的岛田虔次先生！那一天新生的我和逝去的岛田虔次先生的学术生命实现了交替，岛田虔次先生的一生是从对历史学的研究转向了对思想史的研究，而我却从对思想史的研究回归到对历史学的研究。

学史、中国佛教史研究一样，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点上，福永光司功不可没，因此他才被人称为日本道教研究第一人。尤其是他对道教和古代日本历史、思想和文化的相关研究，丰富和开拓了日本思想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和视野。

在《道教の天神降临授诫》一文中，他指出了道教具有完整的宗教哲学思想体系，他认为：

> 在对于道教神学或者教义作为基轴进行思想史的分析考察时，我们坚持认为道教神学同中国思想史的不同时代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它是中国的民族的具有超时空的绝对的皈依宗教的感情、信仰和祈求、思维和思辨的历史的博大的蓄积。

对于道教信仰中的海上仙山等传说，福永光司认为蓬莱仙境并不能单纯地说是因海市蜃楼的幻想而产生的。实际上，它是承袭自渤海中有海岛神山的古代信仰而来，而仙人就是神山上的神灵鬼神拟人化之后的产物。而对于昆仑山，他又主张把昆仑山作为"天地之中"，使之与天枢——北极星相对应，与作为"太帝之居"的北极紫微宫相对应的广大的世界地理学说，就原封不动地成为六朝时期以后道教宇宙构造论的原型。①

他还注意到了佛和道二教之间在具体修行技术上的互补行为。在《佛道儒三教交涉记おける"气"の思想》一文中，他发现佛教在汉魏六朝时代具有重"理"而不重"气"的特点。而进入隋唐以后，加强了与道教的互补，佛教在具体修行技术上也出现了道教的胎息服气、吐纳导引等技术和医学实践内容。②

在《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③一书中，福永光司指出，天皇的名称和皇族仪式、礼节等方面内容都是向中国的道教学习而得来的。古代天皇还曾自称为"真人"。象征天皇地位和权力的神器镜和剑，也是直接来自道教传统的法器。④ 甚至日本古代重要的古典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所记载的"神代卷"中的情节和思想，显然也是直接继承了中国道教的经典。日本留学僧在隋唐时代广泛学习中国道教的方技，并把大量的道教经典带回日本。为日本平安时代兴起的庚申信仰准备了基础。正是从这一科学而客观

---

① 见福永光司等人《气の思想：中国における自然观と人间观の展开》，李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② 见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岩波书店，1987年，第363～374页。

③ 见福永光司、上田正昭、上山春平《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日本古代史·新考》，德间书店，1978年。

④ 见福永光司《道教におけゐ镜と剑.その思想の源流》，《东方学报》第45卷，1973年。

的立场出发,福永光司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福永光司教授的研究,对于中日关系史、日本思想史、日本政治史、道教传播史等方面,都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小南一郎博士的个人研究范围极其广泛而且深入。他的名著《中国の神话と物语り:古小说史の展开》(1984)、《西王母と七夕传承》(1991)二书中都曾涉及了原始道教的研究。在道教研究上,他的主要论文有:《神仙传——新しい神仙思想》、《盂兰盆经から目连变文へ——讲经と语り物文艺との间》、《十王经をめぐる信仰と仪礼》、《桃の传说》等。

在《中国の神话と物語り:古小说史の展开》一书中,由以下四章组成:第一章《西王母与七夕文化传承》、第二章《〈西京杂记〉的传承者》、第三章《〈神仙传〉——新神仙思想》、第四章《〈汉武帝内传〉的形成》。而其内容则几乎全部是以魏晋六朝时代的道教信仰为核心。

小南一郎认为,神仙思想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葛洪《抱朴子内篇》所代表的"自力本愿"的神仙思想;另一种是与道教信仰相结合的"他力本愿"的神仙思想。后者是在前者的风化变质中逐渐显露出来的,并含有复归到民众神仙信仰的倾向。①

就《观世音应验记三种》一书的再发现,小南一郎撰文详细阐述了该书的重新发现在道教史研究上的意义。

麦谷邦夫生于1948年。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科。197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思想史。1977年,他大学院毕业后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主要著作有:《老子想尔注索引》、《真诰索引》、《陶弘景年谱考略》等。编著有:《江南道教の研究》、《三教交涉论丛》、《中国中世社会と宗教》等。主要论文有:《道教における天界说の诸相》、《梁天监十八年纪年铭墓磚と天监年间の陶弘景》、《六朝隋唐期道教における"心"略论》、《真父母考——道教における真父母の概念と孝をめぐって》、《华阳隐居への道——若き日の陶弘景と草创期の茅山》、《〈道教义枢〉と南北朝隋初唐期の道教教理学》、《唐代老子注释学と佛教》等。

可以看出,麦谷邦夫主要以六朝思想和道教、佛教道教交涉史为研究方向。而且他还十分关注我国出土文献的研究。《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养生方"释文》一文,首先在《马王堆医书研究专刊》1981年第2期上刊登。

---

① 见小南一郎《中国的神话与古小说》,中华书局,1993年,第198页。

当赤堀昭带领日本医学代表团来访时，马王堆医学会将此刊当作见面礼赠送。结果，《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竹简“养生方”释文》被他抢先翻译、注解在日本发表。

在《〈道教义枢〉と南北朝隋初唐期の道教教理学》一文中，他主张由佛教所挑起的关于自然、因缘的争论，迫使道教方面在探索教义的合理性、完整性上经历了如下的变迁，即开始阶段以《本际经》、《玄门大义》、《道教义枢》为代表，依据佛教教义主张因缘优先。但是这种因缘优先说后来又逐渐地转向主张因缘与自然处于对等地位、相即不离的方向上去了。到了玄宗朝时期，后一说法则成为道教方面的共同认识。①

在《道家·道教における气》一文中，他集中精力对六朝时代道教有关“气”的理论和修炼方法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在道教研究上贡献卓著的还有坂出祥伸先生。

坂出祥伸1934年3月3日生于鸟取县。1953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大阪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师从重泽俊郎，专业研究中国思想史。1986年，他出任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他以论文《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从关西大学退休后转任森之宫医疗保健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主要著作有：《道教とはなにか》、《康有为传》、《东西シノロジー事情》、《中国古代の占法——技术と呪术の周边》、《中国近代の思想と科学》等。主编有：《中国古代养生思想の总合的研究》、《秦汉思想研究文献目录》等。合著有：《道教的密教的辟邪呪物の调查·研究》、《大英博物馆所藏汉籍目录解题》等。主要论文有：《“气”と养生·风水——感应する身体·大地》、《胡适の留学时代》、《神仙思想の身体观——养形と内观を中心に》、《科学者としての沈括》、《我国における中国哲学研究の回顾と展望》、《清末における西欧论理学の受容について》、《方术传の成立とその性格》、《孙思邈における医疗と道教》、《戊戌变法期における康有为の明治维新论》、《冥界の道教的神格——急急如律令をめぐって》等。

在《道教とはなにか》一书中，他用了10章篇幅介绍了道教的历史和流派，以及主要经典。特别是后三章，他对日本的道教、道教和医学、道教和气功也进行了说明。他主持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道教研究班的研究活动，曾长期担任日本道教学会会长。组织编写了《道教大辞典》等。而且，他的道教研究更多倾向于中国科技史的研究，这使他更多地和医学史研究密

① 见圣凯《论六朝隋唐道教的自然义》，《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3期。

切合作。坂出祥伸的研究在以对古代文献的考证的基础上，以科技思想史学作为衡量道教经典和流派的水准，他和国内学术界所谓的道教文化学、道教哲学的研究模式是不一样的。

七、通史研究

已有松本文三郎《支那哲学史》一书中第一次把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划分为“创作时代”、“训诂时代”、“扩张时代”三个阶段。松本文三郎1898年出版的《支那哲学史》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行总结和研究的专题学术著作。在此书中，他把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自东周至秦为创始期、自西汉至五代为训诂期、自宋至清为扩张期。他特别把自宋至清划分为一个时期内，先于内藤湖南的近世说的提出。后来的内藤近世说只是从中国古代史分期的角度上正式提出而已。而他在该书中以哲学家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来解释中国哲学流派的形成原因，在学理上和内藤史学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也是若即若离的。因此，出身于东京帝国大学的松本，在学术思想上和后起的内藤史学是一脉相通的。他在该书中还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缺乏内在的逻辑性，这反映出他当时以西方哲学体系来研究中国哲学的一个特征。

狩野直喜是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和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院的开创者之一，是日本中国学中的实证主义先驱者和奠基者之一，是“京都支那学”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在通史研究上，他写下的《中国哲学史》一书，1953年作为遗著被整理出版。吉川幸次郎在为此书写的序中，如是评价狩野直喜：“学风最具特征者，精确读书，不忽诸一字一句，以博综为旨。崇尚实在，以见识为先。于经最嗜礼，所宗郑玄之注、孔颖达、贾公彦之疏。于宋儒喜王应麟，于清儒喜顾炎武，于本邦之儒，专唱伊、物二子。”

由此可见他的此书之特点。

根据他对中国古典思想发展和变化的了解，他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孔子以前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汉唐时期、宋元明时期、清代。如果我们把前两个时期看成上古的话，汉唐的中古和宋元明的近世划分问题，在狩野史学那里可以说是虽不曾明言，也是“英雄所见略同”的。那么他和内藤史学的断代差异首先出现在“清代”独立于“宋元明时期之外”这一显著特征。为此，坂出祥伸在《中国哲学研究の回顾と展望》一文中曾经评价此书：

它的第一个特色是把中国哲学史定义为“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历

史”。成为这一范围的有经学(汉唐训诂学、清代考证学)、诸子学、宋明理学……它的第二个特色是把中国哲学史并不限定为经学研究的历史,而是开拓成包括诸子学在内的古典研究的历史。①

狩野直喜把古代学案体著作看成是古代哲学史的记录的观点,是他的学术史和哲学史概念等同的主要标志和表现。古典学包括了对古典的考证学,基于这样一种观念,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给清代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学术史成了哲学史的集中表现。而考证学作为经学的辅助,成为哲学史的研究范畴。在治学特点上,他全盘继承了岛田重礼的考证学传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上把汉唐训诂、宋元义理、清代考证三者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反对当时刚流行的以西方思辨哲学的某一纯粹理论框架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的现象。狩野直喜把传统的经学的研究学派归纳为“传经派”与“传道派”两类,他把当时不被程朱理学家们看重的汉唐训诂之学,提到了与宋明理学相等的学术地位上。他还把在文学研究上的俗文学研究引到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上,注意到了道教作为民间信仰在中国哲学研究上的特殊地位和学术研究价值。但是,狩野直喜却坚持着经学为中国哲学史的核心这样一种信念,从他对孔孟思想的认识开始,他赞成孟子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又从宋代的历史背景下,研究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在宋代倍受关注的原因。而从古典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从他开山之后,至今还是支那哲学京都学派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到了他的弟子小岛祐马和武内义雄、本田成之②等人那里又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确定。

高濑武次郎作为真正意义上的支那哲学史第一讲座第一任教授,1910年出版了《支那哲学史》一书。该书虽然对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但是,该书并没有对传统的春秋公羊学的思想史意义进行解说,而是以宋明理学思想为核心内容,并表现出以西方哲学体系来建构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历史的努力。这和当时狩野直喜对中国哲学的定义和研究范围的理解有了一定的距离。

武内义雄应该算是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早期开设支那哲学史讲座的第一批学生。他后来出版了《支那哲学史》一书。此书战前和战后曾多次

---

① 见坂出祥伸《东西ンノロジ一事情》,东方书店,1994年。

② 在20世纪30年代,本田成之博士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大名鼎鼎。他的儿子就是著名易学家本田济博士,本田济是我在博士生时代导师三浦国雄的导师。1996年,本田济博士以近80岁之高龄,亲自出席我在关西大学举行的《彭と楚文化の关系に就て:马王堆帛书周易を中心として》学术报告会。而实在来不了的老一代著名汉学家、中国哲学史家金谷治博士亲自给我写来了贺信。老一代日本著名汉学家给与我本人的这些厚爱是永远也无法忘记的。

再版。战后再版时更名为《中国思想史》。此书是以思想的发展为线索展开的，而且注意到了对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均衡叙述。他对引用原始文献的校对研究，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也是他的考证学功夫的集中体现。他把古代哲学史分为上世期、中世期和近世期三个阶段。在近世和中世两期，他使用了很多篇幅阐述了佛教思想的发展历程。在阐述宋明理学思想时，特别注意到了佛教和道教的思想对宋明理学思想的辅助和启发。比如，他对宋明理思想和佛教华严宗思想的对比研究、他对宋明理学的末端走上佛教禅宗思想的论述，都是十分准确的。特别需要点明一点：他并没有完全赞同狩野直喜的把考证学也列入哲学史的做法，他认为“考据学”本身并不是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武内义雄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注重对文献的分析研究上，继承了京都学派的传统。他发现考据学的发达从而导致了程朱理学思想的真正瓦解。他对《公羊传》和《谷梁传》中的“革命思想”也是持否定态度。

武内义雄的此书由30章组成。上世期从远古到东汉时代。中世期从魏晋到唐代。近世期则从宋代到清代。他首先从《支那古代の民族信仰》开始著述，重点分析了天、帝等概念在中国古代的出现及其意义。然后对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进行分析研究。接着，他又对墨子的思想进行分类研究。先秦诸子的思想由此全面展开。而他在该书中还特别集中研究了三教的交涉史，对佛教哲学各宗的出现展开了详细地论述。在对近世的研究中，他以《易》和《中庸》为一个核心，以《春秋》为另一个核心展开研究。这两条线索十分清楚，为朱子和王阳明思想的出现找到了学理的发展根据。

狩野直喜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给清代以特殊的意义和地位，学术史成了哲学史的集中表现。而考证学作为经学的辅助，成为哲学史的研究范畴。这一对哲学史的认识到了他的弟子小岛祐马那里，“中国哲学史”的概念第一次得到了极端阐述。小岛祐马的《中国思想史》一书1968年作为遗著出版。此书也是在他讲义的基础上，由他的学生平冈武夫、森三树三郎整理而成的。

周桂殿《学术历程自述》一文中说：

> 小岛祐马认为，这样研究中国哲学不是好思路，从中国古籍中找出一些与西方哲学相类似的语言，然后拼凑成中国哲学。因为这样要破坏中国思想体系的完整性，使人难以把握中国思想的精髓。但是，小岛祐马认为中国只有“思想”，没有西方那种“哲学”。因此，他给学生开的课是“思想史”，而不是“哲学史”。

这一时期,本田成之的《支那经学史论》也是一部研究宋明理学思想的专题著作。

小岛祐马的《中国思想史》出现之后的几十年来,京都学派的中国思想通史研究更多的是集体编著或就若干专题而编著的形式而出现的。一个人独立著述的现象非常少见了。专业化的研究代替了通史研究。

第三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一、商周史研究

贝塚茂树本名小川茂树，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1945年。

小川茂树1904年5月1日生于东京都麻布区灵南坂町。他的父亲是京都学派历史地理学创始人小川琢治。1911年，他在京都市立京极寻常小学上学。1917年，他考入京都市立第一中学。1921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1924年，他从第三高中直接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8年3月，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支那史学研究科，专业从事中国史研究。同年4月，他代表狩野直喜来到北京出席正在召开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会议，开始了他的短暂的留学和访问。也正是在这时，他亲自到昆明湖去凭吊他仰慕很久而不幸已经逝世的王国维。也许，那一刻他已经定下了要终生研究商周史的决心吧。回国后，他在桑原骘藏的指导下，研究《史记索引》的著述工作。1932年5月，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在羽田亨的指导下，研究"支那古代の封建制度"。1935年，他还是在羽田亨的指导下，开始了甲骨文和金文的研究——羽田亨这老爷子居然还懂这些玩意，我怎么也没想到！真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毕竟当时日本大学中的指导教授和时下国内大学的指导教授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1942年，小川茂树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1945年，因为他的岳父贝塚荣之助战死，于是，作为女婿的他，为了合理继承全部遗产，按照日本的规定，他改变身份为婿养子，从此以后正式更名为贝塚茂树。1949年4月，他晋升为新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当年10月，他接任新的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61年11月以论文《中国古代史学の发展》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74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

二等瑞宝章勋章。1979年,他成为人文科学协会理事长。1981年,他当选为东方学会会长。1984年11月,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1987年2月9日因病逝世。

在日本京都学派,他率先提出了对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并且将其和传统的对史料的考证性研究精密地统合起来,使京都学派更加完美和与时俱进。不但如此,受其父亲对现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他也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保持着高度的兴趣和研究努力。

主要著作有:《孔子》、《孟子》、《韩非》、《诸子百家:中国古代の思想家たち》、《论语:现代に生きる中国の知恵》、《史记:中国古代の人びと》、《中国の历史(上)》、《中国の历史(中)》、《中国の历史(下)》、《中国古代史学の发展》、《中国の古代国家》、《殷周古代史の再构成》、《中国の神话》、《中国古代の国家》、《中国の传统と现代》等。翻译著作有:《论语译注》等。合著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等。中央公论社有全10卷本的《贝塚茂树著作集》出版。

在商周史研究上,《古代殷帝国》、《中国古代史学の发展》是他的名著。

在甲骨学上,他在《论殷代金文中所见图象文字》一文首先提出殷虚卜辞里有不属于王的多子族卜辞。从此以后,关于卜辞的研究和分类就有了"王族卜辞"和"多子族卜辞"的划分,这已经成为甲骨学界的定论了。关于卜辞出现的"立中"记载。他以为那是商代的一种在中庭时所举行的立表测影活动,决定着祭祀活动的吉凶。在商周国家结构的研究上,他首先使用了"都市国家"这一概念。对于商人祖先以十干命名的习惯,《史记·殷本纪》司马贞《索隐》云:"皇甫谧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贝塚肯定此说,但是他还发现为十干命名法和祭祀方式是一一对应的,甚至殷人在祭祀其祖先时还根据其祖先生日的十干相应地决定牺牲的毛色。

在《中国古代史学の发展》一书中,他对商周的社会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论证。比如,关于卜辞中的多子族的问题,他就主张:

> 殷代的多子族如果从卜辞及殷代金文中仅有的史料来看的话,就不能详细地了解它的组织、机能等情况。而将其和既是殷国多子族的后身,又是周国的氏族青年组合的师氏来比较的话,它的组织还是可以大致了解的。殷代的多子族,和周代的师氏同样,是以殷氏族的青年团体为核心的,并且也包括了所属国的贵族子弟成员的那样一个团体。①

① 贝塚茂树《中国古代史学の发展》,弘文堂书局,1967年,第295页。

接着，贝塚茂树利用卜辞中出现的相关记载，论述了“多子族”的社会意义：

> 根据卜辞的记载，在殷墟前半期施行的兄终弟及制度，到了后半期开始出现父子继承制度的变化。作为多子族的成员子某，大概只在第一期武丁时代的卜辞中出现过。作为集团成员的多子族恰好也只在第一期卜辞出现。殷王朝的继承权问题，伴随着从前半期的兄终弟及制度向父子继承制度的转变，成为多子族的集团可以想象也是发挥了一些力量的。到了殷墟后半期，殷帝国的势力变得强大了，王权被强化了，对于到来的王的专制权也被确立的问题，私属王的那些王族被扩大化、强化了，代表和王族对立的殷王朝氏族制的多子族则变得无力了。多子族族长的子，占卜族的行事的那些卜辞，只在第一期出现过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可以看作是由多子族的衰败向氏族制、王族制转移的一个征兆，和它现实中的转变期殷墟中期相比，意味着早期已经出现了这一征兆的事情。①

他的后裔中很遗憾的是还没有人继承他的古代史研究。其中，长子贝塚启明是位研究经济学的日本著名学者、日本学士院院士、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1951年，他组织了日本全国级别的学会“甲骨学会”，并且出版《甲骨学》刊物，成为甲骨学在世界上的第一个学术组织。人文所贝塚的上古史研究和文学部宫崎近世史研究使京都学派第二代出现了双龙出水的局面！

贝塚茂树门下弟子众多，如，伊藤道治、樋口隆康、永田英正、小南一郎等。但是成就最为突出的就是著名先秦史大家伊藤道治博士。

伊藤道治1925年6月生于名古屋市。194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9年，他从大学毕业考入大学院，师从贝塚茂树，专业研究先秦史。1954年，他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59年，他转任神户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71年，他晋升为教授。1985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关西外国语大学教授。现已从关西外国语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古代殷王朝の谜》、《中国古代国家の支配构造——西周封建制度と金文》、《中国社会の成立：原始一秦·前汉》、《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出土资料を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古代中国》等。合著有：

---

① 贝塚茂树《中国古代史学の发展》，弘文堂书局，1967年，第300～301页。

《甲骨文字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等。主要论文有：《螭鼎铭とその社会的意义》、《卜辞に见える祖灵观念について》、《盠彝铭考》、《甲骨文、金文に见える邑》、《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管见》、《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同文馆所藏甲骨文字》、《太公九府圜法说について》等。

伊藤道治首倡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河江文明”史观。他立足于湖北盘龙城、江西清江吴城等商代早中期遗址的发现，以及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马家浜、崧泽文化的繁荣及其与黄河流域的相互交流，指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繁荣是一种包括长江流域在内的广大地域的繁荣，为此他取黄河之河和长江之江将这一文化统称为“河江文明”，强调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的多样性。他还主张，周早先与殷是一个文化圈，后来在某个时期周人由东往西开始了早期的迁徙活动，脱离殷墟文化圈西进，和以客省庄第二期文化为代表的陕西龙山文化相结合。[①] 关于非王卜辞，早在20世纪40年代，先由贝塚茂树提出。到了50年代，伊藤道治又提出，但由于非王卜辞较少，一直有学者对其存在表示怀疑，花东甲骨的发现确认了非王卜辞的存在。

在《卜辞に见える祖灵观念について》一文中，伊藤道治主张分析殷人在有了作为最高神灵的上帝之后，宗祖神和自然神便都位于这个上帝之下了。到了商朝后期，祖灵的权威被重新确立，祭祀的规则也已被固定，从而宗祖神便成为了至上神。宗祖成为了“上帝”，人王也就应当是“下帝”，这样商王也就以“帝”为其称谓了。但是，因此却引起了其他族群的反感，而成为了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的一个重要原因。王震中在《伊藤道治先生甲骨文与商史研究五十年》一文中，针对此文特别分析了伊藤道治文中用心所在：

> 关于祖灵观念的变迁，文中认为第一期卜辞中的祖灵明显地具有作祟、祸害于王的能力，所以与其将此称为祖灵观念，倒不如称为令活人恐惧的死者观念或死灵观念。到了第二期，从祖甲开始，祭祀变得有规则了，而且祭祀本身已不是卜问的对象，也就是说，在第一期，是否举行祭祀即祭祀本身是通过卜问来决定的，第二期卜问的对象是有关祭祀的结果。第二期的祖灵可以根据人们的祭祀行为而是否降祸，与第一期相比，第二期所见到的祖灵和人们的关系更亲近，但给予活人佑助的性质还很淡薄。到了第三、四期，已明显地出现了希望通过祭祀而得到先王佑助的态度，这时的人们不但认为祖先当然是依如何祭祀来行动的，而且还进一步认识到祖先对活着的人是很容易施以恩惠的，可以

① 见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创文社，1975年，第346页。

说已进化到了祖先崇拜的阶段。与之同时，此时对先王也开始使用帝的称呼，对于那些具有自然神属性的先公，除了单称夔、河、王亥之外，还附加上了高祖之称号，称之为“高祖夔”、“高祖王亥”、“高祖河”等，明确地把这些异族之神编进了具有血缘性质的祖先系列之中了，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后世的传说，只不过还没有完全整理成型，到了第五期，祖先祭祀更加固定化，在特别重视祖先祭祀的同时，王权也得到了确立，更加神圣化了。诸如，在王对占卜所作的判断中，没有凶的记录，凡是吉或大吉的判断，都只限于王亲自进行的占卜。显然，此时对于占卜，王的意志起着主导的作用，亦即面对占卜的神圣性，王权处于优越的地位。①

在《中国古代王朝の形成——出土资料を中心とする殷周史の研究》一书中，他对西周的官制和土地制度进行了考证和研究：

古代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由血缘而结成的族组织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官职也是通过此组织继承并发挥其职能的。但这种族组织也决非固定不变的。例如就西周前期的情况来看制作青铜器令彝、令簋的矢令是称为作册的官，其官职被其儿子大继承。但是这里说的父子关系是否真像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父子，还是个疑问。令的父亲称作丁公即父丁，大由此丁公来说属于孙子辈、从令来说是属于儿子辈的同族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成王时代的矢令的一族发生过族的分裂。根据由矢令制作的宜侯矢簋，令被虔侯封为宜侯，从铭文知道其父丁公生前也是虔侯。因而可以想到令是在其父死后继承了虔侯之位的。但是根据令簋。令为作册时，丁公是公尹，在令彝的铭文中令依然是作册，但当时丁公已死。因而令一方面是作册官，另一方面继承了虔侯之位，后来又改移为宜侯。②

他在《卜辞中“虚词”之性格》一文中，还对第三、四期甲骨文中出现的“叀”字展开研究：“主要行为或主题是用‘其’字来表示的，而当作卜问这个主要行为中的一部分，如行动的担任者、日期、祭祀的对象、种类，为了提示或替代事物时，则用‘叀’。”

类似的考证文章还有不少，反映出先秦史家的他对古文字学研究的注重。

---

① 王震中《伊藤道治先生甲骨文与商史研究五十年》，《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

② 江兰生译《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中华书局，2002年，第123～124页。

白川静因为自身首先是古文字学家,因此他利用甲骨文和金文史料研究商周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方面,他的著名专著有:《金文の世界——殷周社会史》、《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构造》、《尚书札记》、《西周史略》等。合著《古代殷帝国》等。著名论文有:《殷の世系——いわゆる六示について》、《殷の族形态——いわゆる亜字形款识について》、《周初の对殷政策と段の余裔——特に召公の问题を中心として》、《殷代の殉葬と奴隶制》、《殷の王族と政治の形态》、《西周史の诸问题》、《小臣考——殷代奴隶制社会说の一问题》、《周初における殷人の活动——主として军事关系の考察》等。

他的《金文の世界——殷周社会史》一书是利用商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殷周社会史的学术著作。自出版后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巨大反响,可说影响深远。在该书中,白川静对商周金文素反映的社会史进行了深刻的揭示:

> 殷王朝的支配完全是建立在祭政的原则基础上的。在此当中,它表现出的与其说是政治的,不如说是宗教的性质。王朝的祭祀权的基础,体现在承认其所谓的宗主权这一层关系上。但是在周王朝,明显地表现为征服国对过去的诸氏族的占有。支配的原则是政治上的服从关系、君臣关系。祖祭的性质当然也是被强调政治上的要素。他们以和王室的关系作为基础,这样维持氏族的生存才是可能的。在这里,和王室的关系通过彝器上的铭文记录下来,以这些铜器来祭祀祖先……西周的金文如实地反映了世袭贵族制度的繁荣及其崩溃过程。贵族社会,他们把那些为他们所掌握的权力构造,以此作为维持他们的权威的基础。那些基础当然就是经济力量、军事力量,这自然是不用多说的。在这一时期的铜器,土地关系的铭文是相当多的。经常是既有划定广大的区域对领土进行界定的铜器,也有土地所有或者叫拥有领土的那些铜器。当这些豪族左右国家政治时,贵族社会的秩序在权力斗争中逐渐陷入危机。夷王、厉王时期就已经表现得很显著了。加上自然的灾害,结果发生了厉王离都出走的事件。到了共和十四年,王位旷绝,诸豪族代替天子来维持秩序,王朝的崩坏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时间问题了。①

在探讨史官制度的起源问题上,白川静在《甲骨文の世界——古代殷王朝の构造》一书中主张甲骨文中出现的"史"字具有祭名的含义,他是殷王室

① 《金文の世界——殷周社会史》,平凡社,1971年,第16~17页。

内部所举行的一种祖祭活动。西周以后出现的“史”是殷代所遗留下来的。这就是他的文字和史官制度起源于祭祀活动说的源点。这一观点和他的后辈学者小南一郎撰写的《史の起源とその职能》一文可以说南辕北辙。为此，蒋义斌教授在《中国宗教与史的起源》一文中特别加以评述说：

> 史是否即为祭名，至今仍不能确定，但史确与祖祭有关，如《卜辞通纂》所录第423片：“卜某酒又史”，“某”为殷王祖祭的周祭之一，帝之史为风，人王的重要工作，是施政、教化，殷王亦派其内官，至各地宣达王命、视各地之教化。[①]

看起来，他已经肯定了白川静的此说。

在探讨商周神话时，白川静注意到甲骨文中出现的以牛等家畜作为牺牲来祭祀河神的现象，他说：“中国古代在祭祀河神，是为了求雨和祈祷丰年，因此一定要使用牛等作为牺牲来供河神。”[②]甚至还会出现人祭的现象。即，“牺牲系用巫祝，被当作断发而请雨的牺牲者，需也。需，系含有为需求降雨而断发髡形之巫的意思。如此的巫祝，乃儒之渊流也”。[③] 他在研究《楚辞》时就曾将屈原也归入巫祝一类！

吉本道雅1959年9月28日生于冈山县。197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8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先秦史。1987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退学。1988年，他就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1995年，他转任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副教授。2001年，他晋升为教授。他以论文《中国先秦史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4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他的夫人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现用名吉本智慧子，是一位研究满洲语、女真语、契丹语的文学博士，立命馆太平洋大学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国先秦史の研究》、《史记を探る——その成り立ちと中国史学の确立》等。合著有：《周代中国の社会考古学》等。主要论文有：《缁衣考》、《孟子编次考》、《春秋世族考》、《秦史研究序说》、《楚史研究序说》、《先秦王侯系谱考》、《战国纪年略表》、《春秋载书考》、《中国战国时代における“四夷”观念の成立》、《春秋五等爵考》、《后汉书西羌传の先秦史认识》、《左氏探源序说》等。

《中国先秦史の研究》一书由上中下三部构成，第一部西周期、第二部春

---

① 见《佛教的思想与文化——印顺导师八秩晋六寿庆论文集》，法光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② 白川静《中国の神话》，中央公论社，1975年，第147页。

③ 白川静《中国古代の文化》，加地伸行、范月娇译，文津出版社，1983年，第121页。

秋期、第三部战国期。该书是京都学派有关先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利用最新的出土青铜器铭文作为考证材料是该书最大的特色。

他首先对先秦史研究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氏族制理论提出质疑。然后以金文史料为核心,展开了对西周史的研究。但是,在摒弃了氏族制理论之后的西周史,肯定不是简单的一章三节就能了结的。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真正的学术功夫乃在于春秋史!这也是构成他的这部大作的核心所在!第二部的春秋史又划分为三篇,共计9章的篇幅,实际上该书的四分之三的篇幅全是对春秋史的研究。因此,我觉得该书应该配一个恰当的副标题加以限定,即:《中国先秦史の研究——春秋史を中心としての考察》,因为此书的西周史和战国史的内容实在不足以和他对春秋史研究的成就相比,可以完全放弃。晚商到西周之间的一段历史是我的研究强项,或者正是他的弱项吧。正如春秋史,我根本不敢也不想触动一样。这是我想特别说明的。

该书内容如下:

序论　中国先秦史研究の课题
第Ⅰ部　西周期
第一章　西周期后半の周王朝——册命金文の分析
序言
第一节　册命金文の定义
第二节　册命金文の分析
第三节　西周期权力机构の特质
小结
第Ⅱ部　春秋期
上篇　中原の政治史的推移
第一章　东迁期——周王朝の东迁
第二章　春秋前期——齐の霸权
序言
第一节　齐僖公・襄公
第二节　齐桓公
小结
第三章　春秋中期——晋の霸者体制
序言
第一节　晋霸の概要
第二节　霸权の诸相——制度的・理念的侧面
第三节　世族と霸者体制——社会史的侧面

小结
中篇　春秋期の社会
第一章　春秋的“国”の成立
第二章　春秋期の国人
序言
第一节　国人の内容
第二节　国人の存在形态
第三节　“国人”と世族
小结
第三章　春秋期の世族
序言
第一节　世族支配体制の形成
第二节　世族支配体制の构造
第三节　世族支配体制の解体
小结
下篇　边境の王权
第一章　吴——系谱の分析
第二章　楚——西周春秋期
序言
第一节　楚の建国
第二节　若敖氏政权
第三节　公子群政权
第四节　国君专权
小结
第三章　秦——战国中期以前
序言
第一节　秦の建国
第二节　东迁移期·春秋前期
第三节　春秋中期·后期
第四节　战国前期
小结
第Ⅲ部　战国期
第一章　战国期前半の中原——霸者体制の再建
序言

第一节　春秋后期
第二节　战国前期
第三节　战国中期
小结
第二章　专制国家の胎动

《史记を探る——その成り立ちと中国史学の确立》一书是他研究先秦史的另一部力作，该书由以下五章组成：第一章《〈史記〉と先秦史の史料》；第二章《〈史记〉の材料》；第三章《〈史记〉以前の历史认识》；第四章《〈史记〉と〈春秋〉》；第五章《〈史记〉と战国史》。我从他上述论文和专著中看出了一个精通春秋史、正在向上打通西周向下连接战国秦汉史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学者的努力步伐！

二、战国秦汉史研究

目前，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出土文献进行古籍的最新解读成为研究热点。江村治树博士和永田英正博士是日本京都学派从事简牍研究的典型代表。

永田英正1933年10月生于鸟取县仓吉市。1949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仓吉高中。1953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7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秦汉史。1962年3月，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1年，他晋升为讲师。1973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5年4月，他转任富山大学文理学部教授。1977年4月，他转任该大学人文学部教授。1981年4月，他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一到冬季当地就出现两米以上积雪的恶劣环境，转任滋贺大学教育学部教授。1990年4月，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9月，他以论文《居延汉简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教授。2002年，他从京都女子大学退休。

主要学术著作有：两卷本的《居延汉简の研究》、《汉代石刻集成》、《项羽：秦帝国を打倒した刚力无双の英雄》等。合著有：《中国文明の成立》、《汉书食货·地理·沟洫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等书。编著有：《中国出土文字资料の基础的研究》、秦汉帝国等。主要论文有：《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の字体についての所感》、《汉代の选举と官僚阶级》、《中国における云梦秦汉研究の现状》、《江苏尹湾汉墓出土简についての考察——とくに"集簿"を中心として》、《简牍よりみたる汉代辺郡の

统治制度》、《再び汉代辺郡の候官について》等。他的《居延汉简の研究》一书经张学峰博士翻译出版。内容如下：

序章　中国简牍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一、简牍通叙

二、简牍的出土情况

三、简牍研究的历史

四、简牍研究的课题

第Ⅰ部　居延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

第一章　居延汉简集成——破城子出土的简牍

绪言

破城子出土的簿籍简牍

结语

第二章　居延汉简集成——地湾、博罗松治、瓦因托尼、大湾出土简牍

绪言

一、地湾出土的簿籍简牍

二、博罗松治出土的簿籍简牍

三、瓦因托尼出土的簿籍简牍

四、大湾出土的簿籍简牍

结语

第三章　各种簿籍简牍格式的分析

一、籍与簿

二、簿籍简牍与文书

三、簿籍递送文书的集成

四、侯燧、侯官的簿籍作成及处理

五、簿籍的审核与文书行政

结语

下册

第Ⅱ部　居延汉简与汉史研究

第四章　简牍所见汉代边郡的统治组织

一、汉代地方统治组织通叙

二、边郡的统治组织

第五章　评陈梦家“破城子为居延都尉府”说

第六章　试论居延汉简中所见的侯官

第七章　再论汉代边郡的侯官
第八章　关于礼忠简与徐宗简——评平中苓次“算赋申报书”说
附篇
索引
后记

永田英正在研究汉简时，结合古文书学、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他把汉简分为定期文书和不定期文书两种。他在对居延汉简材料进行重新考释

《汉代官僚论の研究史的考察——とくに“主客”论争によせて》、《春秋战国时代の铜戈・戟の编年と铭文》等。

他的《春秋战国秦汉时代出土文字资料の研究》是这一领域罕见的优秀著作。该书由三部组成:第一部是《春秋时代の青铜器と社会变动の特质》,本部下设四章,集中研究了春秋时代青铜器铭文的诸多问题。第二部是《春秋时代の出土文字资料と都市の性格》,本部下设四章,分别研究了春秋时代多种文字载体的史料价值,并对当时都市的构局和历史进行了研究。第三部是《春秋战国秦汉时代の出土文字资料をめぐる诸问题》,本部下设六章,对战国时代各种出土文献资料进行了整理和考证。比如在青铜兵器的研究上,他在《春秋战国时代の铜戈・戟の编年と铭文》一文中又主张周公戈铭文是伪刻,属于器、铭皆伪。他主张凡是戈铭上出现“用戈”二字的,一定是特定的贵族个人所用,因此,这类戈都有比较豪华的装饰,而周公戈却显得过于粗糙,可以想象是假托周公之伪作。

此书显示了作者在青铜器研究上的过人的学术素养和见识,实际上此书完全是利用春秋战国金文材料而写成的。他发展了他的老师伊藤道治的金文研究范围。

江村治树最近几年一直在专业研究先秦货币史。比如关于出土的秦半两钱的问题,[①]他就主张这些半两钱在出土时和其他铜片几乎混杂在一起,并且已经完全破碎,显然不是储藏起来的货币,而是作为一般性的废铜屑来处理的。由此来看,并不能认为秦时流通战国各国货币。在这方面,研究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稻叶一郎也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南都の建设と战国秦の货币制度》、《战国秦の家族と货币经济》、《秦始皇帝の货币统一について》等。

在《战国秦の家族と货币经济》一文中,他研究了清川战国墓中出土的半两钱问题,认为:

> 虽属于秦代的出土事例,但在咸阳近郊长陵车站南沙坑中的陶瓮中同时出土已破损的齐刀、明刀、布钱、蚁鼻钱及半两钱等情况,则雄辩地证明了咸阳周边并用着这些货币。这里应注意到,将遥远东方齐国、燕国等刀币运往远在西方的咸阳。

---

① 2005年8月9日,他曾就此问题在中国钱币博物馆举行过专题学术报告,当时由我担当现场翻译。可以说对此印象颇深。但是,因为“空首部”等几个日文同音和音近的钱币学术语的翻译问题困扰着我,我实在没能胜任那场十分专业的钱币学学术报告。

在《秦始皇帝の货币统一について》一文中,[1]他再次提出了他对秦统一货币的时间说,主张是始皇帝37年才开始的。

佐竹靖彦生于1939年5月17日。195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宫崎市定,专业研究秦汉史。1968年,他博士研究生中途退学后,成为东京都立大学讲师。以后晋升为副教授、教授。他以论文《中国古代の田制と邑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现已经从东京都立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刘邦》、《唐宋变革の地域的研究》、《中国古代の田制と邑制》等。中华书局还出版了《佐竹靖彦史学论集》一书。主要论文有:《郡斋读书志校证》、《县乡亭里制度》、《中国古代の数值主义について》、《唐宋变革期における江南东西路の土地所有制と土地政策——义门の成长を手がかりに》、《唐末宋初の敦煌地方じぃずナる户籍制の变迁》、《唐宋期间福建の家族と社会——闽王朝の形成から科举体制の展开まで》、《宋代の家族と宗族:宋代の家族と社会に关する研究の进展のために》、《中国古代の家族と家族の社会秩序》等。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中国古代の田制と邑制》一书。此书分上下两部,共由12章构成。第一部分6章研究先秦时期的田制问题。第二部分6章研究春秋战国时代到汉代的邑制问题。作者使用史料丰富、论述严密而气势壮阔,通过对上古中国土地和都城制度的研究,系统地勾画出一幅上古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脉络。该书内容如下:

第Ⅰ部　中国古代の田制

第一章　藉田新考

はじめに

一、《诗经》农事诗の理解をめぐって

二、《诗经》农事诗に见られる农业形态

三、周王朝の崩坏と藉田仪礼

おわりに

第二章　商鞅田制考证

はじめに

一、商鞅田制における耕区の设

1. 田制の理念の构筑

2. 田制の形态と面积

---

① 见《东洋史研究》1986年8月。

二、商鞅田制における耕地と休耕地
1. 辕田制度の设定
2. 辕田制度の展开
三、商鞅田制の生产力的基盘
おわりに
第三章　汉代田制考证
はじめに
一、汉代における二重畝制について
二、汉代の田租徵收率と田租徵收の基础
1. 田租徵收率の变动とその意味
2. 田租徵收の基础とその变化
三、代田法における新耕区の设定
おわりに
第四章　中国古代地割の形态的研究——井田地割、阡陌地割、代田地割
はじめに
一、陕西地方における规则的地割の成立と展开
1　Frank Leeming 氏の研究の特色とその贡献
2. 陕西地方における阡陌制度と带状地割
3. 汉代の墓券から推则される农道と耕地の状况
4. 亭部と阡陌制度
二、关中平野の地形と地割の相关
1. 商鞅による阡陌地割の实际の寸法
2. 关中平野の农道体系の实际の寸法
3. 阡陌制度における带状地割の方向の问题
三、代用地割の特质——阡陌地割变质の起点
1. Frank Leeming 氏の代田地割の理解とその问题点
2. 代田法の地割の特质
3. 代田地割の行方——屯田地割から均田地割へ
おわりに
第五章　井田制から商鞅田制へ——あるいは集落から领域へ
はじめに
一、关中盆地の自然的条件
二、聚落单位の农耕制度としての井田制度

三、商鞅田制における阡陌制度——国家的名有制度の成立
1. 阡陌制度下の农业生产=《汉书·食货志》における制
2. 所谓周制の提封学说と商鞅田制における领域的编成の成立——耕地の共同体的编成から国家的编成へ
おわりに
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期吐鲁番田制
はじめに
一、吐鲁番地域史研究の基本的课题
二、今后の研究の前提
1. 地域史研究の视角をもつ日本の诸业绩
2. 中国における研究
3. 中国における实地调查
三、吐鲁番田制の基础としての用水と田地区画
1. 畝间灌溉
2. 吐鲁番における田地区画
おわりに
第Ⅱ部　中国古代の邑制
第一章　春秋期の城郭都市と亭の渊源
はじめに
一、《续汉书郡国志》に收录された历史的地名の分布
二、秦地における亭の制度の渊源
三、中原における亭の制度の渊源
四、西方诸族による东方进出の前线における都市国家群
五、都市の考古学的遗迹の分布の问题
おわりに
第二章　中原の边境としての陈蔡地方の亭
はじめに
一、楚国と中原诸国の抗争の概观
二、“江黄远国”=中原の亭の渊源
三、考古学的遗迹から见た城郭都市の亭的性格
おわりに
第三章　县乡亭里制度考证——假托と考证
はじめに
一、基本的史料と学说史の展开

二、亭部の构造——地域编
三、亭部の构造——聚落编
四、十进法的行政编成原理について
五、井田法の观念の构造と展开
六、张家山汉简における乡部と田部
おわりに
第四章　春秋时代から战国时代へ——领域编成の问题
はじめに
一、春秋期から战国期にかけての领域编成への动き
二、广领域编成の定点としての秦地の亭
三、天下という观念の诞生とその意味
四、战国时代における“方几里”の观念の流行
五、“方几里”という思考の本质＝苏秦，張仪の言说の检讨
おわりに
第五章　所谓郡界刻石と汉代の领域编成
はじめに
一、连云港东西连岛の境域界石
二、尹湾简牍における领域の问题
三、再び匡衡传について
おわりに
第六章　汉代の亭长と亭卒
はじめに
一、亭长の所属
二、亭长と校长
三、亭父とその职责
四、求盗とその职务
五、秦汉の亭をめぐる断片的检讨
1. 秦地の亭の立地条件
2. 所谓王莽の亭制改革について
おわりに
终章
附录　续汉书郡国志における古地名の分布とその州郡别密度

富谷至生于1952年1月1日。1971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古史。1979

年,他从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退学,成为大阪大学教养部讲师。1982 年,他晋升为副教授。以后,他把研究方向逐渐转移到秦汉法制史上。1988 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6 年,他以论文《秦汉刑罚制度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0 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秦汉刑罚制度の研究》、《古代中国の刑罚》、《教科书では读めない中国史》、《韩非子——不信と打算の现实主义》、《木简・竹简の语る中国古代——书记の文化史》、《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楼兰・尼雅文书を中心に》等。主编有:《边境出土木简の研究》、《流沙出土の文字资料》等。主要论文有:《黄泉の国の土地买卖——汉魏六朝买地券考》、《汉代谷仓制度——エチナ川流域の食料支给より》、《秦汉二十等爵制と刑罰の减免》、《亭制に关する一考察——汉简に见える亭の分析》、《晋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秦汉の律と令》、《儒教の国教化と儒学の官学化》、《3 世纪から4 世纪にかけての书写材料の变迁》、《东アジアの死刑》等。

富谷至利用他对简牍的研究,在《秦汉刑罚制度の研究》一书中,对中国秦汉法制史和简牍学进行了精湛的研究。他的汉简研究成为继永田英正之后的汉简研究的杰出代表。他甚至还注意到利用汉简发现今本《论语》中出现的错简问题。他通过对法制史的研究从而得出了:传统中国人在儒家传统下具有不可思议的复仇理念,这已经对民族劣根性的研究上升到法制史的角度。他还研究了当时有爵者的刑罚减免问题,他研究后发现秦汉刑罚可分死刑、肉刑、劳役刑三种,而有爵位者所能回避和减免的只限定于死刑和肉刑两种。在《古代中国の刑罚》一书中,他分析指出中国古代的肉刑具有深厚的潜在观念,即黥刑意味着将犯人排斥为异族,劓刑意味着将犯人排斥出人类,刖刑意味着将犯人排斥为无足动物,宫刑意味着将犯人排斥出动物界,死刑意味着将犯人排斥出生物界。因此,上述肉刑等级的上升,反映的是古代中国法律通过对身体的刑罚,逐渐剥夺犯人生存权利的过程。他又考证出凌迟是发源于契丹民族辽的一种刑罚制度。

他的著作也有被译成中文出版的。如刘恒武所译的《木简・竹简の语る中国古代——书记の文化史》一书,但那只是对简牍和古代版本印刷的一般介绍性著作。为了研究秦汉法制思想的起源,他还特别把法家代表任务韩非的著作加以翻译注解。

在《后汉政治史》一书中,狩野直祯用了多半的篇幅集中研究了光武帝时代的政治活动,特别分析了兵制改革的问题,以及当时对法典的注重,从而突出了光武帝在儒家思想为主下的礼治主义治理国家的理念。

在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上,宇都宫清吉在《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一书

中对汉代劳动力的价值有很仔细的推算。如:耕种100亩农田需要4.8个劳动力、或者2个劳动力与1头牲畜,耕作1000亩农田则需要20名奴婢,汉代奴婢的价格从5000钱到2万钱不等……这些分析和研究给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真实可信的参考数据。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在隋唐史研究上,最早继承并发扬了内藤史学的是冈崎文夫。

冈崎文夫1888年生于富山县。字焕卿,号樱洲。1908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史学科。191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支那史学科,师从内藤湖南。1917年,他博士研究生课程毕业,继续留在大学院做研究。1919年开始,他来到中国留学。同时来华留学的还有武内义雄等人。在华期间,为了研究佛学和理学,他多次拜访马一浮先生,虚心求教隋唐至两宋时代佛学和理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并写下了著名的留学文章《究豫纪行》。1921年他结束留学回到日本,成为佛教大学教授。1924年,他成为新成立的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的副教授。1926年,东北帝国大学文学部开设东洋史学讲座,他成为该讲座第一任讲座教授,由此形成了东北帝国大学支那学第一讲座武内、支那学第二讲座青木、东洋史讲座冈崎三教授的局面。他以论文《魏晋南北朝通史》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9年,他正式退休。1950年,他因病逝世。死后获得日本政府追赠的正四位勋二等瑞宝勋章。

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通史》、《魏晋南北朝通史:内编》、《南北朝に于ける社会经济制度》、《支那史概说》、《新制东洋历史教科书教授资料》、《古代支那史要》、《司马迁》。合著有:《江南文化开发史:その地理的基础研究》、《支那の政治と民族の历史》等。还有学生们依据他的讲义整理而成的《隋唐帝国五代史》一书。

其中,《魏晋南北朝通史》至今仍是日本汉学界的学术经典。在该书中,他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中古史分期学说。他主张从南北朝时代到隋唐时代,国家法制有了极大的变化。继承了北朝国家体制、又包含了南朝文化的隋唐帝国由此开始走向历史舞台。因此之故,他成为日本汉学界专业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第一人。

在该书中,冈崎文夫主张汉代的"里"既是行政聚落(行政村),也是自然聚落(自然村),在"里"以外基本不存在聚落。关于孙皓迁都与撤都武昌的原因,他主张孙皓之徙都,可能是出于筹划北伐的缘故。冈崎文夫的《魏晋

南北朝通史》和《支那史概说》、《南北朝に于ける社会经济制度》三部专著，成了以贵族制度为核心、贯彻和论证“内藤假说”的杰出代表作。在该书中，冈崎文夫继承了内藤湖南所主张的贵族势力和军事势力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的权力中枢的观点。中央皇权和地方豪族、贵族之间的对立，尽管他们同属于统治集团，但是他们的矛盾比一般民众与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地域特征上，北方的皇权集中和南方的贵族势力形成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但是，他把贵族制度的存在推进到贵族制度国家化的程度，并且经过考证认为隋唐贵族制度起源于汉代的乡举里选制度，这使得他得到了他的老师的格外赞许，内藤湖南甚至认为他自己对中世贵族制度的研究，到了《魏晋南北朝通史》一书中已经接近完成。不难看出，“内藤假说”在宫崎市定和冈崎文夫二人手上得到了最为彻底的确立。

《九品中正考》一文成了《南北朝に于ける社会经济制度》一书中的名作之一。

冈崎文夫本人对王国维也十分尊崇，他甚至预想只有王国维的研究方法才是中国正确的学术研究之路的观点。并且还批评说“当然中国学界的现状违背了这一预想。不过与其说我的预想是不对的，毋宁说混乱的中国现状使学问的大潮流不能朝正常的方向发展”。[①] 他还十分欣赏梅兰芳的京剧表演艺术，曾经撰文对梅兰芳进行过高度评价。

宫川尚志对两汉和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研究，首先是宗教学的研究，其次是历史学的研究。在《六朝时代の村にっいて》一文中，宫川尚志对汉代乡里制度起源问题的研究，[②]就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定论了。他主张六朝时代“村”级社会组织的出现，和西欧中世纪的“村”具有相同的性质。他考证后认为“村”的最早概念出现在《三国志·郑浑传》。汉帝国的战乱和城市居民的逃避，导致了乡野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聚落形态。这就是“村”的雏形。

而他对内藤湖南学说的大力阐述，谷川道雄曾给予了很精辟的评价：

> 继承内藤史学一派的宫川尚志、宫崎市定等人，为探索中世的形态作出了一再的努力，并在实证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他们的研究，虽说从内藤史学的文化史的性质上、对时代特征、历史形象的认识是极为敏感的，并由此直观地认识到与欧洲中世相比定的试点性质，但

① 见《追忆王国维》一书。

② 见《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四卷，中华书局，1992年。

毕竟未能从中国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同意把握上创出新的历史范畴来。①

宇都宫清吉1905年10月2日生于爱知县。192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7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内藤湖南,专业研究中古史。1932年,他修满博士课程学分后,就任台北帝国大学预科教授。1945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48年,他转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教授。1955年,他以论文《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56年,他从名古屋大学退休后,转任橘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1973年,他从橘女子大学退休。1998年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后汉末の社会秩序形成について》、《后汉末の社会秩序形成について》、《汉代における家族と乡里》、《西汉の首都长安について》、《管子・弟子职篇によせて——古代专制体制と社会诸集团との关系に就いての考察》、《北齐书・文苑传中颜之推传の一节について》、《汉代における家と豪族》、《世说新语の时代》等。

打着对内藤史学进行全面修正的名古屋大学东洋史教授宇都宫清吉,以"宇都宫学派"而称著于日本史学界,他是研究先秦、秦汉、六朝史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只是提出了所谓"时代格"这一概念,来修正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法缺乏终结意义和临界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内藤史学中所谓过渡期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古代中世史研究》一书中,他特别强调了六朝贵族制的自律性质,并以此对秦汉、魏晋、隋唐各个时代贵族制的历史进行了具体的比较研究。

川胜义雄1922年11月8日生于京都市。他的亲戚中有著名哲学家下村寅太郎。1941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5年,大学毕业后,他到法国留学,专门学习法国汉学。从那时开始,他一边学习法语一边翻译著名汉学家马伯乐博士的汉学著作。1950年,他从法国归国后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两年后晋升为副教授。十几年后终于晋升为教授。1984年4月4日,他在任上不幸突然逝世。

主要著作有:《魏晋南北朝》、《中国人の历史意识》、《六朝贵族制社会の研究》。翻译著作有《史学论集》、《史记列传》、シリーズの《司马迁》、马伯乐的《道教》等。主要论文有:《东晋贵族制の确立过程——军事力との关连のもとに》、《刘宋政权の成立と寒门武人——贵族制との关连におい

① 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华书局,2002年,第128~129页。

て》、《贵族制社会と孙吴政权下の江南》等。

川胜义雄一生以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思想史为研究方向。他虽然大力支持内藤湖南的中世说,并且公开承认:"对我的研究思路产生巨大影响的,是由内藤湖南开创,在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诸位先生的继承下发展起來的所谓京都学派。"但是,作为京都学派的一员,他通过对贵族制的研究和宫崎市定的学说有了一些差异。他和另一位学者谷川道雄一起,提出了贵族制中的"豪族共同体"说,这一学说明显遭到了矢野主税、越智重明等人的反对。于是,在宫崎和前川论争之后,川胜和矢野的论争又成了中世说新的焦点。

谷川道雄1925年12月2日生于熊本市。他兄弟四人皆日本国内著名的人物:长兄谷川健一是日本著名的民俗学家,次兄谷川雁是日本著名的诗人。小弟谷川公彦,成为吉田家族的婿养子后改名为吉田公彦,是日本著名的学校"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的创始人。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1949年,他大学毕业后,又考入东洋史学研究生。1954年,他成为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助手。在宇都宫清吉的影响下,开始了对隋唐史的研究。他选定北魏史作为专业突破口。10年后,他的论文《北魏末の内乱と城民》成为这一领域的名作。1956年,他晋升为副教授。宇都宫清吉教授退休后,谷川道雄接替了他的职位成为教授。1973年,他以论文《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8年,他调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1989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唐の太宗》、《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世界帝国の形成:后汉—隋·唐》、《中国中世の探求》等。合著有:《中国民众叛乱史1-4》、《内藤湖南の世界》、《日本と中国》等。主要论文有:《中国史における世界性と固有性——六朝时代を实例として》、《六朝贵族における人格と身体》、《六朝贵族制社会の史的性格と律令体制への展开》、《中国における中世——六朝·隋唐社会と共同体》、《府兵国家と府兵制》、《西魏·北周·隋·唐政权と府兵制》、《战后の内藤湖南批判について——增渊龙夫の场合》、《五胡十六国史における上苻坚位置》等。对他的研究在中国、在日本全是热点话题。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奥崎裕司甚至专门撰写了一部专著《中国史から世界史へ——谷川道雄论》一书来系统地研究谷川史学。

因为谷川道雄学生时代受教于宫崎市定,而后来工作后又长期受益于宇都宫清吉。所以,他在学理上继承了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三人的贵族制学说,他和川胜一起丰富了对"豪族共同体"说的理论和建设。

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中，他目光敏锐地发现自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两大对立的阶层：一个是豪族，一个是游牧民族。而这两者的出现又直接可以上溯到秦汉帝国中央集权制的崩溃。北魏孝文帝施行的汉化政策，豪族和门阀成为隋唐帝国统一后社会中坚力量。在他的《中国中世と共同体》一书中，他就提出了“豪族共同体”说。也在动荡的汉魏六朝时代，以地方名望家族为核心而结成的相互共存的社会体制，谷川称之为“豪族共同体”。最典型的就是当时的军队主要是由“豪族共同体”结成的军事力量。在《中国中世社会と共同体》一书中，谷川道雄主张：

> 以往的六朝研究，虽然也注重贵族（家族）的地方社会势力，但是那只是将其作为国家的对立面，即从统一与分裂的力学角度所作出的理解。我虽然也考虑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更加注重的是使贵族阶级得以形成的那种内部结构。这是一种既存在着贵族与民众相隔离的阶级关系，又建立了共存体制的共同体社会。虽然这种共同体社会主要是以农村为场所而成立的，但是它又不是那种所谓的村落共同体。……当时将农村中各家族结合为一体的力量，来自于那种特定的有实力家族的领导性，以及民众各家对于这种领导性的信赖之心。在这里与其说是精神关系，不如说是精神关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结合的更加强有力的纽带。①

谷川道雄叙述了胡族的“豪族共同体”在中国社会中逐渐改变性质并终于超越汉族社会的门阀主义而流入隋唐帝国的过程。为此，他在《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一书的中译本自序中说：

> 宇都宫先生是研究先秦、秦汉、六朝史的大家，他的学问充满着人文主义精神，这也是他受到学术界极大尊敬的原因。先生的学德对整个东洋史研究室的影响极大，而对我来说，在先生身边亲聆雅教的十七年，所受到的熏陶亦可以说巨大无比。如果没有先生的教导，我的学问可能比现在更为浅陋，更加缺乏人情的味道。良师以外，我还有一位良友，这也是我深感幸运之处。这位良友便是京都大学的同窗川胜义雄（1922～1984）。大学毕业后，川胜致力于魏晋南朝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的主要著作《六朝贵族制社会的研究》（岩波书店，1982年）在国内外受到极高的评价。川胜一直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我们两人从1960年开始便进行一项共同研究，也就是计

① 马彪译《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中文版自序，中华书局，2002年，第6页。

划通过他的魏晋南朝史与我的五胡北朝史研究，分别从两个方面来诠释同一时代。后来成立的中国中世史研究会便是以我们两人的这项共同研究作为基础的。可以说，川胜与我两人的上述两部著作，大部分都是这项共同研究的产物。对于我的研究，宇都宫先生与川胜氏还是最大的理解者。①

此说一出，自然遭到了京都学派以外的反对和论争。因为汉魏六朝的大土地所有制制约了他所说的“豪族共同体”势力的发展。而且，过分看重豪族的名望与势力还表现在抹杀阶级的对立，有宣扬唯道德论的弱点。

吉川忠夫的研究专业也是中国中世史，他先后写有：《刘裕——江南の英雄宋の武帝》、《王羲之——六朝贵族の世界》、《侯景の乱始末记——南朝贵族社会の命运》、《六朝精神史研究》等。编著有：《唐代の宗教》、《中国古道教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岛夷と索虏のあいだ——典籍の流傳を中心とした南北朝文化交流史》、《裴休传——唐代の一士大夫と佛教》、《北魏孝文帝借书考》、《六朝隋唐时代における宗教の风景》、《六朝时代における〈孝经〉の受容》、《脇は席に至らず——全真教と禅をめぐって》、《唐代巴蜀における佛教と道教》等。他还组织并领导了对《高僧传》和《真诰》的翻译和注解。

在《六朝精神史研究》一书中，吉川忠夫指出，在这个时代曾发生了把域外的印度当作中土，而把中国当作边土的意识变化的情况，那种传统的认为以汉族为中心的世界到魏晋南北朝已逐渐相对汉化了。他的研究围绕着三教的交涉为核心。在《裴休传——唐代の一士大夫と佛教》一文中，吉川忠夫主张：裴休《圭峰禅师碑》中所说“大和二年庆成节，徵入内殿”之说有误。因为根据他的考证“庆成节”设置于大和七年。他的《师受考》和《静室考》等著名考证论文对于中古时代历史和早期道教仪轨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刘裕——江南の英雄宋の武帝》和《侯景の乱始末记——南朝贵族社会の命运》以历史学家的笔法，描述了在佛教背景下，贵族制的宋和梁的兴亡过程。

在2006年12月12日日本学士院召开的第1004届总会上，他高票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日本学士院对他当选的说明如下：

吉川忠夫氏は、中国の社会と思想の关系について深い考察を行ってきた中国史学の专门家です。吉川氏は、中国中世史（秦汉と隋唐の

① 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二つの大统一时代にはさまれた小国分立の六朝时代とその前后)に焦点をあて、この不安定で过渡的な时代においてこそ、かえって独自に思索し行动せざるを得なかった知识人たちの自由な发想の展开を、个人の行动を示す传记类を通して总合的に分析しました。これによって、儒教・道教・佛教が、この时期の知识人たちの自由な感受性と思索によって相互に关连付けられ、思想的に深められた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また、中国人が宗教意识の希薄な民族であるという通说を批判し、この时期に"罪の意识"という深刻な宗教的自己反省が生まれたことを论证したことは、研究史上、大きな贡献です。さらに、近年完成した《后汉书训注》は、唐代以来の传统的な注释を踏まえながら、独自の校订、注釈を加えたものとして、高く评价されています。

砺波护1937年9月生于大阪府东大阪市。195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196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研究生院,专业研究中国中世史。1965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1年12月,他成为神户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副教授。1975年4月,他又调回京都大学,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4年11月,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93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东洋史学第二讲座教授。1996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历史文化学专业东洋史学讲座教授。2000年4月,他成为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长兼文学部长。2001年3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成为大谷大学文学部东洋史教授。2003年4月,他又成为大谷大学文学部特别任用教授。

主要著作有:《冯道——乱世の宰相》、《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中国上・下》、《隋唐の佛教と国家》、《唐の行政机构と官僚》、《京洛の学风》、《隋唐佛教文化》等。合著有:《隋唐帝国と古代朝鲜》、《京大东洋学の百年》、《中国历史研究入门》、《日本にとって中国とは何か》、《中国中世の文物》等。翻译著作有:《中国の科学と文明第1卷》等。主要论文有:《唐の行政机构と官僚》、《隋唐时代の太仓と含嘉仓》、《唐代社会における金银》、《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变革と使职》、《唐宋时代における苏州》、《唐の律令体制と宇文融の括户》、《中世贵族制の崩坏と辟召制——牛李の党争を手かかりに》等。

作为隋唐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的著作出版后在日本也有不少书评。

如:高濑奈津子就曾写有《书评砺波护著〈隋唐の佛教と国家〉》一文[①],韩升、刘建英曾将《隋唐佛教文化》一书译成中文出版。[②]

在《三司使の成立について——唐宋の变革と使职》一文中,他试图解决唐宋时代国家、官僚、贵族三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在《中世贵族制の崩坏と辟召制——牛李の党争を手がかりに》一文中,他又从各自党徒的出身统计入手,以统计的数字否认了陈寅恪先生主张的牛李党争实为科举与门第之争——"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的传统说法,认为两党成员之间没有特殊差异,区别还是政治观点上在对待藩镇或对外问题上的主战派与主和派的不同。在《隋唐佛教文化》一书中,他以四章的篇幅很系统地研究并考证了隋唐时代佛教和国家政策之关系,并对少林寺和玄秘塔的具体来历及其佛教价值进行了考证。

砺波护的《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一书由四部分构成:第Ⅰ部《唐宋末の变革と使职》,第Ⅱ部《行政机构と官僚社会》,第Ⅲ部《隋唐の社会と财政政策》,第Ⅳ部《佛教と国家》。该书从对唐代官制的研究入手,然后展开对唐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最后以对唐代宗教的研究为归结。并批判和订正了一些同行的错误观点。特别是大量使用了唐代墓志史料。池田温特别肯定了他的此书,并称他是日本真正的唐代史专家,打破了以往的隋唐史、汉魏六朝隋唐史、唐宋史一体化的研究模式。[③]

气贺泽保规生于1943年10月27日。1964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8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隋唐史。1975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出任佛教大学文学部讲师。1980年,他转任富山大学教养部副教授。1995年,他晋升为教授。1996年,他以论文《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从富山大学退休后转任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府兵制の研究——府兵兵士とその社会》、《中国石刻资料とその社会——北朝隋唐期を中心に》、《中国佛教石经の研究——房山云居寺石经を中心に》、《绚烂たる世界帝国:隋唐时代》等。主要论文有:《隋末弥勒教の乱をめぐる一考察》、《唐代府兵制における府兵の位置——中国中世的兵士の形态として》、《北朝隋の"军人"について》、《窦建德集团と河北——隋唐帝国の性格をめぐって》、《隋代乡里制に关

① 见《唐代史研究》第3号,唐代史研究会,2000年6月。

② 韩升、刘建英译《隋唐佛教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③ 池田温《砺波护著〈唐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と文化》1987年6月,第276页。

する一考察》、《隋代における江南の动向について》、《驍果制考——隋煬帝期兵制の一侧面》、《丁兵制の性格とその展开——西魏大統十三年文书の负担体系の再检讨》、《前期府兵制研究序说——その成果と论点をめぐって》等。

气贺泽保规在研究唐代府兵制度时，也很重视西州府兵的情况。他还特别考察了隋唐时代佛教和儒教的交涉史。他还注意到唐代经济政策的改变出现妇女贞节观念的变化。晚年，他的研究方向已经以石刻为主，重点在于研究和考证唐代石刻，作为唐史研究的新的切入点。在这方面，他已经整理出版了几部相关资料集。

大泽正昭是专业研究唐史的学者。大泽正昭生于 1948 年 4 月 4 日。1967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1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隋唐社会经济史。1975 年，他成为京都大学研究员。1997 年以论文《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77 年，他出任奈良大学文学部讲师。1979 年，他转任埼玉大学教养部讲师。1980 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0 年，他转任上智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唐宋时代の家族・婚姻・女性》、《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陈旁农书の研究》等。编著有：《主张する〈愚民〉たち——传统中国の纷争と解决法》。主要论文有：《唐律における“部曲”について》、《唐宋时代社会史研究の现状と课题》、《唐宋变革时期的婚姻与家族》、《唐末・五代の在地有力者について》、《唐代华北の主谷生产と经营》、《唐代后半期の农民诸阶层と土地所有》等。

他在《唐宋时代の家族・婚姻・女性》一书中真实地揭示出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通过对当时妇女在财产继承权、夫妻关系及家族规模等方面的分析研究，得出了当时妇女地位很强大的结论。在《唐代华北の主谷生产と经营》一文中，他又涉及当时菜市场的出现等问题，从而提出了当时蔬菜生产的商品性行为的存在。但他否认学术界所认可的宋代江南存在所谓的“江南农业革命”的问题，认为那只是个虚假的现象。

四、宋史研究

宫崎市定 1901 年 8 月 20 日出生于长县下水内郡秋津村，父亲是当地一所小学的教师。1919 年，他考入松本高中。1922 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成为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狩野直喜的学生。1926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1931 年，他从大学院毕业后，先后在京都

第六高中、第三高中工作。1936年2月开始,他到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校留学。1938年8月回国,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副教授。1942年,他以论文《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44年5月,他晋升为教授。1960年,他受聘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50年,他成为文学部长。1958年,他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65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78年,他获得法兰西学士院奖。1989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勋章。1995年5月24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东洋に于ける素朴主义の民族と文明主义の社会》、《科举》、《五代宋初の通货问题》、《アジヤ史概说续编》、《东洋の近世》、《九品官人法の研究:科举前史》、《隋炀帝》等。有25卷本的《宫崎市定全集》出版。

宫崎市定是日本乃至于国际汉学界久负盛名的宋史专家,也是战后日本"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宫崎市定继承并发展了内藤湖南的唐宋历史观。他曾声称:"我的宋代史研究是以内藤湖南先生的宋代近世说为基础的。"他的研究正是以内藤氏的这一学说为基础而展开的。内藤湖南主张贵族势力进入宋代以后趋于没落和崩溃,代之以君主独裁下的庶民实力的上升,货币经济大为发展而取代了以往的实物交换。文化方面也从训诂之学而进入自由思考的时代。[①] 他在1965年10月发表的《内藤湖南と支那学》一文中赞叹地说:"湖南留给后代的最大的影响是关于中国史的时代区分论。"[②]

他的《东洋の近世》一书由以下五篇论文组成:《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业资本の贷借について》、《合本组织の发达——〈中国近世における生业资本の贷借について〉补遗》、《宋代以后の土地所有形体》、《明清时代の苏州と轻工业の发达》、《吉川幸次郎著〈宋诗概说〉》。在此书中,他从社会经济的观点论述并发展了内藤湖南首先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并提出了他所谓的"景气变动史观"。宫崎市定认为唐宋时代的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层面:首先是从唐代中叶以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私有化、贷借化转化,贱民身份和制度的解放,在君主独裁制度下,万民平等,带来了宋代中国农村佃户制度的广泛实施,反映出了唐宋之间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宋代以后,佃户完全成为自由人,他们与地主的关系是临时的租赁关系。其次,科举制度造就出一批新兴的集地主和官僚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特殊阶层,开启了近世中国

① 《概括の唐宋时代观》,《历史と地理》第九卷第五号,1922年5月。

② 《内藤湖南と支那学》,见《中央公论》第936期。

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中国社会中世庄园制度和贵族制度崩溃后，商业都市、运河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的进程。他曾指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

依照这种观点，中国在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居同时代欧洲之上。宫崎市定在《宋元の文化世界第一》一文中更是首次提出了"宋代文艺复兴说"："宋元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稀有的伟大的时代，是民族主义极度昂扬的时代。和军事上的委靡不振相比，中国人的精神全部倾注于经济、文化之上，并加以发扬，取得了出色的成果。"①

但是中西之间的差异是自18世纪中期英国工业革命发生后开始的。②内藤湖南、宫崎市定师生的以唐宋之际转型论为核心的宋代近世说，必然会得出宋代文化顶峰论和自宋至清千年一脉论的结论。宫崎市定继承并发挥了这一学说，他认为：

> 据湖南的观点，在宋代所形成的中国的新文化，一直存续到现代。换言之，宋代人的文化生活与清朝末年的文化生活几乎没有变化。由于宋代文化如此的发展，因而把宋代后的时期命名为近世。……认为宋代文化一直持续到现代中国，是他的时代区分论的一大特点。③

宫崎市定又认为，中华文明一经成熟便丧失了其应有的活力，全靠周围的野蛮民族及时给中华文化注入朴素主义的新鲜血液才使其源远流长。这为日本侵略战争找出了他所谓的合理解释。

李华瑞在《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一文中曾针对宫崎市定的观点，评价说：

> 宫崎市定发展内藤湖南的学说，添加了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宋代近世说，他的新贡献主要表现在四点。(1)贵族所有庄园的农奴部分被解放，以自由平等为原则的新社会出现。(2)过去门阀贵族独占的政治特权不被承认，官吏地位的取得以科举制向万民开放。(3)由于贵族制被打倒而发生了新的资本主义潮流，财阀、地主阶级取代旧贵族，因而产生了教育权、参政权被他们独占的倾向。(4)既然佃

① 《宋元の美术》，大阪市立美术馆编，1980年7月。

② 《宋代の石炭と铁》，《东方学》第18辑。

③ 《内藤湖南と支那学》，见《中央公论》第936期。

户变成了独立的自由民，佃户在完成地租契约义务后有转移的自由，就不受地主的人格束缚。地主利用佃户的弱点进行残酷压榨，这并非法制上的权利，而是资本主义的淫威。所以他否定了土地束缚、地主的恣意压榨和佃户身份的隶属性等事实。同时他认为，宋代以后确定了个人对土地的所有权，土地买卖即是出让所有权，这是尊重契约的表现。以上这些便是近世社会发展的特征。①

在中国史研究战将优良而范围广阔的“内藤军团”大旗下，宫崎市定则是最为著名的领军人物。在日本东洋史学界，一直认为内藤史学中的中国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之所以得到确立和推广，与内藤湖南的直系弟子宫崎市定的大力倡导是分不开的。宫崎市定本人在《东洋的近世·前言》②中干脆就坦然宣称“谨请留意的是：本书的观点基本上是沿袭先师内藤湖南博士的高论”。不仅如此，宫崎市定在其名作《九品官人法的研究》等书中，对宋代到清代的社会、经济、文化以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进行了详细地考证和分析研究，调整了以往旧说中的官僚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矛盾，使“内藤假说”逐渐得到充实和实证。尤其是他对九品官人法的分析研究，他发现乡品和官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一个人乡品就可以看出其官品的大小。他认为在隋唐时代的选举制度和官僚制度中一直潜伏着中世时代所流行的贵族制的主线，而从宋代开始则具有了全新的内涵，这样一来，他通过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完善了中世贵族制形式的变化和延续。从此，中世贵族制度、近世说及其唐宋变革说成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最为典型的学术标志和研究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坐标系。

宫崎市定的同学曾我部静雄，也是一位宋史专家。

曾我部静雄1901年10月7日生于德岛县美马郡美马町。1916年，他考入德岛县脇町中学。1920年，他考入松本高中。1923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6年，他大学毕业后入伍。1928年，他退役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师从桑原骘藏，专业研究宋代经济史和法制史。1931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东洋史副教授。1940年，他晋升为教授。1947年，他以论文《宋代财政史》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从东北大学退休后，又转任国士馆大学教授。1991年1月2日因病逝世。

---

① 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89页。

② 《宫崎市定全集》，岩波书店，1992年。

主要著作有:《宋代财政史》、《宋代政经史の研究》、《日宋金货币交流史》、《律令を中心とした日中关系史の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の研究》、《开封と杭州》等。主要论文有:《唐、五代、宋の贡举と科举》、《南宋の和买绢及び折帛钱の研究》、《中国及び古代日本における乡村形态の变迁》、《宋代の巡检县尉と招安政策》、《宋代の度牒杂考》、《日中の律令における寡妻妾に对する授田とその义务免除》、《唐宋时代の草市》、《宋代军队入墨について》、《南宋行使の铜钱について》等。

曾我部静雄最初来华留学时,因为名字是五个字,再加上恰好汉字中有"曾"姓,于是他名片居然被印成"(姓)曾(名)我部(字)静雄"的格式。这样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几十年来一直成为围绕在他身上的趣谈。出身于日本儒学世家的他,日本的姓"曾我部"成了孔子的弟子"曾"姓,不管是他有意还是印刷者的无意,他看来都很乐于接受这一误解。他的舅舅就是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后曾任当年台北帝国大学东洋史教授的著名汉学家藤田丰八博士。立志于研究东洋史,是他自幼就有的想法。很多人问他是否是因为受了他舅舅的影响,他对此并不否认。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宋史专业课,而他那时就已经决定了以宋代财政史作为研究方向。在他看来:"中国的近世一直被认为是从宋代开始的。同样,关于经济,也是从这一时代创始的。各种各样的经济的表现及制度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多。"①

于是,他对从宋代税法到役法等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展开了研究,终于写出了著名的《宋代财政史》一书。

在研究宋代科举制度的产生问题时,曾我部静雄和宫崎市定有很大的区别。他在《唐、五代、宋の贡举と科举》一文中主张宋代出现的科举是逐渐由"贡举"发展而来的。"贡举"本来是指地方向中央举荐的一种制度,早在汉代就已经开始盛行,如所谓的"举孝廉"就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而"科举"则是全国性的考试取士的一种政府行为,它正式形成在隋唐时代。当时,北宋官方的诏书中已经开始出现以"科举"取代"贡举"的倾向。到了南宋晚期,"科举"一名大行天下。于是,"贡举"正式为"科举"所取代。在《中国及び古代日本における乡村形态の变迁》一文中,他研究了中国古代都市中里、坊、厢、隅等城郭下属概念的起源和准确含义,进而探讨中国都市里坊制的成立和发展的问题。斯波义信在《中国都市をめぐる日本の研究——宋代を中心に》一文中特别给予了介绍。

---

① 见《东方学》第81辑,第204页。

佐伯富1910年11月6日生于香川县,1931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1935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助手。1938年,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42年,他转任山口高等商业学校教授。1949年,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讲座副教授。1956年,他以论文《中国盐政史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57年,他晋升为教授。1974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83年,他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三等旭日中绶勋章。1989年,他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奖。2006年7月5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盐政史の研究》、《清代盐政の研究》、《王安石》、《宋代の坐仓》、《中国史研究第1-第3》、《宋の新文化》等。此外,他还编纂了很多古籍索引,如《吏学指南索引》、《宋代茶法研究资料》、《明律国字解索引》、《苏东坡全集索引》、《福惠全书语彙解》、《唐律疏议释文索引》、《中国随笔杂著索引》、《职源撮要索引》、《宋名臣言行录辑释索引》、《资治通鑑索引》、《宋史职官志索引》、《宋代文集索引》、《古今类书纂要附索引》、《雅俗汉语译解》、《宋史刑法志索引》、《宋史兵志索引》、《宋史河渠志索引》、《宋史选举志索引》、《事物异名录索引》、《类说索引》等。

研究宋元佛教史的竺沙雅章本来是研究宋史起家的。在《宋の太祖と太宗:变革期の帝王たち》一书中,他利用三个篇幅《五代の动乱》、《统一国家の建立》、《独裁君主の产生》,对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一生的主要事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研究,特别是在我国学术界还很少研究的宋太宗,他也从其政治活动、思想方法到个人性格、兴趣爱好、日常生活等方面都作了详细而生动的叙述。该书围绕着宋太祖与宋太宗的政治活动和生涯,勾画出了五代至宋初历史发展的脉络。为宋代思想和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前提研究。该书最后的《宋太祖宋太宗年谱》一章也是比较精心之作。对于前后两宗的继位问题,他说:"太祖死得很突然,甚至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以托付后事……《辽史·景宗本纪》记载说:'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自立'。很明显,'自立'就是篡夺。"①

他甚至在《征服王朝の时代》一书中称太祖到太宗的王位更替为一场"小革命"。并且他还引用了《辽史·景宗本纪》中的相关记录作为证据。②在该书中,他还对澶渊之盟给予了新的评价,他认为:

澶渊之盟是中国王朝和周边民族的国家之间建立起了新的关系。

---

① 见方建新译本《宋太祖与宋太宗》,三秦出版社,1988年。

② 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时代》,讲谈社,1977年,第92页。

按照传统中国的处理方法，中国的皇帝不单是统治汉人社会的国王，他们还确信自己是全宇宙的支配者。那些不为直接支配所及的化外人民，总是被编入中国的所属之民的位置上。因为周边诸国对中国是一种朝贡的臣属关系，并不是对等的地位。但是，像这样传统的中国意识，在宋和辽的交涉过程中却出现了对等的两国关系。这并不是宋王朝自我喜欢这样，而是面对强大的辽国所作出的不得已的选择。①

《征服王朝の时代》一书集中探讨了从晚唐到元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制度因为受异民族入侵而产生的诸多变化。虽然频频遭受外来入侵，但是，他也清楚地意识到：

外民族的统治者们为了统治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不得不沿袭中国固有的传统，已经被高度的中国文化所感化了，失去了素朴和清新的民族风气，加之领地内中国民众的反乱，最后这个异民族统治的王朝就被正式瓦解。②

岛居一康生于1942年8月21日。1962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6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佐伯富，专业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史。1971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1972年，他就任鹿儿岛大学文学部讲师。1975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9年，他转任为岛根大学法文学部副教授。1985年，他晋升为教授。1998年，他转任大阪府立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宋代税政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南宋の佃户と主客户制》、《税折纳における纳税价格と市场价格》、《宋代两税の课税基准と戸等制》、《宋代における逃弃田对策の变迁过程》、《宋朝专制支配の基础とその构造》、《宋代における两税の折纳について》、《宋代における戸等の定立とその机能》等。

在《宋代税政史研究》一书中，他在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结构时，指出宋代基本的生产关系是国家向农民征收税役而构成国家与农民之间的支配和隶属关系，也即所谓的“国家农奴制”关系。而以往在唐中期以前则是由被地主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奴隶作为主要生产力，到了宋初则转化为客户，即农奴。这实际上还是在支持宋代近世说。进而，他主张唐末建立的两税法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初，也即整个近世全是以这一税制为主的，国家和农奴的关

① 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时代》，讲谈社，1977年，第100页。

② 竺沙雅章《征服王朝の时代》，讲谈社，1977年，第8～9页。

系主宰了整个中国社会。

足立启二教授也是一位专业研究宋代社会经济史的学者。他生于1948年8月12日。1967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1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宋史。1976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先后在高中和大学就职。1991年,他转任熊本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94年,他晋升为教授。

关于宋史研究,他的主要专著有:《专制国家史论》等。主要论文有:《中国史像の再构成》、《宋代两浙における水稻作の生产力水准》、《中国专制国家の发展》等。他反对以往史学界的那种将封建制阶段应用到中国史的观点。

木田知生对宋代政治史的研究,也是值得介绍的。

木田知生生于1949年5月6日。1970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4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宋史。1980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1981年,他任龙谷大学文学部讲师。1990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8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司马光とその时代》等。主要论文有:《北宋时代の洛阳と士人达》、《包拯の后裔と祠堂》、《王安石の晚年——半山圆と定林寺》、《王安石と佛教をめぐる诸问题》、《宋代开封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江浙初期佛寺考》、《司马光の佛教观——宋代士大夫の佛教受容の一形态》等。

五、元蒙史研究

安部健夫生于1903年。192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8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在矢野仁一和羽田亨指导下,专业研究元史和清史。1933年,他大学院毕业后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助手。后晋升为副教授。1946年,他晋升为教授。1959年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元代史の研究》、《清代史の研究》、《西ウィグル国史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元史刑法志と"元律"との关系に就いて》、《元代通货政策の发展》、《清代に于ける典当业の趋势》、《生熟券支给制度略考》、《元代投下语源考》、《元时代の包银制の研究》等。他的《西ウィグル国史の研究》一书研究并考证了自漠北西迁至新疆的回鹘自8至14世纪的历史。在《元代"投下"语源考》一文中,他主张"投下"在词源上和蒙古语的 tokyaku,而王国维则主张"投下"在词源上出自契丹。他试图解释发生在元代的这一术语背后所蕴涵的社会组织构成上的含义。

著名的考古学家梅原末治,1938 年出版了论文集《古代北方系统文物研究》一书。该书主要针对蒙古地区考古发掘成果,研究了斯基泰式青铜文化和亚细亚石器的类型等问题,成为蒙古考古学的先驱者。

田村实造生于 1904 年 5 月 25 日。1923 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史学科。1927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羽田亨,专业研究元蒙史。1932 年,他从大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内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考古发掘活动。正是在这考古发掘中,他发现了辽代的遗迹。回到日本,他第一个将新发现的契丹文字的碑文介绍给了日本学术界。1940 年,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副教授。在此期间,他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明清两代民族史。1947 年,他晋升为教授,并同时担任文学部长。1954 年,他获得日本学士院恩赐奖。1968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退休后的他,又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教授,以后又当选为该大学学长。1974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二等瑞宝章勋章。1999 年 2 月 24 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庆陵Ⅰ》、《庆陵Ⅱ》、《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世界史からみた新东洋史》、《中国征服王朝の研究》三卷、《庆陵の壁画——绘画・彫饰・陶磁》、《中国史上の民族移动期——五胡・北魏时代の政治と社会》、《アジア史を考える——アジア史を构成する四つの历史世界》、《中国史にみる女性群像》、《庆陵调查纪行》、《明代满蒙史研究》等。合编有:《满蒙史论丛第 1》、全 18 卷本的《明代满蒙史料》、《大モンゴル帝国》、《最后の东洋的社会》、全 3 卷本的《元史语汇集成》等。

他的著名弟子有岩见宏、间野英二等人。

田村实造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对庆陵的考古发掘和对明代满蒙史料的收集整理上。尤其是他对契丹文字的史料解读,极大地开拓了蒙古史研究的范围和视野。

研究元曲的著名学者田中谦二对整个元代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有着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他曾经参加《元典章》研究班,对《元典章》和元杂剧进行同步研究。他和岩村忍合作出版了《校定本元典章・刑部》第一、第二册,并且还特别撰写了《元典章文书之构成》等论文。这些学术基础,为他在更深入的范围内研究元杂剧准备了基础。

岩村忍 1905 年 9 月 26 日生于北海道小樽市。1925 年,他考入オタワ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1929 年,他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新闻联合社、文部省民族研究所等地就职。从 1950 年开始,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在京都大学的几十年间,他除了取得了辉煌的学术研究成果外,还为京都大学接受アジア・フォード财团资金援助而奔波工作着。正是在他的努力下,

京都大学在アジア・フォード财团支持下,成立了东南アジア研究中心(现在的东南亚研究所)的创始期的研究所长。他一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游牧民族史和东西交涉史为主,尤其是擅长对蒙古史的研究。1954年,他曾在中亚细亚的ヒンドゥークシュ山脉中的蒙古部族中发现で、当地のモンゴル部族著名的《チルニ文书》,因此而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关注。1968年,他以论文《モンゴル社会经济史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69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88年6月1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モンゴル社会经济史の研究》、《十三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耶律楚材》、《蒙古の欧洲远征》、《マルコ・ポーロの研究》、《暗杀者教国》、《东洋の发见》、《东洋史のおもしろさ》、《东洋史の散步》、《元朝秘史》等。翻译著作有:《中央アジア探险记》、《エドゥアール・シャヴァンヌ司马迁と史记》、《长春真人西遊记》等。主要论文有:《拔都终焉の年次に就いて》、《元史速不台传の西征纪事について》、《イラン文蒙古史の诸版本》、《元朝治下の汉人と西域人》、《元の大都》、《元朝奥鲁考》等。

但是,岩村忍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却是他的那部《十三世纪东西交涉史序说》。该书利用多种文字资料,集中研究了元蒙时代的中外关系和交通,至今还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经典著作。

荻原淳平生于1920年4月4日。193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元蒙史。1948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出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讲师、副教授、教授。1983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立正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明代蒙古史研究》等。编著有:《明代西域史料》、《明代满蒙史料》等。主要论文有:《木华黎王国の成立过程にっいて》、《明代嘉靖期の大同反乱とモンゴリァご——农耕民と遊牧民との接点》等。

植松正也是一位研究元蒙史的专业学者。

他生于1941年7月26日,名古屋市人。1957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静冈高中。196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田村实造,专业研究元蒙史。1970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退学,就任京都大学研究员。1971年10月,他出任香川大学教育学部讲师。1973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83年,他晋升为教授。1994年,他从香川大学退休后,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1996年,他以论文《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7

年，他从京都女子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元典章〉年代索引》、《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元初の法制に关する一考察——とくに金制との关连について》、《元代江南行省宰相考》、《元朝史の研究》、《元初江南における徵税体制について》、《元朝支配下の江南地域社会》、《元代江南の地方官任用について》、《元初における海事问题と海运体制》等。

可以说，植松正侧重于研究的是元代江南地区的法制和社会经济问题。在《元代江南の地方官任用について》一文中，他从元朝统治政策的角度，系统地考察江南地方官的任用问题，并分析了元朝在江南统治上的政策得失。他发现，由于元代江南士大夫们被阻塞了科举通往中央之路，于是，大部分的士大夫阶层转向江南地方官府发展。由此而来对中国近世社会从宋至明的过渡，发生了重大的作用。在《元初における海事问题と海运体制》一文中，他从"水军の编成と变迁"、"对外关系と船舶"、"漕粮体制"等几方面来研究忽必烈时代元代的造船业和海运体制问题。

森田宪司生于1950年7月11日。1970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4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元蒙史。1979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奈良大学文学部讲师。1998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元代知识人と地域社会》等。主要论文有：《〈事林广记〉の诸版本について——国内所藏の诸本を中心に》、《可见元代石刻拓影目录稿》、《鸽子洞文书について》、《元朝科举研究をめぐって：资料状况と研究状况のかかわりで》、《史料としての出土墓志：浙江省临海县の场合》、《至元三十一年崇奉儒学聖旨碑》等。

可以发现，他主要是利用元代墓志来研究元史和人物史实的考证。在这方面，他也下了很大的工夫来搜集相关史料。而我国除了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和研究《全元文》之外，还没有专业研究元代墓志的学者。[①] 在《〈事林广记〉の诸版本について——国内所藏の诸本を中心に》一文中，他研究后得出结论《事林广记》在日本国内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至顺年间建安椿庄书院本。1963年，中华书局根据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一刻本的《事林广记》加以影印出版。

---

① 在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期间，我曾经利用我所看到的上百张元代墓志拓本和《全元文》中的元代墓志进行过文本校勘工作，居然发现《全元文》中的文本出现一些错误。为此，我曾致信那里的古籍研究所所长韩格平教授。可惜，我的研究专业并不是《全元文》。

杉山正明1952年3月1日生于静冈县沼津市。1967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沼津东高中。197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4年,他大学毕业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元蒙史。1980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88年,他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文学部讲师。1989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95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大モンゴルの世界:陆と海の大帝国》、《クビライの挑战:モンゴル海上帝国への道》、两卷本的《モンゴル帝国の兴亡》、《耶律楚材とその时代》、《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疾驱する草原の征服者》等。主要论文有:

2009年12月9日,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对他的介绍如下:

> 杉山正明教授是国际著名的东亚历史和民族史学者,现任职于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他广泛涉猎于东亚民族史(含辽金、西夏、宋、蒙元、明诸朝史,尤擅蒙元)、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学等领域。代表性著作有:《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耶律楚材及其时代》、《游牧民眼中的世界史——超越民族与国境》等;并在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数十篇。曾荣获过SUNTORY基金会奖、司马辽太郎奖等奖项。杉山正明教授通晓13种语言文字,它们是汉语、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拉丁语、波斯语、梵文、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蒙古语、藏语、满语;因此他能够充分掌握亚、欧、美各地区的丰富史料,贯通东西方学术,整合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突破断代与区域研究的局限性,开拓新的领域与方向。他能将世界史与亚洲史及中国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从微观研究体现宏观视野,论著质优而量多,兼具深度与广度,迭有新见,久为国际学术界所推重,不仅是国际蒙元史学界的顶尖人物,也是世界著名的京都学派现阶段的代表人物。

上述介绍可以说相当符合实际的他。他的外语天才也许可以和羽田亨相比。但是,他的研究专业和学术贡献却是超过了他的这位前辈学者。

岸本美绪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一文中曾经引述杉山正明对日本蒙古史研究的评价:

> “日本的元史研究具有三重构造:①利用汉语文献作为中华王朝之一的元代看待的‘宋元’史研究;②利用汉语乃至蒙语等‘东方文献’探索‘中国征服王朝’潮流的‘辽金元’史研究;③利用‘东方文献’及波斯

语史料等'西方文献'作为贯通东西方问题的'蒙古时代史'研究。他指出这三个方向同时并存,并举出近年来显著的动向之一是将汉语史料和波斯语史料作为双璧,对涉及蒙语、藏语、拉丁语、维吾尔语等20多种语言的基本史料,以严密的语言文献学方法致力探究的研究者正在增多"。①

在上述评价基础上,他在研究元蒙史时,针对以往学术界过分依赖汉文史料的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开始利用碑刻文字、八思巴文等众多中亚地区少数民族古文字资料来研究元蒙史。另一方面,他在十几部元蒙史研究论著中强调在"世界史"的范围内来研究和考察"蒙古时代"的重要性,力图重新建构他心目中的"History of Mongol period"。他在考察了十几种相关文字的史料后,否认了马可·波罗的真实存在。这也是他闻名世界的观点之一。从他所谓的世界史的视野研究蒙古史,他提出了"蒙古中心说",认为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是全球化的先锋,那时的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阶段。

六、明清史研究

在京都学派,最早的明清史家就是内藤湖南和矢野仁一两位教授。

内藤湖南先后出版的有关汉学研究著作有"清朝史系列五书":《清朝史通论》、《清朝衰亡论》、《清朝建国史》、《支那论》、《新支那论》。还有《支那绘画史》、《支那史学史》、《支那目録学》、《支那近世史》、《燕山楚水》、《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等。矢野仁一在明清史研究上,如《日清战役时期中国外交史》、《アヘン战争と香港: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1〉》、《アロー战争と円明园:支那外交史とイギリス(その二)》、《支那近代外国关系研究》、《支那近代外交史》、《清朝末史研究》、《近代蒙古史研究》、《近代支那の政治及び文化》、《近代支那论》等。

这些研究专著的出版可以说奠定了京都学派的明清史研究的基础。

194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宫崎市定和安部健夫两位教授领导下正式开办了"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这一研究班一直持续到1971年。1950年,宫崎市定出版了《雍正帝:中国の独裁君主》一书。

1986年,东洋史研究会将上述4期合编为论文集《雍正时代的研究》,并且编制了详细的综合索引:《雍正朱批谕旨索引》。该论文集收录了24篇论

① 见伍跃《日本的雍正研究》。

文,以下引自伍跃《日本的雍正研究》[1]一文:

一、宫崎市定《雍正朱批谕旨解题》
二、佐伯富《论明清时代的民壮》
三、岩见宏《雍正时代公费问题的初步研究》
四、荒木敏一《雍正二年的罢考事件与田文镜》
五、安部健夫《米谷供需的研究》
(以上原载《东洋史研究》第15卷第4号,1957年3月)
六、宫崎市定《清代的胥吏和幕友》
七、佐伯富《康熙雍正时代的日清贸易》
八、荒木敏一《从直省教学之制观察雍正统治时期的文教政策》
九、小野川秀美《雍正帝与大义觉迷录》
十、安部健夫《耗羡提解的研究》
(以上原载《东洋史研究》第16卷第4号,1958年3月)
十一、宫崎市定《雍正时代地方政治的实际状况》
十二、荒木敏一《雍正时代学臣制的改革》
十三、塚本俊孝《雍正帝的儒佛道三教一体观》
十四、岩见宏《关于雍正年间的民欠》
十五、狩野直祯《平定种家苗的有关问题》
十六、小野和子《清初思想统制的有关问题》
十七、寺田隆信《关于雍正帝的贱民开放令》
十八、佐伯富《清代雍正朝的通货问题》
(以上原载《东洋史研究》第18卷第3号,1959年12月)
十九、宫崎市定《关于雍正帝实施的俸工银扣捐的停止》
二十、佐伯富《清代的奏销制度》
二十一、荒木敏一《雍正统治时期考差法的成立》
二十二、狩野直祯《茶马贸易的终结》
二十三、横山裕男《观风整俗史考》
二十四、岩见宏《关于养廉银制度的创设》
(以上原载《东洋史研究》第22卷第3号,1963年12月)

伍跃在《日本的雍正研究》一文曾经如是评价说:

如上所述,"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是构成日本"雍正热"的中心,研

① 岩见宏、谷口规矩雄《传统中国の完成》,讲谈社,1977年,第6页。

究论文的发表以及《雍正朱批谕旨索引》的编纂是“雍正热”的两大成果。但是，这一热潮的最大成果，诚如佐伯富先生在1983年为《雍正时代的研究》一书所写的序文中指出的，现今在学术界发挥着重要影响的青年研究者们几乎都曾经在这一研究班中以及索引的编制工作中受过锤炼。我认为，当年日本的“雍正研究”留给世界的中国史学界最大的成果就是培养了不止一代的学者。一些先生们在回忆录及言谈话语之中都往往会提到当年在研究班中受到史料学以及研究方法的训练。前后参加过该研究班以及索引编制工作的学者为数众多，仅据本人所知列举如下：宫崎市定、安部健夫、小野川秀美、佐伯富、荒木敏一、日比野丈夫、岛田虔次、波多野善大、岩见宏、谷光隆、近藤秀树、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河内良弘、寺田隆信、梅原郁、永田英正、森正夫、堀川哲男、北村敬直、山根幸夫、竺沙雅章、吉川忠夫、砺波护、狭间直树、佐竹靖彦、杨启樵、横山裕男、谷口规矩雄、衣川强、西里喜行、植松正、爱宕元、足立启二、松浦章、井上裕正、孔飞力(Philip Kuhu)、夫马进、杉山正明、岩井茂树、檀上宽、井上进等。

三田村泰助1909年生于福井县南条郡武生町。192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史学科。193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在内藤湖南、滨田耕作、羽田亨的指导下，专业研究清史和满洲史。1937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助手。1939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49年，他晋升为教授。1964年，他以论文《清朝前史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78年，他从立命馆大学退休。1988年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宦官：侧近政治の构造》、《满和辞典》、《清朝前史の研究》、《内藤湖南》、《明と清》、《明帝国と倭寇》、《黄土を拓いた人びと》等。主要论文有：《明实录の传本について》、《再び清の太宗の即位事情に就いて》、《满文太祖老档考》、《清代米谷供需研究》等。

他的《宦官：侧近政治の构造》一书集中研究了从汉到明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宦官的历史，特别是对宦官和后宫女祸、宦官和朝廷官僚之关系的论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封建王朝频繁更替的原因之一。

在他的《清朝前史の研究》一书第二章《明末清初の满洲氏族とその源流》一文中，三田村泰助一直坚持主张明代女真族的社会形态还是社会氏族制度的观点。他还主张满语的“满洲”一词实际上出自努尔哈赤。在该书中，他还极其重视满洲人与周边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他认为16世纪中叶的满洲人已经具有了后世商业资本家性质的投资活动。此书和河内良弘的《明代女真史の研究》恰好可以构成明清两代的女真·满洲史。

河内良弘生于1928年8月20日。1951年,他插班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二年级。1954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宫崎市定、佐伯富,专业研究清代民族史。1959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1960年,他成为天理大学讲师。1968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3年,他晋升为教授。1984年,他以论文《明代女真史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5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1992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再次出任天理大学文学部教授。1996年,他从天理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满洲语文典》、《明代女真史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清初满语语文献资料の现状》、《朝鲜王国の女真通事》等。

他的《明代女真史の研究》是一部长达800多页的巨著。该书分前后两部,共由21章组成。第一部的研究范围从明代初期(高丽末期)至天顺年间(朝鲜世祖的前半期),第二部的研究范围从明代成化年间(朝鲜世祖后半期)到明代后期。他一反以往大量使用中国文献来研究满洲史的弱点,利用他掌握的朝鲜史料,对明代的满洲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并给清初满洲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某种意义上,此书是满朝在明代的交涉史。他大量进行《李朝实录》和《明实录》互相研究,开拓了满洲史研究的视野。

寺田隆信1931年5月23日生于兵库县姬路市。195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4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史。1959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退学,就任东北大学文学部讲师。1986年,他晋升为东北大学文学部教授。他以论文《明代乡绅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从东北大学退休。1997年,他转任いわき明星大学教养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物语中国の历史:文明史的序语》、《明代乡绅の研究》、《山西商人の研究》、《永乐帝》等。

《明代乡绅の研究》一书由以下六章构成:第一章《乡绅の登場》,第二章《近世士人の学问と教养》,第三章《乡绅像の诸相》,第四章《乡绅の系谱と行状》,第五章《祁彪佳研究》,第六章《非乡绅的人生——市隐の生と死》。在该书中,他首先指出,"乡绅"这一概念在当时具有"生员"、"监生"、"举人"、"进士"等多重身份,又是广义的居住在乡里的知识人的总称。由于定义范围的宽泛,自然就涉及对明清时代的中国基层社会结构的理解。

谷光隆生于1920年8月7日。193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史。1948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讲师。1955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0年,他晋升为教授。1972年,他以论文《明

代马政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4 年,他从奈良女子大学退休后,转任爱知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明代马政の研究》、《明代河工史研究》、《王阳明》等。编著有:《东亚同文书院阿片调查报告书》、《アジア女性史文献目录》等。主要论文有:《成化时代における司礼监の地位》、《明代茶叶贸易の研究》、《明代茶马贸易の研究一虜寇を中心として》、《永乐~成化期における地方官の保举について》等。

他在《明代马政の研究》一书中,对明代的茶市和马市贸易进行了专业研究。该书选择当时茶马贸易作为研究点,成为解读明代社会经济史的名著。另一方面,他的《アジア女性史文献目录》一书又成为研究中国古代女性史的资料目录集。

岩见宏生于 1924 年。京都市人。1943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7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史。1951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退学,就任神户大学文学部讲师。1958 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68 年,他晋升为教授。1981 年,他当选为文学部长。他以论文《明代徭役制度の变迁:上供公费との关系を中心とし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7 年,他从神户大学退休后,转任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等。合著有:《东洋史概说》、《传统中国の完成——明・清》、《民族主义の时代》、《明末清初期の研究》、《东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际秩序の形成と展开》等。主要论文有:《养廉银の创设について》、《清朝の中国支配》、《晚明财政の一考察》、《明朝嘉靖期の加派について》、《明朝嘉靖期の加派について》、《银差の成立をめぐつて》、《山东经会录について》等。

他对明清时代税制上的折银制度问题进行了细致地研究。

在他和谷口规矩雄合著的《传统中国の完成——明・清》一书中,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从明到清这一时间段上。在他们看来,这个时候的中国,才是传统中国真正的完成,而这一完成时态的中国,他们认为是"烂熟の中国"。用他们的原话来说,即:"まさに烂熟という言叶がふさわしい状态になっていた"。387 这在日语中并不是个好术语,而是和"腐朽"、"无可就药"等概念很接近的一个词。换句话说,他们已经把中国古代社会的腐败和衰亡的起点从晚清拉回到了明初。该书第二章《明帝国の衰退》就已经开始了传统中国的衰退过程。在他们看来:

清朝,如果说和过去的中国王朝是完全异质的王朝的话,显然也是

不能那么说的。可以看到清朝更好地实现了中国的天下国家观念形态。从四方的异民族接受中国文化的同化、并最终接受了中国皇帝的统治这样一种中华思想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可以说清朝当然是比明朝更好地实现了中国的传统理念的国家。从这点来看,清朝可以说是具备了与中华帝国的终结相适应的所有特点。①

于是,所谓"传统中国の完成"也就变成对传统中国的衰亡过程的研究。在全部由五章构成的本书中,第三章中的商业的发展和欧洲传教士的来华两小节内容是他们眼中仅有的两个亮点,除此之外,全是从明到清衰亡的历史过程。

小野和子也是一位研究明清史的专业学者。

小野和子生于1932年1月2日。1951年,她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5年,她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岛田虔次,专业研究明清史。1960年,她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现为三重大学文学部教授。

在明清史研究上,她的主要著作有:《明季党社考:东林党と复社》、《复社姓氏索引》、《黄宗羲》等。编著有:《明清时代の政治と社会》等。主要论文有:《东林派とその政治思想》、《黄宗羲の前半生——とくに明夷待访录の成立过程として》、《明末の结社に关する一考察——特に复社について》、《东林党考——その形成过程をめぐって》、《山西商人と张居正》、《清初の思想统制をめぐって》等。

在《明季党社考:东林党と复社》一书中,她以晚明政权覆灭前后的政治史为背景,详细地研究了东林党和复社的形成过程,以及主要成员、见解、人际交往等重大问题。实质上,诚如此书译著李庆先生在《前言》中所说它"是一部从党争角度描述的晚明史"。

她的同学大谷敏夫是一位研究清史的专业学者。

大谷敏夫生于1932年2月18日。1951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矢野仁一,专业研究清代史。1960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开始在大学文学部任非常勤讲师。后晋升为法文学部副教授、教授。1990年,他以论文《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94年,他从鹿儿岛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战争》、《清代の政治と文化》等。主要论文有:《清代江南の水利惯行と乡董制》、

① 岩见宏、谷口规矩雄《传统中国の完成》,讲谈社,1977年,第8页。

《清代思想史研究——近年の动向》、《〈海国图志〉の幕末日本に与えた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战争》、《扬州·常州学术考:その社会的关连》、《魏源经世思想考》等。

他的《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由以下三部构成:第Ⅰ部《清朝独裁君主制と断罪事件》,第Ⅱ部《江南地域社会と学术》,第Ⅲ部《清末政治思想と经世学》。第Ⅰ部在研究清代军制的基础上,对戴名世、年羹尧等人的文字狱事件进行了背景分析研究。然后,他对雍正皇帝看重"诚"不看重"理"的政治思想进行了论述。第Ⅱ部在研究江南水利和乡董制度的基础上,对扬州、常州等地学术出现繁荣的局面,进行了社会经济史的考察。为实学思想的诞生找出了社会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

在《清代江南の水利惯行と乡董制》一文中,他通过对清代江南水利问题的研究,探讨了当时乡绅和地方官僚体制之间的关系,揭示了清代中后期在水利问题上"惯行"模式的变迁,由此而考察以乡绅为主导的"乡董制"的成立及其在对水利建设方面的管理情况。他把乡绅介入的水利建设和举办团练,划归为地方公益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乡董们得以参与地方行政统治。

森正夫的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京都学派中国古代史研究上的创新点之一。

森正夫1935年生于京都市。195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2年,他大学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史。1967年,他修完博士研究生全部课程学分,转任高知大学教育学部讲师。1987年,他转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教授。后来又当选为名古屋大学文学部部长、副学长。1996年,他从名古屋大学退休后,转任爱知县立大学教授、学长。2007年,他从爱知县立大学退休后,就任爱知县立艺术文化センター总长。2009年3月,他卸任后正式退休。

主要著作有:《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江南デルタ市镇研究:历史学と地理学からの接近》、三卷本的《森正夫明清史论集》、《江南三角洲市镇研究》等。合著有:四卷本的《中国民众叛乱史》等。主要论文有:《いわゆる"乡绅的土地所有"论をめぐって》、《日本の明清时代史研究における乡绅论について》、《16~18世纪における荒政と地主佃户关系》等。

森正夫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他非常看重这一研究方法。在《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一文中,他认为:历史研究本身具有现实性和实践性,而田野调查也具有明确的现实性和实践性。因此,两者之间本来就具有共通性。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就是通过验证以往的历史,解决现实所面临的问题,并且

以过去为参照,摸索解决现实问题的途径。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田野调查也是与此相一致的。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所具有的卓越的中国特质的问题。中国以其丰富的文献收藏量而素有文献之国之称,然而,其实有不少问题如果不进行田野调查就无法弄清楚。历史学有必要全面摄取在与之相邻的地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中业已确立的田野调查的方法。摄取田野调查的方法及其成果,有助于给历史学开辟新的未来。①

常建华教授在《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一文中解释说:

> 日本明清史学向地域社会研究的转变实在同森正夫本人的学术转向分不开,在一定程度上,森正夫的学术转向反映了日本明清史研究趋向的改变……1981 年森正夫在《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中国史研讨会(地域社会的视点——地域社会与领导者)基调报告》,尝试将自己的观点体系化,正式提出他的地域社会研究设想。陈述了为了和今天的问题对应,把意识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他提出:所谓秩序或秩序原理,与进行生命的生产或再生产的场所,即人们生存的基本场所深深关联着,它对于整合构成这个场所人们的意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要素。换言之,虽然孕育着阶级矛盾和差异,但面对着从广义上来说共同的再生产的现实课题时,各个人都处置于共同的社会秩序下。这样由共同领导者统治下被整合的地域场所叫做地域社会……森正夫之后,众多学者采用不尽相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探讨地域社会,形成以地域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学术倾向。②

"地域社会说"一出现立刻就成了日本汉学界明清史研究的显学。

在《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一书中,森正夫在考察文献中记载的"父老"、"耆老"、"里老"、"乡耆"等概念时发现,其实这些人就是民众中实际的指导阶层。③ 他所谓的"江南",其地域范围完全限于苏州、松江、太仓与嘉兴即江南的东部地区。后来又扩展到常州、湖州两地。

谷口规矩雄生于 1935 年 6 月 1 日。1954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神户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8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专业研究明

---

① 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

② 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③ 森正夫《明代江南土地制度の研究》,同朋舍,1988 年,第 491 页。

史。1963年,他大学院毕业后就任大阪大学教养部讲师。以后逐渐晋升为副教授、教授。他以论文《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他从大阪大学退休后,转任爱知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朱元璋》、《明末清初期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日本における明代徭役制度の研究》、《庞尚鹏の一条鞭法》、《东阳民变——所谓许都の乱について》、《明代荆襄地帶农民反乱の一面》等。

在《明代徭役制度史研究》一书中,他以华北地区为例,研究了当时那里普遍出现的徭役折银制度——即从"九等法"到"门银"和"丁银"、再到出现"一条鞭法"的长达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甚至还特别研究了南方地区出现的类似问题——见他的论文《明代福建の一条鞭法について》。

西里喜行生于1940年4月12日。195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时代中琉日关系史。1968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琉球大学教育学部讲师。以后逐渐晋升为副教授、教授。2005年,他以论文《清末中琉日关系史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清末中琉日关系史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中琉日关系の再编成における琉球问题》、《册封进贡体制の动搖とその诸契机——嘉庆·道光期の中琉关系を中心に》、《黎庶昌の对日外交论策とその周边——琉球问题·朝鲜问题をめぐって》、《琉臣殉义事件考》、《中琉交涉史における土通事と牙行》、《咸丰、同治期の中琉日关系における铜材"献纳"问题》等。

显然,西里喜行的研究完全是明清时代中、琉、日三国的关系史。从某种角度上看,他是矢野仁一史学的追随者。

西村元照生于1944年3月26日。1965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9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史。1974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4年,他转任东海大学文学部讲师。1977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85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中国民众叛乱史第2卷》、《明人文集目录集成》、《明清类书目录集成》等。主要论文有:《张居正の土地丈量》、《清初の土地丈量について》、《清初の包揽——私征体制の确立、解禁から请负征税制へ》等。

夫马进1948年4月7日生于爱知县。1967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

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1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明清史。1974 年,他从博士研究生退学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9 年,他转任富山大学文学部讲师。1981 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5 年,他晋升为教授。1999 年,他以论文《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使琉球录解题及び研究》、《中国明清地方档案の研究》、《中国东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清代の恤渚・会と清节堂》、《明清時代の讼師と诉讼制度》、《中国明清时代における寡妇の地位と強制再婚の风习》、《中国清代における寡妇救援事业》、《明代南京の都市行政》等。

他的《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一书主要是研究明清时代存在的慈善组织这一问题。之所以选择明清时代是因为明末清初的江南地区,因为存在宗教的、政治的和伦理的种种不同因素而使得当时的民间慈善事业发展出现高潮。而他本人通过这一研究却力图找出中国近代的地方自治及早期社会福利制度等重大的社会问题。

足立启二对明清社会经济史也下了很大工夫进行研究。他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明末清初の农业经营——〈沈氏农书〉の再评价》、《明清社会の经济构造》、《清代前期における国家と钱》、《清—民国期における农业经营の发展》等。在《清—民国期における农业经营の发展》一文中,他对清代中晚期陕西、山东两地三户农家经营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从中找出了华东地区农业生产的特点。而他在《明清社会の经济构造》一文中对明清社会构造进行研究时,他又得出了"非团体性的社会结盟关系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特征"的结论。他还主张明清社会并不存在具有政治主体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这一概念。

井上裕正是另一位研究清史的专业学者。

他生于 1948 年 12 月 17 日。1967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1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清代鸦片战争史。1976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开始在岛根大学文学部任非常勤讲师。1982 年,他正式出任岛根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84 年,他转任奈良女子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96 年,他晋升为教授。他以论文《清代アヘン政策史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清代アヘン政策史の研究》、《林则徐》等。翻译著作有:《内藤湖南——ポリティックスとシノロジ》等。主要论文有:《清代咸丰期のアヘン问题について》、《清代嘉庆期のアヘン问题について》、《清代嘉庆・道光期のアヘン问题について》、《两广总督李鸿宾のアヘン政策论》、

《“嘉庆元(1796)年アヘン外禁说”辨误》等。可以发现,他的研究全部围绕着鸦片战争而来。特别是他在《清代嘉庆・道光期のアヘン问题について》一文中所指出的:“直到道光九年(1829年)御史章沅上奏,指出纹银流出的原因实为鸦片,这一见解才被一般人接受”。这就公开肯定了章沅的历史地位。

檀上宽生于1950年6月6日。196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清史。1978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富山大学人文学部讲师。1987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89年,他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明朝专制支配の史的构造》、《明の太祖朱元璋》、《永乐帝——中华:“世界システム”への梦》等。主要论文有:《元・明交替の理念と现实》、《初期明帝国体制论》、《明初の海禁と朝贡》、《方国珍海上勢力と元末明初の江浙沿海地域社会》、《明初建文朝の历史的位置》、《明代科举改革の政治的背景——南北卷の创设をめぐって》等。

在《明朝专制支配の史的构造》一书中,檀上宽把研究重点放在明初历史的研究上。首先,他把朱元璋的明初政权定位为江南地主的支持下而建立起来的南人政权,而他认为朱元璋的迁都行为正是为了打破这一南人政权而采取的行政手段。在当时的江南,朱元璋虽然夺取了政权,但是逐渐形成南北两个政治中心的局面。为此,如何实现明王朝真正的南北统一就成了朱元璋的心病。尽管这一过程最终直到明成祖通过几次血腥的杀戮和镇压,才取得了南京政权大小官员的一致赞同并成功迁都。其次,檀上宽认为朱元璋为清理明初江南社会所造成的追求私利的弊害,采用了把维护乡村地主富室作为王朝基石的策略。他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对明初王朝从南到北的转移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

松浦茂1950年12月20日生于鸟取县。1969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清史。1978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讲师。1981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教养部副教授。2002年,他晋升京都大学综合学部教授。2005年,他以论文《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清朝のアムール政策と少数民族》、《清の太祖ヌルハチ》等。主要论文有;《ウリンの输送问题と边民制度の改革》、《金代女真氏族の构成について——金史百官志みえる封号の规定をめぐって》、《康熙前半・新满洲佐领移住》、《十七世纪以降の东北における经济交流》等。

他主要研究清初史、清朝东北边疆史、东北边民制度史。他特别注意到了努尔哈赤对女真人口的迁徙问题,他称之为努尔哈赤的徙民政策。他甚至亲自在1990年8月30日到我国辽宁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查阅当时巴拉人的相关档案。

在清代对外关系方面从事专业研究的还有神户辉夫。他生于1939年4月16日。195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清史。1967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现为大分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主要论著有:《雍正朝期の改土归流について》、《マーガリ事件をぐる英清交涉》等。

岩井茂树生于1955年10月20日。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8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1983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京都产业大学经济学部讲师。1985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现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世财政史の研究》、《中国近世社会の秩序形成》等。主要论文有:《清代国家财政における中央と地方——酌拨制度を中心にして》、《张居正财政の课题と方法》、《清代の戸部——度支部档案について》、《清代の版图顺庄法とその周边》、《清朝に输送された对马藩主宗义成の书契原本と一六三九年前后の北东アジア情势》、《清末の外销经费と地方经费》、《朝贡と互市——非"朝贡体制"论の试み》等。

七、历史地理学研究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小川琢治是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开创者。但是,在他出任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主任教授之后,他的职位交给他的副手石桥五郎继承。后来才出现了人文科学研究所,也出现历史地理学讲座、相互协助教学和科研的现象。1935年,石桥五郎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接替他的职位的是小牧实繁。小牧实繁在京都帝国大学就读期间,同时师从小川琢治和滨田耕作。因此之故,从他开始加强了对史前历史地理的研究。1937年,小牧实繁以论文《史前地理学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整个历史地理学教研室的全体师生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支持日本军部的侵华活动中——这显然和该学派祖师小川琢治的积极的投身于侵华战争活动是分不开的。"二战"结束后,因为过分介入战争活动而受到指责的小牧实繁,被迫引咎辞职。这期间,宫崎市定成了这一讲座的临时教授。1950年,小川琢治的弟子织田武雄出任该讲座教授,这才又开始了历史地理

学教研室的正常工作。

和《考古学京都学派》出版的目的一样，最近日本也出版了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的纪念专著：《地理学京都の百年》一书。[①] 此书又名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百年史”。该书内容如下：

はじめに
第一章　京大地理学教室百年の歩み
1. 近代日本と地理学
2. 地理学教室の创設
3. 地政学への倾斜と教室再兴
4. 宫崎市定の兼担
5. 森鹿三と人文科学研究所
6. 藤岡谦二郎と教养部
7. 地域地理学讲座の增设とその前后
第二章　历代教授の地理学观
1. 小川琢治
2. 石桥五郎
3. 小牧实繁
4. 织田武雄
5. 水津一郎
第三章　地理学研究の展开と京大地理学教室
1. 历史地理学
2. 地图史研究
3. 地理学思想史研究
4. 村落地理学
5. 都市地理学
第四章　地理学教室创设期の人々
1. 内田宽一
2. 村松繁树
3. 米仓二郎
4. 松井武敏
5. 山口平四郎
补遗

① 《地理学京都の百年》，ナカニシヤ出版社，2008 年。

表1　教员一览(a. 教授·副教授 b. 讲师 c. 助手 d. 客座教授)

表2　专门科目(地理学)の非常勤讲师ならびに授业担当者一览(1907年度~2008年度)

表3　学部卒业生ならびに修了生の氏名および卒业论文题目一览(1910年~2008年)

表4　修士课程修了者の氏名ならびに修士论文题目一览(1955年~2008年)

表5　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一览(1937年~2007年)

表6　博士课程单位修得者および学修者の一览(1958年~2008年)

附表1　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地理学谈话会会报(1936年~1938年)掲载の记事一览

附表2　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地理学谈话会会报(1990年~2008年)掲载の记事一览

该书的目的是要说明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历史和未来。从上述目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地理学京都学派的开创者小川琢治在这里的真实的历史地位。因此,京都学派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创始自小川琢治,而他名下的著名弟子是森鹿三、小牧实繁、日比野丈夫、织田武雄等人。

森鹿三1906年生于兵库县神户市。192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9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助手。1937年,他出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嘱托讲师。1948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他以论文《居延汉简の古文书学的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63年,他当选为人文科学研究所长。1970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佛教大学文学部教授、副学长。1980年8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篇》、《历史地理讲座》等。主要论文有:《水经注に引用せる法显传》、《戴震の水经注校定について》、《最近の水经注研究》、《房山地方の沿革地理》、《唐代の交通》、《支那地图史研究论文要目》、《水经注に引用せる史籍》、《北魏洛阳城の规模について》等。

他根据李柏文书出土地点的照片上出现的"海头"二字断定日本人桔瑞超所主张的楼兰古城其实是斯坦因曾经来过并命名的"LK城"。以后的考察也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的正确。他还是洛阳历史地理研究的开创者。他还开创了居延汉简研究。即他首先对散乱的汉简进行文本复原,从古文书学的角度,将散乱而不成文的简牍逐渐恢复到其本来的版本状态。而他对

《水经注疏》的研究和译注以及他主持的专业研究班，更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日比野丈夫1914年3月4日生于京都市。他的祖先是高须藩著名的汉学世家。1929年，他从京都市第一中学考入著名的京都市第三高中。1932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36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的助手。1939年开始，他来到中国留学。1941年底回国后，他任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1948年，他成为研究员。1949年，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1951年，他晋升为讲师。1957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68年，他晋升为教授。1959年，他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62年，他以论文《汉代历史地理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69年开始，他先后到法国和英国任文部省在外研究员。1977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而后，他成为追手门学院大学教授。1980年，他成为大手前女子大学教授和该大学校长。2007年7月2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五台山》、《华侨》、《水经注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目で见る中国の史》等。合著有：《秦汉帝国》、《中国史人名辞典》等。主要论文有：《王莽时代の河西四郡について》、《大元统一志の零页について》、《唐宋时代における福建の开发》、《宋の临安についての觉え书》、《地图に现われた后套水道の变迁》、《支那沿革地理》、《清末より现在に至る支那の测量地图》、《阿尔泰军台について》、《サリク＝ウイグル种族史补考——甘肃への移住年代》、《モンゴル部族並びにチンギス汗の祖族ボルジギン集团の系谱について》等。

1942年，他曾被派往中国山西堡城县，现场调查那里保存的大批汉代古墓。这让他倍感兴奋。因为当年他的祖上日比野辉宽在1862年作为幕府遣清使节团一员来华时，就曾留下著名的《文久二年上海日记》一书。可以说，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兴趣和研究是他长久以来的愿望。直到1944年，他才返回日本。在华期间，他并没有停留在山西，而是利用一切机会到中国各地去进行实地考察。《五台山》一书就是在此期间开始动笔的。

关于历史地理学上的河西四郡的问题，即《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

武威郡　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县十。
张掖郡　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县十。
酒泉郡　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县九。
敦煌郡　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县六。

这四郡的设立年代，《史记》和《汉书》的记载是矛盾的。在《王莽时代

の河西四郡について》一文中，他利用掌握的文献，进行考证后主张这四郡是公元前115年、张骞归国时设立的。此说一出，至今还是历史地理学界和秦汉史学界的定论之一。后来有关学者又利用新出土的汉简，更进一步证实了此说。

八、史学思想研究

研究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从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开始就是他们看家的学术传统之一。内藤湖南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肯定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一书的史学思想和学术贡献，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因为作为日本学者的他远比中国学者更早更全面地发掘了章学诚的遗书。内藤湖南在《支那史学史》中对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推崇，也肯定了胡适、姚名达、刘咸炘三人对章氏生平和思想的研究。内藤湖南最为赏识的是章氏全新的史学思想以及章氏在校雠学和方志学上的突出贡献。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原道说和原学说等观点，深得内藤湖南的赞赏。在《支那史学史》中，内藤湖南还特别肯定了章学诚创建方志学的学术史意义，在介绍这一新学说时，他不惜点出了戴震对方志学的非难，这显然已经暗含着对戴震的批评。

内藤湖南的弟子三田村泰助的《章学诚の史学》一文，继承并阐发了内藤湖南在《支那史学史》一书中的观点。

稻叶一郎1936年生于大阪市。195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东洋史学科，师从著名东洋史家宫崎市定。1966年，他在取得了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1967年，他成为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助手。1969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5年，他晋升为教授。1980年，他转任关西学院大学文学部东洋史教授。1989年，他以论文《中国史学史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5年，他从关西学院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中国の历史思想——纪传体考》、《中国史学史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章学诚の史学原理》、《汉书の成立》、《〈历年图〉と〈通志〉——〈资治通鉴〉の成立过程に关する一考察》、《司马光の政治思想——主として改革派官僚期における》等。

在立命馆大学文学部任教期间，稻叶一郎先后写有《章学诚の史料学》、《章学诚の地方志编修と方志学》、《章学诚の历史观》、《章学诚の史学原理》等多篇论文。他对章学诚视为败作的《永清县志》，也从章氏对此书编修

的缘起、体制、内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为人们了解章氏的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翔实的文献研究范本。

在《章学诚の史学原理》一文中，稻叶一郎继承了内藤湖南的观点主张，章学诚全面继承了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并力图通过重视六经的复古来达到在历史叙述上的革新。

在史学思想的研究上，还有重泽俊郎的《欧阳修の正统论》、吉川忠夫的《范晔と刘知几》、西脇常记的《刘知几の历史意识》等。

在此问题的研究上，小南一郎还发表了名作《史の起源とその职能》一文。[①] 在该文中，小南一郎提出：早期的“史”是具有计算和记录技术的人。他首先在对王国维《释史》一文的基础上展开他的研究。该文由“史字の构成”、“数字符号”、“数の技术者としての史”三章组成。他已经和白川静对史的起源研究和解释有了不同。

还有现任大阪教育大学的教授福嶋正先生，他是一位专业研究《史通》思想的学者。1954 年 1 月 5 日生。1972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76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史学思想。1981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退学，就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1985 年，他就任大阪教育大学教育学部讲师。1989 年，他晋升为副教授。2002 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史记・汉书》等。主要论文有：《史通と资治通鉴》、《论衡と史通》、《西汉年纪と资治通鉴》、《邵晋涵の历史学》等。

① 见《东方学》第 98 辑，第 12 页。

第四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新城新藏1873年8月26日生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他的祖上是当地著名的酿酒家族。1891年,他从会津若松市第二高中毕业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189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攻物理学。1897年,他修士毕业后就任陆军炮工学校教授。1900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副教授。1901年开始,他到德国留学,专门从事天文学的研究。1903年,他回国后晋升为理学部教授。从这时开始,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移到了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研究上来。他和文学部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两位教授有了很深的交往。并在他们的启发下,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著作。他的名著《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一书出版时,内藤湖南教授亲自为此书写下了长序。此书出版后立刻为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使他成为国际上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问题的权威学者。1918年,他在京都帝国大学设立宇宙物理学教研室。1920年,他成为理学部长。1929年,他当选为京都帝国大学校长。1935年,他又出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在上海期间,他多次主持汉语教学活动和面向上海大众的学术演讲。

即便是在那个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疯狂的时代,他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良知,多方奔走呼号,保存中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他甚至大胆地给日本国内因反战而被解除工作和职务的左翼知识分子柘植秀臣、小宫义孝等人提供了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和科研机会。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战后,国民政府依据新城教授所提供的文物保护清单展开了对日军占领区掠夺中国文物的清查工作。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的1938年8月1日,他亲自来到南京城区视察当时中国文物保存现状工作时,因疲劳过度而突然逝世——是疲劳过度还是因为内心中的愤怒突然引发了心脑血管的疾病,我们只能意会而无法言传,因为我所看到的来自日本官方(或南京驻军)公布的死亡原因就是简简单单的"疲劳过度"而已。但是,这样一位善良而正直的汉学大家,面对着自己的

同胞制造了南京惨案和血洗了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六朝古都南京所留下的残垣断壁,研究科技史的他将是以怎样的心情来承受这一切……我们不得而知:“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京都学派早期学者们中,新城新藏的学术良知的出现,绝对是个异数。他和内藤、桑原、矢野、小川、羽田等人的对日本军部的积极的支持态度和对华情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主要著作有:《迷信》、《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战国秦汉の历法》等。以及物理学和天文学著作《宇宙大观》、《宇宙进化论》、《天文大观》、《最近宇宙进化论十讲》、《天文学概观》、《こよみと天文》、《物理及ビ化学・宇宙物理学》等。

他的弟子中,继承了他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的有能田忠亮、荒木俊马、上田穰、藪内清等人。

在《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科学史研究の动向》一文中,川原秀城评述说:

> 他从《左传》《国语》中关于岁星的记载,推定该书应该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另外,新城根据《春秋》、《史记》、《汉书》等有关历法的史料,考察了从周初到太初改历(公元前104年)构成的长历,他发现“太古以来到太初约两千年的天文学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完全自发的演变历史,丝毫看不到任何外来影响的形迹”。新城的这一论证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中国天文历法来源于西方的观点。①

藪内清1906年2月12日生于兵库県神户市。1925年,他从大阪高中毕业后,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大学期间,因为受新城新藏的影响,从此开始了对古代中国历法的专业研究。1929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该大学理学部助手。1935年,他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助手,在能田忠周博士的指导下,开始了他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研究。1948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同年,他以论文《隋唐历法史の研究》取得理学博士学位。1949年,他晋升为教授。正是从此时开始,他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的研究达到了世界领先地位。1967年,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69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龙谷大学教授。1972年,他获得美国科技史学会奖。1983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2000年6月2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支那の天文学》、《支那数学史概说》、《支那数学史》、《隋

① 胡宝华译《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唐历法史の研究》、《中国の天文学》、《一般天文学》、《星座・中国・朝鲜・日本・印度の星座》、《天文学の历史・东洋天文学》、《中国古代の科学》、《中国の科学文明》、《中国の天文历法》、《中国文明の形成》、《中国の数学》、《中国の科学と日本》、《历史はいつ始まったか》、《科学史から见た中国文明》等。合著有:《汉书律历志の研究》、《元号を考える》、《授时历译注と研究》等。编著有:《中国の科学》、《中国天文学・数学集》、《天工开物の研究》、《中国中世科学技术史の研究》、《宋元时代の科学技术史》、《明清时代の科学技术史》等。翻译著作有:《支那数学史》、《天工开物》、全两卷《中国の印刷术:その发明と西传》、《墨子》等。论文太多而从略。

在《中国文明の形成》一书中,薮内清从科技史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古代文明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全部发展过程。该书由以下九章组成:第一章《科学文明の诞生》,他从甲骨文、青铜器、历法和殷代农业技术等几个方面的考古学成果入手,研究了中国文明在早期起源阶段上的发展历程。而第三章名称也是《中国文明の形成》,和书名一样,可见此章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他在阐述中国文明的形成时却先从秦王朝统一后新的政治制度的出现开始,跟着就是对西汉儒家思想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已经奠定了此书的研究模式和基调。这一基调就是:

> 我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及其儒家学说特别对中国天文学给予很多的影响。对天文现象的观察和对历法的制定,成为国家关心的重大事情。以上述这两个部门为中心,设立了国家天文台机构。这一制度的确立是虽然还不明白究竟是何时确立的,但是我想至少是武帝太初改历之后出现的吧。……通过太初改历的过程,推动了天文观测和历法专门化的进程,促使国家天文台制度的完备,这是可以想见的。所以在这里我主张是武帝太初改历之后出现的。①

在接下来的各章中,他都处处体现出历法和古代儒家政治密切结合的线索。为此,川原秀城在《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科学史研究の动向》一文中曾经评述说:

> 薮内清在方法论上的一个贡献是:他认为中国天文学的研究,不应该仅仅看作是历法理论的研究,而应该作为中国文明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来把握,其研究对象应该包括历法以及所涉及的政治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革命频发的历史,革命后的新朝廷为了使民心一新,

① 薮内清《科学文明の诞生》,岩波书店,1974年,第107~108页。

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历。改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证明新政权的正统性。太初改历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因此，研究中国历法必须要从政治思想的深度来分析和考察。①

在《中国の科学文明》一书中，藪内清则更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把中国的科技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科技文明进行对比研究，以中国的科技文明和欧洲、伊斯兰、西洋文明的相互接触和交涉中，研究中国科技文明对这些文明的影响，从而在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对中国的科技文明进行定位和审视。

当然，他反复强调的还是"历法是国家的大典"这样一个核心主题：

中国的天文学，在各种各样的表现点上和古希腊、欧洲的天文学是截然不同的。历法被赋予了很强的政治理念。表现为把历法当成是国家的大典来看待的事实。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因为革命而实现王朝交替，也必然要实行各种各样的变革，而历法的变革则是这一革命的中心环节。为此，中国周边的国家在成为中国的属国的场合，被强调一定要使用中国的历法。使用中国的历法就意味着是中国的属国。②

藪内清门下的著名弟子是吉田光邦、山田庆儿等人。

能田忠亮生于1904年。1922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1926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在新城新藏的指导下，专业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他以论文取得理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东洋天文学史论丛》、《历学史论》、《周髀算经の研究》、合著《汉书律历志の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夏小正星象论》、《甘石星经考》、《〈礼记·月令〉天文考》、《汉代论天考》、《诗经の日食に就て》、《秦の改时改月说と五星聚井の辨》等。

在《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科学史研究の动向》一文中，川原秀城评述说：

能田根据研究发现，中国最古的天文算法书《周髀算经》的成书年代应该在东汉末年，作者是赵君卿。同时他通过研究《礼记》中记载的月令，认为书中记载的天文现象所反映的时代，属于公元前620年（前后误差百年）范围之内，这一结论直至今天仍然被很多学者所承认。③

能田认为科学史的研究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周密的文献考证；第二是严密的自然科学素质。缺少其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能进行天

① 胡宝华译《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② 藪内清《中国の科学文明》，岩波书店，1970年，第40～41页。

③ 胡宝华译《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文学史的研究。日本在天文学史方面之所以能够出现像新城和能田这样的著名学者,主要原因与京都大学宇宙物理学科的优良传统学风,以及京都大学所特有的研究中国学问的坚实底蕴密切相关。①

吉田光邦1921年5月1日生于名古屋。1941年,他从爱知县第八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部。194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薮内清,专业研究中国科技史。1949年,他就任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58年,他晋升为讲师。1960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7年,他晋升为教授。1984年,他当选为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85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90年,他出任京都文化博物馆馆长。1991年4月,他出任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1991年7月3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图说万国博览会史1851~1942》、《万国博览会研究》、《炼金术》、全3卷《吉田光邦评论集》、《日本と中国:技术と近代化》等。合著有:《明清时代の科学技术史》、《イスラムの世界》、《日本科学史》等。主要论文有:《周礼考工记の一考察》、《西アジア采集ガラスおよび釉药の化学的研究》、《殷代技术小记》等。

在《炼金术》一书中,他专门研究古代中国和日本流行的炼金术的问题。该书由以下三章组成:

第一章　仙术と哲学の混沌——中国

1. 说话の中で

2. 神仙思想の背景、道教

3.《周易参同契》の三位一体论

4.《抱朴子》の世界

5. 丹药の服用と制造

6. 本草学との关系

7. 中国炼金术の发展と展开

第二章　魔术から科学へ—西洋

1. アレキサンドリアの时代

2. イスラムの神秘と科学

3. 中世神学と炼金术

4. 妖术と近代科学

5. 东と西の交流

① 胡宝华译《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第三章　日本の炼金、炼丹术

1. 神仙たちの话

2. 四方拜から庚申待まで

3. 舶来丹药の流行

吉田光邦的此书在研究中国古代道教的炼金术基础上，将其和西洋历史上的炼金术进行对比研究，最后又回归到对日本炼金术和庚申信仰的研究上，洋洋洒洒，东西数万里，上下几千年，叙述文笔优美而富于故事性。晚年的吉田光邦，一方面开始写艺术和文学评论，一方面又开始研究西亚科技史，并多次参加西亚探险队，亲自到现场考察。

在《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科学史研究の动向》一文中，川原秀城评述说：

> 吉田的研究方法是：第一，以各种具体的技术作为考察对象的纯技术史研究；第二，作为文化史的技术史研究；第三，作为经济史的技术史研究；第四，与周边地域以及异文化之间的技术进行比较研究。吉田的研究业绩主要集中在纯技术史、技术文化史、比较技术史三个方面。因为技术史研究领域是一个涉及广泛的领域，因此在解明各种技术时，吉田在文献考证的基础上所运用的解析方法主要是金属技术、制陶技术、炼金术（化学技术）等自然科学的知识与理论。①

山田庆儿1932年3月7日生于福冈县。1951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理学部。195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1959年10月，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66年4月，他转任同志社大学工学部副教授。1970年5月，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78年4月，他晋升为教授。1989年3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1997年3月，他从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退休后，又转任龙谷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未来への问い：中国の试み》、《混沌の海へ：中国的思考の构造》、《授时历の道：中国中世の科学と国家》、《朱子の自然学》、《中国医学の思想的风土》、《本草と梦と炼金术と》、《中国医学の起源》、《中国医学はいかにつくられたか》、《中国の医术を通して见えてきたもの》等。编著有：《中国革命》、《物のイメージ—本草と博物学のへの招待》、两卷本《东アジアの本草と博物学の世界》、《历史の中の病と医学》、《アジアが生みだす世界像——竹内好の残したもの》等。翻译著作有：《科学の前哨：第

① 胡宝华译《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二次大战下の中国の科学者たち》、两卷本《东と西の学者と工匠:中国科学技術史讲演集》、《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等。主要论文有:《针灸の起源·新发现中国科学史资料の研究》、《授时历の道》等。

在《日本における中国科学史研究の动向》一文中,川原秀城评述说:

> 山田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与中国科学相关的思想史乃至社会史的研究,即科学思想史和科学社会史的研究。第二是与中国医学相关的学说史研究。山田认为:现在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①

那么,他的中国医学思想史研究又具有怎样的特色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

> 中国医学在现代医学中能够找到其位置吗?我认为是可以的。不仅如此,还可以对近代医学提出极大的问题。但是为了这一点,中国医学的经验,尤其是理论,必须以使受近代科学之人亦能理解的方式提出。这并不是说要使用近代科学的概念及法则来说明。可以被近代科学的概念所置换的,或置换后不太离谱的概念的确是有的,但这是极有限的。我所讲的就不是这样。不是照搬中国医学的独特概念与思考方法,而是说必须拿出、将其翻译成学习近代科学之人亦能理解的另一种独特的概念与思考方法。由此方能使与其他医学体系的对话成为可能。不仅如此,通过如此不懈努力,还可以使中国医学可能获得新的拓展。②

最值得深思的是他对中国医疗技术的起源提出的一些猜想,如:"灸法的发明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初期,但是,针法的发明年代的上限顶多为战国时代的末期"、"经脉开始时是作为脉被发现"、"提出在脉上用艾施灸这种方法时,固有意义上的灸法就成立了"、"在从战国到秦代的某一时期里,针法出现了。用针来刺这种想法,一定是从砭法那儿学来的"等等。

但是,也应该看到:最近十几年来,对中国医学史的研究成为京都学派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新的特点。一方面是因为对道教研究的深入,气功和丹法修炼的内容日益成为中国医学史研究的热门课题。另一方面,出土文献中古医书的出现和对出土文献的研究热潮,也促使中国医学史研究的发展。山田庆儿在中国医学思想史研究上的努力,正试图转变京都学派中国科技

---

① 胡宝华译《日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② 译文见李建民《评山田庆儿中国の医学思想的风土》。

史研究的传统。他和武田时昌成为这一转变的两大先锋。

当然,在《朱子の自然学》一书和《梁武の盖天说》一文中,他又恢复了京都学派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朱子の自然学》一书共由四章组成。第一章《宇宙论前史》,重点在于阐述了传统的天文观念。第二章《宇宙论》则接上章而展开,引入了气在自然学中的位置。以此建立宋代宇宙论的重新构成。他在第三章《朱子の天文学》中通过对朱子在古代天文学和气象学研究上成就的肯定,给予了朱熹自然科学家的地位。他大量利用了《朱子语类》和书信集中的材料,结合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揭示了朱子哲学中的自然科学思想。在世界朱子研究学界可以说独出心裁!

武田时昌生于1954年4月21日。1973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77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科技思想史。1980年,他从大学院修士毕业后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98年,他晋升为副教授。2005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汉籍はおもしろい》等。合著有:《中国思想の流れ》、《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传统文化》、《易の世界》等。主要论文有:《祖沖之の数学的业绩》、《胎儿の性别を推算する术》、《中世の数学と术数学——科学と宗教の习合点をめぐって》、《物类相感をめぐる中国的类推思考》、《王充の性命论と科学知识》、《妇人病の医学思想》、《黄宗羲の图书先天の学批判——易学史の展开のなかで》、《纬书历法考》等。

武田时昌试图通过对《周易》及其纬学思想的研究,作为贯穿古代中国科技史的一条线索。这一视角更多是思想史角度上的考察,和京都学派的其他科技史学者的研究风格和方向有着明显区别。当然,他的努力还包括对传统术数的改造和科学化解释。但是这些努力的风格特点虽然已经具备了,却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新视角,至少对新城新藏—薮内清这一系列的科技史研究模式翻新和修改。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在某种意义上,京都学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就是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别称而已。对历法的研究已经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了,而现在武田的改弦易辙加上山田的中国医学思想史研究的努力,历法研究传统却面临后继无人的担忧。

而仍然继续着历法研究这一传统的,目前还有宫岛一彦。

宫岛一彦生于1946年7月11日。1965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工学部。1969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1974年,他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就任同志社大学讲师。现为同志社大学工学部教授。

主要论著有:《中国人の惑星观・序论》、《〈元史・天文志〉记载のイスラム天文仪器について》等。

第五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京都学派的诞生是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发掘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28年,为了给日本政府的"满蒙非中国领土论"提供考古学证据,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正式成立,标志着日本考古学界针对中国东北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成了日本政府的工作重点之一。京都学派对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一直是和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侵略密切相关的。

正是在日本政府支持下的这些考古活动中,滨田耕作带领着他手下的众多弟子们展开了考古实习和发掘、研究活动,实现了他们从考古学学生到著名考古学家的身份变更。这当中又以梅原末治、水野清一、小林行雄、末永雅雄、岛田贞彦、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等人为代表。①

按照樋口隆康的观点,考古学京都学派的早期弟子们多是出自滨田耕作门下的一群考古少年:

> 那时候,能专门搞考古学的人还几乎没有,连学生也屈指可数。就在滨田先生执教京都大学之时,并非大学,而是在日本各地聚集着各式各样热爱古物的考古少年。例如,末永雅雄、梅原末治等,有许多这样的考古少年。他们来到滨田先生身边做起了学问。他们虽不是大学的学生,却都聚集在大学的研究室内。

可见,早期弟子全是实干出身的考古工作者。但是因为他们来自实际考古活动,并且很快全可以独当一面,承担考古发掘活动,这使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考古学界的新星。梅原末治就是个典型代表。

梅原末治1893年8月13日生于大阪府南河内郡古市村。1913年,他

① 不过,据说梅原和他的同学之间关系相处十分紧张。

从同志社普通学校毕业，因为体弱多病他没能参加高考。[①] 1914 年，他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陈列馆助手。从这时开始，他旁听考古学专业课，开始了系统学习考古学理论的生涯。1921 年，他出任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委员。1929 年，他转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并兼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讲座讲师。1933 年 6 月，他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考古学讲座副教授。1939 年，梅原末治以论文《支那青铜器时代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他就已经成为考古学京都学派的著名学者，并引起了国际考古学界的关注。[②] 1939 年 7 月，他接替突然逝世的滨田耕作，晋升为考古学讲座教授。1948 年 7 月，他就任京都大学评议员。1956 年 8 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63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功劳者勋章、从三位勋二等旭日重光章勋章。1983 年 2 月 19 日因病逝世。

按照他生前的愿望，死后他的全部藏书被捐献给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死后，他的墓地也选在了京都法然院墓地，和他的老师滨田耕作永远地在一起了。

在考古学方面，梅原末治对商周青铜器和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的铜镜，以及汉代漆器等，都有很精湛的研究。

主要著作有：《考古论考》、《支那汉代纪铭漆器图说》、《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河南安阳遗宝》、《河南安阳遗物の研究》、《殷墟》、《殷墟出土白色土器の研究》、《支那考古学论考》、《考古学六十年》、《梅原考古资料目录》、《唐镜大观》、《支那古玉图录》、《铜铎の研究》、《战国式铜器の研究》、《古铜器形态的考古学的研究》、《绍兴古镜聚英》、《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古代北方系统文物研究》等，以及全七册的《欧米搜储支那古铜精华》和全六册《日本搜储支那古铜精华》等。主要论文有：《陕西省宝鸡县出土の第二の柉禁》、《柉禁の考古学的考察》、《东洋文库藏梅原考古资料について》、《小野毛人の坟墓と其の墓志》、《山城に于ける宇

---

① 姜波在《荣誉学部委员王仲殊先生访谈录》一文中曾如下记载："1949 年我转学到北京大学历史系，经常听周一良先生讲授日本历史。我曾想毕业后作为周先生的研究生，专攻日本史，只因校方无相关的机制、计划而未果。我进入考古研究所工作伊始，梁思永副所长听来访的周一良先生说我对日本语文的造诣颇深，便要我翻译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的论文，以备测验前来投考的青年学生们的日语水平之用。读了梅原的论文，我对梁思永副所长说，论文内容虽好，但文章语法欠通，不宜作为考核语文水平的标准。梁先生听了大笑说，梅原末治是日本考古学界第一人，或许由于他少年时代只在小学读书，以后不曾在中学和大学入学，以致所写文章在语法上欠通，这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现在回想，当时我真是冒冒失失，对梅原末治先生有不敬之嫌。"

② 他曾经应俄罗斯汉学家奥登堡之特别邀请，前往俄罗斯科学院，为其鉴定诺音乌拉发现的匈奴遗物的真伪。

治宿祢坟墓及墓志》、《播磨壇场山古坟の调查》、《富合村玉丘古坟》、《近江滋贺里崇福寺の塔阯》等。

其中,出版于1955年的《支那古玉图录》一书收录了109件精美古玉。梅原末治从欧美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中搜集材料,并利用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重新检视出土玉器的真伪,审查其学术价值。他的《河南安阳遗宝》一书中收集了149片甲骨。在《古铜器形态上之考古学的研究》一书中,他按照器形上的特点,把中国古铜器分为13类。他在《柉禁の考古学的考察》和《陕西省宝鸡县出土の第二の柉禁》二文中开启了对柉禁的研究。他提出了琮源于镯的观点。他又根据王盱墓出土的占星盘上有TLV纹饰,提出了TLV纹来源于占星盘之说。他还主张鄂尔多斯青铜艺术对战国时期的中国青铜器铸造技术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梅原末治还对在日本大量出土的汉、魏、晋各朝舶来的铜镜加以分析,并提出这些铜镜的出土地大多集中在近畿一带,而这正好与《倭人传》中所载魏明帝赐镜的事迹相吻合,因此可以作为邪马台在近畿的证据……他对商周青铜器的考古研究,确立了考古学京都学派有关商周考古研究的真正基础。

但是,也有些结论遭到了中国学者的质疑。比如,他在《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一书中收入文物238件。他根据其中一件银器铭文上有"三十七年"的记载,就断定这件银器为"秦始皇三十七年"所作,并进而主张金村古墓为秦代墓葬。此说显然过于唐突。因为东周的平王、敬王、显王、赧王四位天子在位年限都超过37年。

水野清一博士也是研究商周青铜器的专家。水野清一1905年3月24日生于兵库县。192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师从滨田耕作,专攻支那考古学。1928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确定了对商周铜器的研究为主。在此期间,他来到北京留学,回国后在导师滨田耕作的推荐下,他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助手。从1932年至1945年之间,水野清一还和长广敏雄二人先后八次来到中国河北、山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对云冈石窟进行了迄今最为详细的调查。其摄影、实测、线描、拓片、论文等研究成果,结集为16卷的《云冈石窟》一书。1949年,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52年,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以合著《云冈石窟に关する研究》一书获得日本颁发的日本学士院奖。1971年5月25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の佛教美术》、《殷周青銅器と玉》、《敦煌石窟艺术》等。合著有:《云冈石窟:西历五世紀における中国北部佛教窟院の考古学的调查报告》、《龙门石窟の研究》、《响堂山石窟》、《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

刻目录》、《图解考古学辞典》、《云冈石窟とその时代》、《东亚考古学の发达》等。主要论文有:《殷商青铜器编年の诸问题》、《北魏黄花石二面像》、《大夏胜光二年金铜佛坐像》等。

可见水野清一在商周青铜器研究之外,就是对佛教美术考古学的研究。他的名作《中国の佛教美术》一书,内容如下:

中国における佛像のはじまり
中国佛像の源流
大夏胜光二年金铜佛坐像
北魏石佛の系谱——平城时代——
北魏普泰二年金铜菩萨立像
北魏黄花石二面像
天龙山北齐佛头
いわゆる华严教主卢遮那佛の立像について
北齐黄海伯白玉像について
北朝画像石
开皇二年四面十二龛像について
唐代の佛像雕刻
唐代龙门佛头两种
造像记について
半跏思惟像について
倚坐菩萨像について
执雀パラモンについて
观音菩萨と普贤菩萨——云冈图像解
云冈の阿弥陀像について
云冈石窟における二、三因缘像
逆发形について——云冈图像学
六朝佛教艺术における汉代の传统
洛都永宁寺解
北支那石窟构造论
付法藏传と云冈石窟
魏书释老志の耆阇崛山殿
云冈における昙曜の五窟について
云冈石窟调查记
云冈石窟の发掘

敦煌石窟ノ－ト

敦煌石窟の发现とその艺术

和他同时代的还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中国佛教美术考古学家、他的同学长广敏雄博士。

长广敏雄1905年12月27日生于东京市。192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师从滨田耕作,专攻中国考古学。1950年,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52年,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以合著《云冈石窟に关する研究》一书获得日本颁发的日本学士院奖。1969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橘女子大教授、学长。1990年11月28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汉代画像の研究》、《大战中の佛教石窟调查》、《中国石窟寺》、《六朝时代美术の研究》、《战国式带钩について》、《飞天艺术》、《法隆寺五重塔の塑像》等。翻译著作有:《历代名画记》等。主要论文有:《六朝隋唐の鬼神图の展开》、《六朝・隋唐の贵族文化》、《古代支那工艺史に于ける带钩の研究》等。

长广敏雄的主要研究兴趣在石刻考古及其相关的美术造型研究上。在《飞天艺术》一书中,他首先提出并研究佛教美术中的飞天艺术造型问题。"飞天"一词的流行也正是由于他的使用而流行起来。根据对日本古代文献的考证,"飞天"一词在日本平安时代就已经出现,是对佛像的"飞天背光"、"飞天菩萨"的简称。

樋口隆康是研究商周青铜器的专家。

樋口隆康1919年6月1日生于添田町。1932年,他考入小仓中学。受中学校长的影响,他开始练习日本武道。1937年,他从小仓中学毕业后考入第一高中。正是在此时,他开始对考古学产生浓厚兴趣。194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专攻考古学。1944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水野清一和梅原末治两位教授。1950年,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手。1952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5年,他晋升为教授。他以论文《西周铜器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83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奈良县立橿原考古学研究所所长。1997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国际性的大奖"福冈亚洲文化奖"。

主要著作有:《西周铜器の研究》、《古代中国を発掘する》、《シルクロード考古学:西域发掘志》、《古镜》、《泉屋博古》、《卑弥呼の百枚铜镜》、《巴米扬石窟》等。主要论文有:《考古学からみた殷周文化》、《敦煌石窟の系谱》等。主持科研课题"考古资料における三次元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の活

用と展开”、“三次元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を活用した古镜の总合的研究”、“中国陵墓の考古学的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

和他同时代的著名考古学家还有冈崎敬博士和林巳奈夫博士。

冈崎敬1923年生于北海道。1942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6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梅原末治,专业研究考古学。1951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就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教研室助手。1954年,他转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56年,冈崎敬亲访敦煌,写成《大谷探险队と敦煌千佛洞》一文。1958年,他转任九州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72年,他晋升为教授。他以论文《魏志・倭人传の考古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7年,他从九州大学退休。1986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紫绶褒章。

主要著作有:《古代中国の考古学》、《魏志・倭人传の考古学》、《东西交涉の考古学》、《シルクロードと佛教文化》等。合著九卷本《古代の日本》、《东アジアの考古と历史》等。主要论文有:《“绢の道”の成立とその历史的背景——近年の考古学的调查を中心として》、《中国および北方・西域における古代绢织物早见表》、《隋赵国公独孤罗墓志铭考证》、《多钮细文镜——唐津市宇木汲田遗迹》、《镜・铜钏・巴形铜器——唐津市樱庭场遗迹》、《“夫租蔵君”银印をめぐる诸问题》等。

他和我国考古学家夏鼐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看出冈崎敬研究范围主要围绕着东西文化交涉史的考古学研究这一核心。

林巳奈夫1925年5月9日生于神奈川县藤沢市鹄沼町。他的父亲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评论家、平凡社出版的《世界大百科事典》总编辑林达夫。1947年,他从神奈川县第一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师从梅原末治教授,专攻中国考古学。林巳奈夫学生时代就已经确定了想要成为一名学者、超越自己的父亲的目标。他曾经说过“自ら生み出す者としての学者になろうと思った”这样的志向。195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研究生院,确定了以中国古代青铜器和玉器作为研究方向的目标。1957年,他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58年至1962年,他先后三次参加京都大学组织的“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考古考察队”,从事考古发掘活动。1968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75年,他以论文《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他晋升为教授。1985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日本学士院奖,并当选为德国考古学研究院院士。1989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95年,他被日本政府授予勋三等旭日中勋章,2004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2006年1月1日,他因急性心力衰竭突然去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殷周时代の武器》、《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殷周时代铜器纹样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二》、《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三》、《战国时代出土文物の研究》、《汉代の文物》、《汉代の神々》、《中国古玉の研究》、《石に刻まれた世界》、《中国古代の生活史》、《龙の話》、《中国文明の诞生》、《中国古玉器总说》、《中国古代の神々》、《神と兽の纹样学》等。

林巳奈夫利用考古学上的类型学理论对商周青铜器和玉器进行了分析、对比和排列,结合古代文献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成果,对商周历史和宗教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他的上述著作为中国上古文学史、先秦史、思想史和上古宗教史、政治制度史提供了考古学实证。发表在《东方学报》上的《殷中期に由来する鬼神》、《殷、西周时代礼器の类别と用法》、《殷周青铜彝器の名称と用途》、《殷周时代の图象记号》等著名论文,解决了商周青铜器的分类、命名、具体用途等方面的问题,对于铭文出现的图像文字给予了合理而最新的回答,特别是《殷周时代の图象记号》一文,他将商周金文中出现的族氏名号与甲骨文中出现的地名、人名、贞人名相比较,对商人族氏的类型作了精湛的分析,否定了郭沫若所认可的一些定论。虽然未必是唯一正确的答案,但是他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对这些疑难问题的解决。

200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由畏友常耀华教授等人翻译的林巳奈夫的著作《神と兽の纹样学》一书。该书由以下七章构成:第一章《兽面纹为何物》。第二章《良渚文化的兽面纹》。第三章《从新石器时代到殷周时代的变化》。第四章《兽面纹的形成》。第五章《珍贵的兽面纹》。第六章《复合兽面纹》。第七章《春秋、战国时代及以后》。

该书是系统探讨商周时代青铜器上出现的兽面纹和商周神话传说中诸神之关系的研究著作。属于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模式。作者先从兽面纹为何物谈起,然后开始将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到春秋、战国时期及其后的兽面纹、人面纹的演变过程,在大量利用考古图片资料的基础上,给予了详细的说明和考证。从兽面纹的形成与变化到普通兽面纹、复合兽面纹以及珍贵兽面纹的形式特征与象征意义等方面,林巳奈夫都进行了阐述,显示出作者对商周青铜艺术发展史的高度把握和了解。安阳殷墟遗址曾出土过一批石柄形器,器上有用朱书书写的祖先名字,可见这类器物应该是用于祭祀祖先的礼器。林巳奈夫则主张它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大圭"。可以佩戴在身上以表示祭祀者的资格。他还考证说:"细长的圭可以从西周初延续到战国初,越到晚期其尖部越锋利。另一方面,战国时代又出现了尖部角度大的粗短尖型。"这一总结和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是比较接近的。到春秋中期,圭的

尖端的宽度和高是大致相等的。而到春秋晚期，它的尖端高度则变成宽度的一倍半左右。根据林巳奈夫的考证，所谓“柿蒂纹”其实就是莲花。早在东周时期，莲花就已经作为装饰题材出现了，并非是佛教传入中国后才产生的。考古发掘证明在东周时期即已出现柿蒂纹，即莲花纹。

在商周青铜器断代研究上，白川静《金文通释》是著名的经典之作。

此书主要在两个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首先是对商周铭文的解释和考证，其次就是对商周青铜期的分期和断代。至今，白川静先生的《金文通释》和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已经成为研究商周青铜器铭文和断代的经典著作。关于他对铭文的研究，我们将放在后面的《京都学派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一章中进行总结，这里，我们将介绍一下他的铜器断代学说。

青铜器的分期和断代历来就是商周铜器考古学的最大难点。王国维、郭沫若、吴其昌、容庚、陈梦家、唐兰等先生先后发表了各自的研究论著，建立了他们各自的铜器断代标准和相关学说。白川静在《金文通释》一书中也提出了他自己的观点。他首先将各说排列出来，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康侯簋》，他就先列举了武王说、成王说两说。持武王说的有容庚、贝塚茂树、赤塚忠等人。持成王说的有唐兰、杨树达、陈梦家等人。而白川静通过对铭文史料的考证以及相类似器形的分析后得出结论：“从器形和铭文来考虑，显然属于成王时代的器。”①再如他对《宪鼎》的研究，他先列举了成王说、康王说、昭王说三说。这三说的提出者分别是容庚、陈梦家、吴其昌三人。白川静在考证中，支持陈梦家的观点，并补充了大量相关证据，最后他得出结论说：

> 即，此器和成王期的《素鼎》在风格上完全不同，下腹部的膨胀，所谓的倾垂现象已经被陈梦家指出，这些也就是大体上来看，它的形制也有部分殷代的特点，安阳出土的《叔龟鼎》和此器相比，也有显著的倾垂。另外也被看作是殷器的《父乙鼎》，从项下分成几段，到了腹部就很大了。而一般认作倾垂的几乎全部是康王时代的器。考虑以上的因素，把此器定为康王时代的器显然是具有决定性的证据的。②

总结来说，白川静给商周青铜器断代是铭文考证和器形分析的统一基础上的产物。

白冰在《青铜器铭文研究——白川静金文学著作的成就与疏失》一书中认为：

---

① 见《金文通释》卷一上，白鹤美术馆，1966年，第166页。

② 见《金文通释》卷一下，白鹤美术馆，1966年，第432页。

对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白川静先生也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他以典型墓地的分期成果作为参照，对西周墓葬、窖藏出土铜器进行研究，又往往与传世的有铭铜器加以对比，全面地占有相关资料，得出许多可信结论。①

川又正智1946年5月17日生于新潟县。1965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9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林巳奈夫，专业研究中国考古学。1974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6年，他转任佐贺大学教养部讲师。1978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0年，他晋升为教授。2008年，他从佐贺大学退休后转任国士馆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马车の历史——古代&近代の马车》《汉代以前のシルクロード》、《马利用史の未解决问题》等。主要论文有：《马の家畜化をめぐる研究动向》、《非去势雄马に骑乘する话》、《古代草原地带の辐式车辆》、《载驱薄薄——东アジアの古代战车と西アジア》等。

在《汉代以前のシルクロード》一书中，他主要以"青金石"为例，研究了它在古代东西交涉史上的作用。第四章和第五章又从科技方面入手，研究东西科技交流的历史。

冈村秀典生于1957年。197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8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林巳奈夫、樋口隆康，专业研究中国考古学。1985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88年，他转任九州大学文学部讲师。1990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4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2000年，他获得第13届考古学"滨田青陵奖"。2005年，他晋升为教授。他以论文《中国古代王权と祭祀》取得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青铜器の图象记号による殷后期社会の研究》、《中国古代王朝形成期における畜产と动物牺牲の研究》、《夏王朝——王权诞生の考古学》、《夏王朝——中国文明の原像》、《中国古代王权と祭祀》、《中国文明——农业と礼制の考古学》等。主要论文有：《前汉镜の编年と样式》、《秦汉金文の研究视角》、《战国から秦汉への文样の展开》、《西王母の初期の图像》、《中国古代の农耕仪礼と王权》、《礼制からみた国家の成立》、《湖北阴湘城遗址研究》等。

---

① 白冰《青铜器铭文研究——白川静金文学著作的成就与疏失》，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53页。

他的《中国文明——农业と礼制の考古学》一书已经是商周农业考古学的名作。该书由以下五章构成:第一章《中国文明とは何か》。1. 四〇〇〇年におよぶ中国文明。2. 中国文明の空间动态。第二章《文明の胎动——纪元前三千年纪の龙山时代》。1. 农耕社会の成立。2. 复杂化する社会。3. 地域间交流の扩大。第三章《文明の诞生——纪元前二千年纪前半の二里头文化》。1. 王朝の成立。2. 中国的世界の形成。第四章《初期国家の成立——纪元前二千年纪后半の殷周时代》。1. 农业生产の发展。2. 复杂化する王都の构造。3. 地方支配の构造。4. 王统と王陵の成立。第五章《文明・王朝・国家の形成》。1. 都市と农村の分化。2. 祭仪国家の成立。

他研究的核心方法还是将考古学和古代礼制进行对比性研究。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王权と祭祀》一书还是在《青铜器の图象记号による殷后期社会の研究》一书中,他处处结合商周礼制,从考古实证角度给予考证和分析,使考古学和上古宗教思想的文化史研究密切结合起来。除了农业考古研究和礼制考古研究之外,在他的论文中,还涉及了对三星堆文明的研究。他认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跪立人像可能就是中原殷人的形象。他还发现三星堆人头像的辫子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有例子。而且,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一件头像头顶上的环状物在殷墟时期的中原也能找到。由此,他得出结论三星堆文明和中原商文明之间存在着文化和物质的交流。

第六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佛学研究

在中国学术界,宗教学或佛学肯定属于哲学系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但是在日本学术界,中国古代宗教学或中国古代佛学,传统上并不属于支那哲学、东洋史学的研究范围,而是划分在独立的哲学、宗教学或佛学甚至印度学的研究范围内。因此,我们这里也把佛学研究独立成章,而不是划归到《京都学派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一类中。尽管两者是密切相关的。

松本文三郎,生于1869年,石川县金泽市人。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毕业后,曾执教于早稻田大学、哲学馆、国学馆、立教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等。1906年4月,他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设置委员。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开设之后,他任文科大学哲学史第二讲座教授,讲授印度哲学、佛教学。1908年10月开始,他就任文科大学校长(即文学院院长)。1911年,松本文三郎发表了《异本般若经に就いて》一文。1912年,松本文三郎又发表了《敦煌本大云经と贤愚经》一文。1929年5月,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后,转任龙谷大学、大谷大学、高野山大学文学部教授,并从事《日本大藏经》之编纂。后历游欧洲、印度、中国,专事佛陀遗迹之调查工作。1938年4月,他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1944年12月18日逝世。

——他还是日本近现代学位史上第一个取得文学博士的人!

特别说一句,日本传统意义的"文学博士",在实际概念和意义上,和时下的我国文科的研究文学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取得的"文学博士"不是同一个概念。这一区别在本质上与我国学位制度至少有五点不同:

第一,日本的文学博士学位授予权涵盖了文学、历史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等学科。

第二,日本的文学博士学位一般授予具有大学教授、副教授职称并至少具有两部以上学术专著、五篇以上学术论文发表的学位申请人。

第三,日本的博士研究生毕业时,无论是否撰写学位论文,基本上不会给当年的应届毕业生授予文学博士学位。按照日本传统习惯,一般是在国

立大学任教多年，即将退休前才向大学提交一部不少于40万字的论文，申请文学博士学位的。

第四，日本的文学博士学位还分为“博士（文学）”、“文学博士”、“博士（学术）”三种。一般大学教授、副教授在退休前申请的学位是“博士（文学）”，即所谓的论文博士。绝非随便哪个人写篇论文就可以自由申请的。它的申请人年龄一般在45岁至60岁之间，而且具有大学教授或副教授职称。和我国文学博士概念比较接近的是这里出现的“文学博士”，即所谓的课程博士——基本上专门针对留学生和部分日本学生而设立的，修满学分并提交学位论文、经过7到30位论文审查委员的审查通过，并经过至少有三位教授联合审查的答辩，即可授予。它的申请人年龄一般在30岁到45岁之间。而论文质量介于“博士（文学）”和“文学博士”之间的则授予“博士（学术）”学位。

第五，无论是哪一种文学博士学位，一般一所大学每年只授予几名申请人，通常只授予一名而已。本书作者取得文学博士学位那年，我的母校只授予了我和加藤千惠两人文学博士学位而已。

——看了以上五点不同，我想国内的学术界就该明白博士学位对于日本学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了。所谓到日本留学拿学位很难，原因就是如此。

在佛学上，他的主要著作有：《佛典结集》、《达磨》、《支那佛教遗物》、《极乐净土论》、《弥勒净土论》、《东洋文化研究》、《佛典批评论》、《佛教史研究》、《佛教史论》、《佛教史杂考》、《佛教征古录》、《东洋古代艺术》、《佛教艺术とその人物》、《佛教史杂考》等。主要论文有：《支那唐代の佛教彫像に就いて》、《肇论中吴集解に就いて》、《兜跋毘沙门考》、《敦煌本大云经と贤愚经》、《魏书・释老志に于ける佛教传来説に就いて》、《支那古代の明器殊に象人の起源に就いて》、《曹溪大師别传について》、《异本般若经に就いて》、《观音の语义と古代印度支那に於ける其信仰に就いて》等。

松本文三郎从科学批判的角度出发，对佛典、佛教以外诸派哲学之论书、戒律等问题展开了研究。他认为佛教的真谛是艺术的具体化体现，而佛教的妙用更是由人物而显现出来，所以他极力主张研究佛教的人一定要同时研究佛教美术和美术史。这已经将佛教美术上升到了美术考古学和宗教美学的角度上来了。这也难怪他写出了日本汉学史意义上的真正具有通史价值的中国哲学史了！松本文三郎曾经主张《起信论》是一部古代中国人自己编撰的伪书，而不是马鸣菩萨或者真谛所译。在《牟子理惑論の述作年代考》一文中，他曾经说：“佛教史上重要之点，不在其作者是非牟融，而为此书是否成于汉代。”进而他还主张《牟子理惑论》也是伪书。他还主张敦煌本的

《坛经》不是善本,因为那只是唐末的本子。

傅艺子在《东山草堂的追忆——并悼松元亡羊博士》一文中曾经回忆如下:

> 松元博士,日本石川县人,明治二年(清同治八年)生人,享年七十六岁,原系东大印度哲学出身,后来京都帝国大学创立,与狩野君山(直喜)博士都是筹备京大文学部的重要教授。狩野博士是文学科主任,松元博士是哲学科主任,先后都曾任文学部长。松元博士精研内典,为日本佛学耆宿,日本佛学教授,泰半是僧侣——如高楠顺次郎、常盘大定诸博士,唯松元博士却不是和尚而是居士。现在日本有许多有名的僧籍教授,如羽溪了谛(著有西域之佛教)、塚本善隆(著有东亚佛教史研究等)都出于他的门下。松元博士虽然是一位佛学耆宿,但他对于汉学造诣极深,这是日本一般佛教学者所不及的。他的著作很多,最有名是《佛典批评论》,这是他对于释典多年研究的集成,所批评的经典最多,其中关于教法,关于戒律,关于禅,都有新的见解。其次是《佛教史之研究》,对于中日佛教史,如中土佛教之传来诸问题,俱有新的考察,使佛教史成一新的面目。晚年仍不断有论文发表,大半都刊在京都的东方学报,如《牟子理惑之述作年代考》,《四十二章经成立年代考》,《兜跋毗沙门考》等,出经入史,都是他绩学之作。

塚本善隆1898年2月8日生于爱知县。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县立膳所中学渡过的。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京都的一所佛教专门学校。然后,他又考取了当时东京的一所佛教大学。本来,他可以沿着佛学研究或者佛教僧侣的路子一直走下去了。但是,对学术的爱好使他在佛教大学毕业后反而放弃了成为职业僧侣的前途,而是考到了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专业研究印度哲学和支那佛教史。1926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留学。1930年,他回到日本,成为东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他成为京都大学文学部佛教学讲座教授。他以论文《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5年4月开始,他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61年,他又成为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1963年,他成为华顶短期大学校长。1977年1月,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72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二等瑞宝章勋章。1980年1月30日因病逝世。

他作为京都学派研究中国佛教史的第一人而名闻天下。

主要著作有:《唐中期の浄土教》、《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日支佛教交涉史研究》、《肇论研究》、《魏书·释老志の研究》、《支那佛教通

史》、全七卷《塚本善隆著作集》等。主要论文有:《敦煌本・シナ佛教教团制规——特に〈行像〉の祭典について》、《敦煌佛教史概说》、《弘法大師时代と现代の支那佛教》、《宝卷と近代支那の宗教》、《北魏窟に现れたる佛教》、《成寻の入宋旅行记に见る日中佛教の消长》、《シナ佛教史における道安》、《隋文帝の宗教复兴特に大乘佛教振兴——长安を中心について》等。

塚本善隆写出了完整的中国佛教通史,他还利用敦煌文献和古代佛教、道教文献进行对比研究。他开创了佛教史的比较研究,并且以文献学和考古学的证据作为基础,建立起了他的新的佛教史学。

长尾雅人1907年8月22日生于广岛县。1927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31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1937年3月,他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助手。1949年4月,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50年2月,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哲学科佛教学讲座副教授。1951年3月,他晋升为教授。1956年4月,他兼任九州大学文学部佛教学讲座教授。1959年,他的《居庸关》一书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65年9月,他就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特聘教授。1967年4月,他当选为京都大学评议员。1969年3月,他当选为京都大学文学部长。1971年3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71年4月开始,他就任铁钢短期大学教授。1976年,他出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1978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二等瑞宝章勋章。1980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2005年3月13日因病逝世。

长尾雅人是日本研究西藏佛学的权威学者。他树立了对西藏佛教经典的文献学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他通过对中观和唯识思想的研究,开创了利用藏文、梵文对比研究佛教经典,并参照佛教考古,系统地研究和考察藏传佛教的研究路数。正是在他的手上,日本的西藏佛学研究得到了真正的确立和发展。

主要著作有:《大乘佛典》、《蒙古喇嘛庙记》、《蒙古学问寺》、《西蔵佛教研究》、《中观と唯识》、全二卷《摂大乘论:和译と注解》、《维摩经》、《维摩经を读む》、《佛教の源流:インド》等。合作翻译著作有:《般若部经论典》、《宝积部经典》、《世亲论集》等。

牧田谛亮1912年生于滋贺县野洲市净土宗念佛寺内。他的父亲就是一位职业僧侣。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他中学毕业后考入佛教专门学校学习佛学。1933年,从专门学校毕业后,他考入了大谷大学东洋史学研究科,进行专业的支那佛教史学习和研究。1936年,他又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的博士研究生。1939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上海,就任上海东

亚同文书院助手。日本战败后,他回到日本,就任京都大学文学部佛教学讲座副教授。几年后,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他以论文《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76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就任岐阜教育大学教授。两年后,又转任埼玉工业大学常务理事、埼玉工业大学学园长。1994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佛教传道文化奖。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の研究》、《五代宗教史研究》、《疑经研究》、全三卷《中国佛教史研究》、《浄土佛教の思想》、《善导》等。主要论文有:《肇论の流传について》、《天台大师の疑经观——六朝末期の止观经典の疑撰》、《中国佛教における疑经研究序说——敦煌出土疑经类をめぐって》、《ペルシア人来朝と盂兰盆会》、《六朝古逸观世音应验记の研究》、《水陆会小考》、《中国に于ける民俗佛教成立の一过程》、《谢肇斋の佛教观》等。

牧田谛亮认为,隋唐时代由于佛教大兴天下,于是,伪经也开始盛行。为此,牧田谛亮专门针对唐代出现的各种经文,结合敦煌文献,进行考证研究,1976 年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疑经研究》一书。可见,文献考证在佛教学京都学派上又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入矢义高 1910 年 12 月 13 日生于鹿儿岛县。他的父亲入矢祐云是一位中学英语教师。1928 年,他从县立小仓中学毕业后,考入福冈高中。1932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最初的研究学习专业是德国文学。正是在此时,他的父亲却启发他开始学习和研究支那古代文学。于是,他转变学习专业后,成了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教授的弟子。1936 年,他大学毕业后就任县立吴第一中学教师。1939 年,他转任东方文化研究所助手。1944 年开始,他来到北京留学。日本战败后,他回到日本。1949 年,他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55 年,他晋升为教授,并兼任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佛教学讲座教授。1968 年,他当选为名古屋大学文学部长。1970 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佛教学讲座教授。1974 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然后就任花园大学文学部教授、京都产业大学外国语学部教授。1994 年,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83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二等瑞宝勋章。1998 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叙正四位爵位。1998 年 6 月 30 日因病逝世。

他的弟子中有篠原寿雄、川合康三、冈村繁、佐野公治、庆谷寿信、盐见邦彦、衣川贤次、西口芳男、小川隆等人。

主要著作有:《明代诗文》、《求道と悦乐:中国の禅と诗》、《自己と超越:禅、人、ことば》、《中国文人诗选》等。校注和编译的著作有:《寒山》、

《袁宏道》、《黄檗传心法要》、《官场现形記》、《宋·元·明通俗小说选》、《洛阳伽藍记》、《近世随笔集》、《佛教文学集》、《东京梦华录》、《临济宗》、全三卷《碧岩录》、《芥子园画传》二卷等。主要论文有:《公安から竟陵へ——袁小修を中心として》、《南泉斩猫私解》、《王梵志について》、《求道と悦乐——中国の禅と诗》等。

他是禅宗文献研究的权威学者。特别是他早年从事敦煌文献与语言学的研究,使他的佛教研究如虎增翼。

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竺沙雅章对宋元佛教有专业的研究。他先后撰写了《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宋元佛教文化史研究》等学术著作。主要论文有:《敦煌の僧官制度》、《论敦煌寺户》、《敦煌佛教教团の研究——佛教社会史后编》、《敦煌吐蕃期の僧官制度》、《元代白莲宗之一考察》、《宋元代之慈恩宗》、《宋元代杭州寺院与慈恩宗》、《宋元版大藏经考》、《宋元佛教与庵堂》、《黑水城出土の辽刊本にっいて》等。

在《宋元版大藏经考》一文中,他提出了刻本《大藏经》流传的三个系统,即:蜀版《开宝藏》系统、《契丹藏》系统、闽版《崇宁藏》系统。这一划分为错综复杂的宋元版《大藏经》的版本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而对于著名的《高丽续藏本》的来历,竺沙雅章认为可以确认是根据应县木塔中发现的辽代道宗年间刊本的复刻本。

西脇常记1943年生于上海。196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教育大学。1964年,他大学毕业后来到德国留学。1970年,他考入京都大学大学院中国哲学科,专业研究中国哲学。1975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94年,他晋升为教授。1999年,他以论文《唐代の思想と文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同志社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唐代の思想と文化》、《ベルリン・トゥルファン·1汉语文书研究》、3卷本《中国古典社会における佛教の诸相》等。翻译著作有:《史通内篇》、《神女——唐代文学における龙女と雨女》等。主要论文有:《宋代における佛教史书》、《舍利信仰と僧传におけるその叙述——慧洪禅林僧宝传叙述の理解のために》、《千唐志斋藏志に见える唐代の二三の习俗について》等。

第七章
京都学派的敦煌学研究

根据严绍璗教授在《日本中国学史稿》一书中的调查：

> 日本国内首次报道敦煌文物的发现，是在《燕尘》第2卷第11期之后第二天，即1909年11月12日，东京和大阪两地的《朝日新闻》，皆以《敦煌石室的发见物》为题，作了隆重报道。[①]

严先生并推断此文的作者应该就是内藤湖南。这一推断是合理的。因为随后的几天中，内藤就连续刊发了《敦煌发见之古书》长文。由此预示着内藤湖南有资格作为日本敦煌学的最早的新闻报道人。但是，京都学派的敦煌学研究的开创者应该是狩野直喜博士。

晚清时期敦煌文书的发现，在中外学术界成了和甲骨文发现同等重要的事情。在日本的内藤湖南博士通过罗振玉得知了这一消息后，立刻上报日本文部省和京都帝国大学，请求派出特别考察队，前往北京，进行学术调查。于是，1910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立即派遣内藤湖南教授与狩野直喜教授、小川琢治教授、滨田耕作和富冈谦藏两位讲师五人来京，调查保存在学部的敦煌文书。高田时雄在《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②]一文中也分析说：

> 1910年，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正在从事有关调查活动。毫无疑问，大谷探险队的活动也促使京都学者的敦煌热日益升温。就在京都的敦煌遗书热潮日益高涨之时，京都文科大学获悉残存于敦煌的写本已被全部送往北京这一信息后，随即匆匆将五位教官派往北京。由此可以推测，校方对此行寄予了极大的期望。反之也可以充分认为，在北京的罗

---

① 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② 高田时雄《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2004年。

振玉、李盛铎等人的热心推动下，京都学术界对敦煌遗书关心的骤然高涨，也为敦促清朝政府对此加以重视而发挥了一臂之力。

回国后，小川琢治发表了《北支那旅行概报附敦煌石室遗书》一文，向日本学术界正式报告了这次调查活动的经过和敦煌文书的情况。有关记载，还可以见尹雁《日本敦煌学史》一文：

> 1912年2月11～12日，京都大学特地举行盛大报告会，请五人作访书讲演报告，同时还展出了五人在京访书时拍下的写本和文物照片。事后，内藤湖南执笔写出了《清国派遣教授学术视察报告展览号》，刊载于1911年12月5日的《朝日新闻》，对此行及调查结果作了详细解说。

狩野直喜从1909年开始，他先后到北京、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地的大学和博物馆、图书馆中，去实地考察和抄录所能看到的敦煌文献，亲自核对从罗振玉那里得到的文献抄本、照片与英法等国收藏实物之间的文字差异。将这些文献利用到对古代文学史的考证上。并且，还在日本学术界举行“敦煌发掘物视察谈”、“关于敦煌遗书”等专题学术报告。实地考察、核对文字和文学史研究三项工作，基本上就划定了敦煌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的定位。他从敦煌发现的唐代写本唱本《唐太宗入冥记》、《秋胡变文》、《伍子胥变文》、《董永变文》等直接找到了宋元演义类和杂剧类戏曲故事的前身，正式提出了“唐末或者五代已经明显看出是俗文学的萌芽”的观点，把元代戏曲文学的诞生直接推到了晚唐五代时期。

尹雁在《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说：

> 从此，日本学术界特别是以京都地区为中心，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工作。1909年11月28日～29日，京都大学史学会在冈崎图书馆召开了第二届总会，会上展出了内藤和狩野从北京获得的敦煌遗书、雕刻和绘画等照片，并且，他们还分别发表了演讲。其中，小川琢治以“中亚探险与伯希和敦煌之行”为题，介绍了敦煌地理；狩野直喜介绍了《老子化胡经》；桑原骘藏讲《景教三威蒙度赞》；羽田亨解说《摩尼经》残卷，内藤湖南讲述《西州志》残卷。

1919年，小川琢治又发表了《中国本草学的起源与神农本草经》一文，这是中外学术界第一篇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专业研究论文。本来，1908年的大谷光瑞探险队来华，就已经从敦煌石室中获得了一种《本草经集注》的卷轴残卷本。在内容上，它和保存在日本的古卷子本残卷十分接近。而新发现的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在最后一行留有“本草集注第一序录华阳陶隐

居撰”一段文字,可以断定当是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于是,小川琢治博士从对版本的比较研究开始,写出了上述研究敦煌中医药学的论文。

于是,敦煌学在日本京都学派正式生根。就连研究中国哲学的小岛祐马,在1928年也编辑出版了敦煌的著作《沙州诸子二十六种》一书。当时的松本文三郎和羽田亨也开始了敦煌学的研究。

尹雁在《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说:

> 松本本是京都大学的佛教学者,曾参加大谷收集品的整理工作,后有5件收集品的佛典断片归他所有,这5件佛典裱成4卷,即《妙法莲花经》、《摩诃般若波罗蜜优婆提娑》、《大智度论》、《大品经》和《优婆塞经》,已由松本文三郎编入《东山草堂古经图录》(1929)和《佛教关系古写古版本目录》(1932)。

羽田亨与伯希和合编了《敦煌遗书》活字本和影印本各一集,虽然收录的文书不多但都是与历史文化有关的重要资料,羽田亨的简要解题,涉及了不少新问题。

神田喜一郎1897年10月16日生于京都市上京区。号鬯盦,书房名为佞古书屋。他的祖父和父亲皆为儒商,和王国维有很好的私人友谊。祖父神田香岩,擅长撰写汉诗且长于书画鉴赏,嗜好收藏中、日古籍,曾任京都博物馆学艺委员。父神田喜左卫门,为京都著名之儒商。当时一直住在京都市上京区室町通今出川上ル筑山北半町。1914年,他小学毕业后考入京都府立第一中学。1917年,他从京都市著名的第三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21年3月,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东洋史学研究科,师从内藤湖南。1923年4月,他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就任大谷大学教授。1926年3月,他转任日本政府宫内省图书寮(即日本皇家图书馆)编辑,主要负责那里收藏的珍贵古籍的编目和解题工作,分别出版了《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增加帝室和汉图书目录》、《图书寮汉籍善本目录》。1929年4月,他转任台北帝国大学副教授。1934年11月,他晋升为教授。1934年12月至1936年8月,他前往法国和英国留学,专心研究敦煌写本。日本战败后的1945年12月,他被免除台北帝国大学教授之职,回到了日本。1946年5月,他再任大谷大学教授。1948年11月,他转任大阪商科大学教授。1949年4月,他出任大阪市立大学教授。1950年1月,他以论文《支那训诂学上より见たる日本书纪古训考证》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2年5月,他出任京都国立博物馆馆长。1972年11月,他当选为日本学士院院士。1984年4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东洋学说林》、《敦煌学五十年》、两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两卷本《日本における中国文学——日本填词史话》、《墨林闲话》、《画禅室随笔讲义》、《艺林谈丛》、《中国书道史》等,有全10卷《神田喜一郎全集》出版。

《敦煌学五十年》一书成了他的成名作。

在该书中,作者对敦煌学50年做了简明的论述,并介绍了当前敦煌学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和前沿课题。而两卷本《敦煌秘籍留真新编》一书是作者在法国和英国留学时所拍摄了大量的敦煌文献照片,并选择其中精善者影印成的。晚年,他还为日本东京永青文库所藏的敦煌本《文选注》写卷的影印出版,亲自撰写《解说》。

那波利贞1890年8月1日生于德岛市。号诚轩。祖上数代人皆为是江户时代著名的儒学世家。他8岁时丧父,生父那波韦,字缓卿,号蚬北。从此开始接受母方的多贺氏家族的传统儒家经学教育。1909年,他从德岛中学毕业后考入著名的京都第三高中。1912年7月,他高中毕业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15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东洋史学研究科。1920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结束了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1921年3月,他就任京都第三高中教授。1929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31年开始,他作为文部省在外研究员,来到法国,考察那里所藏敦煌文献。1933年底,他回到日本。1938年,他晋升为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第一讲座教授。同年,他以论文《唐の开元・天保初期の交が时世の一变转期たるの考证並に主として敦煌发见史科に据る天宝以后唐末に至る期间の庶民に关する二三の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53年8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同年9月,他转任京都女子大学教授。几年后,他又转入甲南大学教授。1970年10月2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燕吴载笔》、《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等。主要论文有:《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上、中、下)》、《中晚唐时代に于けゐ伪滥僧に关する——根本史料の研究》、《唐天宝时代の河西道边防军に关する经济史料》等。

那波利贞的研究专业主要是敦煌学,他是敦煌文书研究的开拓者。

竺沙雅章曾经为此写有《那波利贞先生の敦煌文书研究》一文加以评价。[1] 特别是关于唐代社会经济史和敦煌寺院经济状况的研究论文,如《梁

① 见《草创期の敦煌学:罗・王两先生东渡90周年纪念日中共同ワークショップの记录》,知泉书馆,2002年。

户考(上、中、下)》、《唐代社邑研究》、《敦煌地方佛教寺院の碾磑经营に就きて》、《唐天宝时代の河西道边防军に关する经济史料》,对于了解唐代社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擅长书法,经常落款为"西都国子博士诚轩迂老那波利贞",而且用印也很中国化,他最喜欢的印是"臣利贞"。

1926年,铃木虎雄发表了《敦煌本文心雕龙校刊记》一文,已经把敦煌文献和《文心雕龙》的研究结合起来。

藤枝晃1911年8月3日生于大阪市住之江区粉浜村。1927年,他中学毕业后考入大阪高中。1930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34年,他大学毕业后成为文学部的助手。在羽田亨指导下,从事《满和辞典》的编纂。1937年,他转任东方文化研究所图书管理员,后晋升为副研究员。主要负责《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的编辑。1944~1945年之间,他作为日本西北研究所的研究员,多次往来中国内蒙古各地进行考古调查活动。1948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51年开始,他加入了以森鹿三为课题组长的居延汉简共同研究班。1959年,他因为参加对居庸关的共同研究而一起获得日本学士院奖。1962年,他以论文《吐蕃——归义军期の敦煌》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68年,他晋升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1972年,他获得法兰西学士院颁发的儒莲汉学奖。1975年,他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教育学术功劳奖。1975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82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勋三等旭日章。1988年,他就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客座教授。1998年7月23日因病去世。

藤枝晃是日本京都学派和整个日本汉学界研究敦煌学及其西域出土的古写本文献研究的第一人。1972年,他因为在《学术月报》上发表了著名论文《敦煌写本の编年研究》后,建立了被人称为"敦煌藤枝学"的敦煌古写本年代研究和考证方法,其实他主要是采用从书籍史角度与文书学角度研究敦煌写本的断代研究方法。比如,他指出标准式样的敦煌写经用纸的长和宽应该是26cm×39cm,部分写本是26cm×52cm。这就从书籍史角度与文书学角度为古写本的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

他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和搜集整理工作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见《四海觅珍》一文中的一段记载:

> 1964年春,藤枝晃听说京都立命馆大学与苏联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交换教授,专攻日本史的苏联学者芭洛洛娃来到了京都。藤枝晃随即找到她,向她了解列宁格勒藏品的情况。10多年后,藤枝晃回忆说:"第二天,当她把孟列夫所著的《影印敦煌赞文译注》给我看时,我惊骇得几乎要肝胆俱裂了。"藤枝晃立刻写信给孟列夫。孟列夫随即寄来

他自己著的《维摩变之研究》,之后又寄来了列宁格勒藏品目录的第1卷。藤枝晃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不安了。当时,藤枝晃作为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员,正计划遍访欧洲敦煌藏品。于是他立即改变计划,首先就是前往列宁格勒。调查的结果,藤枝晃发现了上万号的敦煌遗书,而且得知在艾尔米塔什博物馆还有大量的敦煌壁画和塑像。摸清了列宁格勒藏品的底细之后,藤枝晃继续进行他的欧洲之旅。藤枝晃相继看过了列宁格勒奥登堡搜集品、斯德哥尔摩斯文赫定搜集品、伦敦斯坦因搜集品和巴黎伯希和搜集品等。特别在伦敦,藤枝晃在库房里看到了被拍成缩微胶卷(6980号)以后未经整理的几千号斯坦因搜集品,虽然它们都是些碎片,但对于藤枝晃来说,却别有一番意义。因为他亲眼看到了这些藏品,亲手抚摩了这些碎片,并感觉到了它们的价值所在。此后,藤枝晃又连续数次前往欧洲查阅敦煌遗书原件,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所有敦煌吐鲁番文书的收藏地。①

在《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上,曾有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藤枝晃教授与敦煌学研究》一文,对他的敦煌学研究进行评价。

主要著作有:《文字の文化史》、《ペリオ蒐集敦煌写本选影假目录》、《ペリオ蒐集敦煌写本选影》、《敦煌学とその周辺》、《征服王朝》、《トルファン出土佛典の研究》等。合著有:《蒙古研究文献目录》等。主要论文有:《敦煌写本の编年研究》、《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敦煌の僧尼籍》、《敦煌千佛洞の中兴——张氏诸窟を中心としれ九世纪の佛窟造营》、《归义军始末》等。

其中,《文字の文化史》一书成为他研究中国古代文字学和版本的名著。饶宗颐先生为此书的中译本撰写了"前言"。

在《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一文中,他主张认为吐蕃占领敦煌时间是在781~848年间,而法国敦煌学者们则主张始自787年。关于敦煌藏经洞的性质问题,他就主张"废弃说",也就是说那些写本是当时寺院的废弃之物,即当时印刷佛经流行之后,此前的写本卷轴于是废弃。这就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避难说"或称"图书馆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据说,1981年,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讲演时曾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一段故事又有另一版本:据说,1981年,南开大学吴廷璆先生在主持并介绍日本敦煌学专家藤枝晃及其举办的敦煌学讲习班时曾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① 见《中华读书报》2000年8月16日。

天哪！人家无非就是针对当时国内的一些他所认为的“实际情况”说了点刺激我们民族情绪的话而已。可是却先后冒出来了“西北师范学院说”和“南开大学说”两个挨骂战场版本！可见这句话真的是深深刺痛了当时许多研究敦煌学的国内学者们的心。以至于至今还成为国内敦煌学界长久挥之不去的一桩公案。看看饶宗颐先生在为藤枝晃博士的《文字の文化史》一书的前言中是怎么评价此事的吧：

> 以后有一次在国内举行敦煌学会议，藤枝晃曾说过一句涉及敦煌学的话，引起一些人的误会。其实，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国家的提倡，莫高窟受到高度的保护，研究院设立，段文杰、樊锦诗的苦心经营，出版物的丰富，各国收藏的敦煌文物逐渐印行，大学中研究机构林立，研究人才茁秀蓬勃，敦煌研究已发展成为旷代显学，可惜藤枝已不及见。

当饶老针对藤枝博士的此说，提出了“可惜藤枝已不及见”的批评时，我们有些人还在炒作藤枝晃的此说的主战场是在西北还是在南开?！挨了骂还有主动出来捡骂的，什么样的心态！我实在搞不明白……

著名考古学家水野清一也没有忘记对敦煌学的研究。1958年，他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一文。当时，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已经成为热门课题。见尹雁《日本敦煌学史》一文中对当时几位考古学家的敦煌研究进行了介绍如下：

> 在这一阶段的日本敦煌学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即不仅研究敦煌遗书，而且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1956年，长广敏雄发表了《最近敦煌石窟的研究》，冈崎敬则在亲访敦煌千佛洞的基础上写成《大谷探险队和敦煌千佛洞》，樋口隆康的《敦煌石窟系谱》(《敦煌研究》1990年第4期)，小山满的《敦煌第六十一窟〈五台山图〉研究》(《敦煌学辑刊》1990年第1期)。1958年，水野清一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这是一篇优秀的研究著作，此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者还对千佛洞石窟进行了编年研究，如福田敏男的《试论敦煌石窟的编年》，水野清一的《敦煌石窟笔记》等。

京都学派敦煌学的转机是从高田时雄等人的“新敦煌学”的出现开始的。

高田时雄1949年6月2日生于大阪府。1965年，他考入著名的大阪府立天王寺高中。196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小川环树。1979年，他

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到法国留学，师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李嘉乐。1980 年，他获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1987 年，他就任京都大学教养部副教授。1991 年，他转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97 年，他晋升为教授。2005 年，他以论文《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取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2003 年，他担任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干事长。①

主要著作有：《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敦煌・民族・语言》、《梵谛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梵谛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等。编著有：《汉字文化三千年》、《中国语史の资料と方法》、《东洋学の系谱（欧米篇）》、《西域行记索引丛刊 I 大唐西域记》、《西域行记索引丛刊 II 大唐大慈恩寺三蔵法師传》、《明清时代の音韵学》等。主要论文有：《ウイグル字音考》、《コータン文书中の汉语语汇》、《五姓を说く敦煌资料》、《慧超〈往五天竺国传〉の言语と敦煌写本の性格》、《李滂と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日本流入の背景》、《敦煌写本研究年报》、《敦煌における五姓説について》、《内藤湖南の敦煌学》、《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に对して》、《敦煌写本を求めて——日本人学者のヨーロッパ访书行》、《清野谦次蒐集敦煌写经の行方》等。

高田教授是在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鼎盛时期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者，他有着留法的经历，接受了法国敦煌学的研究传统。回国后，他与其他几位从事西域语言和历史研究的学者森安孝夫、熊本裕、武内绍人、吉田丰共同创立了所谓的“新敦煌学派”。这使他有别于以往的羽田亨开创的以文献研究和历史语言学研究为主体的传统敦煌学派。

我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他撰写的《敦煌・民族・语言》一书，中华书局于 2005 年 12 月出版，钟翀等译。该书内容如下：

第一章　总说

敦煌发现的多种语言文献

汉语在吐鲁番——以《切韵》断片研究为专题

第二章　汉藏资料

藏文音译《寒食诗》残片

藏文书写阿弥陀经的跋文——藏汉对音资料年代考

杂抄与九九表——敦煌藏文字使用的一个侧面

藏文社邑文书二三种

① 即 International Liaison Committee for Dunhuang Studies。

有关吐蕃期敦煌写经事业的藏文资料
北京敦煌写卷中所包含的藏文文献
吐蕃期敦煌有关受戒的藏文资料
第三章　回鹘字音
回鹘字音考
回鹘字音史概述
回鹘字注音的吐鲁番汉文写本残片
第四章:其他
于阗文书中的汉语语汇
敦煌本《玉篇》
敦煌本《玉篇》篇·补遗
五姓说之敦煌资料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之语言与敦煌写本之性质
可洪《随函录》与行瑫《随函音疏》
莫高窟北区石窟发现《排字韵》札记

在敦煌学研究上作出贡献的还有金文京,他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神话,发表了《中国民间文学和神话传说研究——以敦煌本〈前汉刘家太子传〉为例》一文,获得学术界的好评。他通过对敦煌本《敦煌本〈前汉刘家太子传〉》的分析,找出了归义军节度使张氏作为神话传承人的准确身份,为唐代以前神话传承谱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

第八章
京都学派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一、语言学研究

仓石武四郎1897年9月21日生于新潟县高田市。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学生。特殊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开始接触中国古籍。1917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文学科。1921年,他大学毕业后到中国江苏、浙江进行短期游学。1922年,他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师从狩野直喜,专业研究汉语言学。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讲师。1927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28年3月23日,仓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在外研究员的身份来到北京留学。在京期间,仓石武四郎与中国学者频繁来往。他当时还向一名叫奚待国的旗人系统地学习《红楼梦》。1930年,他又得到上野育英会奖学金资助,继续在中国留学。

关于他的在华留学生活,现在已经出版了《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一书可以作为参考。我们选录一段荣新江教授的介绍如下,可以看出他的努力求学生活:

> 在日记所涉及的1929~1930学年的两个学期中,除了星期天,作者每周六天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钱玄同、吴承仕、孙人和、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学者的课程,包括音韵学、说文学、三礼、周易、文法、词学、版本目录学等。而钱玄同的音韵学课程无疑直接影响了作者回国后的汉语教学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五四新文化以来的"国语运动"在海外取得的巨大成果,正是通过钱玄同、仓石武四郎的交流而产生,这是新文化研究尚未关注的内容。这样繁重的课程学习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少见的,大量的留学生到中国来的名义都是"在外研究",主要是收集材料、进行实地考察等,在仓

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实际上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①

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后，他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1939年，他以论文《段懋堂の音韵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1940年，他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教授。战后不久，与新岛淳良等以东京大学为中心，创办中国语讲习会。1946年，东方文化研究所建立语言研究室，任该室主任。1946年10月26日，在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仓石主持召开了中国语学研究会成立会及第一次学术会议。1947年，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为核心，发行了《中国语学》刊物。仓石为该刊撰写了发刊词。1949年，他专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1958年，他从东京大学退休。1974年，他被日本政府授予朝日文化奖。1975年11月14日因病去世。

主要著作有：《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发达》（遗稿集）、《支那语语法篇》、《支那语翻译篇》、《支那语法入门》、《支那语教育の理论と实际》、《汉字の运命》、《ラテン化新文字による中国语初级教本》、《中国文学史》、《中国语法读本》、《ローマ字中国语》、《汉字からローマ字へ：中国の文字改革と日本》、《岩波中国语辞典》、《中国文学讲话》、《中国语五十年》、《中国古典讲话》、《中国へかける桥》等。有全两卷本的《仓石武四郎著作集》出版。

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清朝音韵学、现代中国文学、中国语学。

仓石本人实际上是京都学派汉语音韵学研究的开创者。在他之前，以音韵学为专业研究方向的学者几乎没有。他在日本学术界较早地运用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分析研究清代的音韵学和训诂学，甚至包括了对方言的研究，为清代传统语言学的现代化开拓了一条崭新的中西结合的路子。他在京都帝国大学任教时，首先开设了清代音韵学、小学、汉语学等课程，完全放弃了传统的训读方式来阅读中国古籍的方法，使战后京都大学的汉语研究和中国文学研究走向正轨奠定了基础。

田中谦二博士在汉语研究上，曾经参加中国语学研究会主编的《中国语学辞典》一书的编纂工作。在当时铃木虎雄教授的影响下，田中谦二在中国文学、中国语学两方面都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为他今后在任何一个方面的深造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他对元曲的研究，完全得益于他对现代汉语的研究。特别是在口语方面。

小川环树博士在汉语研究上的主要著作有《中国语学研究》一书。1974

① 见《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前言，中华书局，2002年。

年，他发起成立了专业研究汉语语言学的组织——“均社”。这是日本第一家专业研究汉语音韵学的学术组织。并出版了学术刊物。

在历史语言学的研究上，小野川秀美博士曾经编纂了全3卷本的《金史语汇集成》一书。

新村出1876年10月4日生于山口县。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山口县令关口隆吉。1889年4月，关口隆吉死于交通事故。为了生活，他成为新村猛雄的养子。他的中学时代，是在当地有名的静冈寻常中学渡过的。中学毕业后，他考入静冈县第一高中。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博言学科。1899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在上田万年的指导下，专业研究语言学。1904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就任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国语研究室助手。1902年，他转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1904年，他兼任东京帝国大学副教授。1906年开始，他到英、法、德留学，从事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学习。1907年，他转任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副教授。1909年，他结束留学生活，归国后晋升为教授。成为文科大学言语学第一讲座教授。1919年，他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36年，他从京都帝国大学退休。1967年8月17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全15卷本的《新村出著作集》。1956年，他获得日本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他的儿子新村猛也是一位语言学家，是日本著名的《广辞苑》一书的作者。现在，全国最高级别的日语研究奖就是以“新村出”的名字命名的。

但是，新村出的语言学研究更多的意义是引入了西方流行的语言学理论。而真正落实在汉语研究上是由他的弟子们完成的。

尾崎雄二郎1927年生。194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语学·支那文学科。195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1955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9年，他以论文《中国语音韵史の研究》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并晋升为教授。1983年，他发起了对汉语的研究活动，成立了经学研究班、小学研究班。1987年，他当选为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他和平田昌司编辑的《汉语史の诸问题》一书正式出版。1990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1993年开始，他转任名古屋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1999年，他从名古屋学院大学退休。2006年12月8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语音韵史の研究》、《汉字の年轮》等。合著有：《汉语史の诸问题》等。主要论文有：《“雅音交字属半齿”の读み方と三种类の门法》、《古音学における韵尾の设定と音韵特性の“豫约”の问题》、《反切

か见た〈集韵〉の问题点》、《汉语闽北方言の来母S化现象》、《切韵系韵书における韵の排列について》、《上古汉语の复声母について》、《大英博物馆本蒙古字韵札記》、《汉语喉音韵尾论献疑》、《日本古代史中国史料の处理における汉语学的问题点》、《汉语声母の音量がもたらすもの》、《汉语史における梵语学》等。

在一文中,他认为《集韵》四等切上字的分立只限于《韵镜》开口图和开合图里的牙喉音见溪疑影喻五母,反映了不同于《韵镜》音系的实际语音变化

平田昌司生于1955年2月17日。1974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8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尾崎雄二郎,专业研究音韵学和历史语言学。1981年,他修满博士学位课程学分后退学,成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85年,他转任山口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1989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2000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孙子——解答のない兵法》等。合著有:《汉语史の诸问题》、《徽州方言研究》等。主要论文有:《全浊上声と去声の合流》、《目の文学革命·耳の文学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国における听觉メディアと"国语"の实验》、《制度化される清代官话——科举制度と中国语史》、《しゃべる女·叱る男——中国の话しことばにみられるジェンダー科规制》、《清代鸿胪寺正音考》、《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语方言学研究》、《徽州休宁の言语生活》、《唐代小说史における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反切上字"匹"の一解释》等。

在《徽州方言古全浊声母的演变》一文中,他认为徽语中古全浊声母的不规则分化是由于汉语内部的派系和层次等原因而产生的,得出现代休宁方言中不送气的是古层,送气应是近几百年间显著地增加的新层的结论。[①]在《制度化される清代官话——科举制度と中国语史》一文中,他首先对中国方言的地域特色进行了说明。他注意到基础语汇的问题,提出了汉语方言中存在的"东南方言的多样性"和"北方方言与文化语汇的统一性"这两个主要表现的现象。接着,他又论述了印度语言体系对汉语音韵学的影响。然后又对高本汉为代表的汉语音韵学体系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集中讨论了四声说理论的弊端。接下来,他对诗歌用韵在科举制度上的表现进行了研究,特别注意到了南北应试者的方言爱科举制度上用韵的具体变化和使

① 见《均社论丛》第12号,1982年。

用规则等问题的阐述。这使得本文具有了超出音韵学之外的意义和学术价值。

高田时雄在汉语音韵学上的研究著作有：主编的《明清時代の音韵学》、《中国语史の资料と方法》、《东洋言语学の发展と近年の动向》、《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等书。主要论文有：《清代官話の资料について》等。在语言学上，敦煌学家出身的他以中古时代河西地区的方言为研究重点。对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问世以来的相关研究加以总结，构拟古时代的河西地区方言的音韵系统。并以此部分复原了在藏语、于阗语、粟特语、突厥语中的汉字借字、转写字的问题。为解读上述语言的文献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文字学研究

白川静的文字学研究是谁也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很显然，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古文字学的研究。目前，对于这样一位国际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我们只有白冰博士的一本博士学位论文《青铜器铭文研究——白川静金文学著作的成就与疏失》对其学术成果进行总结。该学位论文内容如下：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白川静金文研究的历程
第二节　白川静金文研究的地位
第三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现状
第四节　材料范围及研究方法
第五节　课题研究的目的和难点
第二章　《金文通释》
第一节　《金文通释》的特点
第二节　《金文通释》的成就
第三节　《金文通释》的评述
第三章　《金文世界》
第一节　《金文世界》的特点
第二节　《金文世界》的成就
第三节　《金文世界》的疏失
第四章　《说文新义》
第一节　《说文新义》的特点
第二节　《说文新义》的新见

第三节 《说文新义》的评述
第五章 《字统》
第一节 白川静独特的编纂思想
第二节 《字统》的形训特点
第三节 《字统》的音训特点
第四节 《字统》的义训特点
第五节 《字统》的形音义结合的特点
第六章 与军礼、刑罚、祭枭有关诸字
第一节 与军礼有关诸字
第二节 与刑罚有关诸字
第三节 与祭枭有关诸字
第七章 与乌占、神梯、盟誓有关诸字
第一节 与乌占有关诸字
第二节 与神梯有关诸字
第三节 与盟誓有关诸字
第八章 从戈矢、人儿、口曰等偏旁诸字
第一节 从戈从矢之字
第二节 从人(尸)从儿之字
第三节 从口从曰之字
第四节 从宀从辵之字
第五节 从糸从殳之字
第九章 金文词类、短语、句子之训诂
第一节 金文名词训诂
第二节 金文动词训诂
第三节 金文形容词训诂
第四节 金文连词训诂
第五节 金文短语训诂
第六节 金文句子训诂
第十章 金文研究的方法及其运用
第一节 金文研究的方法
第二节 从井从白诸字
第三节 鹰与从鹰之字
第四节 士土、公颂讼辨
第五节 囊余、来束市辨

第六节　春秋青铜器器名方言考

第七节　春秋青铜赂器功能考辨

虽然已经出现了对白川静的金文研究进行总结的著作，但是，至今还没有诞生对白川静的甲骨学、《说文》学、字典学的研究进行总结的博士论文或者学术著作。2007 年 4 月 13 日，当温家宝总理来访时，立命馆大学特别赠送了白川静教授的三本著作《字统》、《字训》、《字通》给温家宝总理，足见他在中日两国学术界和政界的影响力！今天，国内外学术界公认：在殷周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有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白川静 4 人。

他一生在古文字学研究上最主要的学术贡献就是撰写了两部学术巨著《说文新义》和《金文通释》。前一部巨著更多是利用甲骨和金文史料，对传统的文字学经典著作《说文解字》进行全新的考证和解释，实现了甲骨学成立以来百年间中外学者无人能及的巨大工作。而后一部则集中考证并解释商周青铜器铭文的意义，把作者景仰的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的研究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阿辻哲次 1951 年生于大阪市。因为他父亲经营一家活字印刷的公司，使他从小就开始对汉字产生浓厚的兴趣。1970 年，他从大阪府立北野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4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汉字学。1979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出任静冈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81 年，他转任京都产业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84 年，他转任京都大学教养部副教授。现为京都大学人间环境学研究科教授。

主要著作有：《汉字学——说文解字の世界》、《图说汉字の历史》、《汉字の字源》、《中国汉字纪行》、《汉字の社会史》、《タブーの汉字学》、《“名前”の汉字学》、《部首のはなし》、《部首のはなし2》、《文字の文化史》、《近くて远い中国语》、《汉字を乐しむ》等。主要论文有：《日本における汉字の现状》、《段懋堂〈说文解字读〉について》、《“史书”と“史篇”》、《北京图书馆藏段玉裁〈说文解字读〉初探》、《王锡侯〈字贯〉の研究》等。

他在汉字文化学的研究和普及方面成绩卓著。他试图将传统的《说文》学打造成现代汉字学的努力，是在借助了西方文字学理论的基础上而展开的。而他对汉字的研究又以文化学而非传统训诂学的模式而进行。

浅原达郎生于 1955 年 11 月 27 日。1974 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8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古文字学。1982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84 年，他转任神户商船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97 年，他转任京都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现为教授。

合著有:《训读说文解字注金册》等。主要论文有:《殷代の甲骨による占いと卜辞》、《西周后期の编钟设计——戎肆庵读裘记》、《“热中”の人——端方传》、《甲骨学と金文学》等。

在《西周后期の编钟设计——戎肆庵读裘记》一文中,他以《子犯钟》和《晋侯苏钟》作为资料,对西周后期到春秋中期编钟的设计和调律的方法变迁,进行了周密的考证研究。

三、语法学研究

1956年,青木正儿发表了《虚字考》一文。此文是研究古汉语语法问题的论文。他在该论文中首先从文献上考证“虚字”这一概念诞生在南宋时代。这为古代汉语的语法研究提供了参考。

仓石武四郎在语法研究上的主要著作有:《支那语语法篇》、《支那语法入门》、《支那语教育の理论と实际》、《中国语法读本》等。他应该是日本现代学术史上的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创者。

志村良治,1948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东北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1952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汉语。1957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爱知大学文学部讲师。1962年,他转任东北大学川内分校讲师。1964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67年,他转任文学部副教授。1973年,他晋升为教授。1974年,他以论文《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取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故此,将他的研究列入京都学派。1984年2月8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两卷本的《志村良治博士著作集》等。主要论文有:《中古汉语の语法と语汇》、《汉语における使成复合动词の成立过程の检讨》、《“甚么”の成立》、《〈老子〉の中の成语》、《“从渠”について——唐代における纵予の表现》、《陶渊明“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考》、《〈冥报记〉の传本について》等。最近出版了对他回忆的纪念文集《白云遥遥——回想の志村良治》。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一书分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由21章组成,研究中世汉语的语法和语汇。后半部分由8章组成,对具体的语法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在该书中,他使用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敦煌变文集》、《世说新语》和《游仙窟》三书。在《汉语における使成复合动词の成立过程の检讨》一文中,志村良治认为使成复合动词产生于中古时期。在《“甚么”の成立》一文中,他又主张“恁么”是唐代出现的俗语指示副词。

第九章
京都学派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虽然京都学派一直研究中国古典而著称，但是也不乏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该学派的近现代中国研究分为革命思想和革命人物研究、现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研究两大方面。

一、革命思想和革命人物研究方面

关于现代中国革命思想的研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小岛祐马，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将中国现代革命思想与传统的儒家革命理论联系起来，他暗示着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延续性。

而以研究明清思想而著称的岛田虔次，多次和近现代政治思想史家小野川秀美一起合作，展开了对近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的研究。

小野川秀美1909年出生于高知县。1928年，他高中毕业后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33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矢野仁一和羽田亨，专攻东洋史研究。1938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成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员。1940年，他任京都帝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到此为止，他一直研究清代的突厥史、回鹘史为主。1943年，他晋升为副教授。进入4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转到了以晚清政治思想史和现代政治制度史为主。他以论文《清末政治思想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晋升为教授。1973年3月，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同年4月，他转任奈良大学文学院教授。1980年7月因病去世。

主要著作有：《清末政治思想研究》、《资产阶级革命の比较研究》等。主编有：《孙文、毛泽东》、《〈民报〉索引》、全五卷本的《宫崎滔天全集》等。

岛田虔次写有《中国革命の先驱者たち》一书。在该书的《关于章炳麟——中国传统学术与革命》一文中，他以章太炎为例主张：在中国近代革

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只有儒教与佛教。[1] 他总结说:

> "五四"前后涌现出许多思想界、学术界的人物,也都出自太炎之门,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以及黄侃、吴承仕、朱宗莱、马裕藻、朱希祖等等,只是数数人名,也应是思过半矣。

他在《章炳麟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一文中评论:

> 在这个改革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最初论战中,作为革命的争辩家的炳麟面目,已毫无遗憾地发挥出来了,而最为轰动的是他在论战中,直呼当代皇帝的名字,骂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

岛田虔次曾经主持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辛亥革命研究班和五四运动研究研究班。

岛田虔次主张,康有为是希望在中华民国推行孔教,强化精神的纽带,促进精神的振兴,进而将一盘散沙的民众汇聚在一起,形成国民的强固统一。[2]

他还曾编译全五卷本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书。

岛田虔次并和小野川秀美一起编纂了《辛亥革命の研究》一书。岛田虔次在该书中讨论了大隈重信的几次政治演说。他发现:大隈的演说在鼓吹中国必须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

岛田虔次主持编纂了《新儒家哲学について——熊十力の哲学》这一研究报告。在研究论文中,岛田虔次认为熊十力哲学受到西方进化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影响。而小野川秀美在《清末の思想と进化论》一文中也表现出类似观点。

在工具书上,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二人主编了《〈民报〉索引》一书。

岛田虔次的学生中,继承了他的进现代中国研究的是森纪子教授。

森纪子生于1945年。1964年,她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8年,她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师从岛田虔次,专业研究明清史。1973年,她大学院毕业后就任神户大学文学部助手、讲师、副教授、教授。2004年,她以论文《转换期における中国儒教运动》取得文学博士学位。2009年,她从神户大学退休。

主要著作有:《转换期における中国儒教运动》等。翻译著作有:《中国近世の宗教伦理と商人精神》等。主要论文有:《梁启超的佛学与日本》、《コ

---

① 《中国革命の先驱者たち》,筑摩书房,1965年,第169页。

② 《辛亥革命の研究》,筑摩书房,1978年,第9页。

ロニアル空间・青岛における文化摩擦と时代相》、《盐场の泰州学派》、《遗老辜鸿铭における文化保守の论理》、《清代四川の盐业资本——富荣厂を中心に》等。

她的《转换期における中国儒教运动》一书由两部组成。第Ⅰ部《明末の世相と儒教の变容》,第Ⅱ部《中国の近代化と儒教运动》。她的研究核心是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这两大转换时期。在前一部分,他继承了岛田虔次的观点和学风,对王艮等人泰州学派的思想进行了研究。在后一部分,她则集中以辜鸿铭等传统知识人的儒家思想和现代社会的矛盾与转化为研究核心。对于康有为,她在《中国的近代化与孔教运动》一文中分析了康有为推广孔教的原因,她认为:

> 正是康有为的这种把西方富强的形成根源,归结为宗教与科学以及社会组织的泰西认识,才是孔教运动具体化的动力。①

当然,她也反思了发生在部分地区的(如青岛)破坏孔庙的现象。在近现代中国思想的研究上,她很推崇余英时先生的研究,并且亲自将余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译成日文出版。

研究商周史的贝塚茂树受其父亲对现代中国政治研究的影响,也对近现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保持着高度的兴趣和研究努力。1954 年国庆节,他曾作为日方代表被邀请出席国庆晚宴,亲眼见到了毛泽东主席。1956 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先生诞辰 90 周年之时,他特别来电表示祝贺。电文如下:

> 因有事不能参加孙中山先生诞辰 90 周年纪念典礼,我感到非常遗憾。50 年前协助了孙先生民族解放运动的我国同志们,假使活到现在,亲眼看到这运动获得了伟大的成功而人们这么盛大地庆祝孙先生的诞辰,不知他们如何地欢欣鼓舞!如同我国的先辈曾经声援了贵国的解放运动,我们衷心庆祝这一伟大的纪念日!

贝塚茂树在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中国の传统と现代》和《毛泽东传》等书,《中国の传统と现代》一书主要由《中国の民族意识》和《中国の革命と传统》两部分构成。

在该书中,他首先将现代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定义在民族主义的角度上,他认为:

> 从现在稍微往前一段时间内,一般认为中国人是非常缺少民族意

① 见《近代中国与世界》第 3 卷,第 538 页。

> 识的。可是,指导着现代中国的毛泽东组织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运动之时,在初期的毛泽东思想中,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方面相比,当然作为民族主义者的那一面更强一些。①

宫崎市定认为,近代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本质上只是一场"排日运动"而已。他并且还主张:"'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实质上与五四的排日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当然,他的这一主张以后遭到了狭间直树的反对。因为狭间直树认为:"五四运动期间的上海三罢斗争,超出了反日斗争的范围,已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寺广映雄生于1922年2月5日。1941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45年,他大学毕业湖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近现代中国。1950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出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而后就任大阪教育大学文学部讲师、副教授、教授。1978年,他以论文《中国革命の史的展开》取得文学博士学位。1986年,他从大阪教育大学退休后,转任神户女子大学。1990年,他从神户女子大学退休。2006年2月10日因病逝世。

主要著作有:《中国革命と日本・アジア》、《中国革命の史的展开》等。主要论文有:《民国军阀期における中国统一策について》、《越南初期民族运动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云南护国运动について》、《台湾民族运动と中国:辛亥革命の影响を中心にして》、《"革命瓜分论"については》、《辛亥革命期における陕西》等。

比如,在《中国革命の史的展开》一书中的《云南护国运动について》一章,他就考证出云南护国起义的领导者并非传统说法的唐继尧、蔡锷二人,而是当时云南新军的中下级少壮军官们。而在《"革命瓜分论"については》一章中,他又肯定了梁启超等人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清醒认识。

而在对革命思想和革命人物的研究上取得丰硕成果的是竹内实教授。

竹内实,1923年6月12日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村。1942年,他才回到日本,考入二松学舍专门学校学习。1946年,他从专门学校毕业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5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东京大学大学院中国文学科,师从仓石武四郎博士,专业研究中国近代文学。1955年,他从东京大学毕业后,成为中国研究所助手。1957年,他转入东京都立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60年,他和野间宏等人一起到中国访问,并且特别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很多年以后,竹内实回忆起他受到毛主席接见时还非常激动。

---

① 贝塚茂树《中国の传统と现代》,中公新书,1973年,第2页。

他说：

>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毛泽东原来的理想是当一名小学教师，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上过师范学校。但是后来却走上了革命道路。

1973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75年，他晋升为教授。1987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以后又出任松阪大学、关西大学、北京日本学中心主任教授等职。

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等。合著有：《毛泽东——その诗と人生》等。主编有：全十卷本的《毛泽东集》和全九卷本的《毛泽东集·补卷》及别卷一卷。翻译著作有：《毛泽东语录》等。竹内实是在日本战后最早开展现代中国研究的权威学者，被誉为日本"毛泽东学"的权威和"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

在名作《毛泽东——その诗と人生》一书中，他开创了以诗证史的现代中国研究的模式。当然，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学术关系和模仿的结果。因为正是陈寅恪的以诗证史的研究元白唱和诗，才有了更多的学者对他的模仿和应用。然而，对毛泽东诗歌的证史研究却是他首先运用的。他不赞成有些人主张的《沁园春·雪》有帝王思想的观点。相反，他更多地从毛泽东诗词中读出了毛的历史使命感和负责感。他认为毛泽东诗词既体现了古典的豪放派诗歌的气魄，也具有婉约派诗歌的特点，是这两派的有机结合。他高度赞扬了毛泽东艺术人生的诗人特征。

在具体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上，竹内实比较看重对文献的比较研究。这使他赢得了毛泽东文献研究头号权威的称号，受到了国际毛泽东研究领域的广泛尊重和关注。

小野和子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的京都学派著名女教授。

在现代中国研究上，她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女性史——太平天国から现代まで》、《五四时期家族论の背景》等。主要论文有：《太平天国と妇女解放》、《社会主义中国の女性解放论》、《旧中国における女性哀史》等。

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的森正夫，还是研究李大钊的专家。李大钊曾于1914年1月至1916年5月留学日本。因此之故，森正夫在《李大钊》一书中主张：

> 把在东京时代以某种形式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深藏在心中，一旦实现这种思想的外部条件成熟时，就将其作为自己思想的内在发展而开始确认这一理论。

他还注意到李大钊"在留学期间写的论文《民彝与政治》中，屡屡出现'立宪'的用语，虽然吉野作造教过他，但在此前的文章中却从未使用过"这

一现象。可以证明李大钊的思想和日本近代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系。

森时彦生于1947年4月17日。1966年,他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70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近代史。1975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就任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讲师。1990年,他晋升为副教授。1995年,他晋升为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棉业史の研究》、《五四时期の民族纺织业》等。编著有:《在华纺と中国社会》、《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小史》、《中国近代化の动态构造》等。合著有:《データでみる中国近代史》等。主要论文有:《生计学と经济学の间》、《论民国十六年九月上海日商纱厂的产品结构调整》、《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机械制绵丝の普及过程》、《民族主义と无政府主义》等。

可以看出,森时彦的研究主要围绕着旧中国纺织工业史为核心。他主持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20世纪中国の社会システム"等相关研究项目。

狭间直树1937年8月30日生于兵库县。1956年,他从北野高中毕业后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61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近代史。1966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1968年,他就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助手。1974年,他转任佛教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77年,他转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1985年,他晋升为教授。2001年,他从京都大学退休后,转任日本孙中山纪念馆馆长。2007年,他从日本孙中山纪念馆退休。

编著有:《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梁启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中国国民革命之研究》、《西洋近代文明と中华世界》等。主要论文有:《孙文思想における民主と独裁——中华革命党创立时における孙文と黄兴の对立を中心に》、《五四运动と日本——亲日派三高官"罢免"问题をめぐって》、《初期アジア主义についての史的考察》、《中国近代における帝国主义と国民国家》、《三大政策と黄埔军校》等。

他在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先后主持了"五四运动の研究"、"民国初期の文化と社会"、"国民革命の研究"、"一九二〇年代の中国"、"梁启超の研究——その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认识について"等研究项目。

在他主编的名作《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一书中,他首先研究了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和"私德"两个概念的日本思想背景。他还在该书序言中主张:

在此,我想提及的是,与其说是梁启超以自己的方式主动摄取明治

时期形成的日本文化，倒不如说是明治时代的日本“培养”了梁启超。

狭间直树总是注意近代中国革命者之日本背景的研究。他还擅长将不同版本的革命文献进行对比研究的研究方法，对于现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有效。因为现代文献往往因为时代、人物、权力及政治的变化而变化。于是，同一文献几有先后不同版本的文献问世。狭间直树将研究古典汉学的方法运用到现代文献的文本研究上，非常成功而且有效，充分地体现了京都学派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在现代中国学研究上的成功应用。

二、现代文学作品和文学家研究方面

仓石武四郎比较早的以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活动中。1955 年，他参加了全 15 卷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的编译活动，他主编了该全集第 14 卷《短篇集・谢冰心篇》。

萩野脩二生于 1941 年 4 月 17 日。1966 年，他考入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语学・中国文学科。1970 年，他大学毕业后考入大学院，专业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1975 年，他修满博士研究生课程学分后退学，就任三重大学文学部讲师、副教授、教授。1991 年，他转任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の改革开放——现代小说スケッチ》等。合编有：《中国文学最新事情：文革、そして自由化のなかで》等。主要论文有：《冰心与大海——冰心试论》、《冰心的国际性》、《谢冰心的作家魂——一片冰心》、《日本关于冰心的介绍——清纯的力量》等。

虽然是研究现代文学，但是萩野脩二还是亲自调查文献，并实地考察作家的生存环境。并且注意比较不同作品的版本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数量还真不太多，这反映了研究古典文献中的中国和研究中国的古典文献才是京都学派汉学家们 100 多年历史上的正宗而主要的研究范围。

列国汉学史书系
Sinological History Series

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印章篆刻：郑怀宝
责任编辑：杨　雷
封面设计：徐道会

ISBN 978-7-5077-3721-9

9 787507 737219 >

定价：45.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京都学派汉学史稿
作者=刘正著
丛书名=列国汉学史书系
页数=335
SS号=12792681
出版日期=2011.05
出版社=学苑出版社
ISBN号=978-7-5077-3721-9
中图法分类号=K207.8
原书定价=45.00
主题词=汉学-研究-日本
参考文献格式=刘正著.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05.
内容提要=本书作为“列国汉学史书系”之一，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阐述日本汉学京都学派诞生的原委、发展时期的各分支流派以及鼎盛时期的成就。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上篇　释义与综述
第一章　京都学派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第二章　东洋史学京都学派诞生的前前后后
中篇　创始与发展
第一章　狩野直喜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第二章　桑原骘藏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第三章　内藤湖南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第四章　矢野仁一和东洋史学京都学派
第五章　小川琢治和历史地理学京都学派
第六章　滨田耕作和考古学京都学派
第七章　羽田亨和敦煌学京都学派
第八章　铃木虎雄和支那文学京都学派
第九章　高濑武次郎和支那哲学京都学派
下篇　鼎盛与辉煌
第一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第二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思想史研究
第三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古代史研究
第四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科技史研究
第五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考古学研究
第六章　京都学派的中国佛学研究
第七章　京都学派的敦煌学研究
第八章　京都学派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
第九章　京都学派的近现代中国研究
封底